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大本营，完全操纵在一个人手中。曾作为天才的战局计划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的发源地，对很多人来说、大本营甚至在战争形势恶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德国军队心怀坚定信念的可靠支柱。但它最终也没有使大家——国防军和人民——免遭战败的厄运。甚至到今天，在当代人面前提起“元首大本营”，都似乎要冒一点风险。

德国公众的这种义愤，当时和现在主要是针对身为“国防军最高司令”的希特勒个人的。然而，在大本营总参谋部身居高位的那位军官，也应承担部分责任，但仅仅是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这个职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而且还因为他的经历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维系在一起。如果当时的条令对职责作了另一种规定，明确指出不包括高级总参谋部军官的所谓“共同责任”；如果那些年里，公正和邪恶对德国大本营的最高指挥只是偶尔发生影响；如果战后同盟国法庭对总参谋部军官的责任，进行了完全相反的判决，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自己良心上的自责了。因为被置于这种地位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承认，上司们的可怕的命运之力从他身边掠过的时候，都不会不留下痕迹的。

尽管如此，为了满足历史研究者的需要和愿望，作者还是欣然命笔。这也是为那些同路人，履行他个人的一点义务。正是由于那些站在第一线的高级军官们残遭非命，才能使作者在战后对德国大本营及其国防军统帅部的本质和作用，作只言片语的描述。

但是，该书的这一特殊目的，不应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性。促使作者写书的动机，恰恰是想进一步澄清各种事件，使读者对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朽中，对软弱和失职没有进行指摘；同样，也没有将成绩和功劳作为辩解的资本。在希特勒面前，每一个军官都不可能有独立作出抉择和采取行动的自由。对这一点，该书比战后任何一本著作都进行了更清楚的描述。这种状况，在国防军统帅部首脑凯特尔和约德尔，与其下属的总参谋部军官们——作者也在此列——之间，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据作者多次观察，每一位来大本营听报告和作汇报的前线司令官，几乎没有一位不感到希特勒的束缚和压力。在这方面对国防军统帅部的高级军官们进行“辩解”，已不属于事实范畴。超出事实之外的东西，应留给历史去评说。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写作的源泉，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部回忆录多处提到一大批原国防军的军官，其中几位仍在今天德国军队里担任要职。对本书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妨前去核实和考证。此外，部分迄今尚未发表的命令和文件；公务日记和个人日记；引自备忘录和其他战后著作的可告见证；希特勒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对本朽都是一种充实和佐证。当作者 1960 年夏动笔之前，就已经收集和整理了若干年的资料。依靠这样的资料，作者就不必专门去澄清“传闻”中的流言蜚语，也不必去校正大量“报道”中关于德国大本营的不实之词。有些不属于军事范畴的无关大局的或与此有关的事，部不在本书考虑之内。

此外，还必须说明一下，根据德国军语的习惯用法，本书使用的“大本营”一词，是国防军最高机构从事指挥和命令活动人员的总称，在其他地方则指领率机构的驻地。

瓦利蒙特

于泰根湖畔的
罗塔赫—埃根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瓦尔特·瓦利蒙特曰1938年9月，在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即总参谋部）任国防处长，1939年9月升任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直至1944年9月因病离职。此间，山少将逐级晋升为炮兵上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几年中，瓦利蒙特在希特勒和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拟制厂大量指令和作战行动计划，参加了希特勒召集的每日军事会议，被多次派往前线巡视。

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并引证大量已经或尚未发表的国防军统帅部战时日志、私人日记、由希特勒签署的指令、作战命令，以及希特勒与其将领们的谈话记录等宝贵资料，重点介绍了德国国防军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活动。该书对于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国防军领率机构由组成到崩溃的全过程，德国几次重大战局决断和作战计划的出笼经过，以及希特勒与其将领们的复杂关系，是一本难得的书；对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译本删去了一小部分不甚重要的当页注释、附录及人名索引。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1990年3月

出版说明

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需要，在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关怀和支持下，军事科学院组织翻译出版一批有代表性的外国军事著作，供全军学习、研究、借鉴之用。这批外国军事著作，包括有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军事辞书，军事历史、军队建设以及外国法典、条令等，有些著作在国外是有一定影响的。这时比图书，内容广泛而丰富，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并照顾到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当然，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并非都是正确的，请读者注意鉴别。

这批外国军事著作，从现在起陆续出版。对选题和译文方面的问题，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军事科学出版社

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第一部　基　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德国的最高指挥层还没有一个步调一致、精明强悍的大本营。位于帝国之首的那位独一无二的人，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于 1939 年 9 月 1 日发动了战争。当天傍晚，在柏林老总理府的冬园里临时举行了一场形势报告会。国防军各级军官以及社会上的名贵显流接踵而至。被召来作报告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①军官瓦利蒙特上校面对这一场面，不禁回忆起“华伦斯坦军营”一剧中的舞台场景，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的报告并非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他讲的主要是希特勒感兴趣的多：德军越过波兰边界后向纵深挺进的公里数。戈林从报告中得知，“他的”空军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戈林一直蔑视总参谋部的工作，他总是嘲笑前不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拟制的“第 1 号战争指令”。尽管这份指令是由希特勒签署的，他仍然挖苦说：“这团废纸对我有什么用？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冬园的来访者和通讯兵穿梭往来，行迹匆匆。报告完后，报告人也悄然离去，杂乱与严肃的鲜明对比，使他感触颇深。

第二天、凯特尔②告诉瓦利蒙特——自 1938 年秋季以来，瓦利蒙特便成了凯特尔的第一位合作者——希特勒将乘坐所谓“元首专列”随部队进入波兰，国防军也要派一位高级军官随专列前往。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瓦利蒙特陪同元首前往，还是将位置让给根据动员令刚刚调回指挥参谋部任参谋民的约德尔少将①？由于作者对希特勒在此期间的军事指挥行动感到异常震惊和茫然，便毫不踌躇地把位置让给了担任要职的约德尔。9 月 3 日，“元首专列”在所谓“头面人物”的簇拥之下——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军事人员，毫无目的地向东驶去。因此，这个在波兰战局中被称为“元首大本营”的专列，实际上名不符实。因为在随同的“要人”之中缺少最起码的真正干事的人。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仍然还在柏林②。

人们不禁要问，何以产生这种混乱状态，原因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国防军的所谓“领率机构”进行一番探讨，因为它对大本营的性质和作用一直发挥着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日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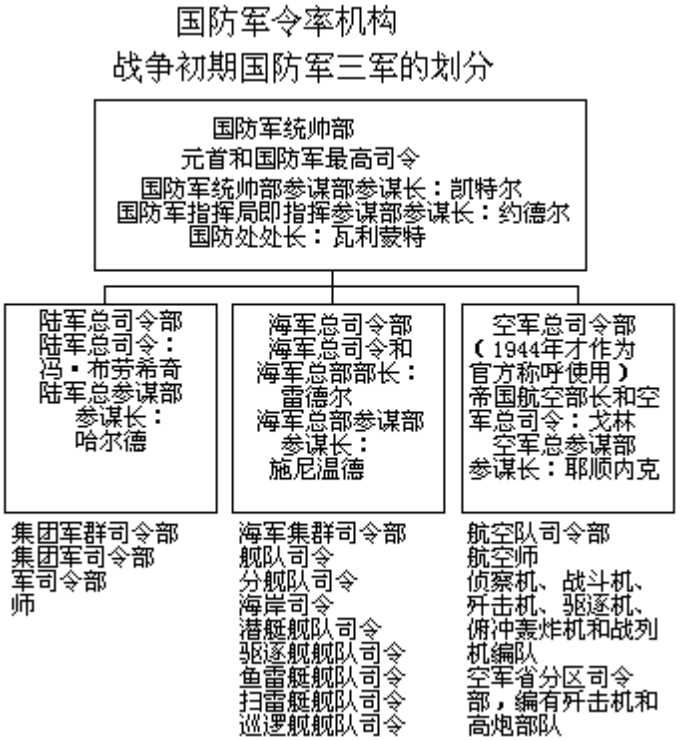
第一章国防军的领事机构

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

早在 1933 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种权力，那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指挥权”之上。自 1935 年 3 月宣布“国防自由”①以来，这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参见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②的其他手段，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从此走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　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通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领域。因此，一个新的执掌

附图一



全面指挥大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必须在国家元首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

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自 1934 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加了一些参谋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

理任务的“局”①。但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轻的空军总参谋部来说，也被视为一种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凌驾于陆军、海军之上的指挥参谋部，更何况“陆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称之为“最高统帅部”——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程。

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协调统一

鉴于以上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对布洛姆贝格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陆军总司令、上将冯·弗里奇男爵认为，在德国乃全将来的大陆，陆军仍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对新出现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30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陆军总司令是‘战争中的头目’”。“因此，他必须是国家元首在全部战争指导问题上——也包括空、海军作战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以及陆战问题的唯一顾问”。所以，当新组建的、作为其上级的国防军司令部，利用一批陆军将官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应当为陆军作事的，占据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焦躁不安。而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径来维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领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而帝国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与希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①。

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之中。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次国防军统帅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1937年的唯一一次国防军军事演习。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及军争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路，同时——自 1935 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持，为此约德尔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年所要解决的眼前问题是要设立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的所谓“国防军总司令”。他应当取代陆军各军区司令的职位，包揽国防军的一切任务，其中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内政和防御问题、国防经济和征兵事宜。

工作上的紧张和对立也渗透到了人际关系之中。结果，隐藏在从陆军脱颖而出的、目前担任要职的将军们之中的分裂逐步公开化。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周围同事结成亲密伙伴，使最高军官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民族社会主义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旧的陆军派。

尽管如此，布洛姆贝格不仅在一触即发的混乱之中，使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还想利用他优越的地位及其军事权威，对战争政策施加决定性、至少是制约性的影响，或者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施加影响。当时发生的几件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布洛姆贝格的态度。希特勒曾于1937年11月5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国防军总司令和陆军在反对这一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希特勒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备战时，布洛姆贝格在同年12月13日作的一次报告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国防军战争潜力的极端不足，特别是弹药的短缺，此事也表明他为避免战争危险而持的反抗态度。一年前，他还曾激烈反对大量军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此事很少为人所知，至使陆军总司令没有表态的余

地。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担任要职的将军们、总参谋部和陆军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布洛姆贝格用他宽厚的脊背隔在我与国防军之间。这是时代的产物。”

希特勒攫取军权

1938 年 2 月 4 日，希特勒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将这一“ 障碍 ”铲除了，自己接管了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 最高司令 ”。自此，除了在希特勒接管的、原封未动的布洛姆贝格的参谋部里委任凯特尔为“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①之外，在希特勒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之间再没有任何机构了。实际上，当时围绕国防军参谋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军抬挥参谋部，在陆军和海军的备忘录里或口头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论。从那时候起，戈林一头倾倒在凯特尔一边。所以，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偏爱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无条件地做一名希特勒的“ 忠实信徒 ”，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地觊觎整个国防军的指挥大权。即使不能成为布洛姆贝格的继承者②，也许会有希望被希特勒任命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中的一名常务代表。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军总司令的职位，使他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联合起来，激烈反对新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亲自接任国防军最高指挥后，他的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现在不是组建一个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成为全部作战指挥问题的最高顾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应当编入陆军总参谋部。

使人感到离奇的是，贝克上将①于 1938 年 2 月再次在凯特尔面前对陆军的要求进行辩护时，其所用的言辞与希特勒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第一次谈话相差无儿。约德尔在他的记录中对他们如出一辙的谈话作了这样的记载：两者都说：“ 陆军对德国来说是决定性因素。 ”于是，贝克便从中得出结论：“ 陆军必须领导战争。 ”希特勒则指出：——尽管是充满理智的——“ 其他军种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 ”。但是，身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谨慎从事，防止将来他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受到了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参谋部精神的束缚。然而，贝克也不仅仅是企图为当时的国防军树立一个健全的领率体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即当陆军执掌国防军控制大仅之后，不是“ 进行 ”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关于他的这一思想——撇开他后来的行动不谈，仅从他所说过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写道：“ 政治……产生于陆军的效率。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效率也可以决定政治企图的界限。 ”这些潜在的、重大的矛盾，陆军想设法给以解决，但直到 1938 年 2 月仍悬而未解。这种矛盾不用说是当时，就是时至今日还未被世人所知。

1938 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现行体制，似乎最终结束了在组织领域内甚至波及到陆军高级职位的争夺。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这一由布洛姆贝格所建立的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他多年的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所取得的胜利，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被无所不管的独裁者兼并，他们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期望也化为泡影。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防军统帅部由于希特勒的接管，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已失去了它的纯军事特点。更有甚者，过去在布洛姆贝格领导下的国防军总司令部“ 对政治领导来说曾是维护军队利益、对国家领导来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军事指挥机构 ”，现在，却成了一个“ 工作班子 ”，更确切地说，是“ 政治家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 ”。这位新任

最高统帅从走马上任伊始，几乎没有几个星期，即在他还未开始滥用职权达到强权目标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据凯特尔将军的能力和素质，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当了“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以参谋长的身份辅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没有考虑给他什么职务①可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对希特勒在贺饲中的一句话深信不移，经久不忘。希特勒说：“您是我的知己，是我在国防军问题上的唯一顾问。”凯特尔铭记着这一颂词走上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从此，他在虔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和指令。他以认真的态度、不倦的精力，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然而他的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寻求平衡，这就成了他走向灾难的原由。约德尔也在忠于职守，勤恳地工作着——尽管是出于其它企图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谨小慎微，把任何一点点自己的和别人的批评意见都深深地埋在肚子里①。由于对希特勒的绝对相信以及在他们脑子里已形成的国防军已构成统一指挥的固定看法，使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首脑对他们的“娘家”——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产生了对立情绪，而且愈演愈烈。这样，国防军的内部团结每况愈下，特别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一些军官把维护与“党”的关系视为自己独有的、不允许任何人介入的事情，使国防军的分裂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从 1938 年春季起，国防军也逐渐被卷入希特勒的欧洲政策。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而在精神上、理论上或实践上为改进现行体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产。由于希特勒的反复无常的、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的令人生厌的作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2 月 18 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凯特尔保证，“在没有听取他的参谋长的意见之前，他绝不在有关国防军的问题上作任何决断”。然而，仅在数周之后，在准备“合并”奥地利的问题上，他不给周密的军事计划工作留出时间和余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险，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混乱。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希特勒获知许士尼格要进行“公民投票”①的消息后，这位国防军最高司令便于 3 月 9 日夜晚，紧急召见戈林、赖歇瑙——从罗马赶回，以及另外两名他熟悉的将军，共同磋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恐吓和高压的措施。也许到 3 月 10 日清晨，凯特尔才从他副官那里知道戈林等人已在希特勒那里。“10 时驱车去总理府”，约德尔写道，“我随后前往，向他呈交一份旧的作战方案”。过了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也被召来，他向希特勒报告说，陆军对此没有丝毫准备，要想动员计划内的部队，必须在 5 个小时之内临时起草一份紧急命令。于是在此基础上，3 月 11 日国防军统帅部发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说，希特勒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海军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配合，便独自命令“全部舰船返国”。

同年，由于在苏台德危机过程中准备以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一事，使国防军最高司令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极度紧张。这是作者 1938 年暮春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炮兵上将之命前往柏林参加总参谋部制定的“绝色方案”的“最终会商”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当时作者正在杜塞尔多夫任团长。在一大群与会者中间，没有看到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凯特尔，也没有看到约德尔，更没有看到一名他们的

总参谋部军官。对于这个使人感惊讶的问题，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赫上校作了令人惊讶的回答：“这里研究的是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关。”贝克紧接着所作的发言，是唯一的对希特勒和国防军统部所制定的计划和下达的命令的示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只能有保留地表示赞同。此后，贝克还公开地以其他各种方式想打消希特勒的企图，直至 1938 年夏他被黜职。

对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几件事情上也表露无遗，直至哈尔德接任贝克的陆军总参谋长之职后为止。在 1938 年 9 月 9 日夜直至次日 4 时召开的纽伦堡‘帝国党代会”上，又发生了一次争论。在会上，希特勒面对陆军首领的顽固态度，要求他们改变其独出心裁的展开和作战计划。当时作为旁听者出席这次会议的凯特尔在回到柏林后，对约德尔抱怨说：“他对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曾尽过很大努力，现在已对他大失所望，这种争论……将最终导致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失败，但他无力阻小。”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利用这一机会，“根据他从纽伦堡得出的令人沮丧的经验，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强调说：“他绝不容忍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随意进行批评，不允许他们牢骚满腹和吹毛求庇”。对凯特尔表示完全支持的约德尔上校,根据希特勒在 9 月 12 日一次讲话中谈到的“与捷克进行一次了不起的清算”，这句话，希望“在我们人民和军官团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他们的怯懦和自负而脸红”约德尔在他这篇日记的结尾写道：此外，元首还知道，陆军总司令向他的将军们寻求支持，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使元首能看清他的冒险行动并幡然悔悟。他自己表示无力对元首施加影响。

正因为如此，纽伦堡笼罩在冷若冰霜的气氛之中。令人痛感悲切的是，元首背后虽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却得不到陆军将军们的支持。

我认为，他们只能以实际行动来补偿他们由于缺乏精神力量和忠顺而犯下的过错。这与 1914 年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军队里只有一种不顺从，即将军们的不顺从，这种不顺从归根结底来自于他们的狂妄自大。他们不再相信和顺从元首，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他们看到的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二等兵，而不是俾斯麦以来的最伟大的政治家。”①

早在纽伦堡会议以前，就明显地出现了危险征兆，它是希特勒推行的灾难性政策及其在军事要求上执掌大权的必然结果。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忠于职守，以及包含其中的“对全国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方面可与其先辈媲美，②然而却被希特勒扼杀在萌芽之中。希特勒的“工作班子”即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对布劳希奇在哈尔德的支持下，在纯军事指挥问题上仍固执己见表示愤懑不平。为此，他们重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希特勒的意志，在军事领域为他铺平道路。这显然同布洛姆贝格所寻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布洛姆贝格的司令部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过早夭折，但在其作战处里，始终保持有 6 至 8 名军官。然而从现在起，它的工作界限却落得一个在独裁音进行本能的政治干预与其所产生的军事后果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往这边移动，则毫无影响；往另一边移动，就必须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认可。这样，参谋部在国防军传统体制里，比过去更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它除了一次又一次地借用希特勒的权威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苏台德危机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作者被调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准备在熟悉一段工作之后接替约德尔的职务。作者当时的亲自经历也许更能说明

当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状态。约德尔首先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他说，不仅苏台德地区已并入德国——这已通过新闻界为众人所知，而且还将彻底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政体作为备战的目的。紧接着，约悠尔将话锋一转，又谈到了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说，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因反对希特勒计划而被免职，由哈尔德接任。此消息未向舆论界以及在国防军的更大范围内宣布。尽管人员作了更换，但在陆军总参谋部内，仍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抗希特勒观点和命令思潮。因此，要求国防军统帅部的每个成员，采取更明确的态度，注意个人与陆军总参谋部接触时的言行举止。

使人震惊的事情层出不穷，使他不能向作者一一列举。接着他说，在这种紧张的态势下，什么是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在世界范围内要完成的任务呢？英国和法国是潜在的对手，意大利和日本是友邦。对问题必须从战略角度去思考。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对问题作出回答，而是指着地图，介绍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细节，顺便提到了预先占领“西壁工事”①的意图。此项准备工作所花费的款额之大令人吃惊，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此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为进行将来的对捷作战，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中的一项。

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自 1938 年 11 月至 1939 年 8 月，作者作为约德尔的接班人，接管了国防处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但仅仅 9 个月的时间，作者也无法彻底改变当时的状况。也许有一种观点为他指明了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指挥参谋部不再独立地置身于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而是作为国防军的一部分立于他们之中时，也就是说不是依赖于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陆军总参谋部时，它才能够克服其各方面的弱点。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凯特尔同意并决定，约德尔——在此期间已晋升为少将——不再返回他的原岗位，而是于 1939 年 10 月 1 日由一名陆军所信赖的将军取而代之。然而，约德尔却重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原来的如意打算化为泡影。

1939 年 3 月占领“捷克剩余领土”，以及月底收复梅梅尔地区的行动，都没有为国防军领率机关中的合作，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相反，在波兰战局伊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 3 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令部，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波兰就范。数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 1938 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政治条件采取的，但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识，瓦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长①海内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 4 月 3 日将文件下发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的工作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导人的军事“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边防的长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他们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去的中间上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

副官们也把失宠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备忘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打入冷宫。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谋部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与国防处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尽管国防处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

希特勒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这种尔虞我诈之中，按照“分权制和主管人员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渔人之利。国防军高级参谋部的这些弱点及其灾难性的影响，不单单是由于　国防军统帅部组织无能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三军种的态度。他们不是联合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一道反对希特勒，而是想法设法对这个“工作班子”行破坏之能事。

踏上战争之路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从——纽伦堡法庭称之为——“关键性会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会商是于1939年5月23日举行的。会上，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在柏林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进攻波兰的展开、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事先既没有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报，也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会商，替代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的却是陆、海军总司令。在会商会上，希特勒无视他的指挥参谋部的存在，为准备未来的欧洲“进攻计划”，他要求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小型研究班子”，凯特尔对此毫无察觉。希特勒要求，这个班子应包括陆、海、空三军代表，负责进行“最高等级上的作战精神准备”，——大概是指战略上的精神准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这里以蹩脚的军语所描绘的任务，正是在正常条件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所肩负的职责，也是他一开始就赋予它的任务，尽管它的职责不是拟制一项进攻计划，它的真正军事职责是保卫帝国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战略方针，也没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月23日的会议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说明，国防军内严重缺乏秩序和信赖，这也是身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当时和后来时常向国防军首脑们流露的。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22日，在没有高级军事首脑参加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了经长时间谈判而与意大利缔结的所谓“钢铁盟约”的隆重签字仪式。这份条约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从性质上说毫无疑义是军事同盟，它要求国防军要承担重大义务。然而，在这个条约的准备和缔结过程中却没有那个军事机构参与；甚至希特勒还在于1939年3、4月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唯一一次有双方国防军司令部代表（意方为帕里阿尼将军，德方为凯特尔将军）参加的，会谈中严禁讨论战略问题，因此在5月23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没有向与会者透露任何有关该条约的重要军事内容。议定书的主持人施蒙特中校仅向与会者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保守秘密——即指进攻波兰的计划——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这个计划，即便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对于意大利来说，只有突破马奇诺防线，此问题还有待研究。”①尽管作者当时是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但所获悉的有关这次会商的内容，也只是凯特尔知道的那一点点。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波兰战局计划的内容。这些消息，同时联系到当时的政治事态，作者毫无疑义地认为，希特勒企图发动一场新的“鲜花战争”②，并将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一名长年作约德尔的首席助手——当时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贝格中校接替。此后，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继续充当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为其战争目标服务。他们尽管认识到自己地位的严重虚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对希特勒企图进攻波兰的行动，以及用现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企图。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关系到希特勒的战争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欧洲西方列强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入考虑在内。他们将此项计划的目的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作了说明，凯特尔稍加思索后便给以否定。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会立刻看穿他们的真正企图是对他的决断施加影响，参谋部从而将失去他的信任，此项计划由此宣告失

败。紧接着，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按照过去的模式，于 1939 年夏季，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防军司令部演习，请希特勒亲自指挥。他们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要特别向希特勒说明，指挥此次演习，对位居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来说，是一次对内对外进行宣传的大好机会。他们满以为这次会稳操胜券。结果，这个本想让希特勒在演习中亲眼看一看他的冒险行动将遭何种厄运的计划，又败在凯特尔手里。凯特尔说，让元首和总理指挥一次司令部演习是一种绝推可能的苛求。结果，这个企图利用希特勒想在战争中指挥国防军欲望的计划仍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利用凯特尔的地位，对时局施加影响的经验，似乎已经失效。在此期间，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没有再透露出一点关于战争危险增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对其备战工作也一如既往，不找国防处商谈，使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前几周，处在一种奇特的、使人不适的真空之中。他们承担的唯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是，按照“鲜花战争”时期的格式为武力解决与波兰冲突的行动拟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举了根据陆、海、空三军的报告而制定的最重要的准备措施及其完成的时限，关于完成这些措施的命令须由希特勒作出最后决定。此外，除了指出对敌情报机构进行伪装外，还指出了在非常情况下，停止从展开转入进攻或取消这次行动的时间①。这份大事年表堪称指挥参谋部从事“档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这份文件也没有使领率机构就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作出决断。

早就住在“山间别墅”的希特勒，从 8 月中旬起，由于陆军对其展开计划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图，使他的军事活动再度频繁起来。希特勒的副官也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请来参加这一活动。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头对陆军总参谋部长施加影响。以凯特尔看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于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国防军统帅部的书面“指令”而引起的陆军的过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陆军的展开方案也确有改进，这是显而易见的。

8 月 22 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担任三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然而，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信念，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局前，以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 1944 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役前，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 8 月 23 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的最后期限，命令国防军于 8 月 26 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顶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

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多年与政府各部和“党务办公厅”共同为战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并按军事惯例编写的《民事管理动员手册》，均在最后一刻被希特勒毁弃。希特勒将波兰战局当成国防军的一次“特别行动”，而不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一场可能引起民众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 8 月 26 日至 31 日之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 9 月 3 日随之实施动员，因此，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它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的义务；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将专业技术工人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作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谋部“秘书处”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 月 25 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队进入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个命令已经按“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用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①的第一句话却是：“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是，亲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他的“大本营”留在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驻扎在柏林南面约 50 公里处的措森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房；空军部队则驻扎在波茨坦附近的维尔德帕克空军学校。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天直至 9 月 1 日，没有考虑搬迁的问题。后来得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考虑搬进布洛姆贝格在任时在柏林附近建造的拥有各种防护和通讯设备的别墅式的建筑物里，同时也没有采取其他准备措施。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国防军统帅部战地大本营的建议呢？对这个问题，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答案。很显然，希特勒是怕人们说他在重大抉择面前畏缩不前。在波茨坦地区的一座军营里为希特勒修建下榻时，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说，当国防军开赴东部战场时，他作为最高司令却从柏林向西转移，舆论界必然认为他是逃避危险”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因为希特勒认为，在动乱时期，他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对内、

对外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显露他关于西方列强不会介入战争的信念，而柏林处在东、西方的中间位置上，他可以借题发挥，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却于 9 月 3 日出人意料地决定从柏林出发。这一行动也许是由于他动荡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审慎行动与“即兴创作”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也许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密切与部队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显示一下他篡夺来的统帅角色，出一出风头。

希特勒自然并不指望在他的专列里能组成一个井然有序、名副其实的军事指挥班子，然而却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在列车上，除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还有匆忙从陆军、空军调来的联络官——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义一个排挤指挥参谋部的措施——，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班子”。然而，希特勒对这一切却漠然置之。对他更重要的是党、记者、摄影师、医生和随身警卫，还有他信赖的、陪他晚间聊天、听音乐的女随从，这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圈子，他是不会忘记的。在几次“鲜花战争”中，他也是以同样方式横跨国土驶向奥地利，通过苏德台抵达布拉格。因此，此次波兰战局只不过是一次特别行动而已！①

第二章　波兰战局期间的经验

1939 年 8 月 31 日由柏林发出的“第 1 号指令”和 9 月 3 日的“第 2 号指令”，是全军实施统一指挥首次采用的手段。国防军统帅部所颁发的这种指令是吸取了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的经验，模仿命令的措辞和内容拟制的，它对最高军事指挥来说是一种适宜的手段。但是“指令”不同于“命令”，它不是将下级约束在指令上，而是为了避免超出具有远见的方针所规定的范围，有意不表露领导的意志。此外，“指令”应当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之有效。起初，为了与当时国防军领率机构的体制相适应，1939 年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只下达给陆、海、空二军总司令部。后来，统帅部开始将指令直接下达给下属单位，数量与日俱增，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特性。

第 1 号指令发出之时，在“大事年表”上所安排的最后准备工作已经完成。8 月 31 日 0 时 30 分，即最后期限前 14 个小时，由总理府副官处发出的一则短讯足以说明部队已根据由希特勒批准的三军计划，由展开转入“武力解决”。指令中也只说，“进攻波兰是根据‘白色方案’（波兰）所采取的准备措施进行的”。同时，根据三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对“西部作战部队”的行动作了调整。指令不但对细节而且对战略方针作了规定。指令指出，为应付英、法的敌对行动，驻西线的弱小部队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为胜利结束对波兰的作战创造条件”。

紧接着颁布了对英、法宣战的第 2 号指令。指令规定了或“自主”采取的对付西方列强的实战措施，如布设水雷障碍，海上经济战等。这些同样不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思想财富”，而是海军总司令部的主意，这些措施早在海军总司令作报告时，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后以最高统帅的名义、以指令的形式下达。

很显然，从 1、2 号指令中可以看出，两线作战是希特勒违背有良知的人的意愿而发动的，它需要国防军领导事先为此作大量工作。然而，由于希特勒对波兰采取的政策的仓促性和对波兰的切骨之仇，使这位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未能将参谋部置于国防军最高位置上，也没有在对政治、军事总体形势进行负责的现实的考查基础上，充分实践指令的内涵，并事先估计到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如果不继续按希特勒在 1939 年 5 月 2 日“关键性会商”中的意见行事，如果国防处不是获悉了这次会商的内容，参谋部也没有可能在它于 1939 年春提出的关于在最广泛的背景下举行一次司令部战略演习的建议遭到拒绝后，按照自己的研究结果按排工作。只有形成最高统帅的工作班子，而不是国防军的一个总参谋部，才能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部的全面合作，从而为这种“演习”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意见。但是这没有希特勒的命令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当西方列强的政治领导违反一切担保居然站在波兰一边时，最高统帅既没有给他的参谋部，也没有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提出必要的方针，以应付超出第 2 号指令范围而出现的新情况。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出，在他全部的军事指挥活动中，缺乏高瞻远瞩，统盘筹划，缺少一根贯穿全部活动的红线。

仓促开赴前线；脱离自己的参谋部和三军总司令；以及工作条件残缺不全的“元首专列”——这一切正好迎合了希特勒的杂乱无章、心血来潮的工作方式。凯特尔在纽伦堡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们的元首专列停在格罗斯—波恩（波莫瑞）。我们由此出发，昼夜兼程，第二天休息，第三天继续前进，奔赴各集团军和军司令部……，在这些地方，元首应邀作了形势报告，也与陆军总司令碰了几次头……对作战指挥问题……希特勒很少介入；我记得的只有两次……。在其他时候，他只限于与陆军总司令交换意见和谈话，有时也提出一些建议，但不是以命令的口吻。”

对作战拥有更大指挥权的陆军总参谋长在整个战局期间，没有同希特勒或凯特尔、约德尔以及陆军联络官冯·福尔曼上校通过一次长途电话，好象作战指挥在他手里胜若任何人①。

在对波兰作战的第一个月，迅速取得的决定性战果，以及由于法国在西线采取静观战略而出现的“奇迹”，使德国临时组建大本营的工作能力并未受到更艰巨任务的考验。他们满足于那种曾在9月初在总理府举行的没有固定形式的“形势讨论会”。这种讨论会的依据是每日两次由柏林首脑机构和国防处发出的三军报告。会上，希特勒坐在他的“卫作车厢”内，夸夸其谈，喋喋不休，与其说是讲给周围的人听，倒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就连每天的《国防军通讯》也是由新闻宣传处起草，由约德尔在“元首专列”上加以修改，最后经希特勒大删大改后发出的。在这些日子里，唯一让人深恩的是国防军统帅部9月9日和25日分别发布的第3号指令和第4号指令。这两个指令的主要内容是将多余的陆军和空军兵力调向西方，并进一步加强对付英、法的措施。两个指令的基本框架是在列车上形成的，尔后，“草稿”送往国防处，国防处受命与三军各总司令部作战处共同进行全面审查、加工和确认，最后退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参谋长越过凯特尔，直接送呈希特勒签字后下发。

柏林国防处的军官们决不会过度忙碌，他们只将与三军种总参谋部保持尽可能的密切联系为已任。国防处还每天以自己的形势讨论会的形式，与留守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其他机构互通情报。参加讨论会的除了国防处担负领导职务的军官和作战日志人员外，还有谍报局联络官，经济、装备局联络宫，国防军新闻宣传处联络官，通讯联络处联络宫，国防军运输处联络官和外交部长联络官。对于形势报告、国外消息和其他重要事件的报告，通常还要举行一次“内部讨论”。在内部讨论会上，国防处长向他的最亲密同事通报他从上级机关所获悉的一些考虑和企图，提出完成特殊任务的方针。在波兰战局期间，国防处长还担负一项任务，即不经常地去威廉街办公大楼，向“元首代理人”’鲁道夫·赫斯报告战争形势。对此事还唯一留有记忆的是，在每次简短的报告后，对方都是缄口不言，至今回忆起来还犹在心目。

此外，瓦利蒙特上校还尽一切可能与他的上司们保持个人联系。出自这个目的，他于9月10日首次从波莫瑞地区（波兰）上西里西亚的依尔瑙，“元首专列”已到达这里。动乱的军营生活再次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与在作者本人和公众心目中所设想的最高大本营没有一丝共同之处。尽管在波兰的作战顺利进行，西线仍然保持宁静，但是一种明显的不安心情在作者心中油然而生，尤其担心的是，目前正在快速为陆军组建新的预备队。在此过程中，希特勒以动员方式，首先加强希姆莱和达吕格①的力量，组建了一个“保安师”，而其真正意图是想培养大批训练有素的军事警察。这一措施虽具有党政性质，但仍使凯特尔感到怏怏不快，而约德尔将军有意避开这种头等棘手的事，不发表任何意见。但这并没有改变发布必要命令时通常把他的国防

处“组织小组”撇在一边的局面；而且在陆军眼里，国防军统帅部也仍然是最有资格的党的隶属机关。由俄国红军进攻波兰而引发的一些事情，最能说明临时组建的大本营在形式和体制上存在的缺陷。9 月 16 日深夜，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克斯特林骑兵上将给柏林打电话通知作者，俄国军队即将越过边界，开进波兰东部地区。克斯特林想必是——以后他自己也确认，他被德国领率机构内的关系搞得糊里糊涂，因为接电话的国防军统帅部指挥部部长根本没有想到，电话会打给他。因此，一开始，他几乎不理解电话里讲的到底是什么，他只能保证，立即将情况上报。凯特尔和约德尔也不了解此事。当他们其中一个人第一次听到俄国人向西开进的消息后，惊恐地问：“进攻谁？”在下达紧急命令之前，数小时的宝贵时间，就这样流逝了。俄军和德军在波兰相向推进，当德军已越过里宾特洛甫与俄国人共同商定的分界线 200 公里时，一场恶战似乎在所难免。

9 月 17 日下午，俄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在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陪同下，来到本德勒大街国防处办公室，向作者了解德国军队在波兰的机动位置和所达到的目标。上校身着褐色制服，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听着国防处长的介绍。然而由此却引出一个使人不愉快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结局：第二天早上，约德尔在电话里向作者透露，前一天夜里，斯大林在莫斯科强烈谴责了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因为德国在通告了他的驻德武官后，德军仍想占据波兰南部的德罗戈贝奇油田。斯大林认为，这违背了 8 月 23 日秘密条约中所划定的分界线！瓦利蒙特知道德国缺少石油，但由于不知有条约一事，因此在俄国武官面前突出强调了德国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看来他要成为德，俄不稳定的交易的第一个牺牲品了。瓦利蒙特还从约德尔那里得知，里宾特洛甫对此事大为脑火，埋怨军事干扰了他的政策。结果他引火烧身，反被希特勒训斥了一通。希特勒说：“如果外交官在战争中犯了错误，应当让他永远去当兵。”此事似乎就这样完结了，至于后事如何，不得而知。人们从这件事情中并没有吸取关于外交政策与国防军领导之间达成真诚合作的经验教训，尽管这两者都集希特勒于一身，外交部长也经常在他的鞍前马后①。那个时期在纯军事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即希特勒作出的关于不久对西方发动进攻的决定，能使人们对德国领率机构的状况获得最深刻的认识。鉴于 1940 年春德军迅速取得的巨大胜利，使人们一时认为真理在希特勒一边。然而曾几何时，德军灾难性的失利，使人们逐渐改变了对希特勒的认识，在人们头脑中，再无法唤起当初希特勒在各军种总参谋部内宣扬胜利时所产生的印象。早在 9 月 3 日，西方列强对德宣战时，一些旧军官就深感震惊，他们深知 1939 年德国的军备状况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准备极不充分。然而，敌、我双方在德法边界的工事内无所行动地对峙了数周。这种状况连同波兰的迅速覆灭，作为一种政治和军卓因素，似乎激发了西方尤其是德国国防军的迫切愿望，即战争可能会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从而避免将中欧再次夷为废墟，拖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之中。这种思想不足为奇。如果上述愿望不能兑现，将在西线组织强大防御，在短时间内征集大量兵力，广辟运输供应线，从东方输入工、农业物资，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促使西方列强停战。陆军总参谋部已下达命令，命令陆军主力变更部署，准备实施防御。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状况下，促使国防军最高统帅作出决定，在西线转入进攻，这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当 9 月 9 日和 9 月 12 日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应希特勒召见，在“元首专列”上单独进行长达两个多小时的

谈话中，希特勒绝没以向布劳希奇透露一句他的企图②。也肯定没有哪个负责军官考虑被希特勒召去，共同商讨这一重大决断，尽管这一决断的最终结局必然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当作者于 9 月 20 日第二次来到大本营时，却成了知情人，此时大本营已从专列迁至索波特的俱乐部旅馆。凯特尔没有直截了当地，而是利用各种暗示，心有余悸地向作者透露了这个绝对军事秘密。即希特勒进攻西方的企图。就连他，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这位唯一的“国防军问题顾问”，也不是从希特勒那里，而是从一名副官嘴里获悉这一消息的。凯特尔认为，事已至此，已没有可能提出异议。国防处长则果断决定，既不找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不找再度变得缄默不语的约德尔，而是联合陆军总参谋部对希特勒的决断展开斗争。因为，没有任何义务比保护人民和国家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更为重大。看来只有依靠陆军总参谋部这一条路。因为作者曾多次与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官接触，知道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①受他的总司令委托，正在修订一份文件，准备再一次以大量的、能够找到的资料为依据，来陈述陆军总司令关于在西线在若干年内只能进行防御战争的观点。

然而，通向措森②的道路，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③。希特勒返回柏林后，于 9 月 27 日在新的总理府召见三军总司令——到会的还有凯特尔和作者——通告了他的西进意图。在场的人，包括戈林在内，无不瞠目结舌。看样子，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刚发布的国防军统帅部第 4 号指令中的这句话：“在西方……必须时刻维持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或者还没有完全理解它的含义。希特勒在讲完话之后，随手将写有讲话提纲的便笺投进他工作室的壁炉里烧掉了，便笺上有他作出以决断的理由和基本作战方针。会上没有任何人对他的讲话提出异议。

作者在索波特大本营逗留期间，还看到一些潜伏着危机的怪诞不经的事情。一天早上，有二三十辆车成两路纵队由旅馆出发，向格丁根①北部的战场开进。大本营司令隆美尔将军的一项任务就是将希特勒安排在车队最前方。作者不解地问隆美尔：为什么要成两路纵队行进？隆美尔回答，这个“行车队型”是他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之后采取的，因为在大批到大本营的来访者中，有许多非军人，要显示他们的级别、身份的差别，只有采取这种队形，这是一种最适宜的办法。但是，这一天仍使隆美尔出了洋相。当车队行驶到一条田间小路时，队形再无法保持了，而且一大批车突然被一障碍所阻，而希特勒及前几辆车却撇下车队，独自前行了。尽管组织这些滞留的人参观了附近的一座医院，以打发这段时间，但党务办公厅主任马丁·博尔曼仍对战场的道路未加清理而大发雷霆，并对将他们的车子排在后面对隆美尔将军痛加辱骂。隆美尔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言行似乎无能为力。当作者出来打抱不平，指责博尔曼的举止时，隆美尔却只要求能将此事报告国防军副官长施蒙特就行了。

第二部建设时期
（1939 年 9 月—1940 年 5 月）

第一章框架

早在 1939 年 9 月上旬，在“元首专列”上就有人认识到，这个动荡不定、拥挤不堪、行驶在铁路上的临时大本营，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更重大的作战指挥任务。如果最高统帅想要担负这一任务，或者完全从军事角度说，不仅仅满足于制定战争计划，而且还要亲手实施作战指挥的话，那么，就必须首先有一个新的固定的大本营。

有人说，希特勒自己也对现状很反感并倡议进行改革，这是不真实的。因为他已经完全陶醉于他在波兰战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他对军事指挥“机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难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与他相反的是，立志要实现国防军严格、统一指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于“元首专列”的状态很不满意，急于要求改变现状，组建新的大本营。约德尔将军认为，应首先组建一个如同指挥参谋部那样的高效率的参谋部，以及一个能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通讯网。

这些条件要想得到满足，希特勒就必须决心留在柏林的帝国政府所在地办公，并能与他当时和以后的世界上的助手和对手。如墨索里尼、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行为举止相匹配。然而，这一简便易行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有在一种过渡时期内才能加以考虑。但是不管怎样，国防处长从他第一次到“元首专列”直至 9 月 10 日这一段时间，他已经受约德尔之托，在德国西部中心地带，为组建一个统帅部战地大本营寻找营址，以便使战争顺利进行。此行动的主要依据是由希特勒亲自签发的指令。指令指出，他要尽可能地靠近西线，但要在远程火炮射程之外。陆军、空军总参谋部也必须在他的附近寻找各自的驻地。

第一个战地大本营的合适地点，是于 5 年后即 1944 年末至 1945 年初，由国防处一名总参谋部军官选中的，位于吉森——劳海姆地区陶努斯山脉的东部。这座齐根贝格贵族庄园拥有豪华住宅和宽敞的附属建筑，似乎一切条件均已具备。据说，庄园主人已准备出售；扩建和布置工作也在建筑总监托特领导下立即着手进行。然而，由于希特勒执意要在 1939 年晚秋时分开始西方攻势，在此之前无法完成扩建的准备工作。因此，10 月份，临时为国防处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必要时参谋部随“元首专列”一同行动。在比较简朴的开始阶段，这个专列只配有三节车厢，两节寝车，另一节为工作、就餐两用；然而在大战期间，逐渐扩展为两个大型专列，一直作为办公车和运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人员的车辆随时备用。

西方攻势的开始时间由于气候的影响，不得不一推再推。此间，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处视大本营营址问题为己任。以领导身份介人此事。不久，他们便强调指出，国防处的选择方案，在许多方面都不合希特勒的个人口味。希特勒既不愿住在庄园主的住宅里，也不想看到周围尽是牲畜马圈、农田莱庄。因此，副官们转移视线，很快在“西壁工事”后方地带找到了他们理想中的目标。有三个永备工事体系同时作为考虑对象，一处在明斯特艾弗尔北段，第二处在兰德施图尔和法尔茨的中部，第三处在克尼比斯不远的黑森林的南部。1940 年 2 月中旬，当希特勒得知齐根贝格庄园的通信技术设施不能在 7 月前安装完毕时，便最终决定，“作战开始时……不去齐根贝格，而去山崖城堡”——位于明斯特艾弗尔营址的代号。希特勒命令陆军总司令部在同一地区安营扎寨，并亲自为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精干的工作班

子，选择附近的一间猪舍为其驻地。与此相反，希特勒却让空军任其安排它的大本营。在此期间，“ 海因里希 ”专列载着外交部长，拉默斯和希姆莱却被撇在了莱茵河右岸。

将陆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安排在“ 元首大本营 ”附近，意味深长。凯特尔觉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作希特勒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的传递员，尽力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赢得更多的美言。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愿，希特勒如此安排，意在严格控制陆军总参谋部；而哈尔德却另有一番心思，他想利用靠近大本营的这个有利条件，对作战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起码能遏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约束。然而，事与愿违！

战地大本营的营址建设，随着任命约德尔为通讯长官而暂告结束。“ 山崖城堡 ”连同陆军总司令部的“ 林务所 ”①，于 1940 年 3 月 11 日完全准备就绪。

第二章核心

希特勒从东部边境地区返回柏林后，仍在总理府办公和居住。后几个月，他也只是偶尔到贝希特斯加登作短时间逗留，还有一次是圣诞节到西部展开地域，走访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些部队。这几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军人只有他的几个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专列”上一样，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办公室设在老总理府的二层楼，隔壁是联邦议会大厅，兼作地图室和会议室。这样，这两位将军便不知不觉成了希特勒的“侍从官”，和所谓的“贴身”。约德尔还要按时参加有众多第三帝国头面人物出席的午餐会。

希特勒的这些“新调整”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其实是他分散权力的本能表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整个大本营“体系”必然落得一个充满紧张和弊端的结局。虽然根据陆军的要求，陆军能经常有机会与领率机构接触，如参加希特勒自波兰战局以来每天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但它所发挥的却是“无名的、没有权威的影响”，正如贝克将军在过去争执中所说的，陆军“在战争的领导和指挥机构里……没有位置”。讨论会上尽管谈论的绝大部分还是陆军问题，然而却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在场，只有“侍从官”凯特尔、约德尔，以及他的副官们参加。一般情况下，戈林的“个人联络官”博登沙茨将军也在座，原来到会的陆军联络官因为在约德尔眼里被认为可有可无，被挤出这个讨论会。身负重任的国防处处长及其军官们，不管是从前线，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一般也不得参加形势讨论会——特殊情况除外。在一段时间内，约德尔将军依然以主要发言人自居。由于他所具有的资历和知识，被希特勒特意任命为部队高级指挥的助手。他借此机会，超越他的上司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事事处处不与凯特尔商议，然而他的高谈阔论也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希特勒的观点。他将每日情况报告的一部分，交给他的两名助手担负，使希特勒的副官们从此沦为听众——这也是约德尔的安排。

每个报告的最基本的依据，都是由国防处收集来的三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和报告。其实，这些消息和报道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日常情况及其一些变动，不可能有象各指挥员从部队实际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价值的内容。希特勒及其在他周围工作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并未受此种报道的左右，他们是根据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论据，漫不经心的发表他们的议论，作出他们的决定，时不时地向陆军总司令发表一些无根无据的意见，虽然不是每次，但通常是将陆军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已完全被置于希特勒的魔力之下，疏离了国防军，特别是疏离了他们出身的军种陆军的精神，这是产生另一个巨大危险的根源。这两个在布洛姆贝格离职时曾为国防军的统一领导而担扰和为之奋斗的人，现在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破坏国防军的内部团结而卖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的紧张关系和玩忽职守

在约德尔自己的参谋部内已经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国防处长急切等待他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请调工作。也许人们还没感觉到，在波兰战局的数周里，人们之间的陌生感有增无减。当然，促使瓦利蒙特产生这种愿望还出于其他理由，起初，他觉得战争将为大批高级军官大开用武之地，可事实上，出路越来越窄，职位越来越少。当然，在战争中单靠这一条理由也不能成立。从迄今一系列事实看出，一个总参谋部上校军官在约德尔身边的这样一个职位上，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可干。因此，瓦利蒙特认为，调动一下工作似乎对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于 9 月末趁国防处实施动员时，将一大批军官免职，重新分配。

约德尔未答复瓦利蒙特的请调，不知可否地将他留了下来。在此期间，约德尔对于领率机构里工作的日益烦琐，越来越感到反感。在约德尔晋升到现在这个职位以后，也开始启用“工作班子”这个名称，这个“工作班子”曾是 1938 年他和统帅部与希特勒发生关系的主要形成，约德尔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现在他也把这一称呼用到了国防处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员身上。这首先就意味着，仅拥有 12—15 名军官的国防处，在战地大本营组建过程中，将再度被分割①。然而，当时显得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其外部形式，而在其实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把“工作班子”这个称呼应用到他的参谋部内，这对国防军领率机构尔后工作方式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约德尔与陆军总参谋部的传统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只想让其参谋部的军官们成为起草命令的机器，不把他们看成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提出建议和咨询的同僚。他的这种倾向不仅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而且完全符合总参谋部一种新流派的观念，这种观念戈林早在 1939 年就想在空军加以实现。这种观念要求“对上绝对负责，对下绝对专制。”①两者无疑都是纳粹的准则，总参谋部内部工作的变革与其外部形式的变化是相适应的，都是由约德尔接收下来的希特勒所创立的体系，也就是用一种最高指挥来取代德国陆军采用过的、经过历史考验的“任务式指挥法”②，试图通过一种对细枝末节都规定得死死的命令，强行贯彻他的意志。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参谋部之间的距离，更促成他这种倾向的发展。但疏远与否并不在乎空间距离的大小。不管在柏林时，由本德勒区到总理府，还是后来在战地大本营时，由“Ⅰ号滤波电路”——希特勒及其左右的宿营地，到“Ⅱ号滤波电路”③——国防处的宿营地；不管是几分钟的路程，还是几小时的航程，都无管大局。约德尔一方面按自己的风格亲手将希特勒提出的方针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贯彻，另一方面又使国防处以及三军种指挥处作为他的方案的表决机构，但更多是充当他的办公室和档案室，这就使约德尔与他的参谋部日益疏远。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与三军总参谋部进行口头联系中形成了一种“工作程序”，这种工作程序常常把国防处撇在一边，只有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希特勒思想和意愿的可靠知情人。

空间上的距离还带来另一个后果，即约德尔将军如同希特勒一样，对他的参谋部的年青军官不屑一顾。以国防处长为首的一些老军官，不能不承认约德尔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长处，比如试图摆脱希特勒的摆布，努力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参谋部注入新鲜空气。然而在工作上，他们却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被排除在事态进程之外，从而破坏了在国防军领率机构建立一个统一的

指挥参谋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恰是约德尔自己力主提出的。

参谋部内比这一切更为严重的弊端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最亲密同事、国防处长，在政治和军事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约德尔对希特勒的崇拜，在他早期的日记里就以异乎寻常的军事表达方式显露出来，而在他全部的举止、行动中一一尽管是无言的，更是表露无遗。1939 年 10 月 15 日，正当陆军总司令部为西方攻势迷惑不解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战争背离总参谋部的理论，我们就会赢得战争；因为我们有较强的军队，较好的装备，较高的士气，还有一个亲密无间、目标明确的领导。”然而，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战争抱有幻想。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这两位担负指挥参谋部领导的军官之间，无法在战争与和平、战争的基本特点问题上、以及一触即发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占领政策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各自的看法，以求消除对立。鉴于时间的推移，以及在统帅部内极少的活动自由，使瓦利蒙特早在 1939 年秋就两次进行以单枪匹马阻止事态发展的尝试①，更难以见到成效。但是，离开国防军统帅部，到前线另谋职务的出路，也由于缺少众多的老参谋部军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断受阻。自 1943 年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严禁大本营内具有固定职位的人进行调动。此外，还向统帅部内的大约 20 名将级军官，另外还有陆、空军的军官指出，他们应当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服过役而知足。但希特勒或许是由于“厌恶那些新面孔”，或许对谋杀的担心，终于在 1944 年 7 月 20 日，允许军官进行调动。除了那些躺在病榻上的和被判刑的军官之外。今天还有些人指责某些司令部的将领们“前线业务生疏”，看来是找错了对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国防军中的地位和任务，一直模糊不清，战前没有解决，在波兰和法国战局之间的建设时期，仍然没有解决。当战争刚刚开始时，德国的独裁者便强调指出，他的主要活动要转向战争指导；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也与他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此时，约德尔将军大概也自以为，他为希特勒设计的军事“工作班子”准备就绪。但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班子”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使参谋部既使在战争年月里，也依然是他的军事办公室，他的传声筒，或者用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军事领域里下达专制命令的编辑和监督机关。大概下面这一事例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希特勒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出席每天的形势报告会上，那么在约德尔的日记本上就必然缺少这一天的日记②。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受到最高统帅魔力驱使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更乐于在国防处长的领导下，寻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据战争的要求改进参谋部的结构和任务。然而，这一努力也被迫终止。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内部的紧张和对立，也不是由于三军总司令部的反对，而完全是一种疏忽。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他们对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全部建议，均因毫无例外地遭到约德尔的彻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国大本营建设时期。就根本没有制定出任何在 30 年代中期，组建一个真正的、高效率的国防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各项任务，依然是根据临时需要、没有长远规划、随心所欲地加以解决。

例如，进攻西方的行动，以及作战指挥的基本特征，都是希特勒一人决定的。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另外任何一个军事参谋部内。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对此事作了进一步供述，他说：按常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为作出决定……需要下级提供资料、地图和兵力报告——己方的和敌方

的……”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实上，希特勒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他的进攻西方的命令，仅仅是基于直觉上对敌人的估计，根本不考虑将战争扩大到波兰以外，在他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已不再是儿戏。他后来作出的一些决断，特别是进攻俄国、对美宣战和胁迫意大利参战等决断，都主要是受其政治狂热的驱使，没有考虑这些决断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将要产生的结局。这种腐败的工作方式，与政治优先于战争这一正统的定理毫无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希特勒手头却异乎寻常的有大量外国装备、工事、舰艇和飞机的数据；他对世界军事地理状况也大体熟悉。然而这些因素却促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理想，即要求下级的精确的军事判断和报告，必须与他事先的设想相吻合；否则，他就断然弃之不用，将其编入“总参谋部失败主义”的卷宗里。

1939 年 10 月 9 日，希特勒的内容丰富的“备忘录”出笼了。“备忘录”中，他针对陆军有意识的反抗，阐述了他进军西方的计划和安排①。在这个阶段，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担负的唯一一项任务是，将希特勒的计划和想法以“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编为第 6 号指令，于当天下达。指令有 8 条内容，最后写道：“我（希特勒）请诸位总司令先生们，在这份指令的基础上，迅速具体地阐明你们的观点，并将其准备情况通过国防军统帅部不断向我报告。”

在这最后一段话——这是类似“指令”一贯采用的形式——的背后，隐藏着一般老百姓无法看到的事实；从即日起，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是，根据国防军统帅部“指令”的一般方针，制定自己兵力区分和初期作战行动、计划，即通常所说的“展开指令”，以便使海、空军尤其是空军，能据此制定自己的详细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说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直到 1944 年秋季，不可能对“作战”有任何“准备”②。西方战局的准备工作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陆军的“展开指令”完全是以国防军统帅部的方向性“指令”和“作战”构想为依据而制定的。下面这件事情也许能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10 月 21 日，凯特尔向希特勒报告了“陆军对黄色方案（西方）的观点”；两天前，陆军总司令部已将其展开指令的复写副本由国防处转呈国防军统帅部；

约德尔为此次行动亲手绘制了一份草图，标出了陆军的兵力区分，也包括空军的兵力区分。陆、空军之间的协议，是在没有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合作的情况下达成的；

希特勒仔细审阅了这一计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天，凯特尔和约德尔结伴同行前往措森，向哈尔德说明希特勒的指摘和新的想法；

在经过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首脑为一方，与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长为另一方的多次会商之后，于 10 月 29 日制定出了新的“展开指令”；

这份按希特勒的要求又新补充了若干内容、以统帅部名义下达的指令，连同“作战指导第 8 号指令”，于 1939 年 11 月 20 日下发，在整个国防军生效。

以类似的方法，又分别于 1940 年 1 月 30 日和 1940 年 2 月 24 日拟制了“第 3 号展开指令”，和“第 4 号展开指令”，成为 5 月份对西方发动进攻的依据。在此期间，希特勒运用具权威性的影响，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的作战计划，制定了所谓的“曼施泰因计划”，为法国战局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而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直到最后还力图阻止此事的进程①。

此后，为制定西线作战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加希特勒与凯特尔和

约德尔将军几乎每天举行的会商。如有必要，会商的结果将由他们自己，或委托国防处军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三军总司令部传达。这其中还有对所谓的“单个行动”所下达的命令，这些行动大部分都是希特勒终尽脑汁、经过多次反复而确定的，即随着西线进攻的开始，将以运输滑翔机、强击工兵和伞兵群，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便迅速夺占重要的边防工事和桥梁，保证部队的快速机动。第一道命令是 1939 年 11 月 7 日下达的，接着在尔后的两个多月内，一般每隔 2 至 7 大便发布一次命令，共计有 30 道命令。在这些命令中，进攻时间朝令夕改，不断推延。而在此期间，“事务”工作全部落在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身上。但是，指挥参谋部也至少作出了自己本应作出的成绩，其中包括 2 月 2 日制定的为隐蔽德方意图的“迷惑敌人的方针”，以及 1940 年 2 月 22 日汇编的“大事年表”它按日期、内容和伪装方法，汇集了希特勒后期所作出的历次决定。

除指挥工作外，指挥参谋部还担负了大量其他工作，其中主要是组织工作，即尽力挖掘国内的人力、物力、潜力，弥补装备与兵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为前送物资积累必要的储备。此外、还要同帝国最高当局一起，澄清和修订占领区行政管理的依据①。起初，这些任务由国防处内的“组织”和“管理”两个工作小组担负，后来，指挥参谋部参谋氏为完成内容广泛的任务，在建立领率机构的通讯网和为进攻作宣传准备工作之际，又组建了两个处。

除了西方攻势以外，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个月里，还发布了在海上进行贸易战的指令，它的依据无疑都是基于海军和空军的计划和建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为此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将海、空军有限的力量集中使用到最重要的目标上，然而多数情况仍未能满足空军及其总司令戈林的特殊愿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除了俯首听命、孜孜不倦地，以各种言辞和形式来表达希特勒准备发动西线攻势的意愿，却没有在这段建设时期，用更宽广的军事、政治和战略眼光来研究战争的发展趋势，从而起码能为制定一份“战争计划”提供依据。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可以举出下面这个事例作为充足的证据，即当时德国统帅部对地中海地区的完全疏忽；特别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当西方战局在短短的 6 个星期就胜利结束时。统帅部没有制定任何有关该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作任何准备工作。在战争条件和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本来完全能够在其参谋长领导下，立于国防军之首，恢复它本应担负的任务。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工作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而赋予他的巨大份量，将会阻止最高统帅将指挥参谋部视为他的“办公室”’，甚至也许会对他的武断决定产生一定影响。这样一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地位，就将高于三军总司令部，且更加巩固，就不会象已经发生的那样，由于希特勒的不断插手而被人另眼相看；参谋长和约德尔将军就必然会与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保持紧密联系。而事实上，在整个战争中都缺乏这种联系，或者从未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作为领率机构，在英国称之为“参谋长委员会”，在美国称之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它们的联合机构为“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而在德国却是个多灾多难的真空。

现在来看这一切失误似乎都难以理解。然而，即使在那种状况下，指挥参谋部也完全能够在没有希特勒同意和命令的情况下，完成一些大型任务。之所以没有如此，是因为国防处在它人力、物力有限的状况下，只能发表一些鉴定性意见，在统帅部多方阻挠下，无法成为各军种总参谋部的自愿合作者。事实上，希特勒不但没有要求过这种合作，反而将各军种总参谋部的多

次提示——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倡议，弃之一边，没有一次传达给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例如，希特勒在他 1939 年 10 月 9 日的备忘录中说，战胜法国后夺占的大西洋沿岸地段，足可以为“空军残酷轰炸英国抵抗意志的心脏”提供基地，以最终结束战争。如果这个思想在国防军统帅部于 1939 年冬季正在为“围困英国”而拟制的指令中有进一步的表述，那么就很容易被发现，从而将工作停下来，对作战的前景进行认真负责的审查——尽管当时还缺乏“空战”的经验，潜艇数量也有限。但是，在那几个月里，国防军最高领导根本就没有对英国列岛实施登陆作战的想法，当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而不是他的参谋部，从 1939 年 11 月日志中第一次得知，海军总部正在作在英国登陆的研究，他并没有对此表示赞同。12 月初，他又得知陆军总司令部也有登陆的考虑。甚至当海军总司令于 1940 年 5 月和 6 月两次向希特勒报告其研究情况时，约德尔依然无动于衷，其最中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希特勒本人对登陆计划并不感兴趣。另外一个在 1939 年秋尚属正确的理由，在这个时期也不尽合理了，即有人说国防军年老的军官们，还有希特勒自己，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之中，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西线攻势会如此迅速地取得决定性胜利。

1940 年春季，国防军最高统帅还多次有过这种想法，即争取大加称颂的“钢铁同盟”的盟友意大利，派 20 至 30 个师，经德国突破马奇诺防线，向朗格勒高原方向进攻。这种思想也成了当时陆军总参谋部进行深入研究的作战课题①。但是，靠联盟的力量即联合意大利来完成的大型战略任务，或者对在地中海作战的条件和前景的问题的研究，当时都一概未加考虑。当时，德国军事领导部门只是对叙利亚的魏刚的法国军队采取了认真的防范措施，以应付他可能对萨洛尼卡②和罗马尼亚油田的进攻，对这一危险的估计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希特勒如同墨索里尼特别是那些罗马将军们一样，决心将地中海这一战争舞台交给意大利人单独掌握，这无疑是他拒绝指挥参谋部进攻地中海地区建议的另一个原因。

这样，俄国东方问题最迟要在 1940 年春以后才能列入国防军最高领导的研究计划。1940 年 3 月 27 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当着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的面，谈到他对“东方的形势……不断给以极大关注”，对这句话的抵触情绪大概前者要比后者少得多。当时俄国仍坚守在波兰的分界线上，另外，希特勒对按协议向俄国提供作战物资表现出犹豫不决，这些对一个反应敏锐的军事领导来说，都是应当进行初步研究的明显征兆，而无需发出警告。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40 年春季以前这段德国领率机构进行内部建设时期，很少将统帅部参谋部用来为准备未来作战服务。这与毛奇或施利芬时期不同，那个时候的总参谋部缺少在和平时期对超越国防以外目标的研究。希特勒以其“单个行动”取代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日常中心工作，对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和各项措施严加管束，甚至将其排斥在外——如进攻丹麦和挪威的行动，而自己包揽一切，这是一种不务正业的倾向，它不仅会给国防军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还会损害更大范围的内部联系。

与三军种的关系

如果说国防军统帅部同各军种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或者说其核心是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在 1938 年晚秋时还尚未表面化，那么到 1939 年 9 月 27 日，当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线发动攻势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便骤然紧张起来。对于陆军来讲，已不是单纯地抵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人憎恶的“作战上的干预”，对于这一点，陆军早己从约德尔以往的活动中领教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希特勒将陆军首脑完全撇在一边，擅自决断；而且，除了定下进攻决心外，还亲自为作战指挥制定方针，规定“何时”和“如何”行动。这意味着，国防军最高统帅已着手接管陆军的指挥了。如果希特勒能把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这股国防军中最强大的指挥力量拉到自己一边，同时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排挤出这种指挥领域，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处于建设时期的德国大本营内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时又以陆军总参谋部取代了指挥参谋部的位置。然而，希特勒的干预所带来的结果，与他期望的截然相反。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巩固他在军事领域里的独裁，以“对下绝对专制”来替代陆军总司令部的——迄今如此，将来依然如此——在军事专业上的、认真负责的咨询，摆脱陆军总司令部的抵制和警告。为了尽快和稳妥地实现这一目的，为了将陆军总参谋部排挤到——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样，仅是他的决心和命令的执行机构的位置，同时为了竭力利用这部得到他赞许但又无法代替的下达命令的机器，希特勒想在未来作战中，将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小参谋部安排在自己身边，从距离人手约束他们的行动。这样，陆军总司令部到 1939 年秋季面临着一种冯·弗里奇大将①曾经发出警告的形势，弗里奇男爵在过去围绕领率机构体制的争论中，曾以警告的语言指出：“人们休想要求一位陆军总司令根据别人的方案去夺取胜利。”但是，事态发展的结果还是形成了一种元首与总参谋部那样的关系。在以后的年月里，希特勒不厌其烦地以他当年任士官时，与其 8 个人的“班”的关系来比喻今天这种关系。

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没有参与最高统帅下定西进的决心。但是，由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所以他们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关系，再次陷入苏台德危机时期那样的对立状态——尽管程度不同。凯特尔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为面前不是没有压抑感，但他仍是对陆军首脑好言相劝，在独裁者的要求下无把握的担保——一厢情愿地从中斡旋。约德尔却恰恰相反，他将这一事态的发展，视为是朝他所主张的小型陆军总参谋部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丝毫也没有考虑划分职责界限的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机会打入陆军的领导。贝克曾警告过，严防“暗处的和不负责任的影响”；而今，陆军却为这种影响打开放便之门。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并不是轻易地屈从于最高指挥的要求。在他们两者之间，再次出现了对方向问题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一方依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专制权势，相信能够迫使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他们的要求；另一方，没有被政变所吓倒，主张应自觉为普鲁士德国军人的财富免遭厄运而尽力。1938 年秋当危机达到高峰时，布劳希奇曾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发誓”，他要忠于职守，而现在他却将以往的豪言壮语抛在脑后，不敢起来反抗希特勒的西进决定。这样，陆军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

响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还必须违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设想来拟制作战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总司令部起初只能进行“消极抵抗”，仅对希特勒的意愿表示支持。后来，陆军总司令在西线部队高级指挥官们的一致支持下，终于在 1939 年 11 月 5 日，这个下达最终进攻命令的第一个规定日期，采取行动，提出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和迄今的战争计划的观点，至使希特勒粗暴地打断了陆军总司令的报告。在戏剧性的 11 月 23 日，气氛依然十分紧张，希特勒在空、海两军种将军代表面前，指摘陆军全体将军们是掣肘于他的优柔寡断之徒，并拒绝了布劳希奇会后提出的退职申请。尽管如此，大约从 1939 年岁末开始，陆军总司令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愿意符合希特勒意愿的倾向，紧张气氛暂时有所缓和，这样将凶线攻势的发起时间推至 1940 年存季就有了客观基础。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重国防军统帅部，轻陆军总司令部的状况，而且，不久就带来灾难性后果，使陆军受害非浅。

在这里，似应再次强调指出，战后敌、友广为传播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把在国防军和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在大本营建设时期，重新燃起的，而已完全是由对希特勒及其作战指挥的态度而引起的尖锐冲突，也归咎于冲突双方的全体军官。

具有独立思想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人们存有很多误解了赖歇瑙大将。起初，他心甘情愿地与民族社会主义为伍，使得他在 1938 年 1 月和 2 月危机中，几乎成了弗里奇大将的接班人。对此不仅希特勒竭力反对，就连凯特尔和约德尔都认为他是陆军老军官团中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早在波兰战局前，赖歇踏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就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并公然反对希特勒在 1939 年秋季在西线发动攻势从而扩大战争的企图①。两年后，由于情况的逆转直下，希特勒于 1941 年 12 月拒绝了赖歇刷作布劳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议，并说：“他对我来说过于政治化了；猫总是要捉老鼠的②”。

海军和空军在那几个月里，在关于西线的问题上没有提出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③。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陆军实施的作战行动和指挥上，空、海军总司令也懂得尽力避开希特勒的影响和干涉，或者在发生意见分歧时，竭力贯彻自己的意图。希特勒由于在空、海军问题上的知识贫乏，所以对戈林和雷德尔十分尊重，至使约德尔在他们面前也退避三舍。海军和空军由于在专业和人事上的特殊关系，与陆军相比，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除个别事件外，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与空军的关系是由于空军的力量不断下降，以及由于戈林拒绝出兵，导致希特勒介入以后，才变得紧张的。

直至战争后期，在希特勒与国防军统帅部和三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往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对海、空军总司令有特殊照顾。在他们的任务范围内，他们按照希特勒偶尔所作的口头报告行事就足够了，自己保持有较大的独立。他们对希特勒周围的一群军事幕僚敬而远之，他们也常常目睹陆军首脑在总理府受刁难的窘态。在雷德尔自己的与希特勒谈话记录中，很少或根本没有第三者。戈林几乎总是“下不违例”的得益者，除了正式报告时间以外，他还可以经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门。而他对战争的影响很少是有根有据的，这就足以使第三帝国的这两个巨头的诡秘举止，多次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遇有机会，戈林便派他的总参谋长，越过约德尔，直接去见希特勒。海军和空军总司令采取的这种作法，常常在海战和空战领域产生弊端。希特勒在海、空战方面所作的有关决定，也没有一次通知指挥参谋部参谋长。

希特勒和他周围的将军们，对陆军总司令、对本军种的责任感，有意采取蔑视态度——除非陆军对战争全局具有关键作用之时。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到希特勒那里去作口头汇报，一般都是应召而去，而且在大本营建设时期的数月里，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次。甚至连希特勒举行的为决定进攻开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气形势报告会，直到 1939 年 12 月初以前还没有陆军代表参加。这种矜持态度，早在波兰战局中，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就曾采取过，这在“措森精神”①与希特勒的个性对立情况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特别是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尽管在其高级军事职位上，表现得能力超群，举止高雅，但与希特勒的会见，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经常使他处于“瘫痪”状态。哈尔德的思想与他的总司令完全一致，但是他对这种影响不甚敏感；相反，他在维护自己立场时，能以准备充分、把握十足的论据，辅之以铿锵有力、透彻精辟的语言，远远胜过希特勒周围的高参。

由于凯特尔和约德尔分头与陆军总司令部里的新任军官们保持口头联系，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潜在的紧张有增无减：统帅部参谋长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保持联系，约德尔则与陆军作战处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格赖芬贝格保持联系。当希特勒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需要向陆军总参谋邻传达一一更确切地说，是强行让他们接受时，多次被召来总理府的是冯。格赖芬贝格上校及其最得力的助手总参谋部中校豪辛格。据当时 8、9 个月的日志记载，约德尔与哈尔德只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同样，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仅同哈尔德的第一助手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进行过一次工作会晤。凯特尔和哈尔德之间也进行过一次谈话，并达成谅解。

不久，这种工作会晤少、更多是应召来总理府的现象——这是效仿，1938 年春季进军奥地利前的作法——还逐渐变成与受宠的陆军将军们进行个别磋商。譬如，希特勒与当时的第 16 集团军司令布施将军曾讨论组建一个特种突杰群，用以突破阿登防线；凯特尔也为此向占德里安将军面授机宜。几个月以后，即在准备进攻丹麦和挪威之时，约德尔甚至将陆军高级职位的任命视为己任①——这使国防军统帅部将干预陆军指挥领域全然成了习惯。

当时和后来德国大本营颁发的重要书面意见即“国防军统帅部指令”，大致可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具有较强的战略性质，在这类指令中，大部分是将希特勒的决定作为尔后的作战方针下达的，第 6 号指令；另一部分是陆军总参谋部的“思想财富”。是指导某次战局的，譬如第 8 号指令，或者是在夺取某一地段后为尔后作战拟制，并以国防军统帅部的名义下达的命令。这两部分文件要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根据希特勒的指示，亲自起草的，要么由国防处提供必要的数据。而后者是经常性的。

以类似方式完成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对个别战局所下达的“特别指令”在拟制这些指令过程中，往往要克服许多特殊困难，因为其中的政治成份要由希特勒亲自来定，而无数其他决定，如边界和消息的封锁、货币兑换率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均需有帝国最高民事当局的合作，但这些又因保密缘故，不能及时加以解决。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大量其他文字交往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希特勒并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允许国防军统帅部借用他的名字或权威，因此，统帅部的地位仍然十分低下①。

与盟国的关系

在波兰战局和法国战局之间的数月里，德国在军事上处于孤立的境地。意大利这个德国未来唯一的盟国，在战争一开始就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它在参战与不参战之间摇摆不定；但希特勒完全忽视了自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到 1940 年 1 月，希特勒曾一度同意由约德尔将军转呈的国防处的意见。该意见认为，鉴于未来对作战物资的大量要求，意大利的参战不会给德国带来多大利益。如果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在组织上与意大利进行联合作战。然而，希特勒对“与领袖（指墨索里尼）的会谈，喜形于色，十分满足”——似乎意大利不久即将参战。1940 年 3 月 19 日他自会谈返回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如此，希特勒为了迷惑朋友和敌人，与墨索里尼的第一次会晤中，仍向对方展示了一份远远夸大的“己方兵力区分图”②，这就是德、意双方即将合作的唯一基础。在一阵欢欣鼓舞之后，德国逐渐冷静下来。双方商定，两国军队总参谋部保持进一步接触，就战略方面互相通报各自的依据和目的。德国方面对此事犹豫不决。这一心理状态在几天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所写的日记中有恰如其份的反映：

> “元首在报告中讲到了，我们如何在与意大利总参谋部会谈中取得领先地位。首先，通过驻罗马大使馆弄清，他们准备通过什么途径，来减轻我们的负担，然后，才有可能谈渡过莱茵河上游实施作战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的牌亮出以后，才能考虑双方总参谋部的会谈①”

由于意大利的军事首脑们一直反对他们的国家参战，更谈不上与德国国防军的紧密合作②。因此，根本不会作任何思想准备工作，因此，双方不可能组成联合参谋部，共同指挥这场同盟战争。

在“轴心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整个时期里，这种状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希特勒不相信墨索里尼周围的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愿提前透露他的作战计划；而意大利人考虑的是，首先进行一场“平行战争”③，尔后，在德国进行的战争中，成为或多或少的受益者。希特勒不愿意对意大利施加更大的影响，因为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生伤害意大利领袖的事情，也没有导致损害“轴心”最宝贵的链节，即两国元首间的相互信任的因素。后来的观察证实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推测，即希特勒的真正用意在于，靠这种方法竭力维护墨索里尼这位“轴心”政策在意大利的真正执行者，在意大利人民、军官团和王室面前的威望。

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根据三国条约，于 1942 年 1 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它给人以假象，似乎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效仿西方同盟国的“盟因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成立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实际，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离了它原来的目标——起码从希特勒方面来说是如此。如果军事委员会中的德国成员。连自己本国的作战计划都知之甚少，那就谈不上对作战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研究，军事委员会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

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仍是为希特勒自己设置的，他打算以此来取代联合参谋部的有计划、有预见性的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国家首脑的偶尔会晤、文件往来，成了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最基本的手段。三军驻意大利武官被任命为为军事委员会中的“联络将宫”，但只在需要时，才命令他们参加

工作。德国步兵上将冯·林特伦是“驻意大利大本营的德国将官”’，驻地安排在罗马的意大利大本营附近，能够每天参加那里的形势讨论会，但他很少到会；意大利长驻柏林的代表，也同样很少在希特勒的战地大本营里露面。

第三章特别行动：占领丹麦—挪威

1940 年春季，德国大本营的建设工作尚未就绪，德军便占领了丹麦和挪威。它从诸多方面反映出德国在战争期间所实施的特别行动的特点。这一点，前文已经作了简要阐述，它主要表现在：

> 希特勒对于海军总司令向他提出的德军主要应采取守势的观点，起初是犹犹豫豫地采纳了；尔后，又顽固坚持，其程度远远胜过他的倡议者。同时，将原来的纯军事和受战争制约的根据，置于他自己的世界政治和进攻目标之下；
>
> 在此次战局中，希特勒将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作战处，排斥在陆军兵团的备战和指挥工作之外，仅依靠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其他他自己指定的机构，第一次亲自担负起陆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任务；
>
> 在他尚未将大本营全部组建完毕之前，就已经以一种违背迄今一切准则的指挥体制，将大本营的组织基础破坏殆尽；
>
> 此次战局带来的危机，已经将在性格和军事能力上的缺陷表露无遗，给以后的指挥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1938 年 12 月 12 日，海军大将雷德尔，结合前不久刚刚爆发的俄芬冬季战争，提醒希特勒注意英国占领挪威可能给德国的作战和军事经济带来的危险。他不仅把这看成是他的权力，而且是海军总司令的应尽义务。他不知道，此时他所作的与温斯顿·丘吉尔不谋而合：这位英国海军大臣此时正急于占领挪威重要港口，其中包括纳尔维克和卑尔根，企图以此和其他手段控制挪威的海岸线。如果在这种论据十分充分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沉默，那么对雷德尔来说，将意味着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央职。至于由这种观点得出什么结论，只能留待国家元首根据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作出定夺。

希特勒选择了军事道路。在 1939 年在总理府举行的 12 月大会上，——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座，经过一番讨论，首先提出问题和任务。对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 “两个方案：如果我们宣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必须以武力站住脚跟，我们要作此什么？国防军统帅部应拟定方案”。

这里，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希特勒只满足于他作为最高统所应尽的义务，即将有关军事部门召来，从各种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作战中的新问题。可是我们再看一看约德尔下面这句话，刚刚那种假象就会被彻底揭穿，他写道：“同时就应支持前国防大臣”。这里指的是吉斯林，他并不是受挪威政府的委托而是作为挪威政府的敌人来到柏林的。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日记中的这后一句活，对于吉斯林来说，是一语双关。然而，希特勒却公然宣称，吉斯林会“有求于我们”，并认为他是“我们必须以武力站住脚跟”这一方案中的重要的中间人。

希特勒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着。他原来的军事动机，随着 1940 年 3 月 12 日俄国和芬兰冬季战争地迅速结束，失去了它的紧迫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他最原始的政治思想愿望。然而“阿尔特马克”事件①又使他竭全力为占领挪威寻找理由。1940 年 3 月 10 日，当约德尔第一次获悉俄芬战争停战的消

息后，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军事形势已被打乱，因为两国一旦媾和，我们准备采取行动的动机……就会站不住脚”。两天后，他更露骨地写道：“芬俄媾和，剥夺了英国，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占领挪威的政治依据”。

对于这件事，国防处长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经过自己独立思考之后，在这些天里向他的上司递呈了一份书面的“形势判断”，从各个不同角度充分阐述了他认为目前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大可不必的观点。同时，他还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德国即将发动的西方攻势，必将把英、法的全部兵力吸到该线，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无需考虑英国进攻挪威的问题。约德尔的观点却恰恰与此相反。他认为，由于德国在发起西方战局时，将要破坏比荷卢三国的中立，英国将会“立即占领纳尔纵克”。然而，他在 3 月 13 日的日记里，却完全抛弃了他以前的论点，他写道：“元首还没有下达进行维悉河演习——此次作战行动的代号——的命令他还在寻找藉口”。

3 月 1 日，希特勒签署了占领丹麦和挪威的“指令”，促使他下定这一决心的主要动力可以从他下面的言行中找到说明。4 月 9 日傍晚，即开始行动的第一天，希特勒对“帝国领袖”①罗森贝格说：“1866 年出现了俾斯麦帝国，今天，将要出现大日耳曼帝国！”②在这种思想里隐藏着一种特殊的期望，即扩展海、空军基地以对付英国，从长远考虑，即从狭窄的德国海湾中解放出来，为确立帝国的海上优势地位创造条件。

在大本营里能够发挥巨大影响的海军总司令。为了表示他对英国侵犯斯堪的纳维亚的担忧，徒劳地强调维护挪威中立的好处，以阻止事态的发展①。担负此次行动的陆军部队司令法尔肯霍尔斯特将军提出，在军事占领前，应采取“外交行动”，争取在时间上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以尽量避免付诸武力。他的这一建议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对抱有与法尔肯霍尔斯特相同思想的些担任要职的下级军官，约德尔也以同样方式打发了他们，就象以前打发国防处长一样。约德尔在 3 月 28 日日记里写道：“某些海军军官在威悉河演习问题上表现得滑稽可笑，看样子要使用灭火器了。法尔肯霍尔斯特的三位参谋长的想法怎么样。”

这些充满希特勒本性和意志的语言，是“总理府精神”的一种强烈象征，它意味着“审慎”在“冒险”中是怯懦的表现。同时，也典型地表现出当时大本营存在的那些基本的、从未克服的缺点，即人们相信无需掌握部队及其指挥宫们的脉搏，就可以发号施令——甚至具体到细枝末节，——就可“指挥”军队。

众所周知，同盟国也已经决定占领挪威，并几乎与德国同时即 4 月 7 日，开始向挪威港口运送部队。但人们很少知道，英国原来借以采取行动的所谓防御和战争经济的理由，个久便被否决，认为是超越了界限。在德国西线攻势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战时内阁于 1940 年 5 月 24 日从挪威的纳尔维克地区撤出最后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盟军部队。到 1940 年 6 月 10 日，英军全部从挪威撤出。德军未受任何攻击便占领了挪威和丹麦，直至 1945 年 5 月停战，其全部兵力一直驻扎在那里。

在挪威战局中出现的第二个奇怪现象。是违反一切常规和准则的命令体制。

需要三军强大部队实施准确协同的“联合作战”，恰恰要求有一个联合司令部，并根据当初组建指挥参谋部时的指导思想进行工作。然而，约德尔将军也许不会忘记，1937 年秋季举行国防军演习期间，由于他的指挥参谋部

力单势薄，国防军统帅部不得不只赋予他下达一般指示的任务，把组织演习的大大小小工作都委托给陆军总司令部。此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体制几乎没有扩大，因此对约德尔来说，在这战争的严重关头，他不得不选择两年前在军事演习中那样的出路。由于受这种旧事的束缚，以及受一种认为挪威行动的重担应由空军担负的意见的影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首先想到是，根据统帅部的指示，将挪威作战行动的组织和指挥转交给空军总司令部。按照这个逻辑，约德尔便违反常规地将希特勒 12 月 13 日的命令转给了国防处中空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施佩克·冯·施特恩堡上尉。命令中写道：“应探讨以最小型的参谋部占领挪威的方法。”数天后，约德尔在与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将军谈论“挪威事宜”时，他的中心一句话是：“挪威问题应怎样进一步处理？”似乎就在约德尔向希特勒报告了这次谈话之后，希特勒第一次出面进行干涉，并指出，“挪威方案不能放手”。这样，此项任务又回到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手里。

12 月底，国防处将加工后的第一份草案呈报给希特勒，不久，希特勒——可能是偷偷地——将草案转给了三军总司令部。其中有一条虽是新的、但改动不甚大的建议，要求组建一个由空军总司令领导的指挥部，继续筹划。希特勒对组织形式一贯弃新厌旧，贪婪地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必须为占领挪威成立一个特别司令部。但是他再次拒绝在空军组建；他指示应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特别司令部”。希特勒还拒绝这个“特别司令部”由一名空军军官领导的建议，而是由三军各派一名”组成，由统帅部参谋长领导。戈林对这一规定一直表示反对，但未获任何结果。

促使希特勒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可以从 1 月 27 日的命令中找到答案。命令说：北方行动草案，应在“他个人直接影响下，并紧密结合作战全局进行拟制”。这就是说——事态的发展也表明，希特勒认为“威悉河演习”这一不寻常的艰巨的作战行动，只有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才是上策。此外，他还想以这种最简单的方法，并以此为转机，挽回约德尔草率允诺空军对挪威战局指挥权的要求而造成的局面，他认为，不论是空军总参谋部，还是其总司令戈林，对组织计划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作战，都是力不能及的。不仅如此，他比约德尔更早地认识到，“威悉河演习”的重任，不能交给空军，也不能交给海军。

约德尔在 2 月 5 日的日记中有一句简短的话：“特别司令部”开会时，“空军代表缺席”。这是戈林对“他的”空军所遭到的冷遇的恼怒和失望的表现，在以后的几天里，只有海军和陆军的两名军官，在国防处毗邻的房间里开始他们的工作。他们连地图都没有，更不用说缺少有关“北方行动草案”的任何资料，因为过去德国总参谋部从未对斯堪的纳维亚进行过研究。而且，人们不久就看清楚了，“特别司令部”在作为一个固定的高效率的指挥机构方面，几乎无法与指挥参谋部相比。

在“阿尔特马克”事件压力下，希特勒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急迫决定“尽速准备威悉河演习行动”。这使得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到 2 月 19 日清楚地认识到，此次行动只能由一个具备各种领导职能的指挥机构来领导，这也是能最快解决目前状况的唯一办法。希特勒在听了他报告以后，当天便同意委任陆军的“一名新任军长”连同其司令部，继续进行“威悉河演习”的准备工作，并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负责整个行动的指挥。

由于约德尔的建议，短短几天内，终于在“威悉河演习”的指挥机构中，

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核心。然而，就在这以后，不可思议之事仍然接瞳而至。首先是，在经过一系列动荡之后陆军重新回到中心位置。此时，统帅部不是请陆军总司令至少将任务委派给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而是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将这一特殊任务交给了一个军司令部，也就是说是陆军位于考虑之列的指挥级别中最低的一级。驱使统帅郎采取如此作法的重要原因，可能是认为在未来的西方战局中，不可能指望陆军派出一个较高级的司令部。而更大的可能性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副官处长将此看成第一次机遇，即通过不考虑合适人选级别的方法，按照希特勒的意向并以革新者的姿态，对陆军习以为常的等级制度加以考验。最后，陆军总司令部只是得到这样的通知："元首认为冯·法尔肯霍尔斯特将军是个芬兰通。"①

第二天，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法尔肯霍尔斯特，面授机宜，并委以此任。当他和他的第21军司令部进入"特别司令部"，再次与国防处紧密配合着手工作时，出现了一种稀有的奇特状态：国防军统帅不是由于陆军对挪威作战行动的参与而依靠陆军总司令部，而是仅仅依靠一个军司令部，甚至——在同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将全盘指挥权都交给了它！凯特尔和约德尔也是上行下效，越过陆军，直接与后备军总司令协作，挑选他们认为适于担负执行"威悉河演习"任务的部队。正是由于这件事情，陆军总参谋长才进一步获悉占领丹麦和挪威计划的有关情况。为此，他在他的日记里无可奈何地写道："在这件事情上，元首与陆军总司令之间没有交流过一字一句。这应当载入战史。"

促使希特勒采取这种前所米闻的蔑视陆军总司令部态度的动机，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为避免来自空军的困难第21军司令部应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②这种缺乏说服力的理由——几天后经戈林的调解，说明这一理由纯属虚构，完全是希特勒意志的另一种表现，是为了在三军所担负的战局中，维持"他个人的直接影响"，或者说，是为了早日戴上那顶朝思暮盼的统帅桂冠。另一种简单的推测认为，希特勒在让陆军总司令部准备西方战局的同时，不想再给它增加挪威的负担。这种理由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军作战处以及它的高级领导们，还有陆军其他部门，如情报、运输、后勤等都统统会被排斥在西方战局之外的它们的真正负担不是来自于这里，而是来自于将同时为两个机构服务，即一个大的——陆军总司令部；一个小的——"特别司令部"。尽管挪威战局中的指挥机构是一件"即兴之作"，但它仍成了尔后整个战争中建立的所谓"统帅部战场"①的样板②。

希特勒和他的参谋部对于直接领导一次作战行动的能力，在"关于威悉河演习方案的指令"颁发之后，便开始经受严格的考验。

法尔肯霍尔斯特和他的军司令部的进展迅速，颇有起色。在他们的口头报告和希特勒赞同的基础上，约德尔立即亲自草拟"指令"文稿，国防处仅负责"签发"。希特勒将挪威行动视为个人的事情，这对大家来说已习以为常。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象从前那样与国防军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进行接触，将陆军和空军能够筹措到的兵力数量和种类，写入命令中，并规定了与陆军实施协同的空军部队，在战术上接受法尔肯霍尔斯特的指挥。

从下面的日记中①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由于希特勒和国防军首脑违反军事常规而带来的副作用。

3 月 1 日

哈尔德：“ 提出要求之前应事先与我们接触，这一诺言并没有遵守。 ”

约德尔：“ 陆军总司令对于我与那顺年克商谈……工作安排大发雷霆，降低了要求。”

3 月 2 日

哈尔德：“ 凯特尔要求提供精良的部队……布劳希奇指出，我们陆军总司令部的 20 %预备队已经重任在身。 ”

约德尔：“ 与陆军协调。元帅（戈林）勃然大怒，对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态度粗暴。13 时，他去见元首。下午，在经过与陆军和空军商谈后，提出新的要求，调子有所降低…… ”

3 月 3 日

约德尔：“ 元首尖锐指出，对挪威迅速采取有力行动的必要性……，空军总司令反对空军部队隶属于第 21 军指挥的任何安排。 ”

4 月 4 日

约德尔：“ 空军的全部兵力隶属于第 10 航空军。根据第 21 军司令部的要求，第 10 航空军受命于空军总司令。博登莎茨将军对把元帅排斥在威悉河演习之外牢骚满腹。他认为，事先没有征求空军任何一个军官的意见。隶属陆军是无法忍受的。对凯特尔大将大发雷霆。我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 ”

4 月 5 日

约德尔：“ 与国防军三位总司令就成悉河演习进行认真磋商。元帅从未发过这么大脾气。他抢过话头，指出，迄今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无效……

讨论结果：

（1）向纳尔维克运送强大兵力；

（2）海军应向各港口派遣舰只；

（3）……

（4）对挪威，计划投入 6 个师的兵力。

3 月 6 日

约德尔：“ 准备工作的框架已经确定。元首签署指令，3 月 5 日磋商中确定的各种改动均写入指令之内。自此，再不允许有任何变动。 ”

从上面这件事情的发展过程，可以充分看出当时德国大本营在建设时期的特征：

1、国防军统帅部下达的命令缺少权威性，就连希特勒亲笔签署的指令，下级都可以违背军队的上下级关系，加以反对并迫使其修改，更不用说“ 元首国家 ”的准则了。

2、由于特别司令部的组建，陆军总司令完全被排斥在一边，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①；而空军总司令则不只一次地提出，担负支援陆军的空军部队的指挥权不能交任何人；也不能暂时隶属于陆军一个军司令部②。

3、经过多次申辩，陆军的兵力终于可以增加一个整师和其他部队；空军也由此保住了自己的主动权。

4、起初海军似乎尚未提出什么异议，但不久，便要求希特勒取消他关于在登陆以后海军舰只留在挪威各港口决定。③。

5、希特勒在与众多人员，特别是与戈林和雷德尔的谈话中，尽量克制自己；但事后，他对其身边的人却出言不逊，要求苛刻。

在行动准备时期发生的诸般事情，已经给担负总司令角色的希特勒的形

象，投下不光彩的阴影；而他在作战中的行为举止更为这种阴影雪上加霜。由于对眼前危机判断错误——每次大的作战行动前均是如此——头一天晚上他还陶醉在“大日耳曼帝国”的幻景之中，然而仅一个多星期过后，接踵而来的却是危机四起，漏洞百出。约德尔将军的日记是一个无可怀疑的证人，但是，充斥其全部日记的是那些日子里他的地位和责任感，以及他站在领导职位上，为获取战局的胜利而立下的汗马功劳。在这里，将约德尔这些天的日记，再加上哈尔德的部分日记摘引如上，给读者提供一个直观概念，并由此为作出自己的判断提供依据。

4月14日

约德尔：“迪特尔未受到攻击，但与北部集群的联系被切断。（希特勒）激动异常。事无巨细，一切命令都要从这里下达。”

哈尔德：“布劳希奇大将从元首那里回来。结果：人们认为纳尔维克无法坚守。”“我们算倒了霉“（希特勒的话）。

4月15——16日

约德尔：“责备海军，主要是因为未派战舰参加战斗②，也未能加速运输。这是没有道理的——我（约德尔）表示强烈反对。”

哈尔德：“陆军总司令从凯特尔那里获悉，应撤离纳尔维克。我们不能这样做——与约德尔商讨。约德尔说：纳尔维克城无法守住。山地部队将撤入山里。是否最后放弃纳尔维克地域的问题，尚未决定。”

4月17日

约德尔：“元首再次激动异常地指出，迪特尔集群必须向南开进，或者替换下来。我（约德尔）

再次强烈主张：

（1）向南开进是不可能的；

（2）部队，物资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运走，会损失大量飞机，同时，迪特尔集群的士气将受到挫伤。

他们可长时间地在瑞典边界作战。只有当一件事失败了，才应将其丢弃……

15时30分……

由纳尔维克集群进行的战斗重新打响。每个坏消息都使人增添一分忧虑。国防处长和国防处陆军组长对形势的判断，我完全同意。

我（约德尔）将这一形势判断，以及我们没有足够的远程飞机将部队从纳尔维克运回的证据，呈送元首。此外，还有一份指令草稿…其中包含了我们的（约德尔、国防处长和国防处陆军组长）意愿。战斗和兵力将我们束缚，无法中途停止。

甚至将研究挪威的教授，从因斯布鲁克请来（根据希特勒的安排），关于山地部队能否从纳尔维克向福斯克转移的意见。根据我的（约德尔的）山地经验，这是不可能的。

傍晚，元首签署了给迪特尔的命令，……“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

4月18日

约德尔：“元首恢复了平静……甚至有可能按照坚守的思想来修改昨天晚上的命令……

平静的一天，使神经紧张的人们颇感惬意。”哈尔德：“（1）约德尔说：陆军总司令必须听取纳尔维克的情况。对陆军施加影响……

（2）元首说：不能长时间坚守纳尔维克……昨天，元首想撤回纳尔维克的部队，首先放弃纳尔维克。”

4 月 19 日

约德尔：“ 危机再现。

政治行动已经失败，按照元首的观点，必须付诸武力。省党部头目特博文应当上任①

元帅也在这方面推波助澜。他指责没有对老百姓采取足够有力的，……海军没有运送足够部队。空军不能什么都干。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退出会议大厅；因为（希特勒）对所有有小事情都亲手安排，使有关军事指挥机构的每项井然有序的工作被打乱……

傍晚，特博文到来，元首单独与他谈话。能否将他的全权代表工作仅局限在民事领域——根据国防处的建议，这还很成问题，必须与他亲自谈话。 ”

4 月 20 日

约德尔：“ 元首的诞辰……全部攻击停止。

显然，是空军的报告促使元首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挪威人已经广泛开展小型战争和破坏活动。我已在 19 日表示反对这种观点。我们不允许挪威人进行消极的或积极的抵抗，因为这正是英国人的目的。 ”

4 月 21 日

约德尔：“ 大将（凯特尔）于 4 月 20 日晚，（与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争辩）。在起草特博文任职命令中关系到军事必要性时元首想用大型船只“ 不来梅 ”号将人员和物资运往特隆赫姆。海军总司令认为现在毫无考虑的余地。 ”

4 月 22 日

约德尔：“ 元首对英国（在翁达尔斯内斯和纳姆索斯）的登陆日益不安……而我则认为英国人的处境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港口和机场。 ”

4 月 23 日

约德尔：“ 不安的心情有增无减……在纳尔维克的兵力应立即（在国内）整编，以重整第 3 山地师的旗鼓。 ”

4 月 24 日

约德尔：“ 形势似乎有利得多了。 ”

4 月 25 日

约德尔：“ 继续保持乐观情绪。 ”

4 月 30 日

约德尔：“ 13 时 55 分我向元首报告，奥斯陆与特隆赫姆之间的陆上联系已经建立①。元首格外高兴，中午，我必顷坐在他的身边。 ”

每一个人不抱偏见的人都会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即挪威战局的胜利并不归功于希特勒，而应当归功于敢于抵制他对下级指挥和部队进行粗暴干预的强大的国防军。可以肯定，纳尔维克这个整个作战的关键环节，如果按照希特勒的意见办，就会在占领之后的几天里，在海军损失一多半大型驱逐舰，而且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次放弃。

德国独裁者企图将指挥机构和作战指挥权从属于个野心和政治威望的首次冒险，由于国防军各级指挥的充满理解的合作，终于获得一个良好的结局。然而，人们要求除去这个立于帝国之首的人的情绪依然根深蒂固。对于希特勒那些缺乏头脑的暴躁场面，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日记已经作了绘声绘色的反映。作者想作一些补充，这是作者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到总理府拜访约德尔时所亲眼目睹的场面。当时，希特勒蜷缩在房间角落的一张椅子里，呆若

木鸡，默默无语，与指挥参谋邮参谋民守在电话机旁，象盼救星一样等待新消息的到来。国防处长看到这一有失尊严的场面只好回避了。这不由处主地使人们想起德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统帅。他们的素质、自我控制能力和经验，无愧于领袖的地位和身份。毛奇由于他的“镇定自若，沉着冷静“使”他在波希米亚和法国战场上不断创造惊人之举”，至今还为后人所传颂。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毛奇的举止“与其说来源于钢铁般的意志，倒不如说是他准确清晰的判断力的结果”，而归根结底，他的“全部人格”的最深厚的根源是他的“理性和伦理之间无法割裂的紧密结合”。

而希特勒在挪威战局中，却揭示了另外一种“人品”。但是，大本营的混乱的组织体制，在总理府的那些日子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约德尔将军在挪威事件的高潮时刻，曾多次表现出“刚直不阿”，但他却忽视了一点，即恰恰是他，过去曾竭尽全力排除众议支持希特勒直接掌握军事领导权，也正是他在将陆军总司令部排斥在挪威战局之外一件事中助桀为虐，起了重要作用。此后，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或许也感到了惊讶，一个希特勒竟无法无天，超越了一切界限，他插手一切，甚至干预具体的战术细节，并为他尔后的全部“领导”，树立了带有警告性质的样板。国防军统帅部首脑在总理府办公可以使希特勒随意串来串去，接连不断地向他们提出新的问题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是将任务转嫁给他们的国防处。国防处懂得摆脱希特勒的影响，在当时和以后，都尽力给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以支持。

战地大本营在它首次聚会之前，还没有在其外部的或是内部形式方面，吸取任何经验教训。由于挪威战局的值得庆幸的结局——其他战局也是如此，就其组织体制和最高领导的指挥来说，真不亚于天方夜谭——人们不仅要将一切败笔都忘掉，而且还想证明——不久就这样作了——他们所运用的指挥方法是正确无误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从中得到了一份最危险的报酬：除了他的办公桌被荣幸地“允许”安放在希特勒的案旁达两年多以外，他的诚实态度还巩固了最高统帅对他在军事判断方面的信任——他同时也背起了一个败坏名声、束缚双手的包袱。

第三部鼎盛时期
（1940 年 5 月——1941 年 12 月初）

第一章初期形势

5 月初“从挪威传来的捷报”，为西线攻势开辟了道路。希特勒决定“几天后”开始新的战局；约德尔则建议，两次作战行动要在“时间上和力量上区别开”，因为空军在 5 月份仍有大批空军部队被牵制在挪威。

西方战局开始前的几天是令人心神不定的几天，在这几天里天气预报和进攻命令不断更改。空军总司令每天坐在司令部里“收听”天气预报，因为他的飞行员和伞兵部队比其他军种更需要好天气。在总理府举行的有关会商会上，照旧没有陆军代表出席，也没有向陆军提出任何问题，“只是”要求他们准备 200 万兵力，在 24 小时之内随时准备参战。希特勒自己在 5 月 7 日这天“对再次延期极为恼火，这有泄密的危险”。次日，他依然，“暴躁异常”，声言他再也不想等了。但是他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违心”地让戈林，将开始行动日期最后一次推迟至 5 月 10 日，“但再也不能往后推延一天了”这一决定是希特勒准备行动的信号，他不想再等待有利天气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对希特勒的决定随声附和——这已成了他的习惯。然而，运气帮了希特勒的忙：5 月 9 日傍晚 9 时，即按大事年表中“元首发布进攻命令的最后期限”的前半小时，空军总参谋长报告说，“10 日天气晴朗”。为表彰空军气象工作者们的功绩，该处领导荣获一块金表。

5 月 10 日清晨，领率机构的各个小组——后来就是由这些小组组成了德国战地大本营。从四面八方于不同时间，分乘火车和飞机向奥伊斯基兴地域集中。希特勒及其左右也象往日一样，乘坐“元首专列”，于前日下午从柏林附近的小站出发，向北驶去，以便在黄昏前踏上西进之路。将近半夜时分，国防处长和国防处担任要职的军官们乘国防军统帅部“信使队”的一架飞机由施潘道附近的一个机场起飞；国防处的其他军官和官员，会同秘书、绘图员和通信人员乘坐国防处的特别列车。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第一个精干的参谋部，由措森出发，进驻希特勒大本营附近的“林务所”①。

翌日清晨 6 时许，国防处“战地队”在明斯特艾弗尔城北部的罗德尔特村的一座大庄园里聚齐。距这里仅数百米的大小道路上，挤满了开进的纵队，潮水般地向西方边境拥去；头顶上，已方的飞机划破了黎明的晨空。从庄园外几乎无法看到的简单实用的房屋，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为我们大约 5 名军官和官员以及 30—40 名辅助人员，提供了充足良好的工作和就寝条件。然而，我们却不得不与最不受欢迎的邻居毗邻，其中有希特勒左右的人，包括他的贴身卫队，这些人不分昼夜喧闹不止。希特勒对饮食不厌其精，需求量颇大。为运输这些补给品，更是车马喧嚣，不绝于耳。在整个战争期间，Ⅰ号宿营地一直如此，而国防处战地队的供应却与陆军各单位的一样。这两个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单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基础上的关系，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再未在一起住过。

在“山崖城堡”的第一天上午，希特勒及其随员们一同来察看国防处的办公室和设施。他时不时地向一些他熟悉的军官点点头，但是他的军事“工作班子”的大部分成员，不论是军官还是职员，如同过去一样都似从不相识。在尔后的战争年月里，他从未再光顾过Ⅱ号宿营地。

希特勒自己，以及来柏林总理府的将军和副官们居住 1 号宿营地，有一条由高高的铁丝网篱笆围起来的路，由大院一直延伸到一二百米外的低矮的灌木丛中。灌木丛中散布着许多混凝土筑成的掩蔽所，充当他们的工作室和

寝室。餐厅也设在掩蔽所里。在这些掩蔽所的中心位置的一个小高地上，建造了一所约三四米见方的临时木板房，作为地图室和情况研究室，一切大型的会商也在这里举行。从这里举目远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色，群山起伏，层林叠翠，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和平。战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曾说：“元首大本营纯属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混合体……除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时刻以外，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军人来说，元首大本营里的生活简直是一种殉葬……，因为它不是一个军事的，而是一个民事的大本营，我们这些军人是那里的客人，在那里工作满 5 年半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这种想法，约德尔将军在 1940 年 5 月肯定是有的，更不用说他在这一过程中，是想利用“工作班子”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希特勒那里占一席之地。他的这一描述，用在希特勒那批亲信头上，也许比用在 II 号宿营地的头上更为合适，在这里生活的都是兵，而且完全按照军人的准则生活着。不过，约德尔的话倒是恰如其份地道出了整个大本营的精神实质。然而，最能代表这种精神实质，不是来源于由那些大多数身着军灰色制服的非军人所构成的内部实体；也不是来源于不得不在希特勒周围的军事要人之间搞平衡的那些党内要人的不甚强烈的冲击；而恰恰是驾驭大本营的希特勒自己，是他给大本营的这一精神实质赋予内涵和形式。尽管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尽管他对国防军的发展发挥过决定性影响，尽管从战争爆发就把整个身心倾注在战争指挥上，然而他却缺少一种合作共事的观念——这是世界所有军人独具的气质，具有这种气质人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正派庄重，能作到信赖、真诚、坦率和自我牺牲。然而，希特勒对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军官都无诚实可言。他毫不顾及地窥探他的部下，利用他们的长处和弱点，随时准备端出他在 1939 年 11 月 23 日对三军总司令讲话中的一句威胁的话：“我什么都不怕，谁要与我作对，我就消灭他。”但是他的活并不是实话。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谈到希特勒时，说：“他对政治家、对党说话时的口气，完全不同于对国防军，而他对党卫队讲话时，又不同干对国防军和政治家讲话。”在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内，希特勒也是玩弄这种手腕。其目的，归根到底还是防备危及他的政权的危险，保护他自己的和“党”的最高威望。

约德尔所理解的“民事大本营”，大概也正渊源于它与真正的军人气质的差异。生活在 II 号宿营地的陆军军官，对附近陆军大本营里的军官羡慕不已。那里的军官虽然也属于他人，但大家都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有一件事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思想：为了陪希特勒进餐，国防军副官长每次派一名国防处的军官前往。起初，年轻军官们还争先恐后，可后来，副官长不得不开列一个“次序名单”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再自愿前往了。

在“山崖城堡”以及后来在其他地点的日程安排与在柏林时几乎没什么两样。国防处在 24 小时内，至少收集两次由陆、海、空三军提供的情报，然后进行审阅。整理、补充态势图，最后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此为基础，准备“形势报告”。参加形势报告会的一般是希特勒及其手下的“侍从官”们。遇有特别重要的情报，要么由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利用电话直接向希特勒报告，要么由国防处民迅速转呈约德尔，并在形势分析室里临时举行小范围的聚会。

从报道和讨论前线战事的方法上，也可反映出大本营工作的随意性。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前线瞬息万变的态势，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警告，继续玩弄危险的赌注，而且企图坐在大本营中接管战场的指挥权，真是狂妄至极。他

的观点产生于连篇累牍的废话，从这些观点中产生决心，又从这些决心中产生书面“指令”，甚至产生直接干涉陆军下级指挥机构的措施。而这一切都是他虽然与陆军总司令部近在尺咫而事先没有与其进行任何接触的情况下进行。

国防军这两个最高指挥机构，不久便怒目而视，分庭抗礼。在国防军统帅部这一方，有一个统治一切的希特勒。以脾气暴躁，满腹狐疑，在时间和空间上从不考虑军事准则，不顾后果，一意孤行，然而在关键时刻——如在纳尔维克问题上，他又惊慌失措，将自己的大胆决心抛到九霄云外，代之以滥用手中大权，随心所欲地掣肘战事的进程。紧跟希特勒的凯特尔，将随声附合视为已任，以此则任劳任怨地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竭尽全力地扫清障碍，比起凯特尔来，约德尔发挥了较大影响。他似乎将挪威战局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随时准备对付“将军们的不顺”，为“元首的天才”开辟道路。尖锐的意见分歧在他的日记里有鲜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们只知道聆听和传递希特勒的意见和决定，对全局漠不关心，即便是他们作为信使被派往前线高级指挥机构时，也依然如此。

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几乎每天乘坐飞机或汽车四处奔波，与各级重要的人员保持面对面的接触，以全力监督全部计划和命令的贯彻执行。但是,从这些接触中.他无法搜罗到反对希特勒和确保自已应得的国防军统帅部高级顾问之称的力量。哈尔德也不想为此奋斗。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他有他的主权管辖范围，在他的周围有一批相互信任、志同道合、紧密配合的总参谋军官，他企图借这股潜在的优势最终证明他是强者。事实也是如此，在这次战局的数周时间里，特别是当希特勒神经不正常时，他曾多次逾越自己的职权行事。他将他自己及其总参谋部的工作，作为伟大战局中经久屹立的丰碑，载入他的日记。

在幕后，空军总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动。他通过他的联络官，不时获悉大本营里的各种不同观点，他身为空军总司令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显赫人物，不断想方设法限制在德国人民中享有荣誉的“反动”陆军。他能以电话与希特勒保持联系，必要时还可搭乘停在附近的专列去见希特勒。与希特勒见面时，通常没有第三者在场。与陆军总司令相比，他是历经考验的“元首最忠诚的骑士”，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然而，还是同一个戈林——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他经常为一些被希特勒无理判处死刑或遭其他惩处的陆军军官说情。

处在“大人物”之间的国防处军官们，活动余地极为狭窄。除了不能参加在希特勒那里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以外，国防处军官们所受到的限制并不亚于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们。他们往往被置于既成决议面前，通常没有表达的余地——除了在敦刻尔克问题上他们曾大发过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紧迫的情况下——偶尔的和有限范围内——尚有一些“共同参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参事”也只不过是对大本营拟制的命令。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删删改改，使其更符合当前态势。

国防处长和国防处的陆军军官们默默地工作着。其基础是，他们与陆军总参谋部保持着生动活泼和相互信赖的关系；此外，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不时到前线看一看。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多少活动余地，因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强迫他们到前线要广为传播希特勒的意志和言论。国防处军官们的前线之行，

并不身负重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到前线只能看看朋友或部队，不能作为大本营的“联系人”发挥任何作用。约德尔对这种旅行极不感兴趣。记得在占领巴黎的那一天，国防处长油然记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一天，突然决定飞往巴黎。飞机降落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场地，接着他同一个向巴黎开进的师进入巴黎。当他回到大本营时，居然没有一个上司过问他的巴黎之行。对于国防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以及与前线的接触，即凡是牵涉到指挥参谋部高级军官的事，希特勒和约德尔“都不喜欢看到”，因为他们认为，军官们的此种举动会给双方造成有害影响。其实，双方的这种努力与损害军人思想毫不相干。

在叙述了前面发生的一切之后，读者对充斥于德国大本营中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首脑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如我下面几章所描述的——就不会感到惊讶。这种根深蒂固的对立，早在“取得战果的时期”就已经将由此而形成的合作共事挤到次要位置。甚至新的紧张关系都来自于新的胜利，因为在希特勒领导下——从军事和政治角度上看——这些胜利永远是“失去的胜利”。

第二章西方战局

5 月 14 日即西方战局开始后的第 4 天，希特勒发布了“ 第 11 号指令 ”，确定了继续作战的方针。根据这份指令中部分已众所周知、部分已过时的内容来看——如应“ 尽快粉碎 ”荷兰军队的“ 抵抗 ”，而荷兰军队已于当天投降——指令的主要目的一目了然，它是要清清楚地告诉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最高统帅已今非昔比，他要从现在起执掌作战的指挥权。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日记中，对于希特勒干涉陆军职权范围的事也有鲜明反映。而在这次行动中，国防处在拟制指令过程中，再次贯彻了“ 任务式指挥法 ”，因此他们还为其所从事的“ 编辑 ”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沾沾自喜。

从陆军参谋长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 指令 ”’并不十分重视，要求他将其大量坦克和摩托化兵团于适当时候，从比利时地域向左翼转移时，他却大为恼火。作者曾看见希特勒用一部军用电话机，艰难地质问第 6 集团军司令冯 · 赖歇瑙大将，为什么迟迟不投入他的装甲军。对这件事，约德尔在 5 月 16 日写道：“ 元首催逼 B 集团军群和 A 集团军群的全部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尽速行动。 ”凯特尔随即飞抵 B 集团军群司令部，当面向其传达希特勒的要求。这天，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 问题的关键是，要开辟一条前送道路……分别通过第 6 集团军地域和第 16 集团军地域，……将兵力前送至突破部队的右翼和左翼 ”。几小时后，他又补充写道，希特勒点到的那个装甲军，正在它迄今的作战地域，为取得最后胜利再次投入战斗。从他的日记中看出，哈尔德大概使每一个外行都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部队机动困难重重，而且需要相应的时间。

次日，希特勒——大概是昨天晚间受与戈林一席长谈的影响——突然决定，将经长时间准备的、关于在荷兰进行军事管制的全部措施统统废除。他纯粹从党政观点出发，以波兰和挪威为样板，在荷兰实行民事管理，完全没有考虑到这还是一块极不安定的地区。国防处长立即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就忽视军事管理的必要性提出异议，但无济于事。当哈尔德听到这个消息后，于 5 月 17 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荷兰军事管制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再次表明最高统帅对待陆军总司令部的极度不真诚 ”。

这是一个即将发生严重冲突的征兆。这场冲突涉及的是整个作战行动的核心思想，即迅速向海岸突破。当德国装甲部队主力畅通无阻地渡过马斯河，并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迅速向西挺进时，国防军领率机构与陆军总司令部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分歧。5 月 16 日哈尔德趾高气扬地写道：“ 尖子部队正以一流的速度推进……敌人装甲部队的进攻被击溃。步兵的开进速度……也极为迅速。’据可靠的消息得知，由南向北开进的法国军队所实施的‘ 进攻……开始攻势还很弱 ”。此时陆军总参谋长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装甲部队的“ 快速推进 ”。南部的翼侧安全可通过“ 梯队 ”的不断机动得到充分保障。他写道：“ 尔后，此线可通过后续部队得以加强 ”，并决定次日将其想法付诸实践。而希特勒的想法却与此大相径庭。虽然，他在坦克作战上不是没有花费一定精力，但他现在一直担心翼侧安全。因此，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步兵师身上。他希望，在装甲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之前，步兵应骑马或步行赶到翼侧。5 月 17 日中午，他向陆军总司令说明他这一担心——正如哈尔德在日记中所记载的：“ 他认为主要危险来自南面 ”“ 我认为当前没有任何危险 ”当天下午，希特勒乘汽车亲自赶到巴斯托涅①，向 A 集团军群

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表示他的这一忧虑。希特勒强调说，为防止敌人死灰复燃，在这一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出现任何纵漏。因此，当前不能如此迅速地向海峡突击，而应以最快速度沿埃纳河、尔后沿索姆河①建立绝对可靠的防御，即使失去西进的时间也在所不惜。

5 月 17 日傍晚，陆军总参谋长对这一决定以忧虑的语句写道：“真是不愉快的一天，元首大发神经。他在成功面前畏缩不前，不想冒任何风险，宁可让我们停止前进。”翌日清晨，哈尔德再次向希特勒陈述了他对形势的分析，最终他认为。作战“不能有任何停顿”，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上午 10 时——这对 I 号宿营地的人们来说、可算是起了个少有的大清早——陆军总参谋长和布劳希奇与希特勒发生了一场极不愉快的争论。约德尔称之为“极度紧张之日”。他写道：“陆军总司令部不同意以最快速度巩固南翼的企图……希特勒则以最严厉的方式命令陆军总司令和哈尔德将军，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此后凯特尔再次仓促飞往龙德施泰特集团军群，命令其参谋长，立即按希特勒的要求行动，不要等待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约德尔也没有袖手旁观，他利用他的权威，下达了补充命令。而哈尔德却极为恼怒地回到了他附近的猎屋。他写道：“在元首大本营，另一种观点占了统治地位。元首对南翼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惧怕心理。他大发雷霆，暴跳如雷，似乎我们正在葬送整个作战，正在导致全军覆没。他根本不想继续向西推进。”

直到下午晚些时候，这场风波才平静下来。陆军总司令部收到了一份新的“命令”②。甚至还有关于早晨说话的“谈话记要”———这是一种过去几乎从未采用过的、表示赞同陆军总司令意见的形式。当天 18 时，希特勒终于被哈尔德呈送的新的报告说服了，决定“放弃对机动权的控制”，由陆军自行决定。“从此，正确路线终于能付诸于实践”，陆军总参谋长在分析这一事件的过程中，这样写道。但他又说：“这是在引起普遍义愤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结果，而且从表面看似乎是作为国防军统帅部采取的指挥措施”。这场风波迅速了结了，国防处是在事后才了解到这一情况。

在后来的日子里，约德尔的日记如同温度计一样，反映出指挥层仍处于一种动荡不定的状况。他们对作战指挥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经验，他们的行动准则是受其起伏不定的感情和情绪来决定的。因此，到 5 月 19 日，国防军统帅部对于来自北面的法、英装甲部队的突击，又一次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而敌人的这一行动正中陆军总参谋长的下怀，他“恰恰表示欢迎”。结果，两个最高指挥机构对空军的参预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5 月 20 日傍晚，大约在西方战局开始后 10 天，德军就到达了阿布维尔地域的索姆河河口，并在河口北部将拥有数个集团军的敌人合围。“山崖城堡”沉浸在不寻常的胜利喜悦之中。约德尔写道：“元首大喜过望，高度评价了德国陆军及其领导。”5 月 21 日傍晚，希特勒“对于步兵师向前推进不够又有点心神不定”。约德尔看到希特勒在“地图室里一直呆到一点半”。

第二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敦刻尔克事件。在这些日子里，希特勒将刚刚庄严表示的对陆军的“赞许”抛到九霄云外，再次于预作战行动，因此使西方战局，甚至整个战争的结局，都对德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许多战史书籍已对这一事件作过描述，为使这一事件的介绍更加丰富，作者想以个人在大本营的经历作一些补充。

此次对立的阵容仍如同以往：一方是希特勒、凯特尔和约德尔，还有戈

林；另一方为布劳希奇、哈尔德，以及国防处的陆军参谋军官们。希特勒及其追随他的那些人自以为是，毫无顾忌地将他们的观点和意志强加给陆军总司令部。经过多次“不友好的会商”之后，哈尔德于5月25日只好屈从于无法更改的事实，他说：“迅速推进的左翼前面并没有敌人……但被元首的不可更改的意志阻止了。”次日，哈尔德用极其尖刻、嘲讽的词句概括了全部的灾祸：“装甲和摩托化兵团遵照至高无上的命令，象大树一样，扎根在贝顿和圣奥梅尔之间的高地上，不能进攻。……而此在正是敌人的暴露后方，本可大干一场”。在此期间，由比利时匆忙开来的、仅由步兵师组成的B集团军群，“在对付着谨慎后撤、但仍保持战斗力的敌人……以一定的代价缓慢向前推进”。而敌人在此期间，却匆忙准备于第二天将其被围部队运过海峡。

象哈尔德及其周围的军官一样，国防处的陆军参谋军官们，也对希特勒的命令大吃一惊。希特勒对他下达的这一命令，不想作任何解释。瓦利蒙特和洛斯贝格毫不迟疑，立即通过“上层路线”，详细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约德尔极不耐烦、并十分自信地说：他、凯特尔以及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相当熟悉弗兰德的低洼沼泽地带，那里无法使用坦克。在狭窄的小路上，排成长串的坦克会相继被摧毁，加上迄今已经损失的坦克，到法国第二阶段攻势开始时，将没有坦克可以投入。目前在弗兰德唯一能够作的，就是大胆使用空军。戈林向希特勒担保，他的飞行员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在沿岸完成对敌人的合围①。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以其在战前和平年代里，在比利时海滨度假时的所见所闻，强调指出，1918年以来弗兰德地理的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但却是徒费口舌。作者对空军在黑夜和恶劣天气里的作用的怀疑，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至今还留下难忘的不愉快印象的谈话，还有两点值得一提：约德尔没有一句是引用龙德施泰特元帅多次表示赞同希特勒命令的话，尽管龙德施泰特由于他在当时的总参谋部军官中享有崇高威信，利用他的话最能消除其下级的矛盾；约德尔更没有谈到——那怕只是暗示——政治动机，即希特勒可能出于对英国远征军的怜悯。龙德施泰特在这件事的态度，在陆军总参谋长的日记里没有任何记载。相反。在5月26日的日记里却提到，“龙德施泰特不再坚持，径直去找霍特①和克莱斯特②，向他们说明快速部队继续推进的条件。”因此，根据上述情况，只能证明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和他的参谋军官们——更不用说陆军司令部——尽管在观点和安排上与希特勒有部分的一致，但目标绝不是一样的。这一切说明，龙德施泰特仅仅为了调整装甲部队而下达的短期“停止令”——对此，陆军总司令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成了希特勒在关键时刻中断作战行动自然发展的借口③。5月26日下午，装甲部队恢复机动权。但为时已晚，已无法从总体上阻止英、法军队向海峡彼岸的撤退，德国空军也只能起到干扰作用。

为了使读者对那个时期有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还想补充一些对西方战局尔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印象，因为它对于大本营的性质和作用据有典型的意义。

当德军于5月20日快速到达索姆河口后，希特勒立即撤消了以多个意大利师在阿尔卑斯山脉北缘发动进攻的计划。希特勒的这种对盟国意大利反复无党的态度，只能是出之于纯军事原因，别无其他解释。5月30日墨索里尼照会希特勒，宣布意大利于6月5日参战。希特勒对意大利独裁者的这一决

定非常恼火，建议他最好再等几天，这似乎义与“轴心国”的政治目的不相协调。破绽百出的理由是意大利的参战，将会干扰德军于同一时间计划在法国中部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但是，如果看一看哈尔德在这些天给的答复，就会知道希特勒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哈尔德曾答复陆军总司令说：“意大利在下几周”才能参战。此外，希特勒对于墨索里尼提出的关于两国总参谋部进行不承担义务的对话的动议置之不理，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希特勒而对德国国防军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巨大战绩，并不想与盟友分享胜利与和平的硕果，而必须由他一人独占。

当时，不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得知希特勒的公开的或秘密的企图，是多是少，都应从这些事情中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两个盟国不可能拟制共同的作战计划，更谈不上并肩战斗。因此，当意大利于 6 月 10 日参战时，两国既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最起码的军事联盟所必需的计划和目标。

随着 6 月 5 日在法国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首脑进行了第一次会商。会上再次出现的对立很能说明问题。在说明下一步的目标时，哈尔德说：“必须把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作战的目标”。他的话是符合总参谋部的久经考验的理论的。可是第二天，陆军总司令却告诉他一个希特勒的新想法，“其中关键的一句话是：“他首先想以十分的把握夺占洛林铁矿，从而剥夺法国的装备基地。”如果在当时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日子里，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后来就没有足够的办法和施加充分的影响说服希特勒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即“夺取特别是坚守一个领土目标，是以战胜敌军为前提”，“未取得这一军事成果，……夺占具有军事经济价值的地区，即夺取领土目标，是成问题的，长时间坚守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观点对立的整个过程中陆军总司令和陆军总参谋长，以及陆军高级指挥官们仍然是处于孤立的境地；约德尔保持沉默，凯特尔和“四年计划”所谓内行领导戈林，百分之百地支持希特勒。

6 月 3 日，大本营结束了在“山崖城堡”的生活。撤离前，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整个“山崖城堡”区域被列为“文物保护对象”：每个房间和每扇门上的名牌都应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作者周围的人们看到大本营的第一个驻地正在开始变成德国的纪念地，颇感不快。但人们心里也非常明白，在法国所取得巨大胜利，主要不是归功于希特勒和他的军事工作班子。西线作战精神上的倡导者、时任军长的曼施泰因将军写道：“在德国西线攻势的初期行动中”，他“基本被挤到一个旁观者的地位”。胜利的真正获得者陆军总参谋部也受到希特勒的压抑。

大本营新的营地，设在比利时南部一个名为布吕利一德佩什的小村庄。当国防处的大部军官乘飞机在这里着陆时，一大批托特组织①的工人正在忙于最后一批工程：希特勒个个掩蔽部、花园，以及一条用砂砾铺设的道路，在“内部区域”还有一个小喷泉。在希特勒到达后的两小时，这个老百姓已经撤离的地方，冷寂无声，似乎变得渺无人迹。仓库设在乡村校舍；临时木板房被当作国防处的办公室。国防处军官们的宿营地则设在离希特勒较远的村子里。陆军总司令部将其大本营设在离希特勒数里远的地方。

到这次战局结束前的短短的时间里，作者曾亲耳聆听了希特勒和戈林在乡村的一块场地上进行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谈话的起因和内容是英国空军轰炸德国城市居民区一事，这在当时，第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戈林大

话连篇，说什么他早就对敌人的这种冒险公开发出过警告，敌人的活动不会持久，它立即会遭到“十倍”炸弹的报复。希特勒立刻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英国人这样作很可能是由于英国领导人在敦刻尔克的压力下、一时失去冷静；也许是由于英国的轰炸机缺乏瞄准设备，或是由于英国人投弹手操作不熟练，才致使他们攻击平民百性。总之，他认为无论如何要等一段时间再采取相应措施。这一立场，德国曾在 30 年代进行的国际谈判中采取过，在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空中突击前，又一次得到证实。

如果说指挥参谋部在希特勒与戈林——他们总是谈论空军的事的这种谈话中间——只是充当旁听人，那么到了 6 月中旬，却突如其来地受领一项任务，即准备与法国签订停火协定。在法国提出媾和要求之后，希特勒便于 6 月 17 日动身前往慕尼黑与墨索里尼进行会谈，行前没有就准备工作交代任何方针。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不得不多方征求意见，除了 1918 年 11 月贡比涅的协约国的有关规定可作借鉴外，无法找到更好的依据。6 月 19 日希特勒从慕尼黑回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他象在慕尼黑对意大利人一样提出将保持最大克制作为基本原则。他认为，停战无论如何不会受到威胁，因此，法国不可能重新采取敌对行动。现在要着手进行的，是在将来的停战协定中提出更高的要求除了匆忙原因之外，由于上述这种对法国的估计不足，使德国没有在法属北非采取充分的安全措施——这是违反意大利人的愿望的，这一疏忽为尔后的严重后果埋下了祸根。①6 月 21 日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天。在这一天也维护了法国代表的尊严。此后，大本营人员各奔东西。希特勒由两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连服役的战友陪同，在当年法国的战场中进行了一次旅行。此外，在一个初夏的清晨，希特勒还秘密地在一个法国通的引导下，观赏了巴黎的建筑和名胜古迹。而此时，他再次放弃了他长期构思的，在法国首都举行一次大规模阅兵式的计划——以象征性地表示战争将要继续进行下去。其原因是戈林不想担负空中安全的责任——这是在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子里出现的不详之兆，国防处的几位军官也借这一机会，到敦刻尔克地区作了一次参观旅行。

经希特勒的允许，陆军总司令部将其驻地迁往枫丹白露。自 6 月 25 日，大本营的各个小组先后向北部黑森林一个战前就已准备就绪的掩体群——代号“圣诞树山”——集中。希特勒在回柏林之前，之所以选中这一地点作短暂停留，主要是为了由此出发去参观法国马奇诺防线这一伟大杰作。国防处的成员工作和居住在黑森林附近的客栈里。希特勒还特别为此发布了一项指示，对于店主所遭受的生意亏损，要照价赔偿。这些都照此办理了。

第三章西方与东方之间

打破僵局

由于与法国停战而带来的心醉神迷很快逝去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日益感到，现实与他们设想当中的富有计划性的总参谋部工作越来越不一致。人们很清楚、“围困”大不列颠岛的作战还要继续进行。早在6月中旬，有关命令就已签发。据此，陆军兵力将减少到120个师，被减编下来的全部部队和装备，都用来协助海军和空军，对欧洲唯一剩下来的敌人英国作战①但是，鉴于力量单薄的海军，以及攻击力量一直有限的空军——正如其在敦刻尔克所表现的那样，能否单靠这一计划就能取得胜利并带来和平？这是不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个唯一中断“工作班子”状态的契机？能不能借此机会打破一切都等待希特勒点头。而代之以更多的按自己的思想去进行战争的局面？作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将英勇绝伦、久经考验的军种陆军闲置一旁，是完全不正确的！

然而向何方去，打击谁，才能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欧洲大陆上，从直布罗陀海滨向北望去，已经没有敌人。出于多种考虑，北非被划为地中海的边缘地区，并作为意大利盟国的具有特殊权益之地。正象人们认为的那样，在德国彻底战胜法国和英国陆军之后，不大可能再向意大利交付较大的作战任务。多数人所期望的目标、最强有力的解决方案是：在英国登陆这个目标已日益临近了。早在几周之前，在敦刻尔克的日子里。国防处的参谋们就曾围坐在罗德特农庄的壁炉旁谈论过，是不是当时应即刻横渡海峡，对英国人实施追击为上策，法国的半壁河山是否应听任法国自己管理。这种思想只是由当时的热情所致，但很快便烟消云散了。现在，这种思想又重新浮现在脑海里；并同时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目前是否已经坐失良机。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一直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国防处长携带几份粗略草拟的方案，由他的黑森林客店，来到Ⅰ号宿营地的掩体群。然而，他在这里却遭到其上司从未有过的冷遇。约德尔从不喜欢看见他的参谋部提出超出所制定的作战方针的建议。此时，他似乎处于极其复杂的内心冲突之中。也许他想的与其参谋部完全一样，只是现在不想说。因为前不久，雷德尔海军大将向希特勒提出这一问题时，希特勒对此几乎不感兴趣，随便搪塞过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民的这种拒绝态度使瓦利蒙特费解。返回途中，他猜想，约德尔也许是出于政治动机。接着，瓦利蒙特去找大本营的外交部的代表。外交部代表极其保留告诉他，现正以外交手段试探伦敦的态度，将来也许会使以军事手段对付英国成为多余之举。但这一信息也没有从军事上对德国最高领导正处于僵局的问题给予满意的解释。在人们心里不由地出现了一种象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前不久在慕尼墨与希特勒会晤后，以尖刻的笔调所描写的那种印象：“希特勒现在好比一个把赌本输得精尤的赌徒，他相离开赌桌，不愿再冒一点风险了。”

国防处的军官们没有放弃努力。这一次，他们查明，陆军总参谋部再次与他们站在一边。此外，他们还深信他们会得到海军总司令部的支持。第一步，只是他们努力的间接结果，他们于6月28日促成国防军统帅部签署了一道命令。据此命令，“各通讯单位应利用一切途径”，制造假象，使敌人相信，德军将准备在爱尔兰实施登陆，以此加强对英国的“围困”。

在此期间，约德尔为阐明他的观点而继续奔走。在国防军统帅抵达“圣诞树山”的当天，约德尔便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他对形势的判断。

约德尔考虑到希特勒曾拒绝雷德尔建议这一事实，以及正在进行的对英国的外交试探，他把在英国的登陆仅看成是“最后的手段”。这位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认为，德国战胜英国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德国应该也能够选择一条既不冒险又能保存实力的上策。他进言希特勒，德国应首先以占优势的空军力量，消灭英国皇家空军。接着，空、海军协同作战，攻击英国列岛的仓库、重要运输线，同时对人口集中地区实行恐怖性轰炸。如果能以此折服英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英政府提出投降，然后便可在英国实施登陆，给其“致命一刀”。备战工作必须立即着手，约在 8 月底，9 月初就绪。另外，也不可忽视利用世界范围的反英力量对大英帝国进行作战的可能性，特别要争取那些对摧毁大英帝国感兴趣的国家，首先是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俄国和日本。

当时，国防处长及其同僚对这份备忘录以及他们与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观点上的根本区别，既未耳闻，也没有意识到。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将一切手段都集中使用到“海狮”行动上，想方设法加强德国战争计划上最强大的攻势。这样，按照约德尔的计划，对英作战的主要任务由空军担负，而登陆成了最后一个，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希特勒最终同意的这个计划,成了 7 月 2 日和 7 月 16 日国防军统帅部命令的基础，命令中首先规定，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应即刻着手；14 天后，将提出详细方针。1940 年 8 月 1 日，国防军统帅部又发布了第三道“指示”即第 17 号指令，这份题为“空、海军对英作战的指挥”的指示特别强调了此次行动的目的，即“德国空军部队……要尽速征服（英国）……，为最终战胜英国创造先决条件”。在所有这些由国防处军官们遵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作战方针起草的命令，都搀杂有国防处军官们的观点。然而，根据这些命令，夺取制空权的战斗——即英国人后来所称的“闪电”行动——似乎，仅是登陆作战的前奏，但也是整个作战的高潮。但其前提是，空军要能完成应尽的使命。

从这个基础和这些观点出发，国防处军官们倾注了他们的全部愿望和才能，为登陆计划的顺利实施，排除接踵而来的各种障碍。此前此后，国防处军官们都没有象这次作战准备工作中，有这样能充分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自由天地。但是，从他们的上司直至希特勒，也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表示出如此冷淡和懈怠。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希特勒对戈林和空军一贯宽容大度，甚至对英的空中攻势直到 8 月 13 日即与法国停战后两个月才开始的重大延误，没有给以更多的责怪。但是，当 9 月中旬国防处长到格里内角的空军第 2 航空队指挥所访问时所耳闻目睹的，却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在这里人们刚刚开始讨论支援渡海和上陆问题，还根本没有形成任何固定看法。从飞机和码头向近处望去，海峡沿岸的所有港口都已挤满了运输船和驳船。

约德尔将军在他的处长向他报告前线之行时，仍然没有告诉他，根据他的建议和希特勒的意志，空战依然是对英作战的重要手段，登陆只是“附属物”。国防处的军官们——据他们当时判断——还有陆军和海军总司令部一直认为，赢得对大不列颠列岛的制空权，只是为成功地实施登陆创造条件，只有登陆才是决定性的战斗行动。这不仅在目的上，而且在实施、时间和进攻重点上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从战后公布的一些资料可以表明，近 30 年来德国空军一些上层机构所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空军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再加上海军，也无法达到使“大不列颠投降”的目的，这一目的只

有通过占领不列颠列岛才能达到。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当时一名身居国防军统帅部高级职务的军官，也误入迷途。希特勒至少应向一问戈林，空军到底有多大能量。

另一个思想——这在约德尔将军 6 月末的日记中已有记载——即从外围来解决大英帝国问题，也没有任何结果。但大约一个月以后，国防处和陆军总参谋部在未受约德尔的影响下，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同样的努力——尽管程度有限。此事的起因可能是德国驻罗马大使馆武官林特伦将军向国防处和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次口头汇报，他认为，几周来意大利人对埃及的作战，即使到将来，成功的希望也不大。同时，国防处长由于对希特勒在英国登陆的坚定态度也日益产生怀疑，遂于 1940 年 7 月 30 日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呈递了一份“对总态势的判断”，建议“向意大利人提供装甲兵力，以加强其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势”。国防处的建议以及陆军总司令部同样内容的口头动议经约德尔综合整理后，呈送希特勒，赢得了希特勒的赞许，同意给陆、海军总司令部写信，责成他们进一步研究向盟友提供这种援助的可能性。这份于 8 月 11 日由希特勒签署的文件，再次清楚地反映了德国的作战指挥在那段时间里的摇摆不定。文件中称，在下列前提下：（1）“海狮”行动不能在今年实施；（2）意大利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势未能奏效，或是推迟到秋季进行；那么就可能要考虑元首的想法，即向意大利人提供装甲部队，支援意军的进攻，或待尔后再夺回苏伊士运河。

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既没有对前因后果的综合认识，也没有联系陆军总司令部的新的设想，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就于第二天即 8 月 13 日，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自己对形势的新判断。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地写道：“登陆行动无论如何不能失败。失败将会带来政治后果，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军事范围”。在另一段，他以同样的观点补充说：他认为，倘若全部先决条件——包括海军方面的——均未达到，那么，“登陆行动是一次在绝望形势下，必须实施的绝望行动，但现在我们并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约德尔继续写道，对英国，“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迫其屈膝”。然后，与意大利一起进行一场真正的联盟战争，共同对付大英帝国，以取代劳而无获的“平行战争”。为此，意大利应尽可能派遣大量空军和潜艇部队，将不列颠列岛紧紧围困；除了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外，还要准备在同西班牙、意大利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占领直布罗陀。

约德尔的同僚们在消化并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的同时，希特勒对这些建议——其中涉及到地中海问题——仍保持着谨慎的克制态度。经过长时间考虑后，他仍然将在英国登陆放在次要位置。1940 年 9 月初，希特勒却命令对占领东大西洋群岛，即从马德拉群岛、卡纳里亚群岛、直至亚速尔群岛和弗得德角群岛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情况允许时，也考虑……占领……葡萄牙”。他的这一战略远远背离了“海狮”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这些——部分是海军制定的——计划居然没有采取断然否定态度，反而让他的参谋部用这一新的方针对他们的方案作出回答。这样，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白白地耗费在这个无益的和毫无结果的问题上。

然而，在此期间，又出现了一件意外的情况，它比其他任何计划都更严重地危及到在英国的登陆，这就是希特勒突然要掉转方向对付苏联！这一可怕的决策颠倒了当时的各种关系，留下难以测度的后果，甚至时至今日。

希特勒在柏林作了短暂逗留，7 月 19 日在国会发表演说，竭诚希望与英

国和解，重归干好。此后，德国大本营分若干小组，再次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域集中。国防处乘坐他们的特别列车“阿特拉斯”号由巴特赖兴哈尔车站出发。在这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这次国会上被希特勒由少将越级提升为炮兵上将——在 7 月 29 日突然来到国防处，与处里的领导们磋商军情，这种难得的作法，使大家惊异作常。国防处的军官们，尽管贡献甚少，没有其他奢望，但这一极不寻常的访问，也算是西方战局胜利后，对他们的一种不一般的嘉奖①。约德尔将四面门窗关死，坐在餐车的桌子旁，对四位参谋军官②开门见山地说，希特勒已经决定，尽可能在早些时候即 1941 年 5 月，对苏俄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从世界上“彻底”铲除。

约德尔的活尤如晴天劈雷。更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对英国的作战无论如何不会先于对俄作战结束，而恰恰相反，即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迫使英国和谈的情况下，取得对俄国这个最后的“大陆勇士”将是最好的手段。然而，约德尔的话音刚落，四名军官情绪激昂地异口同声表示反对：迄今得以幸免的两线作战，难道要由我们自己发动吗？尽管陆军主力能够调向东方。而空军又以什么来对付日益给德国城市带来沉重负担的空战呢？为什么与莫斯科缔结的“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几乎还不到 1 年，迄今俄国一直按照条约，准时、充分地向德国提供武器装备时却突然调转矛头呢？约德尔对所有问题，都作了回答，但没有一个令人信服。记忆中，有一句话印象颇深：他说，希特勒认为——也许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分歧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对俄战局最好是己方军事实力处于鼎盛时期进行，这要比若干年后重新号召德国人民赴敌作战好得多。而且，德国空军在经受了东线作战的锻炼之后，可最迟于 1941 年秋季，以强盛的战斗力重返英国战场。在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他要求我们起草一份命令。据此，陆、空军在波兰西部占领区的输送展开和宿营准备工作应即刻着手。这项命令是有关“进攻苏俄的最早文件，代号“东方建设”。

在所有计划突然转向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时，即约德尔刚刚披露此事后，人们仅仅知道。根据希特勒的意愿，对俄战争本应早在 1940 年晚夏就开始了。只是凯特尔与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起向希特勒呈递了一份紧急进谏书，说明时间、空间、气候等因素均不利于对俄作战之后，似乎才说服希特勒罢手。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的这一异议是应当赞扬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提出异议并不是为了取消这场战争，只不过是推迟而已。

为了使读者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作者想再列举几件战后才了解到的事情：

上面提及的希特勒的指示，是 1940 年春季对他的亲信提出的；①

英国政府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 1940 年 7 月初，通过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转交给斯大林一封信。信中建议俄国将矛头转向德国。几天后，苏联便将该信内容通告德国驻莫斯科大使：

陆军总参谋长的日记：1940 年 7 月 3 日与作战处长的谈话：“当前，摆在首位的是英国问题题……和……东方问题。对后者必须重点考虑，即给俄国以军事打击，迫使它承认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1940 年 7 月 13 日，在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报告之后：“元首最关心的问题是，英国为什么不愿求和……对这个问题，他似乎与我们找到的答案不谋而合，即英国对俄国

还抱有希望；”

1940 年 7 月 22 日，陆军总司令对他前一天与希特勒进行的一次谈话的印象是：“俄国问题应着手解决。要做好思想准备；”

1940 年 7 月 30 日，与陆军总司令一起对总态势作的部分判断：“如果不能迫使英国就范，并出现英俄结盟的危险，那么是不是要首先对付俄国，从而实施两线作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保持与俄国的友谊更为适宜”。

1940 年 7 月 31 日，希特勒终于在山间别墅指示：“……俄国将主要赌注压在英国身上……但俄国一旦被摧毁，英国的最后希望也将破灭。德国便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的主人。

决心：在一系列冲突中，必须将俄国除掉。

时间：1941 年春。

仅从这简短的引语中，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出，希特勒的反俄决心早就是无条件的，用他自己常用的表达方式叫作“无法更改”的。此外，还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决心无疑是建筑在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深蒂固和从未泯灭的深仇大恨之上。这一思想大约是在 1940 年 7 月中旬形成的。也就是在同一时间里，希特勒又由于受军队方面的催迫，下达了在英国登陆的命令。

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决定的份量差别，一目了然。1940 年夏季，参预者中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已大有人在。然而，这种打破德国战略僵局的方式，并没有结束战争，相反却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开始。

新旧矛盾

在国防处内外，凡知道希特勒这一新的企图的人，再次提出这个急迫的问题：如何对付希特勒的新企图；怎么才能避免这场在时间和空间上也许是没有止境的新的战争。虽然未作深入研究，但他们确信，“与俄国保持友好关系是上策”。进攻俄国将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可怕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希望能够在国防军首脑人物中找到一位军人。人们信赖他，理解他，他能以无法辩驳的军事论据，加上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与独裁者及其基于政治和世界观而作出的决定相对抗。然而.这只足徒劳空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希特勒已及时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已亲自站在了国防军统帅的职位上，同时也将国防军参谋部——它的参谋长却为此欢心鼓舞——作为他的“工作班子”为其服务。

国防处所能物色到的对象超不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然而也就是他，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已无法指望发挥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影响。至于凯特尔就更不足挂齿，他越来越依赖约德尔，毫无主见。尽管如此，国防处第一海军总参谋部军官仍于 8 月初，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向约德尔陈述从长远看矛头转向俄国后，英国及其海军对德国处境势必带来的后果。这一进谏看来相当必要，因为海军总司令丝毫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然而，这次拜访却证实了这样一件事：希特勒之所以认为要打败这个岛国，必须要走首先除掉俄国这样一条“迂回道路”，是因为希特勒对英国海军力量估计过高。而对自己的装备估计不足。

这种新的设想，同过去的一样，缺少说服力，然而它却促使网防处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为“海狮”行动铺平道路。依靠这一途径似乎还有避免冒俄国风险的可能性。据战后传言，希特勒长时间为渡海登陆作准备，唯一目的是为了威胁和恫吓英国。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他在此问题上的反复强调，更多地是为了说明他还是赞同登陆计划的，只是德国还没有赢得能确保排除来自英海、空军巨大威胁的空中优势。他的这一观点作者似乎在他的言谈中亲耳聆听过。他说，如果德国士兵不得不为德国而捐躯，他是可以忍受的：但他绝不会为成千上万人无谓地葬身于海底而承担责任。

毫无疑问，其结果是，他越是关心俄国问题，气候越是不利于空战的实施，他就越会将登陆计划置于次等地位。事实上早在 1940 年晚夏，希特勒已经将登陆准备仅仅当作恫吓和威胁英国的手段。到 1940 年 10 月 12 日，情况终于迫使他向国防军的首脑们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谓暂时废止登陆计划。这里顺便提一句，1941 年春季，为了迷惑敌人，希特勒又重操“海狮”计划。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各情报单位广为散播一种说法，即向俄国进军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在英国登陆的注意力。

空军和海军对放弃在英国登陆一事轻易妥协了。因为，海军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此事；而空军则认为无力取得海峡上空的绝对制空权。只是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处对此事坚定不移。他们尽管处于被分隔状态，但仍想方设法企图迫使空军通过不断改善装备和战术，以足够的优势，实施登陆。

1940 年 11 月 12 日第 18 号，便是国防处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在其有限的范围内所产生影响的证据。这份指令综合了国防军统帅部对尔后德国战争计划的基本要点。国防处长在这份指令的初稿里，——将“海狮”行动放在头等位置上——尽管到 1941 年春季才实施；然而，第二天，约德尔向他指出，

这种强调问题的方式也许符合陆军总司令部的观点。但却不合希特勒的胃口。瓦利蒙特反驳说，他之所以坚持在英国登陆的观点，是因为它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大问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许同意了瓦利蒙特的观点，但是。他还是指出——显然他对希特勒的意图理解颇深——必须将“海狮”这段文字从指令的第一段移至最后一段。同时，他还大笔一挥，划掉了瓦利蒙特对这一条文所加的加重号。①。

这样，遍体鳞伤的“海狮”又挨了“致命一刀”，而这一刀本来是应落在不列颠列岛身上的。随着未来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性的逐渐消失，德国大本营再次化整为零，以小组为单位活动。8 月 29 日，希特勒在英国皇家空军第一次空袭柏林的轰炸声中回到德国首都，如从前一样，与他的亲信住在总理府。而国防处野战队，鉴于其有较大的机动性，因此仍暂留在停于格吕讷瓦尔德车站的特别列车上。由于时令的变迁，到了秋季，他们希望能为参谋部找到一所既能办公又能住宿的驻地。直到 11 月中旬即战争爆发前夕，他们才住进波茨坦附近的克拉姆波尼茨骑兵学校，离总理府约有一小时的汽车路程。第二年的头几个月，国防处仍住在这里；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则与希特勒一起，住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此期间，陆军总司令部还在枫丹白露等待统帅部对“海狮”行动作出决断。此后，他们便又迁回到措森。海军回到了它以前柏林蒂尔皮茨驻地；空军回到了它在波茨坦附近的掩体群。

这样，到了 1940 年秋季，出现了一种从总体上说与法国战局前夕相仿的状况。信使、军官或官员来往于大本营各小组与三军总司令部之间保持着相互联系。同过去一样，由国防处收集的情报，仍是约德尔每天在总理府或山间别墅中作形势报告的基本材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到这里作口头汇报，接受希特勒的命令和安排。在这种场合下，希特勒总是对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发表滔滔空论。

表面看来，国防军领率机构里一派协和气氛。但进一步观察便可发现三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始缺点。依然如故。首先，象以前一样，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从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起磋商军情。此外。不是因为特殊原由，三军总司令们也很少聚会，既使碰头。在希特勒的淫威下，谁也不会说一句真话。更有甚者，在海军和空军以不充裕的手段艰难地对英国实施“围困”的时候。陆军却通过研究和图上作业逐渐形成了俄国战局的作战基础；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此却丝毫没有参与。第三点——尽管不很重要——国防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其参谋长直到 1941 年，一直被分隔在柏林——克拉姆波尼茨和贝希特斯加登两地，只有通过电话以及国防处长亲自乘飞机取得联系。

因此，被大为称颂的“国防军领率机构的团结”，是名不副实的，完全是纸上文章。如果说，早在准备在英国登陆期间，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工作就缺乏统一步伐和共同目标，那么在尔后的数月时间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问题上的意见和观点就更是大相径庭。

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象约德尔将军一样，直到 1940 年 12 月，几乎没有参与过东方战局的准备工作。这在以往重大战局是极少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处却在全神贯注于适合于将国防军全部兵力调向西线的计划，并将其 1940 年 7、8 月的最初成果部分纳入上文提及的 11 月 12 日的国防军统帅部第 18 号指令中。进攻直布罗陀的计划是指令的中心内容。希特勒放弃在英国

登陆以及 10 月 23 日与佛朗哥将军进行一次不太成功的会晤之后，大力推进这一计划的实施。原来设想，由空军将海港摧毁，尔后赶走英国舰队，就算达到预期目的。在国防处的建议下，最后将占领全部陆地作为目标。与此同时，国防处还在致力于另一项计划：德国派一个空军军和一个装甲军去支援意大利军队对苏伊士运河的迟缓推进。他们认为，这种对英国人的主要基地的双管齐下的进攻，似乎有可能最终“摧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使战争进程有一个转折。但在支援意大利的问题上，希特勒却改变初衷，拒绝进一步向意大利提供支援。然而，在坚决拒绝支援意大利之后，希特勒却又违心地要袭击希腊。可以肯定，他的这一态度是由于德国拒绝提供援助，促使墨索里尼及其统帅部坚持其原来观点而造成的。但是，当时，希特勒并不是不愿意放弃远征北非。因为，他不愿看到为了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而将兵力由对付俄国转向其他地方。由于这个缘故，进攻直布罗陀的行动最迟不应超过 2 月初。

在这个阶段，作为国防处大然“盟友”的海军总司令部，也将当时大家已经知晓的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看成错误的和灾难深重的。由于国防处的海军军官们对这一共同观点的不懈支持，于 8 月底，提出了第三个建议，即在世界海洋上“德意联合实施海战”的计划，以便将注意力由东方移开。这一计划，一开始得到了希特勒的赞许，但因必须待到彻底解决地中海地区问题以后才能下定决心而作罢。

1940 年 11 月 1 日，国防处长在一次商讨关于“冬季作战企图”的会上想再次使约德尔将军确信，这些计划“不可能……全部令人满意……。假如德国不向利比亚派兵，那么意大利对埃及的进攻就难以取得重大成果，……也不会解决地中海的问题。因此，意大利舰队应继续坚守地中海，不应考虑……与德国重型舰只在大西洋联合作战的问题”。然而，约德尔——不管他自己确信与否——只是把希望寄托于在此期间采取的德国空军对西西里岛的行动，并希望能为占领直布罗陀，在地中海地区赢得充足的空中优势。因此，这一设想也写入“第 18 号指令”里。

指令的开头还有一项计划，这是国防处长倾其全部心血的一件事，即与法国进行军事合作。如果说在战争进程中，这种“通敌行为”至今还仍被两国官方视为声名狼藉的冒险行为，那么对当时参与这一合作的军官来说，只能意味着是次利用他们力所能及的途径和手段促成欧洲邻邦真诚谅解的尝试。这种联合反英的尝试，或者用“指令”的话说，由初期的共同安全任务，发展成“法国全面参加反英战争”，是从当前现实出发的。这一目的的最充分的理由是，没有那个计划更能阻止可怕的战争，向东方扩展，以及有效地阻止美国参战。

在这里，不可能对由于希特勒一贯运用政治欺骗伎俩，将法德军事关系搞成僵局的发展过程，作详细描述。但不妨只回忆一下初期，它与 1940 年 7 月英国攻击停泊在凯比尔港和达喀尔的法国军舰，是联系在一起的。此后，德法高级官员在威斯巴登，尔后在维希不断进行接触，在 1940 年 9 月 23 日德国从海上对达喀尔实施攻击之后，约德尔向他的亲信说：“他与国防处长协调一致，充分利用每一时机说服元首。利用德法共同利益，进行高于一切的对英国的战斗。”在他对当前“元首观点的转变”进行一番评论之后，完全接瓦利蒙特的思想补充说：“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关于继续进行战争和战争目的的基本观点的彻底转变”。最后，约德尔出人意料地宣布，

一个月以后，即 1940 年 10 月 24 日，希特勒将与贝当元帅会晤。

在对“与法国进行合作……的形式”进行详细研究之后。国防处长应约德尔的要求，对合作形式提出的原则是：“法国人的参加……必须同时为法国的生命攸关的利益服务”。双方进行耐心合作共同对大不列颠列岛作战的问题，在此之前就已被排除在外。瓦利蒙特认为，保障和维护法国殖民地，是符合德法双方利益的。因此，停战协定的实施。以及与意大利的关系，都应置于这一目的之下。

在以后的数周时间里，即希特勒与贝当元帅会晤前后，与这一军事愿望相联系的“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各方都变得突出起来。意大利人认为，德法亲近会危及他的战争目的，因此不顾眼前其他方面的许诺，断然拒绝德国人的要求，并得到德国外交部长的支持。在这种状况下，贝当元帅说了一句人人皆知的话：“6 个月讨论问题，6 个月后便把它遗忘。”最后希特勒——在凯特尔的热情支持下——提出，“将来对法国的让步，应附以超出停战协定的要求”。这样，在“第 18 号指令”的有关条文还没有出台之前，其份量就已大大降低了。

在国防处长与大使阿贝茨一起，在巴黎与法国人谈判期间，有机会到约德尔那里商谈“重大调整”问题，同时向他强调指出“有一半措施似乎不妥”。其间，凯特尔再次强调了希特勒的要求，“与法国人的谈判仅按步就班地进行……这不符合……德国作战的利益。因为，这会使用以继续对英作战的非洲基地长时间不得开放；而且在这情况下，法国人还可能要求德国，在其所属的非洲殖民地国家里。恢复秩序和安定，更谈不上，在预见的未来，与德国实行有效的军事合作，共同对英作战。”尽管有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希特勒最后仍指示他的军事全权代表，可采取全盘“接受”的方针。

11 月 29 日，德、法总司令部代表，在巴黎德国大使馆举行了会晤。这是德法战争结束半年后，两国代表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次无拘束的会谈。瓦利蒙特少将出乎意料地看到，坐在他对面的除了法国陆、海军首脑恩特西热将军和达尔朗海军上将外，还有副总理皮埃尔·赖伐尔。此后不久，这位副总理和达尔朗便成了法国的栋梁。会谈中，双方没有采用恩特西热提出的将来旨在针对非洲内部地区而安排的计划，而是在全面谅解的基础上，接受了瓦利蒙特少将提出的方案，即——违背全部既定方针，加强法属西北非和西部非洲的安全，德国国防军将此作为德、法军事合作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目标。然而，上述所指地区不仅包括在战略上保卫薄弱的欧洲南翼而且还包括摆脱了英国封锁的重要的经济区。12 月 10 日，在同一地点，相同的代表，举行了第二次会晤。会谈中，法国方面提出的部分问题，第一次得到满意的回答。同时，使人们加深了一种印象，即只有法国人自己能够有效地保卫他们在海外的领地。今后会谈的内容将是，通过远远超出停战协定的，在军事上作出重大让步。以及进行必要的政治和军事的“一体化”，使法国能够胜任这些任务。

然而，德国再次——决不是最后一次——自食其言。作为德国大本营的一名军官，除了按时赴会以外，几乎什么都无权决定。而这就足以使刚刚建立的联系中断。在第一次同法国代表会晤之后，希特勒一反惯例——尽管是明显克制地——亲自审阅了国防处长的报告。在瓦利蒙特第二次在巴黎参加会谈时，希特勒接到了一份关于法国驻北非总司令魏刚将军不可靠的情报，而希特勒早就对他怀有疑心。于是，命令国防军统帅部，近日内火速发布指

令，一旦法属北非脱离维希政府，便占领全部法国领土，并接收法国的舰队。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处长发往贝希特斯加登关于第二次与法国人会晤的书面报告，看来不会受到重视。此前，约德尔曾写道：“要趁热打铁，我们的盟友的进一步反悔”——指在利比亚的意大利人——“很容易导致法国态度强硬”；而现在，希特勒已将大局造就。12 月 13 日，当法国贝当无帅突然解除了他的副手德法合作法方的奠基人——赖伐尔的职务，甚至暂时关押起来之后，希特勒立即丢下全部外交策略，重又恢复了他对法国的战胜者姿态。

半年后，即到 1941 年 5 月下旬，在达尔朗海军上将——在贝当政府里接任赖伐尔的职务——以及阿贝茨大使的共同努力下，希特勒才同意恢复德、法双边军事会谈。经过 10 多天会谈——双方代表仍为恩特西热和瓦利蒙特——产生的纪要形式的条约，并未能发挥德国的倡议者过去所寻求的政治和战略作用。因为进攻俄国的战局即在眼前。但是，一些极好的机会，希特勒也没有充分利用。譬如，当时一方面按照条约法国应支援德国夺取尼罗河谷和中东的战争；另一方面——比前者还重要——在法属北作和西非从背后构成对英国的威胁。希特勒的疑心妨碍了法国在军事上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在政治上，法国要求给以回报，但希特勒以欧洲独裁霸主自居，不愿受到任何约束。

国防处长于 5 月底从巴黎返回德国。凯特尔和约德尔十分冷淡和毫无兴趣听了他的报告，接着便让瓦利蒙特单独一个人前往山间别墅向希特勒报告——这真是一种前所未闻的程序。随后来到山间别墅的是一个令人生厌、举止粗俗的人，此人便是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瓦利蒙特的汇报，赢得了希特勒的注意，当瓦利蒙特讲到的按照法国的态度，法属北非和西非可能给德国形势带来的利益及其作法时，里宾特洛甫插了几句话，使人难以遗忘。他说：“这一切又会对您怎么样呢，我的元首”如果在非洲真的发生了事变，只需隆美尔将军的坦克，就能将全部骚乱平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肯定不需要法国人……”里宾特洛甫一边说着，一边抽出插在上衣口袋的手，指着在希特勒面前摊开的地中海地图，首先从埃及、利比亚边界开始，经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一直指向下面的达喀尔”希特勒终于打破了里宾特洛哺对这一方案的自问自答，给这位将军造成的尴尬局面，他要求瓦利蒙特“向外交部长先生再说一遍”，这些地区在非洲相距多远；坦克在这些地区、机动靠什么取得地面联系；还会遇到哪些障碍。

几个月后，法国在叙利亚受挫，但没有德国支持倘能坚持；与此同时，德国在俄国旗开得胜，取得重大战果。所有这些事，都有使德法协议有全部被遗忘的危险。直到 1941 年 8、9 月，国防处才利用东线战事暂停的机会，向威斯巴登的停战委员会发出一项新指示，命令他们恢复就“协定书”的实施的谈判。鉴于德国继续考虑到与意大利的关系，又因为法国拒绝就承担力所能及的任务作出妥协，会谈未取得重要成果。最后一次会谈是由德国驻巴黎大使促成，于 1941 年 12 月底在柏林举行的，法方参加会谈的是新任驻北非司令朱安元帅，德方为戈林。此时，正是德国在俄国陷入严重危机，以及美国参战的时刻。当法国贵宾早已等候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戈林才赶到，并匆忙向国防处长打听这次谈判的军事题目；而且在会谈中，戈林似乎总是处在一种瞌睡状况，造成会谈迅速不了了之。无疑，戈林的态度是希特勒对此毫无兴趣的一种反映。希特勒经常说，成功时不需要谈判，处于困境时不想谈判①。

地中海、巴尔干和中东

如果追溯到 1940 年底。就会发现，早在那个时候，根据第 18 号指令所制定的旨在从外围解决与英国冲突的一切计划，都已宣告失败。这个给 1941 年头几个月留下阴影的事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战胜法国后，德国的作战已与现实不相符合，似乎被小事所纠缠。毫无目的，处于瘫痪状态。它将一大部分精力花费在挽救其盟国意大利在海洋、希腊和东北非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上。佛朗哥将军之所以拒绝同意向直布罗陀的进攻，并不是因为意大利的这些失败，而是德国未能在英国登陆的结果。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在 1940 年 8 月对形势判断中就提出，“ 通过其他途径迫使英国就范 ”。如果希特勒对其他一切反英计划都给予全力支持，那么约德尔对形势判断本身就可能是不正确的。

从 1940 年底发生的一些事情上，“ 轴心国 ”的作战就已显露出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征兆。1940 年 11 月中旬，经国防处组织安排，德国统帅部的首领凯特尔和约德尔，与意大利统帅部参谋长巴多里奥元帅，举行了此次战争中的第一次会晤。致词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高仰着头颅，一脸傲气。开头他便说：“ 我们已赢得战争，它不可能再失去，我们必须结束战争。为此，必须使英国认炽到，它已失去这场战争。 ”相比之下，雷德尔海军大将倒现实一些。1940 年底当谈到对英战争的现状时，他对希特勒说：“ 想把英国舰队赶出地中海，不是短时间能办到的。——虽然海军总部一直将此看成是寻求战争出路的关键，并多次提出。但目前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非洲又出现了一种危害德国和欧洲利益的形势。 ”

1940 年 12 月中旬，德国空军第 10 军移防意大利南部：此后，迫于利比亚和希腊的形势，于新年过后，派隆美尔远征军远征北非；同时派精兵进行巴尔干战局。这全部对意大利的支援计划意味着——在两个独裁者看来，是一种勉强达成的妥协。经数月犹豫之后，在一方面希特勒通过与墨索里尼协商，另一方面与陆、空军协商后，这些决定终于付诸实施了。在此期间，指挥参谋部充分扮演了一个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它的全部工作主要是协调友好和结盟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利益，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除此之外，还要为希特勒完全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所采取的决断，以及为监督准备工作的实施而起草命令。

德国在北非和巴尔干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尽管是针对英国的，但由于俄国战局的迫近，这些措施基本是防御性的。德国空军第 10 军所取得了伟大胜利；特别是隆美尔率领的那支力量单薄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提前到达利比亚、埃及边界；与此同时，由于总参谋部和部队表现非凡，在很短的时间里，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缘。这样，到 1941 年 4 月中旬，出现了一种事先未曾预见的战略态势，似乎有使整个战争进程发生转折的希望。在英国，人们一贯将地中海看成桥梁，而不是鸿沟，因此，人们当时只希望通过对克里特岛的强大的空中突击，对亚里山大的英国舰队，以及中地中海和东地中海的基地构成严重的危胁，此外，人们还希望美国海军能占领克里特岛，将英国舰队驱逐出地中海，从而结束战争。这样，德国领率机构最关心的是，不能在巴尔干耽搁太久、以防俄国战局的开始时间拖得太久当时，德国在地中海北岸和南岸，已经开始了统一的战略行动。但现在的一些考虑与 1940 年春季想尽快到达英吉利海峡时的想法并不是没有相似之处，它并不完

全是仅带有防御性质，而是为胜利结束东方战局后的形势而安排的。此外，毋庸置疑的是，国防军的活动范围——仅就其有限的向国外和海外输送能力而言，使它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改变作战方向。1941 年 5 月和 6、7 月间，德国对伊拉克暴动和对叙利亚的法国人的支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力证据。尽管如此，如果国防军统帅部是一个反应灵活、对各种可能性都预有准备的指挥机构，如果它的首脑不背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实施十字军东征的包袱，也不是不可能借此机会重新斟酌一下下一步的战争计划。

落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头上的工作，依然毫无意义。值得一提的是，4 月 22 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奉希特勒之命前往伊皮鲁斯，与希腊第二次签订停战协定。因为第一次是德国常胜的第 12 军司令、利斯特元帅经希特勒批准同希腊签订的，但它未满足墨索里尼的要求——这在全部战争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此外，国防处在巴尔干战局刚刚开始的日子里，还就占领克里特岛或马耳他是否对地中海的尔后作战具有重要作用，专门进行了一次分析判断。国防处的陆、海、空军官一致同意国防处长关于占领马耳他的意见，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通往北非的海上通道永久畅通。但是，在约德尔将军还没有跟上这一思路之前，他们的判断已经过时了。因为希特勒已经决定，为避免罗马尼亚油田遭敌突袭的危险，绝不能将克里特岛让给英国人；同时，同意空军从克里特岛上的一个德国空军基地起飞，成进攻之势，在地中海东部海域对克里特岛施加广泛的影响。在这事情上值得一提的是，此后不久，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上校来到国防处，要求国防处将最高指挥层的这一不同意见以及尔后出现的分歧看法都载入战争日志里。此外，在巴尔干战局期间，两列特别列车之间的联系相当松散。战地大本营曾在这里度过三周。两列专车在施泰尔马克一段僻静的铁路线上，附近便有两个铁路隧道入口，一有空袭危险，两列专车便立刻进入隧洞。

德国大本营一回到柏林，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便突然受领了一项出人意外的新任务：“ 利用一切手段和可能实现希特勒的部署，即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尽速给伊拉克——对英国人——的战斗以支持 ”。不久就有入提出，要想迅速提供支援，只有从签订停战协定的法国驻叙利亚军队里提取轻型武器。而空军的介入——更不用说在克里特岛登陆——不仅需要法国驻叙利亚行政机构的同意，而且还需要土耳其的友好的忍耐。然而在此期间，伊拉克的暴动到 5 月底，在英国的强大压力下已岌岌可危。

此后不久，指挥参谋部面临的是一种完全类似的局面：6 月 8 日，英军和从巴勒斯坦开来的法国戴高乐部队，对叙利亚的法国人发动了进攻。根据德、法在巴黎达成的协议，德国应当对在叙利亚处于防御地位的法国人给予支援。过去的讨价还价和犹豫不诀都抛在脑后，现在，希特勒允许法国借道德国南部和巴尔干占领区，用铁路将若干个法国营从本上运往萨洛尼卡；同时，允许法国海、空快速部队通过地中海，开向希腊基地。法国部队通过英国海军舰队在塞浦路斯水域设置的障碍，到达叙利亚；德国第 10 航空军也在具有效航程内，在贝鲁特前成功地牵制了英国的巡洋舰队。在叙利亚的战争，终于 1941 年 7 月 12 日功亏一篑，前后仅一月有余。

在这场失败即将酿成之时——它清楚地表明，在遥远的异国它乡进行军事行动，需要周密的计划——1941 年 6 月，在德国大本营产生了在军事文献上倍受重视的“ 第 32 号指令草案 ”。这个文件初稿首先分析了欧洲大陆的形势，认为“ 在摧毁俄国国防力量之后 ”，“ 轴心国 ”将称霸欧洲。其作战争

目标是“埃及由利比亚、土耳其由保加利亚、……以及必要时伊朗由外高加索，集中力量对英国在地中海和近东的地位发动进攻。”在西方，夺取直布罗陀，也被列入该计划之内。

如果追根溯源，德国的这一“长远”战略计划，最早还是由希特勒提出的。1941 年 2 月，国防处受命以希特勒的名义，对在阿富汗进军印度一事进行研究。1941 年 4 月初，希特勒还认为，东方战局将在数个月内结束，1941 年秋有望在“北非展开大规模攻势”。此外，希特勒在与齐亚诺伯爵谈话时，还附带提到巴尔干战局可以通过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向前推进以寻求出路的可能性。他的这一占领直布罗陀、紧接着占领法属摩洛哥的设想，在此期间几经推延。因此，根据战争头两年的经验，陆军总参谋部对“澄清俄国战局后的未来作战行动”的倡议作到预有准备，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一设想所涉及的范围，可以从哈尔德 1941 年 4 月 7 日的日记中找到详细依据。其中有‘未来编制组织的要求”，以及按兵力和兵种对“作战集群”进行精确的“兵力计算”的一览表，并按区划分为西班牙——摩洛哥，北非——埃及，安纳托利亚——阿富汗。1941 年 6 月初，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建议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将上述内容作为指令发出。此后不久，海军总司令部又提交了一份将全部控制东地中海为作战目的的形势判断，促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几天后，即 1941 年 6 月 19 日，经希特勒批准，三军各总司令部下发了这一计划的初稿。

这一全球战略的前景，主要取决于俄国战局的进程，这里无需详加分析。但需要指出的是，它首先再次证明，在这些思想的背后，隐藏的并不仅仅是大本营或三军总司令部的狂妄自大——如战后某些评论家所评论的那样。当时的一些敌对国家，如丘吉尔和英国军事领导也曾经严肃地考虑过以与德国相似的计划和可能性进军俄国。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国防军的这一长远计划，是因为一些批评家——他们对这些计划要么不予以承认。要么无所了解——不可能对所谓在各个时期表现出的“国防军统帅部狭隘的大陆观念”给予足够的批判，并将责任归咎到在领导岗位上的陆军军官身上。

在尔后的事态发展中，还有几个可说明其胃口过大，以及片面的大陆设想的事例。国防处长在实施陆军总司令部的倡议过程中，为他的同僚们提出了一条方针，即：“（1）通过夺取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岛和苏伊士运河，解决地中海问题；（2）扩建欧洲——西非阵地，反对英、美联合；（3）在英国登陆，给其致命一刀。”这仍是一种将德国军事力量的重点，致力于西方的思想。然而，在第 32 号指令的第二稿中，却企图在俄国取得巨大初步战果后，将中东作为未来作战的主要目标——它主要代表希特勒的观点，同时也是陆、海军总司令部的思想。其中，没有提到马耳他、北非和西非海岸的防御应由法国承担，由德国提供空中保护；经希特勒的批准，准备给法国以必要的支援。

所有的计划最终都要回到英国。东方战局一俟告成，便以全部力量再次对不列颠群岛实施“包围”，与此同时，摧毁大英帝国在地中海的生命线，使不列颠列岛“呈现”“崩溃”迹象，最后，“以登陆结束”全部作战。

第四章东方战局的序幕及其前半局

1、准备时期

陆军总司令部被置于优先地位

1940 年 7 月底至 12 月初，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战局中，德国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及其最高到今，只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这在德国大本营的历史上也许是最罕见的现象之一。对俄国的战争，既没有按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的工作方式，制定一个基本的、经全面考证的计划，而且在关于作战的指挥问题上①，希特勒除了在西方战局即将开始前，寥寥数语，草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之外，再没有任何表示。从一开始，希特勒使将此战局的全部计划——从展开到确定首批进攻目标都听任陆军总司令部安排。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完全被排斥在一边，甚至陆军总参谋部 1940 年秋举行东方战局的大型司令部演习时，指挥参谋部的成员都没有作为客人或观察员被邀请参加。约德尔将军也有意识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因为他个想根据参谋部的任务和性质，以倾导者的身份参与事态的发展。但也有一些例外，如 1940 夏季，他委托国防处长对苏俄作战的基本要素，进行一次研究并拟制一份研究报告。其目的是，熟悉苏俄地理和军事现状，并企图先于陆军向希特勒提出自己的建议。①9 月初，国防处长根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的指示，通知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谍报局，“东方领域”在最近几周要进驻大量部队，并提出几条采取隐蔽措施的原则。除此之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还担负了 1940 年秋向罗马尼亚派送陆、空军“军事代表团”的任务。这无疑也是“东方战局”准备工作之一②1940 年 11 月 12 日统帅部“为尔后作战”所制定的第 18 号指令中，所多次提到的转变方向，在上述系列事情中终于找到了答案。指令只是说：“探明下一步俄国态度的政治会商已经开始了。不管这种会商的结果如何，凡是已经口头命令的东方各项准备工作，将照常进行。一旦陆军将作战计划呈送于我（希特勒一译注）并经我批准备，一系列指令就会随之签发。”

这样看来，约德尔将军 1946 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对质询所作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他解释说：“我不是……第一个为进攻苏联而作准备工作的人。当我在陆军总参谋部从见证人保卢斯那里得知……陆军总参谋部正在制定进攻苏联的方案，我大吃一惊。”我们暂且不谈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在供词的其他段落所谈到的他的主要任务，即将希特勒的决断，通过他的“总参谋部的工作……以国防军整个机构所需要的军事形式体现出来”①上述的事情就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国防军统帅部的结构，在战争达到白热化时，也不能适应国防军指挥的最低实际需要。

希特勒的介入

人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假设，即统帅部集这一时期的经验，应自觉地拒绝任何为东方战局制定作战基础的上作。然而，事态的发展从根本上驳倒了这一假设。首先，当陆军首脑于 12 月 5 日向希特勒报告其研究结果时，希特勒毫无保留地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尽管他作了一些评述。遵照他的“据此计划，准备工作全面铺开”的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委托国防处，按惯例在与陆、海，空三军作战处取得一致的基础上，将陆军的“思想”以统帅部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同时，约德尔还强调说：“元首……已决心实施东方作战行动……因为陆军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而且最近再次向苏俄表明……凡是德国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到达”

在国防处长在巴黎期间，曾提出指令的第一份“草案”必须进行补充。12 月 16 日，瓦利蒙特向约德尔呈递了第二份草案，同时强调指出“在制定过程中，国防处对处在两线作战的形势，以及对有待解决的燃料消耗量的问题，作出了判断”。

希特勒的思想集中在作战开始和实施的方式方法上。因此，当约德尔将军于 12 月 17 日提交指令草案时，希特勒命令，计划要作“重大变动”。此前，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整个东方战局的胜利希望在于，将进攻重点放在莫斯科方向。因为据估计，敌人“主力”可能在此方向上，只有把重点放在此，才有可能将敌主力一举歼灭。而现在希特勒却要求，中央集团军群在击溃白俄罗斯的苏军后，其大部分快速部队要挥师北上，“与北方集团军群……协同，歼灭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内的敌人”，待夺占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德后，才向莫斯科挺进。促使希特勒下此决心的原因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即此前尤其是尔后，他经常是放弃不容更改的、所有作战行动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歼火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代之以二等目标。一个月后希特勒又再次提出“迅速切断波罗的海地域的联系”是“最重要的任务”，他的本怠在于保障这一沿海地区的经济运输畅通无阻；保障与芬兰的最短的联系距离。

东方战局的作战基础，是陆军总参谋部经数月精心研究和最富才干的首脑们的多方论证的结晶，然而却被希特勒如此大笔挥，被另一方案所取代，因此，认为国防处的研究方案参与此事的猜测是不正确的。因为按照参谋部的习惯.此项研究工作应事先交付陆军作战处承担。因此，另一种设想也是不能成立的，即国防处在 1941 年夏季需要对两种对立意见作出决断时，两次利用书面的形势判断，有力地支持了陆军总司令部的立场。同时，也没有其他迹象表明，希特勒在下此决断时，受到了约德尔将军的影响。一切迹象证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与在制定西线作战计划时相反，没有给陆军总司令部一个重新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他自己却要亲自对指令的基本要点重新进行修订——他认为这里与其职责相协调的——而已将以前所用的代号“奥托”和“弗里茨”改为现在众所周知的“巴巴罗萨”①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而拼凑起来的这份文件，终于经希特勒签字，使德国国防军踏上了开向东方的艰难历程。

陆军总司令部如同约德尔将军——在这里，他又完全沦为希特勒工作班子的领导——一样，除了对他们苦心制定的计划作如此重大改动深感震惊之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有人队为，在东方战局的进程中，希特勒会被迫重新接受陆军总司令部原来制定的计划，这种把回避现实当成是解决问题的逻

辑推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巴巴罗萨”指令下达后，在东方战局的准备工作中，陆军总司令部仍起着主导作用。陆军这一优先权是在三次大型会商会上提出的——头两次在贝希特斯加登，最后一次在柏林举行。在 1 月至 3 月中旬举行的这三次会上，希特勒向陆军头目们提出了他关于军队展开和近期作战目标的决断。

在这种情况下，约德尔将军凭着他的性格和素质。只能如同每天在希特勒“侍从”的小圈子里举行一般的形势报告一样，来充当希特勒的常务顾问。在这种场合，尽管他可以谈论东方战局的有关情况，也可以亲手去完成希特勒的某种特殊愿望；但他的参谋部从未能承担过纯粹的准备工作。按照他自己的工作方式，他越是长时间地远离国防处，他越是一筹莫展，只得自己依靠自己。同时他似乎也认识到，他所应得的权威，基本来自于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而不是由于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职位，对于他代表的事业他已完全荒废了。

驻在柏林附近的克拉普尼茨的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在 1 月到 2 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接触一点即将开始的、成为整个国防军头等大事的俄国战局。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等于宣告在各高级参谋部内，已分为东部战场和其他战场，这为后来的作战造成大量灾祸；另一方面在这殷时间里，参谋部与它的参谋长分离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约德尔将军一向从简短的通告或从某位副官草率的记录中所能获取的信息不足以证实 1 月 19 日,国防处长几个星期中唯一一次到贝希特斯加登访问时，向他的上司询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元首是否仍坚持实施‘巴巴罗萨，行动”。约德尔对这个三番五次提出的问题十分不满。回答中，他表明了希特勒对这次作战的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而且还说了一句至今难忘的话，他说：“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如同一个猪尿泡，只需一戳就会把它捅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这种表达方式与希特勒 1 月 9 日的话，有过之而无不及。希特勒在谈话中曾这样说过：“俄国军队虽然象一尊无头的泥塑像，但它将来的发展还难以预料……现在还不能低估俄国人。因此，德国的进攻必须以最强的手段实施”。

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并不同意“上层”的观点。他们一方面象往常一样，尽力去完成东方战局赋予他们的微不足道的任务；另一方面，尽可能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但这些活动与真正的国防军指挥任务还相差甚远，只能解决一些低层次的问题。譬如，在一次在陆军总参谋部进行的会高中，讨论的是如何尽力满足东方战局对长车、轮胎、备件和发动机燃料的大量需求——国防处长曾带指挥参谋部负责组织和前迭任务的军官、当时的明希上校和冯·蒂佩尔斯基尔希上校参加了这一会议。汇总陆、海、空三军总令部的命令、地图和其他资料，并拟制“大事年表”，以供希特勒按时发号施令用，也是他们的任务。按照一个真正的国防军指挥标准来说，如果说国防处在那几个月里，在与俄国战局有关系的事情上作出了成绩，那就是为适应新的形势，为继续实施对英作战和维护西欧占领区的安全，提出新的方针。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上文已经提到的任务，即利用情报机构的一切手段迷惑敌人，使“对俄的展开行动……成为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骗行动”，以转移人们“对在英国登陆实施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力”。

从 3 月起，东方战局对于德国大本营的各个分部来说已日益变成最重要的工作。3 月中旬，当部队的展开行动全面铺开时，希特勒再次介人了陆军

的基本作战计划。他断然命令，放弃南翼（第 12 集团军）由摩乐多瓦出击的计划。第聂伯河这个巨大障碍，最好从后方打开缺口，从而使卢布林地域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第 6 集团军）得到其快速部队的加强。这里不太清楚，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否在每日的形势报告会上，通过通常对最高司令的这种“灵感”进行一番解释而参与了希特勒的这惭的专横独断。但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在一次与陆军首脑以及陪同军官总参谋部豪辛格上校，进行的长达 5 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决定。根据一切迹象表明，陆军方面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陆军总参谋长却在他的日记里，对希特勒这次发表的以及其他日渐动摇东方作战计划基本框架的意见，发了不少牢骚。看一看南方集团军群在战局的头几周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就足以对这位站在最高位置卜的统帅人物的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作出充分估价。

此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涉及国防军最高层指挥体制的决定值得一提。这项决定不应归咎于希特勒，而应归咎于陆军总司令自己。约德尔认为，陆军总司令部由于被排除于挪威战局之外，布劳希奇元帅可能出于气愤，于这天宣布，由挪威和芬兰向白俄罗斯地区开进的计划“全部听任统帅部安排”。

这样，当时在芬兰就出现了第二个“统帅部战场”。但是同挪威战局相反，在这里陆军本来一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体现出某些特性。然而，陆军总司令对在一个纯粹陆地战场上的大量陆军部队所拥有的职责和控制权，心甘情愿地拱手让给国防军统帅部，即让给希特勒。由于在东方战局开始前芬兰军队总司令曼纳

海姆元帅拒绝了德国统帅部关于担任芬兰境内全部对苏作战部队——包括德军——总指挥的请求，致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国防处分别接管了陆军总参谋长和作战处在芬兰此部的任务，就狭义的作战意义而言，这两个职位都是陆军理应和有条件担负的，根本谈不上别人接管。除作战外，其他一切任务，如部队征召、补充、前送和补给象在挪威一样，仍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

人们若想寻求这一特殊的指挥上的调整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无益的，而且得不出任何结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如何不是好的，或者说不是最好的。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陆军首脑是一个强大的人物，他会重新夺回对挪威陆军部队的指挥权，而不会走相反的路①。

盟友

对俄国的进攻，由于巴尔干战局从 5 月中旬推迟到 6 月 22 日，因此，在进攻俄国前夕，与结盟和友好国家接触，并与德同一起共同进行这场东方战局，再次成了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特殊任务。然而，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参谋部的独立自主性也同样受到很大限制。

起初，希特勒挑选的对象只是一些能为德军展开提供方便的俄国的近邻，或者要与苏俄清算旧帐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芬兰。排在第二线的国家也许还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瑞典起码也能为德国提供间接支援，即可借道瑞典向芬兰输送德国部队，因此也旱被列为考虑之列了。希特勒指出，对主要盟国意大利，必须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观点。任与其他各盟国接触的

时机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为一方面，东方战局带有突然性和先发制人的性质；另一方面，这是希特勒领导军事联盟所一贯采取的原则①。

芬兰尽管不是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但两国有“战斗情谊”的关系，是德国特别信赖的国家。6 月初，两国举行了一次短暂的“总参谋部会商”。鉴于在芬兰的特殊指挥关系，这次会商仟务主要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承担。在会上，约德尔将军再次以转移方向为开场白，大谈其已经赢得战争，现在必须结束战争云云。接着，要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与芬兰代表就未来双方在拉多加湖一线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希特勒亲自同罗马尼亚国家元着安东内斯库元帅举行了会谈。对其他国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主要依靠向友好政府所在地派驻老资格的军事武官，或按照在意大利的作法，派遣高级军官，这种军官后来通常被称为“驻盟国国防军大本营的德国将军”。但是，这决不会自然形成喇：在山双方或多方组成的固定的参谋部领导下的协同作战的局面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盟友谈判的内容，一般只局限于国防军统帅部指令里所提到的战争问题，即陆军总参谋部由其展开计划和作战计划派生出来的以及经希特勒同意的思想和建议。更大的战略问题——虽然也属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务范畴——如鉴于意大利的软弱，考虑与日本达成一项日本在远东进攻苏俄的协议，就需要在 1940 年 9 月 27 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条约”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当时，双方都尚未考虑这种可能性。日本外相在柏林进行长时间逗留后，1941 年 4 月中旬回国时，途经莫斯科，与苏俄签订了一项中立条约，日本以此向德表明自己的态度。德国方面没有料到其盟国会走这一步棋。德国认为，日本是想通过此举免去后顾之忧，以利放手打击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德国只能以符合其战胜英国这个最终和最高目标而聊以自慰。因此，当德国的东方战局揭开序幕时，得到日本的直接帮助微乎其微。直到 1941 年秋季，由于苏俄的崩溃即在眼前两国才恢复了过去的相互信赖的关系。当时，德国大个营的人们甚至针对日本的所谓倡议，趾高气扬地说：“我们不需要梁上君子”！

我们暂且不管站在关键军事职位上——不仅限于国防军统帅部——的人，在关于未来对俄作战的快速进程问题上与希特勒的观点是否一致，这里再一次说明，仅仅被视为希特勒军事工作班子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作战指挥的基本问题上，不可能提出与希特勒相悖的观点。因此，统帅部包括海军总司令部在那时期的全部言论，都是关于这些盟友支持德国即将到来的对

英战争、以及必要时的对美战争。1941 年 3 月 5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第 24 号指令，在海军一份备忘录和此后国防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这些观点总结为基本方针。它的最后一句话是：“ 关于巴巴罗萨行动不允许对日本有丝毫暗示。 ”

最后的指挥措施

国防处在约德尔的领导下，在对俄战局的最后准备阶段，除完成所受领的指挥领域的任务外，还负责汇总陆、海、空三军每日上报的侦察情报，以及向陆军总司令部传达希特勒对展开和最初进攻目标的大大小小的反复变动；在涉及国防军统帅部芬兰战场”的问题上，则与挪成集团军司令部联系，希特勒的一切言词，都来源于他个人的孜孜不倦的脑力劳动，而且不但被他的亲信——首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而且被有关的军种总司令部作为命令，无条件地加以接受。最突出的事例是 1941 年 7 月 14 日在柏林总理府举行的。一次“大型会商会”。在这次会上，希特勒打破一切惯例，向到会的集团军群、集团军、装甲集群司令；海、空军与此相当的将领；以及国防军统帅部首脑及其最亲密同僚了解关于任务和企图的全部细节。出于伪装的缘故，这一大批高级军官在希特勒的副官的周密安排下，通过新、老总理府的各条人口，并按不同时间准时到会。报告按各条战线，分组举行。被点名的成员。按指定时间，到老总理府的议会大厅集合。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希特勒无拘束的欢迎。14 时，会商结束。在共进午餐的宴度上，希特勒发表了一次“包罗万象的政治讲话”。讲话中，他再一次说明进攻俄国的理由，并反复解释说，俄国的覆灭将促使英国放弃战争。从外表上看在与会者中，信任的气氛占绝对优势。

“大事年表”对指挥参谋部的准备工作，起了巨大作用。鉴于作战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以及在东线、西线、北线所采取的措施的相互依赖性，“大事年表”按照料各军种的愿望，将大量的困难问题汇编起来。由于巴尔干战局，推迟了进攻时间，因此需在 5 月份拟制第二份“大事年表”。此外，还需要与卡纳里斯情报局的有关部安排好边界和消息封锁问题，以保证突然袭击的达成。但另一方面，要保证满载贵重的战时经济物资的俄国列车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直至进攻发起前的最后几分钟①。

国防处终于受领了一项特殊任务，即以外交部照会的形式、将俄军在近几个月内侵犯德国边界和领空以及类似事件归纳整理出来。这种文件要根据其内容在国际法上的重要程度。按不同级别签字上报。不太严重的事件由国防处长签字，中等严重的事件由约德尔将军签字，重大、严重事件则由统帅部参谋长签字。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正如 6 月 19 日，外交部驻统帅部联络官通知国防处长时说的：“对于国防军统帅部……截止今晚前向元首所作的关于俄国侵犯边界的报告，元首昨晚已委托外交部长发出最后警告，意在表明德国对俄国军队展开所造成的威胁不能再继续犹豫不决了。”

据回忆当时要求拟制的这一报告，基本是一份以事实为依据并有大量数据的文件②。说到这里，似乎通过前文讲述的事实，已经揭示了“非正义战争”的实质。然而，“非正义战争”这个词汇对于当时每个军官来说都还前所未闻！后来，从边境会战中俘虏的大量苏俄战俘口中，以及从苏俄在边界附近新建大量机场一事中得知，俄国人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远远超出德的意料，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德国战争的“非正义”性。最后，只能到它自己的所谓“国家至上”论中去寻找答案。

“罪恶的命令”

对于希特勒的、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罪恶”命令，国防军指挥参谋和国防处肯定有过密切接触。详细地描述一下事情经过，以及此项命令在德国大本营里的产生过程，比仅仅依靠纽伦堡判决所作的描述要重要得多，况且对于一个参与者的见证也是不应当忽视的。在我们一件一件地列举一些文件和其他资料之前，首先回忆一下两个情况：

1、居于国家最高位置上的独裁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受到了德国人民几乎一致的拥戴他的“十字军东征思想”①，至少也不亚于他后来的几个敌对国。在这种状况下，任何公开的异议都行不通，只能暗地里秘密地阻挠他的企图的实现；

2、军官们习惯于将服从、法制和荣誉，以普鲁士德国国家历史上的典范，作为他们的自然观念，但由于他们在能力施展上所受到的局限以及现实与义务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看到希特勒政府犯下的种种罪行，促使他们在战争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起来反抗。因为国家和政府元首所发出的命令，与他们军人的伦理极不吻合。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客观情况尤其需要说明和加以考虑：在入侵俄国一事上，陆军总司令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能够更多地坚持履行所谓“执行权”；至少在“作战地域”和所属的“后方地域”。除了陆军总司令和由他授权的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脱离陆军而独自下达任务。但陆军总司令却在希特勒的压力下，不得不与本不属国防军的“保安局”和警察特种部队达成必要的协议，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特别行动队”①的本来任务是什么。

人们可以今大的观点，去看待 1941 年 3 月 3 日约德尔将军对他交付给国防处拟制的“第 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在特别地区的方针”草案的批语。这份草案的前言部分称，此草案已经约德尔亲自加工修改，并已呈送元首过目”，接着他将希特勒对“最后文本”所提出的“方针”归纳如下：

“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局，不仅仅是一场武装斗争；它还是两种世界观的搏斗。在幅员辽阔的地域里，只击败敌人的国防军还不足以结束战争。必须解散整个地区的国家体制，建立它们自己的、可与我们进行和谈的政府。

这些政府的组建需要极大的政治灵活性和制定审慎周到的原则。

每一次大规模的革命，都会造成不可磨灭的既成事实，社会主义思想，已无法从今天的俄国除掉。它能够成为建立新的国家和政府的内政基础。作为迄今的人民的“压迫者”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必须予以铲除，流亡国外的那些尚存的资产阶级贵族知识分子，也同样予以铲除。他们将被俄国人民所抛弃，他们终究是仇视德国的，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当初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此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避免一个民族的俄国取代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因为，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国家最终仍将成为仇视德国的国家。

我们的任务是尽快、以最低限度的军事力量，重建一个依附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

该任务十分艰巨，仅靠陆军无法完成。”

继续写道：“根据元首确定的方针，约德尔指令必须作如下修改：

1、陆军需要一块作战地域。但其纵深，必须尽可能加以限制：在其后方不应设立军

事管制机构，而是向一些根据民族特点而划分的较大地区派遣帝国全权代表，负责在那里迅速建立新的国家政治机构。此外，应派遣“国防军司令”作帝国全权代表的助手，仅处理与继续作战有关的纯军事问题，隶属于陆军总司令和国防军统帅部。在这个班子里，应设立能处理国防军事务的各种组织机构，（如国防经济、通讯谍报等）

警察主力也将由帝国全权代表指挥。

2、边界封锁只能在作战地区实施。除秘密野战警察外，有无必要在这些地区设立党卫队领袖的机构，须由党卫队领袖酌定。有必要将一切布尔什维克头目和政治委员除掉。对此类问题，军事法庭不须审理，军事法庭只负责审理部队内部事宜。

3、草案的第 3 部分（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的方针应采纳这一指示，即陆军总司令拥有在必要时对这些国家的问题，向统帅部提出建议的特殊权力，再由统帅部与外交部取得联系。陆军可向驻这些国家的德国公使提出“直接请求”。

此后，“特别地区的方针”由国防处重新修改，1941 年 3 月 13 日经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签字，其全文如下。

关于第 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中特别地区的方针

1、作战地区和执行权

1）在东普鲁士和总督辖区内，国防军内部的、对作战区域指挥权和补给规定，应最迟于作战行动开始前一周年国防军统帅部宣布生效。陆军总司令部应在与空军总司令取得一致意见后，及时提出建议。

宣布东普鲁士和总 98 督辖区为陆军作战区域不是有意的。相反陆军总司令有权根据 1939 年 10 月 19 日和 21 日未发布的元首敕令，对实施其军事任务和保证部队安全所有必要的措施作出规定

陆军总司令可授于其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以同样权利。陆军总司令部的这种规定。优先于其他一切职责规定和地方当局的指示。

2）一旦作战进程允许，凡在作战中占领的俄国地区，都要按照特别方针，将其国家机构解体，建立自己的政府。由此，特作如下规定：

a）由于陆军越过帝国和邻国边界向前推进而形成的陆军作战区域，要尽量限制其纵深。陆军，总司令有权在这一地区行使权力，也可授权于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

b）在陆军作战区域里，党卫队领袖为准备实行政治管理，受元首委托，接受由于两种对立的政治体制的最后斗争而产生的特殊任务。在这些任务范围内，党卫队领袖可自主行事，自己对自己负责。但陆军总司令和受其委托的勤务机构所行使的执行权，不能因此受到触动。党卫队领袖应注意，在执行任务时，不得干扰作战。具体规定，陆军总司令部可直接与党卫队领袖磋商作出。

c）一旦作战区域达到足够纵深，其后方区域将受到局限。在新占领区的作战区域后方，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管理机构。它的划分，要依据民族条件，以及在北方（波罗地海沿岸）、中央（白俄罗斯）和南方（乌克兰）的集团军群的分界线而定。在这些地区里，由帝国全权代表实施政治管理，他们将从元首那里接受实施方针。

3）在作战区域后面的政治管理地区，将由国防军的司令官们实施全部军事任务，他们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国防军司令官是国防军在有关地区的最高代表，行使军事主权，他负有地方司令的任务，行使集团军司令或军长的权限。

他的主要任务是：

a）与帝国全权代表紧密配合，支持他履行其政治任务。

b）利用和保护该国的经济财富为德国的经济服务。

c）按照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利用该国条件，为部队提供补给。

d）保障整个地区的军事安全，尤其是要保障机场运输公路和补给设施免遭暴乱、破坏分子和敌伞兵部队的袭击。

e）整顿交通秩序。

f）负责为在其管理区逗留的国防军、警察、各种组织和战俘安排住宿。

对于地方机关，国防军司令有权采取为完成军事任务所必要的措施。在这一地区内，任何人包括帝国全权代表都要服从于他所作出的决定。

有关兵力分配的勤务条例、编成命令和指令，以后将加以区分。

在不干扰作战的情况下，一旦军事态势允许指挥关系的转换，国防军司令便可受命行使指挥权。

4）对作战区域和政治管理区域里的经济管理的统一领导，元首己委托帝国元帅担负。帝国元帅将这一任务交付经济、军备局长完成。有关该方面的特别方针，将由国防军统帅部经济、军备局颁发。

5）警察力量由帝国全权代表领导。在作战区域内，若要求转隶警察力量，陆军总司令部应提前向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提出请求。

6）部队对居民的态度和国防军军事法庭的任务将分别作出规定。并下达命令。

II、人员物贡和消息的交往

7）作战开始前，为控制与俄国的人员。物资和消息交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已由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发布了特别方针。

8）随着作战的开始，陆军总司令应对德、苏边界，以及尔后的作战区域的后方边界，实施封锁，禁止任何非军事人员，非军事物资和消息的交往，党卫队领袖按照元首指示安排的警察组织除外。这些组织的食宿由陆军总司令部总军需长负责安排.他也可在党卫队领袖处设置联络官。

边界封锁也适用于帝国最高当局和党的机关的领导人和特派员。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将对此向帝国最高当局和党的机关作相应通告。边境封锁的例外情况。由陆军总司令及其委托的机构决定。

除对党卫队领袖的警察组织所作的必要的特殊安排外，入境许可的审批权完全由陆军总司令掌握。

III、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的方针

9）与这些国家达成的必要协议，是根据国防军三军总司令部的动议，由统帅部和外交部一起经办的。在作战进程中表明，国防军统帅部有必要提出特殊的权力。

10）为直接保护部队所采取的警方措施，可不依据授予的特殊权力而实施。

其他规定待以后作出。

11）对这些国家的下述领域的特殊规定以后作出：给养和饲料的筹措

宿营地和器材、货物的采购和寄发，货币的筹措和支付规定，

薪金，

索赔权。

邮电业。

交通业。

审判权。

国防军三军和统帅部机关，关于在上述领域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愿望，应于 1941 年 3 月 27 日前报告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国防处。

IV、对瑞典的方针政策

12）由于瑞典只能作为开进经过区，因此德军部队司令在这一地区没有特殊权限。只有保障铁路运输免遭破坏和攻击的权力和义务。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签字）凯特尔

1941 年 3 月 13 日

关于“特别任务”的规定[（I.2）b）]，仅从内容上就可以肯定地看出，希特勒在第三稿中，作了这样的补充：他将任务委托给党卫队领袖，只有他能有权充任“德国警察头目”，有权独立自主行事。对于当时的情况知之甚少的人来说，似乎有必要指出下列几点由此而带来的结果：

1、按 3 月 3 日“方针”才需进行审查的问题，即党卫队领袖是否在陆军作战区域内活动的问题，在此期间已成为既成事实，而没有就统帅部或陆军总司令部进行合作作出任何决定。

2、“特别任务”的形式和范围都没有详加阐述。只是就政治警察的使用，作了较多的解释。这种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处在前线的国防军如同国内的国防军一样几乎无所事事。另一方面，鉴于俄国境内的情况，增加警察力量以保障战线背后的安全，也是必要的。

3、从该命令最后的签发顺序上，也不能说明党卫队领袖与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已作出了具体安排。而更多的是让两者就允许党卫队领袖的机关在陆军作战区域内自由活动，以及设立营地，进行补给等，达成必要的协议。

国防处对这一“方针”持批评态度。因为它极大地侵犯了陆军总司令在作战区域的主权，将给陆军总司令部带来新的困难。然而，出乎预料之外，人们很快接受了希特勒的安排。早在 3 月 13 日，总参谋长就记录了“瓦格纳与海德里希关干警察问题的谈话”，并于第二天，在统帅部指令的开头，增加了“巴巴罗萨的特别安排”的话，却没有加任何注释，几天以后，在上文提到的那次形势讨论会结束时，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及陆军总参谋部军官们就他对东线“后方地域”的意图发表了一次粗狂的讲话，面对陆军将领们来说，却加强了他们以一切可能限制党卫队领袖及其机关活动的意志。在作战区域的特殊条件下，陆军总司令部及其前线指挥官的这种可能性是大量的，比如封锁公路或扣留燃料等权利。

在这种精神驱使下，一贯赞成陆军总司令在作战区域拥有绝对指挥权的瓦格纳将军，与海德希希进行了一次必要的谈话。而海德里希肯定对此早有考虑，对“特别任务”的真正性质没有透露半句。此后拟制的、经陆军总司令部以及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审阅的命令草稿，即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怀疑。也不会使人提出疑义。其全文如下：

秘密

1941 年 3 月 26 日

陆军总司令部

陆军总参谋部　军需总监

在部队之外实施特别安全警务任务，需要在作战区域内增设保安警察特遣队。

征得保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长的同意，在作战区域里，对保安警察和保安局的使用特作如下安排：

1、任务

a）在集团军后方地域：

作战开始前，确保固定目标（物资、档案、德国或敌国组织、部队、集团的卡片等，特别是重要人物：流亡政治领袖、破坏者、恐怖主义者等）的安全。

在由于增派特遣队可能使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干扰的下属区域内，集团军司令可不予以增设。

b）陆军后方地区：

研究和对付故国非军队实施的敌对行动，以及向陆军后方地域司令通报一般政治形势。

1937 年 1 月 1 日与帝国国防部谍报处共同拟制的“ 国家秘密警察和国防军谍报机关之间的合作原则 ”的基本精神，也适合于与谍报军官或谍报机关的合作。

2、特遣队与集团军后方地域军事指挥当局之间的合作。

保安警察特遣队在自己负责范围内执行任务。在行军、补给宿营等方面隶属于集团军，在惩戒法律方面由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局长官处理，集团军无需过问。

在专业方面他们执行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指示。在某些活动受到集团军规定的限制时，应服从集团军安排。

为对这些特遣队实施统一领导，应在每一集团军地域内，委任一名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代理人。他有义务将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特遣队长官下达的指示及时通知集团军司令。为避免干扰作战正常进行。集团军司令有权向代理人下达有关指示；这种指示压倒一切指示。

代理人要经常与敌情军官紧密配合。代理人可按指挥当局的要求，派一名联络官员与敌情军官保持联系。敌情军官需将特遣队的任务同军事谍报、战地秘密警察的活动和作战协调起来。

特遣队有权庄其职责范围内，对当地居民采取行政措施。在此方面，应与谋报机构实施最密切的合作。可能会对作战发生影响的措施需经集团军司令批准。

3、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与陆军后方地域司令之间的合作。

4、特遣队、特别行动队、特别行动组和战地秘密警察的权限。在部队内部的政治谋报任务和直接保护部队的任务，是唯一由战地秘密警察担负的任务。全部此类事务，特遣队、立即交给战地秘密警察处理，反之，一切属特遣队任务范围的事情，战地秘密警察要毫不迟疑地交给特遣队、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处理。此外，1937 年 1 月 1 日的协议有效。

代理人

签字

不久，“ 保安警察特别行动组 ”在这个协议的俺护下，在东方战局开始不久，便按照希特勒向希姆莱下达的秘密指令，在东线后方地域有计划地大批屠杀犹太人。对这一点。参加会商和拟制命令的军官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

早在 1941 年 3 月 30 日举行的约 200—250 名高级军官——主要是三军即将担任东方战局的高级指挥官及其最亲密的同僚一一参加的会议上，希特勒在民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就公开提出了违法的要求。按希特勒的本意，同 1939 年 8 月 22 日波兰战局和 11 月 23 日西方战局前夕的“ 动员 ”一样，即向高级将领及其高级参谋助手们，就即将来临的东方战局，灌输他的观点，要求全体与会者，应将东方战局作为“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由于无法改变的“ 世界观 ”上的巨大差别，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言词尖刻，全场鸦雀无声气氛十分紧张。只有两次起立打破了场上的寂静——一次是当希特勒从后门

走上讲台时，一次是当他离开会场时。

在这次讲话中，希特勒还宣布了“政治委员命令”，颁布了在“巴巴罗萨”地区实施审判权的法令，简称为“巴巴罗萨命令”。希特勒在讲话的一开始就提出一条方针：苏俄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不管是部队的还是地方的，一律是罪犯。因此，既不能把他们当成不人看待，也不能当成战犯处理。如果他们被俘，应将他们转交保安局的特别行动组处理；如果条件不容许，当地部队可将其就地处决，对另一道命令，希特勒早在 3 月 3 日所提出的要求叫就作了解释。他要求军事法庭对待部队要采取双重原则，德国士兵有侵犯“敌国居民”行为时，不应严格按军事惩处法和纪律条令处理；相反“敌国居民任何侵犯国防军的行为”都要以最严厉手段，其中包括立即处决来加以惩处，而不受军事法庭的起诉。希特勒的这些指令，基本上就是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判决，他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犯罪”等同，特别指出了红军在进犯波兰、巴尔干国家、芬兰和罗马尼亚时，政治委员和干部所犯下的残无人道的暴行。在这一基础上，他反复强调，试图让他的听众相信，对俄作战绝不能以军人的侠义精神进行，军人情谊的“过时观念”已不适用；这是一种特殊战斗，不仅要打垮红军，而且要把共产主义永远从地球上根除。

据后来传说，当希特勒离开会场后，他的讲话引起了某些与会者的抗议和强烈反响。然而，据我的观察或当时的史料记载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譬如，陆军总参谋长详细记录了会议的过程，但对希特勒的最后几句话他只记道：“将领们必须有自我牺牲精神，要消除他们的疑虑”在这两句话的旁边还注有“陆军总司令命令”的字样。紧接着上面的话记有“上午：共进早餐——，下午：在元首处会商”从下面的记录可以知道，这两次活动是在陆军集团军群司令和个别下一级将领的小范围内举行的，只听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名叫古德里安的由于哈尔德对尔后的会商，只用了一句话即“没有新东西”来表示，因此可以断定，与会者中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讨论希特勒在上午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陆军高级军官们的这种保留态度，也许决定了陆军的大多数人不会照希特勒的每一句话去办；另一些人可能会低估他的企图的全部意义；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最好不要立即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可以先看上司的反应如何再说。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简明扼要地解释说：“在这次会商之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也许他应当这样说：他对人们对希特勒计划的反应和异议一无所知。凯特尔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即他身为统帅部参谋长，没有参与将希特勒的要求变成命令、从而将其赋予一种固定形式的活动。然而，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战争时期和战后的表现。在巴尔干战局，在夺取克里特岛行动中，在赫斯出走以及“伸斯麦”号战列舰沉没，那些多事之秋，不管是凯特尔还是约德尔，都一反常态，对希特勒百依百顺，尽阿谀之能事。

在沉默了整整 5 个多星期之后，陆军总司令部终于 5 月 6 日呈递了一份文件，推动了事态的发展。这份题为“陆军总司令派出的特别用途的将军”的文件是一份命令草稿，由陆军总司令签字，“报统帅部参谋长，国防处长瓦利蒙特将军亲启”。这份命令草稿是作为“关于处理国家政治权力代表，以及为统一实施 1941 年 3 月 31 日下达的任务的方针”。在“集团军地域”一段里写道：

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领导（政治委员）是……部队安全和被占领国安定的极大危险……

他们一旦被部队抓俘，可由他处转交部队，都要将其送交一名具有惩戒权的军官。该军官需与另外两名军人（军官或士官）确认，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国家政治权力代表或领导（政治委员）。其政治身份一经证实，枪决并立即执行。

部队的政治领导（政治委员）属于政治干部。及时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剔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可能作为战俘，继续在后方从事鼓动宣传。尽可能先将他们押在俘虏集合处，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将他们干掉。行政管理机构和党内的政治委员，以及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为他们可使部队凝聚到一起。经济和技术企业的政治领导，如果他们采取对抗德国国防军的行动，也顷予以逮习捕。

应禁止将被逮捕的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政治委员遣送后方的作法……”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清楚的说明，尽管这位运用于特别领域的将军不隶属于他，而是隶属于陆军总司令，但由于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义，他也不在其外。在 5 月 6 日的有关记载中有这样几句话：

“特别用途将军米勒及其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

a）要以元首最近时将军们的讲话精神命令部队在东方战局中，部队必须在这场世界观的斗争中，英勇奋战。

b）审判权问题……”

收到陆军总司令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为难。因为，到迄今为止，陆军总司令只是用书面形式，将早已忘怀的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在少数高级军官的小范围内传阅。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具体的“实施规定”，对部队下达了命令。瓦利蒙特以直接了当的、但又谨慎小心的措词、在陆军总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写道：

有无必要发布这种形式的法令，育待考虑。是否将其自己的安排……向统帅部参谋长提交报告？①

国防处有关工作组（军需组），以这一批语作为自己考虑方案的基础，进行工作。与此同时，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打破“业务程序”擅自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芦案、与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进行比较，并注上相应批语，转呈收件人（凯特尔）。瓦利蒙特未将收到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并利用这段时间。与军需纽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禁止这种命令的下发，基于这种企图，当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国防军司法处进一步处理。司法处参与了该命令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门提出的法律上的论据比自己的见解，更能使统帅部参谋长信服。

结果：电话通知司法处长勒曼博士，凯特尔禁止使用这个材料，并于 5 月 9 日将陆军总司令部的草案退还国防处。

2、国防处长与陆军总军需长瓦格纳将军——他前不久曾受陆军总司令的委托与海德里希进行过磋商——进行秘密会商，看是否有可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结果：遭到瓦格纳的坚决回绝。其理由是，正是由于与海德里希谈话后，才感到有绝对必要向希特勒呈送这样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这样作，希特勒就会向前线派遣“保安警察”，并借此力量贯彻他的意志。瓦格纳补充说，为避免出现骚乱和不法行为，陆军总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维护纪律的命令”准备下发到陆军最基层的分队。面对这种情况，瓦格纳只得向国防处长紧急建议，“不要再插手此事”①

3、对当时已被国防处所知晓的“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向希特勒呈递的“第 3 号备

忘录”进行分析利用。罗森贝格作为即将走马上任的“东方部长”，在备忘录里指出，在占领区年，地方政治委员和干部在进行行政管理建设中是不可少的。只有“较高和最高级”的干部，才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其除掉。

尽管统帅部和国防处没有参加与东方的行政管理建设，但当瓦利蒙特从瓦格纳那里得到对陆军前线地区令人放心的担保之后，认为，发展罗森贝格的想法是反对国防军迫害非军事政治委员和干部的极好手段。

经过一周之久的调查和多方权衡，认为反对实施政治委员命令已有足够保证之后，国防处长遂于 5 月 12 日，提出了一份“报告摘记”。摘记开头写道：

“Ⅰ、陆军总司令部对方针呈报了一份草案……并将其作为附件附上。”在简述了陆军总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内容之后，国防处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如下：

Ⅱ、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的第 3 号备忘录认为，只有较高和最高级干部才应除掉。因为，国家，地区的和经济干部在被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应要求元首作出抉择，其原则应具有权威性。

对第Ⅱ点国防处建议如下：

1、对于对抗国防军的干部……可作为游击队员加以处决。

2、对于没有敌对行动的干部，可暂不触动……只有当向该国深远纵深突击时，才有可能决定，能否将尚存的干部留在原地，还是应移交给特别行动队，否则无法进行移交。

3、军队干部应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处理。这些干部不作俘虏对待，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处决，绝不能向后方遣送。”

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未将提案呈送陆军总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凯特尔，而是送交约德尔。他认为，约德尔会对此给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他订先指出，“报告摘记”不是什么命令草案，只是对事实情况一种简短概述，对上司的意见尽可能地影响。另外，在这里还要指出，在那种条件下，进行公开对抗.除了只能成为殉葬品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因此，对希特勒这样的命令只能从内容和措词上极力进行破坏。此时此刻，国防处长瓦利蒙特象前线的指挥官一样，除了时不时地上报一批处一决政治委员的数字外，别无他法。其实，他们既没有统计，也没有进行筛选，更谈不到处决①。军官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顾全脸面”，而是出之于法律和人道的良心。

国防处长将报告记录呈报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之后，便暂时脱离了此事。据我回忆，约德尔亲笔在提案上写的批语，直到战后在纽伦堡法庭上才为人们所知，这些批语是：“必须再次向元首报告（5 月 13 日）”，以及“我们必须顾及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行动，最好将整个行动作为报复来安排”（注：在审判中，约德尔大将交待：“我是想……利用这些批注，向凯特尔元帅指出一条或许能回避……这……命令……的途径……，我认为，必须看一看实际中，政治委员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计的那样；如果确实如此，就可以进行镇压。”据作者回忆所及，这份报告记录直到战后才在组伦堡法庭上公诸于世，但在总理府或山间别墅的谈话，时至今日还未为人们所知晓。

国防处长“旧业重操”，再次处理这项工作是 5 月底开始的。当时他在巴黎参加了长时间的谈判后返回在萨尔茨堡火车站“阿特拉斯”号特别列车的办公桌上，看到了由希特勒通过的“政治委员命令”的最后稿本。他首先

发现，他模仿罗森贝格的口吻提出的建议，全部取代了陆军总司令部拟制的命令草案中的相应条款，几乎连措词都被采纳了。瓦利蒙特在欣慰之余，还感到兴奋的是，命令没有希特勒的签字，也没有提出向希特勒或国防军统帅部呈递“实施报告”的要求。于是，国防处长决定自己签署一份说明，连同“政治委员命令”一起下发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部。此外他还曾加了一句话：书面命令仅“发至集团军司令、航空队队长以上”。他认为，一切与他具有同样思想的人，都会借用他的这些说明和补充，正面回避希特勒的命令。在这件事的前后，国防处长都没有向他的上司——凯特尔和约德尔——透露过一个字。

这就是“政治委员命令”出笼的全部的未加任何粉饰的历史。在给“政治委员命令”降调的工作中，当时的国防处长瓦利蒙特少将以及他的军官们作出了重大贡献①在希特勒尔后发布历次命令时，情况都大致类似。希特勒在制定其东方战争的司法权的方针时，国防处及柏林国防军大本营的其他单位不仅没有参与，约德尔也只是偶尔与凯特尔的谈话中，施加一点个人影响，甚至连希特勒的军事工作班子也不清楚这种事情的全过程，或者在希特勒签字时，才了解一二。

后来的发展结果是，“政治委员命令”只局限在内部小范围内而且据作者所知，后来只有两次涉及到该命令的事。②1941 年 9 月 26 日，东方战局大约已进行了 3 个月，约德尔收到一份陆军总司令部 9 月 23 日签署、由米勒将军签字的函件。函件称，前线的经验表明“应重新考虑迄今的对处理政治委员的方法”约德尔在函件上批道：“对迄今所下达的关于处置政治委员的命令元首拒绝作任何修改”并将函件退回。后来，在 1942 年 5 月 6 日，即陆军总司令部第一份命令草案拟制一周年的日子里，国防军统帅部战争史处的勤务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为促使被围俄军的倒戈和投降，无道命令，凡投诚的俄军指挥员、政治委员、党代表，可首先保全他们的生命。”

由于希特勒作了这样的解释，“政治委员命令”从形式上也等于被废弃了。在东方战局开始后的数周里，“政治委员命令”只是在部分地区得到贯彻，尽管大本营对此没有作过任何报道。但到了 1941 年 12 月初，严重的冬季危机开始之时，命令已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

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在对俄战局初期，“政治委员命令”到底在德国国防军战斗区域和占领区多小的范围内得到了贯彻。而事实是在 1941 年盛夏，在战俘营里却关押着无数各级政治委员。国防处长对此自然一无所知，而希特勒却有耳闻，并为此专门下达了“处置苏俄战俘的命令”’。

根据这一切迹象表明，这道新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在前线地区“筛选”俘虏营里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以此作为弥补措施，战后，有些人将这个新命令看作“政治委员命令”的组成部分，这是不正确的。新命令的发起人和撰写者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命令的接受者、不幸的凯特尔。不同的受命者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命令的接受者一个是前线指挥部，另一个是国防军战俘机关。新的命令对刽子手希姆莱来说，是大开杀戒的上方宝剑；而对前线指挥部来说则完全是另一种事。他们知道，非法处置战俘营里政治委员的消息，很快就会被敌方知道。它只能迫使俄军政治委员们及其部队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因此，到 1942 年 6 月对战俘营所下达的命令、尽管未被废弃，也基本未加贯彻。

在结束这一充满忧郁回忆的一章时，还要说：人们经常从军方听到这样

一种说法，即在北非或意大利，德国陆军在进行“正派的战斗”。其言外之意不仅是对东方陆军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陆军绝大多数的毫无道现的贬低。暂且不说东线和南线的大量部队进行过换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人，尽管承受了闻所未闻的负担——来自己方“高级领导机构”的和敌方的——但是他们仍然懂得维护其传统作风。

2、从战局开始到冬季危机

新的战地大本营

与 1940 年西线不同，在希特勒命令大本营自东普鲁士迁移之前，他为能获悉德国陆军 6 月 22 日清晨越过苏俄边界后的结果，一直等了大约 36 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中午，当苏俄宣布当天为第一个动员日时，德国领率机构才分别乘飞机和特别列车踏上东进的道路。其中，国防处原班人马干 14 时 45 份由柏林格吕内瓦尔德出发,于翌日早晨 3 时 45 分到达距拉斯滕堡城东数公里的目的地“格尔利茨林场”。

参谋部新的第 II 号宿营地设在距一条火车支线车站仅几百公尺的地方。营地后面高架着铁丝网，但从大街向后了望，什么也看不见。宿营地内还有一家简陋的森林客店，是拉斯滕堡居民的短途旅行的歇脚处。在这个客店周围建造了几所木制简陋房屋。大部分工作室就设在这些房屋内。这些房屋的规格、窗户的数量以及内部设施，都是以柏林的各个部为标准建造的。更使人吃惊的是有一半隐蔽在地下的设施，它象一列长长的卧车室，一个门挨着一个门，这里是军官们的工作室和卧室，甚至国防处长在这里有两间卧室，水泥墙壁上镶着淡雅的木板，洗漱室和浴室铺设着瓷砖，有制式衣橱，取暖设备、电气装置等等，应有尽有，这一切与“战地”大本营几乎有些不相称。几天之后，国防处长第个脱离这坐地下墓穴，搬到车站附近的列车上，后又迁移到老式客店里。不久，国防处的其他成员也搬到工棚里。

在第 II 号宿营地里，除了参谋部的战地队外，还有陆军的所谓“元首卫队营”，负责警戒，卫队营指挥宫还兼营地卫戍官。人们相互间很少见面，也不了解，但生活在大本营区域里，总还是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无需丝毫戒备。

在大街的另一边，向东不到 1 公里处，是大本营第 1 号宿营地。在这里住着希特勒和他的“国家、党和国防军”的来信。军队方面，除希特勒的副官外，只有凯特尔、约德尔，以及新增加的“编史官”、总参谋部中校舍尔夫。在这里，也有几所木制房间作为会议室和“饭厅”。而作为卧室和工作室的都是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掩体，每个掩体都有两个和更多的小房间。在最北角，是希特勒的掩体，因为希特勒怕见阳光，窗户依旧朝北。这个被希特勒称之为“狼穴”的地方，时至今日仍被波兰列为名胜古迹，供游人参观。

陆军总司令部设在安格尔堡周围的森林里，乘车 1 个小时可到达大本营。空军总司令戈林和他的司令部也住在大本营附近。然而，国防处长在 3 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次去过空军总司令部的驻地；与此同时，他却与陆军总司令部——在勤务之内和勤务之外问题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里，作者还想起另外一件事，很能说明两者的差别：当陆军总司令部首脑前往“狼穴”时，只乘坐一辆旧式灰色小型列车，这种车辆只适合在“郊区路轨”上行驶；而戈林前往大本营时，最低要乘坐由 3.4 节大型现代化车厢组成的豪华列车，行驶在仅 100 多米的单线铁轨上，车上设备舒适华丽，配有身着白色服装的服务人员。海军总司令留在柏林，在头几个月里，仅派一名海军上将作为其常驻代表，住在 1 号宿营地里。虽然“狼穴”设在前线附近，可是处在这穷乡僻壤中，却几乎没有当初西线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所应有的感觉。甚至在第一次乘车“向前”开进时，在辽阔的区域里，也常见到一些散兵游勇。但不久，国防处长便无法前进，只得换乘一架旅行飞机，以便在仅有的数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与部队取得联系。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先头

部队，越是快速向东方推进，拉斯滕堡的森林里越是显得寂寞。由于离前线需要几天几夜的时间，而且中间无处休息，所以飞往前线的可能性已变得绝无仅有，何况约德尔也自然不会批准。为能摆脱钢筋混凝土和简易住房的窒息空气，作者曾好几次与当时的参谋部副官、有名的赛马能手莫姆上校，在晨雾朦胧的黎明，骑马驰骋在原野上，以享受几分近似战争的气味。有时，也利用下午的时间，漫步在东普鲁士的田野上和森林中，得以休养生息。

在大本营驻地的最初几个月里，每大的上作都是在这种消遣之中完成的。按常规，国防处战地队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每大早、晚各收集一次陆，海、空三军由发自东线、西线、北非、巴尔下和地中海其他地区，以及“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详尽报告，经过整理，由绘图员将新情况标在“态势图”上，通过信使转呈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以外，要举行形势讨论会，有时傍晚在大本营Ⅰ号宿营地举行。除了约德尔照例参加外，还增加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国防处长的另一项例行任务是，每天晚上听取战时日志记录员对当天最重要事件的报告，还常常就有关企图和展望坦率地交换意见。

国防处陆军组经国防处长赞成，在每日早晨的报告里，附加了一份对形势所谓“短评”这是当时国防处的创新。这种短评有双重目的。第一，想在每日中午约德尔和希特勒举行形势讨论会之前，将陆军的观点和企图向约德尔作进一步解释；第二，想最终在自己的国防处里与约德尔达成一种类似于参谋部那样的合作关系。然而，这一尝试由于两个原因而失利。几周后，约德尔对瓦利蒙特说，他可以不要对形势的判断，但是他最关心的是，“态势图”不要出现任何差错。这种不亚干侮辱的谦虚再次揭示了仅以希特勒和约德尔为代表的“最高指挥”，在广阔的东方的战场上的权欲。结果，在参谋部内国防处长常常接连几天没有机会向约德尔作口头汇报，连他的面都见不到，更谈不到与他有勤务之外的聚会。长时间以来，第Ⅱ号宿营地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几乎从未涉足的“禁猎区”。

国防处份外的、主要由留守柏林的工作组所担负的工作，诸如组织、国防军后备人员问题、装备问题、与政府最高当局的协作问题等，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日俱增。每天中午有一架飞机，每天夜里有一列快车来往于拉斯滕堡和帝国首都之间，负责函件的传递。国防军统帅部主要局、处——如负责谍报、装备、宣传的局处——的联络官们，也利用同样途径，与国内机构保持联系。当这些局长、处长们没有机会亲临“狼穴”时①，常派代表到国防处，以便使其行动能同最高统帅的观点相吻合。由于约德尔对此类事情不感任问兴趣，因此这一长时间发展而成的特殊勤务，则由国防处直接转交给统帅部参谋长承担。除了这些日常事务外，其他一切事情，均由希特勒亲自过问和作出决断。

国防处除担负每天与各军事指挥部门进行情报联络等繁重任务外，还要满足与大本营有联系的党、政当局和斩间部门的需要。这再次使当时的目击者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德国最高指挥机构的战地大本营能否避免产生如此多的弊端？据当时观察，柏林和拉斯滕堡之间的来往信使络绎不绝，愈来愈多的军官、党政人员来往奔波，使大本营的职能，随着俄国战局的延续，日益偏离其正轨，对这个问题唯一能作出回答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主要战线激战正酣、德国许多城市陷入空袭的火海之中时，希特勒却置身于东普鲁士这个风平浪静的避风港内。

回过头来看，几乎可以肯定他说，“ 战地大本营 ”在这种状况下，不仅已失去它个身的意义，而且还会起到有害的、延长战争进程的作用。一心想把德国政治、军事永远握在自己手中，并已占领欧洲大部分领十的希特勒，本应最迟在 1941 年 12 月冬季危机到来之前，效仿其他参战国，将其大本营安置在首都或芮都近郊，按理说，希特勒应将每一个师的兵力都投入东方前线，以扭转整个形势。如果他和他的高参们能及时认识到这一点，还为时不晚。然而，希特勒却在 3 年的时间里不断建造他的“ 狼穴 ”，延伸铁丝网，加宽布雷区，一个个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象旧式的战列巡洋舰一样矗立在地面，使整个地区成了一个“ 要塞 ”。在此期间，希特勒或长或短短留的“ 山间别墅 ”，再次进行扩建，延长了地下通道，扩展了地下房间。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在法国的苏瓦松，在劳海姆一吉森地域的齐根贝格庄园周围，以及在布雷斯劳，希特勒都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建造了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大本营。除文尼察一处外，其他地区的大本营只使用了极短时间，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启用。1945 年 1 月，希特勒终于将柏林作为他的固定办公处，然而实施真正的、理智的指挥的可能性。早已不复存在了。

局势变化时期的领率机构

自从希特勒宣布利用“征服”苏俄这种迂回手段迫使英国媾和的设想之后，德国大本营在东普鲁士开设已1年之久。希特勒在1940年7月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英国寄予俄国的希望破灭，美国也将失去作用。”出自这一考虑制定了“巴巴罗萨的准备工作”文件，并成了德国领率机构1941年夏季全部政治和战略工作内容。德国大本营及其军事班子所担负这些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任务，也只能逐个去完成。东方战局每大的进程成了希特勒以及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良的头等大事。然而，希特勒和约德尔并不满足于以战略指导思想监督战事的进程以及必要时以新的方针施加影响，而是在东方战局仅开始数周，就习惯地涉足于陆军的职责范围。史有甚者，不久，他还提出了在俄国实施“寸上必争”的战略思想，把大本营的指挥活动带人罪恶的深渊。

走入这一歧途的最重要原因，在对俄战局中暴露得比以前更加明显，这就是希特勒的满腹狐疑，对权威的无限欲望，缺乏后大的统帅气质，特别是他不具备将他内政治、经济、权威混合而成的思想愿望服从于军事基础理论的能力。住在Ⅰ号宿营地里的他的亲信们，以及对他的行动的正确和预见性的信赖，更使他变本加厉地以装腔作势的军事行家的姿态专横跋扈，独断令行。因为在挪威和芬兰北部的指挥中，是在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情况下，完全按他个人的意愿，由他一手实施的。在“国防军统帅部的战场”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务愈来愈繁重，但由于其体制的原因，单靠它自己已无力承担，而且日益脱离其国防军主管机构的职能。本应由陆军总司令部解决的问题，却堆积如山地摆在一无所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面前。既使这些干扰也未能阻止希特勒继续走他自己的路。

——第一阶段

1941年德国东方战局的第一阶段、可以算到7月上旬为止，约二三周的时间。在这个阶段，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这两大指挥机构，很少有过协调一致的时候。在边界地区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迅速夺占大片领土——至少在中部和北部——甚至使那些顽固的怀疑者，产生了与陆军总参谋长相同的思想和希望。哈尔德在1941年7月3日日记里写道：

“综观全局，现在可以说击溃道格瓦河和第聂伯河前方俄军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我认为一个被俘的俄国军长的供词是正确的。他说，我们在道格瓦河，第聂伯河以东仅投入部分兵力，仅以兵力而论我们无力阻止德国的进攻。不需要多说，我认为，对俄找局在14天内便可赢得，当然还不会结束。占领辽阔的地域，以及对付敌人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的顽抗还要占用我们许多周的时间

回过头来看，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这则日记，或许会引起人们的惊愕。1941年6月2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的秘密会议上也发表了同样观点的讲话：“仅仅数月之内，或许更早一些，我们就会看到这场可怕的入侵结束，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这一点。”这就是说，英国政府首脑不仅认为德国在东方的武装力量会迅速取胜，而且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德国对俄国的进攻是为了给英国“致命一刀”而采取的间接措施。

1941年7月4日希特勒甚至对他的亲信说：“实际上，俄国人已失却了

这场战争。”接着，他自诩道：一开始我们就击毁了俄国的坦克和飞机。他们无法得到补充”。在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在对形势判断上取得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希特勒在最初的几周里，只是将其对东线的指挥放在陆军总司令部急迫的提出迅速、全面达成几个大规模“合围”的要求之上，但不久，他又完全象在西线一样，对先头装甲部队的翼侧表示起“担心”。同时，他对空军的行动也采取了同样抑制的态度。而此时正是空军完成了袭击俄国机场和纵深的其他口标的“战役”任务之后，已与陆军总司令部和集团军群司令部协商一致，准备在“战术”任务方面大显身手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及其参谋部对迅速、顺利进展的东方战局，几乎已没有实施指挥的余地；而希特勒却象在西线一样，准备将匆忙得出的一些结论付诸于行动。在他与陆军总司令谈话之后，便于 7 月上旬，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下达了关于未来“人员和装备”、特别是陆军“坦克计划”的详细方针。简而言之，他在此后下达的两个命令中要求，

> 除装甲师外，陆军要从数量上作“重大”减员。装甲师和摩托化师，要在 1942 年 5 月 1 日之前，分别增加到 36 个和 18 个，这两种师都包括党卫队部队；
>
> 海军只需抓装备措施，以便能“直接对英作战，进而对付美国”；
>
> 而空军却要“大力加强”。

希特勒对俄国战局进程的坚定信念，也同样在补充命令中表现出来。其基本观点是，

> 东线必须继续保证充裕的装甲兵力，除留驻在本上的 2 个装甲师外，每一辆坦克的补给都要经希特勒的批准；
>
> “正在立即开始的”陆军新型武器、弹药、装备的生产，应与未来人员的削减相适应；此外，工业的任务也应减少，但这不包括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以及为。个装甲师生产的装备：
>
> 在陆军需要削减的同时，必须按照空军（炸弹和高炮）的需要安排“火药和炸药生产计划”。

不久即将证明，这些命令从战略角度看，已远远超出了事情的现状，另一方面，它也严重地妨碍了东方战局的进程①

——第二阶段

正当国防处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有关部门就希特勒关于在继续对英作战中的装备方针，进行口头和书面意见交流，以决定最后落实方式时，在 1 号宿营地的每日形势讨论会上，已经就东方战局的第二阶段展开议论。每次会上的主要发言者是希特勒和约德尔，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去年 12 月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问题，即是按希特勒一直所希望的，“快速部队大部转向北进”，首先占领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扫清波罗的沿海岸国家的障碍；还是按照陆军的计划，集中国防军的全部兵力夺取俄国抵抗力量中心——莫斯科。正如“巴巴罗萨”指令所指出的那样“两个目标同时夺取”的可能性“只有当俄国……抵抗迅速崩溃…时”才可考虑；会上尽管对形势作了过高估计，但同时夺取两个目标的问题再未提起。相反，却提出了一种过去曾在小范围内讨论过的选择方案，即推进位于普里皮亚特沼泽南部地区已远

远落后的战线，同时中部兵力转尔南下。

在这种情况下，约德尔将军既另出一谋，也不考虑利用他的参谋部，尽管他早在 7 月 4 日就认为，当前的“决定……也许是这次战争小的最重大的决策……”。当他了解到陆军总司令部完全持另一种意见时，这次他不想再承担希特勒唯一高参的责任，因此，他一反常态，力求与陆军总司令部取得及时和广泛的联系。在 7 月 5 日的一篇有关评论中谈到，“必须定下下一步作战。特别是装甲部队作战的决心的时刻已经到来。由于此决心对战争至关重要，也许是这次战争中唯一重大决心。因此，约德尔将军认为，陆军总司令在决定下一步任务之前，有必要与元首商谈一下他的方案和观点。”

在这段时间里，陆军似乎没有找到机会，接受象 1940 年 12 月所希望的通过事态发展而自己得到解决的问题。当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于 1941 年 7 月 30 日向希特勒祝贺诞辰之后说，“由于得到中央集团军群装甲部队的加强，在步兵主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集结，装备向莫斯科发起决定性进攻之前，‘北方’之敌可能就全部被清除”。7 月 8 日，到希特勒那里参加一次报告会之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也曾考虑过部队暂时转向南方。几天后，他时陆军总司令解释说：“我对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装中集群急速向北推进的想法并不热心。我主张，霍特——第 3 装甲集群——的大部兵力必须向北……古德里安。第 2 装甲集群——必须向南，直插基辅地区……但其前提必须是，霍特和古德里安向东实施突破，从而赢得机动自由。”

这样看来，要想调和这两种不同观点，就不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放弃进攻莫斯科的目标，这就使以后越来越僵持的形势更加激化。随之而来的是，希特勒在其指挥上再次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即不充分考虑先决条件，就对部队行动不分巨细，下达各种命令。7 月 14 日，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就曾说过：“元首不懂得事情的关联，但总是插一杠子，把人析腾一番，简直受不了。”从 7 月中旬开始，情形日益严重，导致了希特勒与陆军总闭令部之间的意见纷争，甚至使整个大本营都被卷了进去。直到 8 月下旬，希特勒以命令手段，——从外表看——结束了这场争论。

7 月 19 日国防军统帅部颁发的关于东方战局的第一个指令即第 33 号指令，与陆军首脑几天前向希特勒口头提出的建议有几分相符。但在部队再次实施机动之前，国防军最高司令希特勒没有再次与陆军总司令部进一步磋商，只是在 7 月 23 日发布了“第 33 号指令的补充指示”。该文件指出，不仅基辅，而且还有哈尔科夫、顿河、高加索以及克里木，都成了南方所应夺占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群必须在短期内完成预定任务，尔后由陆军总司令部将其“主力部队……其中包括第 3 装甲集群……调回国内”！同样，空军在结束斯摩棱斯克战斗后，将其若干俯冲机机群调往芬兰，以减轻北缘迪特尔军的压力。“应通过这一行动，消除可能对英国的刺激，避免其介入北极沿岸的战斗”。尽管约德尔对这个分散兵力的计划也有抵触，并站到了陆军一边，但陆军此后所提出的口头设想仍未能实现。哈尔德写道：“他——希特勒——只想确立自己的目标，而不考虑敌人的情况和别人的异义”。“冯·博克将要交出他的装甲集群，仅率步兵进攻莫斯科。然而，博克的兴趣并不在莫斯科，而在斯大林格勒，”当陆军总司令布芳希奇从前线视察返回后，在电话里告诉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执行希特勒指令的“条件尚未成熟”①他满以为，这样便可改变希特勒的决心。然而如同哈尔德的异议一样，依然徒劳无益。

直到苏俄红军几乎在全线加强抵抗，德军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急需补充之时，希特勒才作出让步。但这一次希特勒没有与陆军首脑“就错过的合围时机进行冗长的、时而激烈的辩论”。但是，希特勒却加强了对部队的控制。他说：”俄国人似乎没有被我们在战役上的战果所摧垮，因为他们还不承认这一点。因此，必须运用小型的战术合围，将他们逐个击溃。”哈尔德没有完全否定希特勒认以的合理性，但他写道：“我认为这一思想是迄今充满活力的作战的停滞的开始。”甚至他还看到了阵地战的威胁。

陆军总参谋长“就莫斯科的作用而提出了异议”，也被希特勒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被回绝”。约德尔作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唯一代表，参与了陆军总司令部的讨论会。单独与希特勒进行交谈时，经常表现得软弱退让的约德尔，这次也表示赞同对莫斯科的进攻，他的重要理由是，进攻莫斯科不仅是攻占敌人的首都，更主要的是因为在这条路线上，部署有敌人“唯一的“主力部队。可将其一举歼灭。希特勒再次以他的战争经济为理由反对这一论据。他认为迅速“夺取”顿涅茨煤田和工业，以及高加索油田，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次日，他似乎是受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刚刚发来的不利的形势报告，突然决定，放弃在南部广大区域内计划进行的作战行动。

1941 年 7 月 28 日傍晚，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当着陆军总司令，再次咒骂“目前所决定的作战行动荒谬无稽”，“它将导致兵力分散和对莫斯科进攻的停止不前“。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却在着手将希特勒的观点变为一份新的指令即第 34 号指令。指令在前言部分陈述了“近日态势的发展”之后，认为，鉴于在中央集团军群前方和翼侧出现了敌人强大兵力；补给问题以及第 2.3 装甲集群迫切需要整体 10 天左右等问题……,不得不暂时推迟下一步任务和目标。”按照指令的规定，北方和南方集团军群继续依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局面；中央集团军群应充分保存装甲部队的实力，暂时转入防御。对此，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写道：“这一方案，驱散了近几日压在每个有思想的军人心中的可怕梦魇。这些天，由于元首的执拗态度，东线战事即将处于全面停滞境地。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线光明！”

按公而论，之所以能取得战胜希特勒好大喜功、贪得无厌的结局，应归功于形势，其次是环境。另外，还有一点令人快慰的至今仍留在作者记忆里的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终于第一次与陆军总司令部站在一条战线上，终于以其自己的直言冲破了希特勒观点的束缚。因为再次向莫斯科发起攻势的先决条件，还远远没有具备。

然而，当希特勒在尔后几天访问各集团军群司令部时，又再次兜售起他的计划和思想来了，从而将一时的平静重新打破——可以肯定，他之所以这样作，并不是企图消除陆军总司令部的立场，只不过是受其本性所驱使。7 月 21 日，希特勒在北方集团军群对冯·勒布元帅说，莫斯科只能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斯拉夫的民族特性”应作为考虑不久摧垮俄国的新的因素。8 月 4 日，希特勒在中央集团军群说；进攻莫斯科，在他的计划中排在第三位。夺取对俄国人来说“生命攸关的地区”比一切都重要。即首先是列宁格勒及波罗的海沿岸及其工业区，其中包括重型坦克生产基地；其次是顿涅茨地区及哈尔科夫——“俄国经济的总基地”——这一地区的失陷，“必将导致敌人全部经济的崩溃”。同时，希特勒还矢口否认——也作为对军事情报部门的指责——说，如果他事先更清楚地了解到敌人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他“将难以定下进攻俄国的决心”。8 月 6 日，他又对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龙德

施泰特元帅表露了同样的思想。而在此其间，陆军总司令利用两次巡视前线的间隔时间到大本营拜访时得到的却是希特勒赞同进攻莫斯科的印象！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汇总各方面信息之后，认为应继续扩展已经取得的协调的关系，遂于 8 月 7 日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邮参谋长约德尔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长谈。谈话是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的，即“我们是击溃敌人还是想获取经济目标”。对此，约德尔说，“元首大概认为两者兼顾是可能的”。哈尔德接着说，需要使用到莫斯科上的力量绝不能分到列宁格勒上。“是莫斯科还是乌克兰的问题，或者说莫斯科与乌克兰问题，必须给予答复”。因为“……不如此，敌人的兵源在秋季之前是不会枯竭的”。南方集团军群不仅无需增加兵力，反而就集中全部兵力于“为大范围的、关键目标的作战”——这主要是指莫斯科。哈尔德离开约德尔时确信，此次谈话必将坚定约德尔支持陆军观点的信念。

哈尔德的这些意见为以后的事态发展所证实。谈话的第一个成果是，8 月 10 日,约德尔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在国防处与陆军作战处取得完全一致的基础上，并由国防处起草的形势判断。这份附有地图和力量对比的文件，在一开始指出，中央集团军群前方之敌是一个强大兵力集团，歼灭该敌，接着占领莫斯科，是最重要的目的。从中央实施的、越过友邻集团军群的这一诱人的作战行动应当取消，或是待以后实施。以“步兵集团军”为中路，装甲集群配置于两翼，对莫斯科的进攻可望于 8 月底开始。

这份报告促使希特勒制定了“第 34 号指令的补充指令”，并于 8 月 12 日下发对莫斯科的进攻终于在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开始了。特别是中央集团军群，本应在“完全消除两翼威胁”以及对列宁格勒的作战得到全面保障的情况下开始行动。——而目前仅限于包围。“补充指令”指出，中央集团军群的“目标必须是”“在冬季之前从敌人手里夺取莫斯科这个国家、军备和交通中心”——而以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并阻止敌军重整旗鼓以及重建国家机构”’。按照这一指令，南方集团军群在取得乌曼胜利之后，如有可能，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下一步目标——克里木、顿涅茨地区，甚至巴统。

几天后，当北方集团军群局部受挫时，尽管哈尔德和该集团军群司令部认为无关紧要，但仍使“最高领导机构坐卧不安”，并由此导致希特勒再次直接干预。他命令陆军总司令部在缺少后备力量的情况下，立即调中央集团军群的几个装甲师增援北方，阻止敌人对旧鲁萨的突破。此次行动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那样，同样缺少“先决条件”。冯·博克元帅认为，希特勒的命令是“不现实的苛术”。因为将要增援北方的这几个装甲师，部分由于坦克零件散落，根本无法开动；另一部分由于担负中央集团军群的防御任务，无法分身。于是，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便积极在他的总司令身上活动，而布劳希奇已懒于争吵，也不想“抢先作出重要决断”，最后，只答应以“与约德尔一商”而了事。

鉴于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的犹豫不决，以豪辛格为首的陆军作战处，在未让哈尔德知晓的情况下，以异乎寻常的手段，提交了一份关于下一步作战的“备忘录”；同时，即 8 月 18 日，以瓦利蒙特为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向约德尔递送了一份对新形势的判断报告。在这两份文件里，总参谋部内的中年军官们，竭力从东线态势和德国整个形势中寻找一切论据，再次力主将莫斯科作为主要目标；并证明，南方和北方集团军群所担负的任务已

经够繁重的了。

约德尔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采用他的参谋部的建议，作者已回忆不起来了。陆军总司令向希特勒转呈了他的作战处的“备忘录”，并派其起草者到“狼穴”向约德尔当面陈述。在 8 月 20 日的谈话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缓和大本营“气氛”的转机。约德尔除谈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反对的和赞成的客观理由之外，还说：

> “此外，他——希特勒——本能地担心重蹈拿破仑的覆辙。提起莫斯科他总有些毛骨悚然之感。他担心在那里与布尔什维克展开一场生死搏斗”
>
> 豪辛格接着指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选择了这一方向。我们必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其余的一切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
> 约德尔继续说：“您说得是。但我想告诉您，元首是这样回答的：眼下有一个很好的歼灭俄国有生力量的机会。这个强大集群正位于基辅东面”……

豪辛格还指出，冬天将首先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南部稍迟，他请求约德尔支持他的“备忘录”。约德尔终于作出让步，并说：

> “凡是我能做的，我将尽力去做。但是，您也必须允许我考虑元首提出的理由，不能简单地将其弃之一边了之……不能强迫他违背他内心的信念去做某事。他的直觉往往是正确的。人们不能否定这一点！”
>
> 豪辛格在他的描述中，最后写道，“很遗憾，并非总是如此！我对敦刻尔克还记忆犹新。我们担心，这次又要错过一个关键时刻。”

有迹象表明，陆军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希特勒早在同凯特尔和约德尔谈话时就加以驳斥了。8 月 21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将军来到安格堡哈尔德的军营里，企图说服哈尔德接受希特勒的观点，至少是想缓和对立情绪。在这次谈话中，约德尔被哈尔德逼入窘境，不得不象与豪辛格谈话时一样，承认他无法对陆军的立场提出实质性的异议，“但是，元首有第六感官”。显然，这是同一理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过去让人们无条件相信“元首天才”时所多次使用过的。哈尔德只是干巴巴地说，对这个理由“在逻辑上提出相反的观点是无济于事的。”①。

当大傍晚，约德尔出于无奈，不得不将希特勒新的，也是最后的命令，纳入一份给陆军总司令部的书面指示中。文件开头写道：“陆军于 8 月 18 日提出的关于下一步东线作战的建议，与我的观点不相符”。文件接着重复了希特勒的论断：在冬季到来之前必须达到的最重要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南方的克里木，顿涅茨地区的“切断高加索地区的俄国输油线”；在北部，严密包围列宁格勒，与芬兰建立联系。另外，提出新的要求是，利用“少有的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刻不容缓地集中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两翼兵力”向基辅地区的苏第 5 集团军发起突击，被陆军总司令部视为进攻莫斯科方向的主力的博克集团军群，应以其所留置的部队继续实施防御，直至“第 34 号指令的补充指令”所指出的向莫斯科发起进攻的全部先决条件成熟之时，总之“从中央实施的诱人的作战行动”，成了整个东线作战的主导思想！

第二天，当哈尔德到达他的安格堡军营后，冲动地写道：这个“元首指令”对于此次战局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就在当天，希特勒亲自撰写了一份“文件”，作为对“备忘录”的答复，送给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

使他们苦不堪言。在文件中，希特勒教训陆军首脑们说，在进行了几乎两年作战之后，“快速部队”必须象空军一样，成为“最高指挥手中的战役武器”。接着，他又借用一种明确不合理的对比，说帝国元帅对于这一基本原则在空军已“坚定不移、毫无保留加以执行”，而在陆军却似乎未将这一原则加以“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对此“文件”，哈尔德在他 8 月 22 日的日记里，清楚而有力地作出了反应：

> “我对于因元首的干预而摆在陆军总司令部面前的事态难以忍受。既要认真贯彻元首那一个个朝令夕改的命令，又要不沾污已取得的四次战局胜利的陆军总司令部的美名，陆军总司令的这种作法真是前所未闻。因此，我向陆军总司令申请辞职，并同时提交我的辞呈”
>
> 哈尔德同时补充写道：
>
> “陆军总司令拒绝我的辞呈。他认为，事实上还没有到放弃职位的地步；也就是说，一切将照旧”。

为促使希特勒改变主意，哈尔德作为最后一着试图鼓动古德里安将军出面。这次会见是于 8 月 23 日，在大本营“狼穴”举行的。但是，不管进行怎样的谈话，都丝毫改变不了希特勒的意志。相反，在取得“基辅会战”这一有名的战术上的巨大胜利的前一个星期，即 8 月 30 日，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之间进行了单独谈话，就希特勒的“文件、一事达成“谅解”。毫无疑问，希特勒将这一结局看作是他与陆军的角逐中取得的又一新的胜利——其间与其说他骑士派头十足，倒不如说他道义上的虚伪和软弱。

随着对下一步东方战局的看法上的对立观点的暂时结束，把德国作战计划和前景，放在战略高度重新进行审查，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941 年 7 月 19 日发布的第 33 号指令，已就当时的态势指出，“在西方和北方……必须注意防御英国对海峡群岛和挪威海岸的进攻”；而现在，必须首先将几个月前制定的“巴巴罗萨行动之后”实施的长远进攻计划，与东方态势的发展相适应。同时陆军总司令部在 7 月底与上述计划同时提出的建议——即将由叙利亚和昔兰尼加出发，对埃及实施两面进攻的日期推迟到 1942 年春，而坚持在 1941 年秋夺取直布罗陀——在此期间已经过时。

基于这种认识以及约德尔从与希特勒每日谈话中，所摘引出来的方针，于 1941 年 8 月底，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里，产生了“经元首批准的国防军统帅部关于 1941 年晚夏战略态势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尽管“在被迫投入其他战线多余兵力”的情况下，俄国的崩溃也可能要延长，但“降服英国，迫其媾和”这一既定目标仍然不变。备忘录将这一原则作为战略里程脾，接着指出，即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陆军和空军也几乎无力于 1942 年春季前，在地中海、大西洋和西班牙本土，进行一场决定性的作战”鉴于此种态势，已无法再象过去考虑的那样，置中立国的意愿于不顾，让德军通过土耳其领土；同时，也要看到英国的话动日益频繁。据称，英国军队已驻进伊朗南部，并不断扩建苏伊士运河两岸的重要军事设施。如此种种征兆表明，英国的目标是，尽可能与美国一起，彻底改变德国在地中海的地位。即使不足如此，也由于海上运输损失的不断增加。以及夺取托布鲁克行动的被迫延迟使“轴心国”在北非的处境早已日益恶化。

对于地中海地区，“备忘录”还对一些尽管尚不充分的改进意见提出了

警告。而将被视为与大英帝国进行最后决战的前奏的击溃苏俄的行动，成了希特勒盲目推行的德军压倒一切的任务。

——第三阶段

“基辅会战”于 8 月底开始，它被德国大本营视为 1941 年东方战局的第二阶段的开始。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德军在俄国各个战场上又取得。一系列新的胜利，特别是冬季前攻占莫斯科的热望，在领导层内出现的短时的一致，使希特勒未再对作战进行重大干预。譬如，国防军统帅部在这个时期对东线下达的唯一指令——第 35 号指令在其前言中,使用了与陆军总司令的报告相一致的措辞。

尽管如此，陆军总司令部怕错过对莫斯科实施决定性突击的大好时机的担心，依然没有消除。在陆军总司令部——同样在大本营第 II 号宿营地里很少有人赞成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两个会战”之后便大功告成的说法而希特勒却宣布：“东方军事胜利己成定局，俄国已经完蛋”。实际上，中央集团军群在经历了“沼泽、地阶段”之后，到 11 月中旬，才在进攻莫斯科的道路上迈出了富有希望的几步，只有到这时，人们对态势的乐观判断才压倒了对部队所承担的巨大负荷的担忧。使人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在那些天，陆军总参谋部的第 1 军需官、当时的保卢斯中将来到国防处的临时办公棚，与国防处长和洛斯贝格上校探讨夺取莫斯科之后的方针。当时，他们所谈论的目标已远远超过了俄国的首都。他们谈到，只让最必要的部队留在“前线地带”过冬，陆军大部及其高级指挥机构应撤回，整个东线的指挥权由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接受。

由南方集团军群占领 8 天之久的罗斯托夫，在俄军的攻击下，被迫于 11 月 29 日撤离；该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随即被免职。这是在当时态势下，对人们情绪上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一份给希特勒的电报中，龙德施泰特要求，要么“撤消”关于部队再次在米努斯地段前方集结的命令，“要么，委派他人指挥该集团军群”。2 小时后，于深夜豪辛格打电话询问约德尔，是否撤消命令。约德尔回答：“绝对不能，元首的命令不容更改。龙德施泰特已被解职，赖歇瑙担任集团军司令。”豪辛格重复地喊道，“使不得！绝对使不得！”但约德尔已把电话放下了。

在“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代替陆军总参谋长和陆军作战处长的角色而担负的特殊任务，在 1941 年夏季的芬兰北部，主要是由两个德国军和一个芬兰军来完成。他们的指挥官，冯·法尔肯霍斯特大将，象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一样，逐步直接接受统帅部的指令。这样，法尔肯霍斯特比起陆军集团军司令们来，就具有更大的独立行动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没过多久，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即由于将陆军总司令部排斥在外，国防军统帅部对部队实施的战役和战术指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缺少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经验，国防军统帅部便试图在对北芬兰指挥官所下达的指令中，增补一些具体的实施规定，但它无法替代陆军总司令部这个中间环节①在东方战局期间，国防军统帅部第 1 号战场早就移到了挪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变动。在希特勒的眼睛里，登陆始终在威胁着挪威。因此，他一直在想方设法给这一地区以加强。为此，占用了大量的指挥力量，牵制了相当的兵力。

希特勒对这一特别指挥机构的明显弊病既不加理会，也对来自各方的异议视而不见，却从 1941 年初夏起，利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充当他除东线战

场之外的全部德国战场上，与当地指挥官进行直接联系的指挥机构。在巴尔干、爱琴海的克里特岛邻近的广大地区，直至达尔马提亚，“国防军东南方司令”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接收希特勒关于镇压不久后到处爆发的暴动，以及后来对陆地和海岛沿岸实施防御的命令；而“东南方司令”则将其镇压暴动的具体计划呈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批准，正因为这样国防处长与保加利亚保持着一种特别密切的联系。尽管保加利亚仅有少量几个守备师积极参加了马其顿和色雷斯岛的战争，但在索非亚却始终感觉潜伏在欧洲战争舞台边缘的危险。因此，一再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请求支持和援助。德国大本营还与阿格拉姆保持着频繁的联系。驻在那里的“德国全权将军”、奥地利人格莱泽·冯·堆尔斯特瑙，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这个秩序混乱、支离破碎的国家恢复安定；并在军书上为德国服务。但是，与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却没有取得联系，而这些地方又是东方战局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与这些地方取得联系成了陆军总司令部的主要事情。

自 1941 年秋季起，地中海地区也成了统帅部战场。在这里，意大利人名义上掌握着最高指挥权。在北非，隆美尔的崇高威望占据主导地位，加上与国内联系的困难，使希特勒一直在寻求对北非施加影响。为此，希特勒并没能命令将陆军总司令部对北非的指挥权力交给统帅部，而是直接交给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正如 8 月底的“备忘录”所阐述的那样，在地中海地域，“轴心国”的危险处境早已显露出来。由于将陆军和空军全部力量都集中用来对付俄国，海军也不想从北大西洋主要航道抽出一艘潜艇。希特勒在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取得一致的情况下，终于在每天关于重型舰艇和登陆部队遭严重损失的报告的影响下，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辅助措施。直到 9 月 13 日，希特勒才最后下定决心，命令海军总部，”以最快速度“在地中海部署 6 艘潜艇，并紧接着再增派 15 艘。同时，命令空军第 10 军将保卫德国通往北非的运输线作为其新的主要任务，以取代迄今为止的“攻击敌舰……和英国在埃及的供给”的任务。而戈林却将希特勒下达给空军的关于保卫“由意大利向的黎波里的重要运输线“的任命擅自纳入意大利的护航任务。

此外，他还补充说，空军第 10 军向西西里岛转移，目的是由此攻击英国的海军和空军重要基地马耳他岛这是“不成问题”的。直到人们从认为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的胜利就是俄垮台的误解中醒悟过来，而且地中海的海上交通几乎完全断行时，国防处才紧迫地越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凯特尔直接联系，终于通过他促使希特勒于 1941 年 10 月底发布预先命令，12 月初下达最终命令，命令凯塞林的航空队司令部和一个强大的航空军（第 2 军）飞往地中海。但是，希特勒对于在攻占莫斯科的进攻前，从东方抽走强大的空军力量犹豫不决。

与地中海和北非不同，希特勒在西方处于主动地位。1941 年 10 月 20 日，他以统帅部的名义，下达了一项关于“在英属海峡群岛进行扩建和实施防御”的命令。命令一开头便提出，、如同过去一样，英国对我们西部占领区……采取大规模行动的可能性不大”；接着指出，但“迫于东方态势的压力，以及出于政治和宣传原因，英国随时有可能采取个别行动，特别是要考虑到英国人为对付我们的护航而重新占领重要的海峡群岛的企图”。

随着这一命令的发布，希特勒没有在命令中加以特别说明。就将对西部占领区的领导权，从陆军总司令转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手中。在加强海峡群

岛防御方面，命令中连海岸炮兵连的数量和编制，以及防坦克混凝土工事及其厚度——甚至多少毫米都作了详细规定，并要求每月报告一次海峡群岛工事扩建进展情况。后来有了最小比例尺的地图，这样希特勒对海峡群岛的扩建情况就亲自审查。后来在大西洋壁垒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一天，根据他的指示，处罚了一名值班军官，因为他标绘在海峡群岛的一个高炮连的数量有出入。

正当这一任务的繁杂工作——即使加强了国防处的“陆军组”——使指挥参谋部处于焦头烂额之时，又接受了另一项任务：根据希特勒个人的决定，于1941年12月即东方战局转折前，拟制一份命令。据此命令将在国防军“所控制的北冰洋、北海和大西洋沿海地区，构筑一个新的‘西壁工事，”。该工事的战略目的是，“以尽量少的固定的野战部队，可靠地抵御敌人任何形式的，仍至以强大兵力实施的登陆行动”。工事构筑的依次顺序，首先是挪威，其次是比利时——法国海岸。对于后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在与三军总司令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斯海尔德河和塞纳河河口，布雷斯特南部，以及从基伯龙湾到吉伦特河为第一段，“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突出部”为第二段，第三段是与德国海湾毗连的荷兰海岸和丹麦“西海岸及北海岸”。而波罗的海沿岸的防御工事只要能保证封锁大、小两个海峡通道即可。

希特勒后来提出的“欧洲要塞”，从这里已经可以看见其雏形。当时建造第一批工事的计划，是建筑在短时间内消灭苏俄的设想之上，比如对波罗的海的处理就能说明这一点。但一种似乎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构筑海岸工事，是为了给将来德国空军和潜艇进攻英国，打下一个可靠的基础。然而，由于人们对战争的下一步和出路认识的巨大转变，在西方海岸构筑的工事，在后来的日子里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和更为深远作用。用后来的眼光看，这项命令是在德国战争被迫转入战略防御——从总体上看，不管是否意识到——的初期阶段产生的。

注释

①参阅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6月14日的日记和1941年6月9日“元首副官”的命令。

下面是这次“与会者名单”

Ⅰ.上午和下午：1、陆军：冯·布劳希奇元帅

哈尔德大将

保卢斯中将（第一军需部长）

豪辛格上校（作战处长）

冯·居尔登费尔德中校（陆军总司令副官）

2、海军：瓦格纳海军上校（作战处长）

3、空军：戈休帝国元帅

米尔希元帅

耶顺内克空军上将（空军总参谋长）

博登沙茨中将（部长办公厅主任，联络官）

冯·瓦尔道少将（作战处长）

4、国防军统帅部：凯特尔元帅

约德尔炮兵上将

瓦利蒙特少将

克里斯蒂安少校（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副官）

5、国防军副官：施蒙特总参谋部上校
冯·普特长默尔海军上校
恩格尔少校（陆军）
冯·贝洛少校（空军）
II上午
1、白狐（芬兰北部作战行动代号）
陆军：冯·法尔肯霍斯特大将，挪威集团军司令
空军：施通普夫大将，第5航空队司令
2、南、集团军群陆军冯·尼德施泰特元帅，南方集团军群司令
冯·赖歇瑙元帅，第6集团军司令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步兵上将，第17集团军司令
冯·朔贝特大将，第11集团军司令
冯·克莱斯特大将，第1装甲集群司令
空军：勒尔大将，第4航空队司令
III除全体与会者外、共进午餐的还有：
陆军：费罗姆大将（预备军司令）
空军：乌德特大将（技术局局长）
IV下午
1、海军总司令部：
雷德尔海军元帅
弗里克海军中将（海军总部参谋长）
舒尔特一默廷海军上校（海军总司令副官）
2、波罗的海：卡尔斯海军大将，北部集群司令
施蒙特海军中将，波罗的海司令
3、北方集团军群：陆军：黑特尔，冯·勒布元帅，北方集团军群司令
布施大将，第16集团军司令
冯·屈希勒尔大将，第18集团军司令
赫普纳大将，第4装甲集群司令
空军：克勒尔大将，第1航空队司令
4、中央集团军群：陆军：冯·博克元帅，中央集团军群司令
冯·克卢格元帅，第4集团军司令
施特劳斯大将，第9集团军司令
古德里安大将，第2装甲集群司令
霍特大将，第3装甲集群司令
空军：凯塞林元帅，第2航空队司令
②例如：
a）哈尔德在1941年的日记中写道
4月7日：“清晨有人报告……俄国的编制使我们有理由表示担心。如果被俄国想和平、不想发动战争这样的陈词滥调解除思想武装。那么你就必须承认，俄国军队的编制极有可能迅速过渡为战时编制，对此我们感到极为不适。”
4月26日：“从总体上讲，自4月1日以来未发生变化。但自此，俄国在西部增加了10个师。这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约170个师）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种战时体制……列车为补充物资不停地运转……似乎是在补充兵

员”……

5月5日：“克雷布斯上校从莫斯科返回。他报告说：

俄国将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爆发……

远程轰炸机似乎已在德国边界集结。

运载构筑阵地付料的车队正来往于边界地区。未看到……部队集结。”

6月22日：“进攻第一天的总态势如下：

敌人材德国的进攻感到异常突然，从战术上看，它的部队编制不是处于防御状态的。边境地区的守军住所十分分散。边境哨所的兵力一般都很弱。”

b）1941年6月22日红军展开情况如下（这个文件发表在《国防科学评比》杂志1961年第6期上）：

北方方面军司令：波波夫中将

参谋长：尼基谢夫少将

第14集团军（司令：弗罗洛夫中将）

第7集团军（司令：戈列连科中将）

第23集团军（司令：普申尼科夫中将）

西北方面军司令：Ф·И·库兹涅佐夫上将

参谋长：克伦诺夫少将

第8集团军（司令：索别尼科夫少将）

第11集团军（司令：莫罗佐夫中将）

第27集团军（司令：别尔扎林少将）

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

第3集团军（司令：B·H·库兹涅佐夫中将）第10集团军（司令：戈卢别夫少将）

第4集团军（司令：科罗勃科夫少将）

第3集团军下辖：

第6骑兵军（军长：尼基京少将）

第11摩托化军（军长：莫斯托文科少将）

第13摩托化军（军长：阿什柳斯廷少将）

第10集团军下辖：

笔6摩托化军（军长：恰兹凯莱维奇少将）

第4集团军下辖：

第14摩托化军（军长：奥鲍林少将）

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

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

第5集团军（司令：波塔波夫少将）

第6集团军（司令：穆布琴科中将）

第26集团军（司令：科斯坚科中将）

第12集团军（司令：波涅杰林少将）

第5摩托化国（军长：阿莱克泽英科夫少将）

第5集团军下辖：

第9摩托化军（军长：罗科索夫斯基少将）

第6集团军下辖：

第4摩托化军（军长：弗拉索夫中将）

南方方面军（1941年6月24日组建）

司令：秋列涅夫大将
第 9 集团军（司令：切列维琴科中将）
第 2 骑兵军
第 2 摩托化军

第四部突变时期
（1941 年 12 月——1942 年 11 月）

第一章概况

1941 年 12 月上旬，苏俄红军在罗斯托夫取得胜利后，一夜之间在其他战线也取得了主动权，东方形势急转直下，德国人本营陷入从未有过的震惊之中。甚至在同一时期，隆美尔将军从北非向 1941 年 3 月的出发阵地后撤一事，都很少引起大本营的注意。然而，希特勒对东方发生的威胁性灾难却视而不见，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才于 12 月 11 日对美宣战。

这样，希特勒又一次未与国防军进行任何协商，个人独断专行，开始了两线作战。如果按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数个月内，将俄国的“军事力量”摧垮再集中国防军的兵力解决西——那么现在只能是首先解决在战争潜力上占压倒优势的东方敌人，克服目前东线的严重危机。而重要和迫切的任务是要使战争计划完全适应新的形势。然而，希特勒依然习惯于“即兴发作”，仓促定下决心，致使德国第 6 集团军于 1942 年 11 月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在同一时间，隆美尔军在北非失利。

这一年，希特勒不仅在战略战役指挥领域已经明目张胆地独揽大权，而且战争形势骤然恶化的迹象越是明显可靠，希特勒越是在内部将注意力集中在从形式和人员上，进一步削弱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使其完全顺从他一个人，经希特勒这一摧残，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变得支离破碎，所剩无儿，希特勒却将其集中在自己手中，为其无止境的权欲服务，德国国防军指挥上的混乱不堪也在所难免。

第二章冬季危机
（1941 年——1942 年）

突然转折

正当国防军最高司令于 1941 年 12 月 2 日匆匆飞往南方集团军群，追究从罗斯托夫撤退下来的第 1 装甲集团军的责任时，各种闻所未闻的情报和报告象雪片似地飞到陆军总司令部：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已精疲力竭；担任进攻莫斯科任务的中央集团军群，现已无力在全线采取统一行动；零下 30°—35℃的气温，已使部队和武器处于瘫痪状态；“遭重挫的危险”已近在眼前，其后果难以预料；甚至古德里安装甲集团军的精锐师都对希特勒存有“信任危机”，而博克元帅也同时与“集团军将领之间关系紧张”，要求陆军总司令从中调解。

陆军总司令部通过电话从各集团军群司令和他们的总参谋长得到的这些情报。并不是一字不漏地转给了大本营。但是可以肯定，冯·布劳希奇元帅及其总参谋长会不加掩饰地将形势的真实情况报告给希特勒。然而，对于 12 月 6 日的“元首报告”，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却典型地说：“他（希特勒）没有从数量上权衡力量的对比”，还坚持从“敌人的俘虏数字上证实自己的优势”。在哈尔德同一天的日记里还表明，希特勒拒绝考虑形势的发展，只承认部队需要“重振精神”，继续执行他的既定方针，即在俄国南部占领顿涅茨盆地，准备夺取迈科普油田；在俄国北部与芬兰取得联系。第二天、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夫所望地在他的日记里开诚布公地写道：

> “又是令人沮丧和羞耻的一天。陆军总司令几乎不再是信息传递者。元首越过他，直接与集团军群司令联系。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最高领导不了解自己部队的状况，象一个修鞋匠修修补补，只能靠下决断过日子。”

直到 1941 年 12 月 8 日，希特勒的大本营才对当前的形势变化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国防军统帅部第 39 号指令指出，”立即停止一切较大的进攻作战行动，并转入防御“，因为“冬天突然过早降临……给供应造成困难”。指令还确队了前不久敌人造成的威胁。希特勒还命令陆军总司令部，根据自己的处境建立一条“节省兵力”的防线。但希特勒又以附加条件对陆军的这种行动自由加以限制：对敌人作战或军事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必须加以固守；其他战线不是为敌所迫而后撤时，只能在后方阵地状况允许时才可实施。必须保持为 1942 年恢复大规模进攻作战的先决

条件。未完成的进攻企图，在指令中仅被列为“特殊任务”，但却强调了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任务。为补充部队的损失，陆军指示，应对后方勤务机构进行清理；若想进一步增强兵力，只能从西方占领区抽调部队。再没有其他后备军了①。如果从战略角度将这一新指令，看成是 1940 年 7 月希特勒战争计划的破产，那么可以断定，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及其同僚们，在所谓最终战胜苏俄的呼声渐渐偃旗息鼓的余音里，已竭尽全力完成了这一指令。同日，陆军总司令部也在一份作战命令中，毫无异议地将指令精神下达，甚至在命令的序言里指出，战局开始时所规定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时隔不久，希特勒又以“狂热”的意志坚持既得的战果，禁止部队后撤一步，否定了自己刚刚宣布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个指令无论从眼下看还是从长远看，都未给部队以任何帮助。由于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前前后后所犯的错误，以及所进行的冒险——不仅是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使早已负担过重的进攻部队

离消耗殆尽已为时不远。

日美参战

德国统帅部对东线战争的转折漠然处之，也许是因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日本对美开战所取的战果上。德国整个大本营乃至第II号宿营地的人们，都沉浸在欣喜狂欢之中。然而，他们只是看到了事情本身。那些在此刻看得更远的人，却无动于衷，显得更加沉默。当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其中包括凯特尔将军和约德尔将军，突然离开战地大本营回到柏林时，人们还不知道此行的目的。直到12月11日中午，即希特勒在国会上对美宣战时，作者才从电话中得知此事。

约德尔从柏林打电话给瓦利蒙特。当时。瓦利蒙特正同参谋部的几位军官用餐。约德尔在电话里向瓦利蒙特转告了最新的变化：“您听说没有，刚才元首已宣布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瓦利蒙特：“听说了，不过太使我们感到意外了。”

约德尔：“现在参谋部的任务是，需要研究一下，美国将首先向哪个方向派出其主力部队，是远东还是欧洲然后再做出下一步决定。”

瓦利蒙特：“是的，我也认为此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考虑过对美国作战，因此我们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改，完成这项任务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约德尔：“您看看您能做些什么。明天我就返回，再进一步商谈吧。”

就这样，大本营开始了对美国的战争，直到1945年5月在易北河畔结束。

在上文曾提及的1941年3月5日的“与日本合作的指令”中，称”共同的作战目标”是“迅速使英国就范，从而避免使美国参战”，接着，海军总司令按照同一指令，负责“协调”双方的海战计划。希特勒向海军总司令强调指出，即使美国实施罗斯福的“射击命令”，也必须避免给美国以任何参战的借口①。尽管如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以第二个陆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对这一问题及时地进行了研究。也许约德尔收集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希特勒的决心，即认为，美国至少不会参加欧洲的战争。

在当时的情况下，希特勒对美宣战只不过是一种姿态。在希特勒在对美宣战的当天，责令其外交部长签署的“德、意、日……关于共同作战的协定”也同样是一纸空文。1942年1月3日，希特勒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将军所阐述的思想，也只不过是出之于一种战略愿望。但他还是想从这样一个事实中——……两个如此强大的军事强国——日本和德国——相距遥远，却并肩作战……这在历史上大概还属首次”——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状况，就有可能通过作战行动上的周密协调在作战中产生一种杠杆作用，这势必对敌人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就会迫使敌人不停地调整重点；分散其兵力。他不相信美国还有勇气在东亚地区发动进攻。”里宾特洛甫则认为。要说在目前形势下东方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日本可能在这种形势下于5月份进攻俄国”。大岛浩也认为，当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后，“必定会有一天进攻俄国”。然而，希特勒对此并不感兴趣，他认为“对德国最重要的是，日本不要输给大英帝国……英国也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肯定不会输给俄国人。”

不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人们，便同意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观点——尽管没有可靠的证据，确信美国人会将重点首先放在击败德国上。并认为，

美国重兵出现在欧洲和非洲的时间还尚未到来。此外，他们还认为，日本的高度战备状态，首先对“轴心国”有利，特别是它能将俄国强大兵力牵制于远东，尽管日本人同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42 年 1 月 18 日，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与意大利和日本同级的参谋长全权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意、日军事协定”，这是继 1941 年 12 月政治协定后的又一个协定。文件是在外交部领导下，由三国条约的军事委员会拟制的。由于“轴心国”的这一组织。无从了解德国的作战企图，因此“协定”实际上只限于划分海上贸易战的分界线，以及诸如通信、供应、技术和装备问题等般军事合作。现在人们谈论的主要对手是英国和美国，却忽略了俄国。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既没有参与该文件的拟制，也没有看过一眼。因此。德、日之间的军事关系只局限于日本军官偶尔来德国大本营访问。在这里，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大使大岛浩将军，凯特尔和约德尔与大使的随从进行了磋商，本来，大本营第 II 号宿营地是大本营的军事工作场所，但却没有一个日本军官光顾。

15 个月以后，即 1943 年 4 月，希特勒对日本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 1943 年 4 月 5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作了如下一番谈话。

> “约德尔：日本人确信，1943 年，重点将在欧洲战场上。
>
> 希特勒：不要这样高兴。
>
> 约德尔：（日本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撤退已经成功。
>
> 希特勒：对日本人说的话，不要当真，我就一句都不信。
>
> 约德尔：是不能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是一批心是口非的人。
>
> 希特勒：他们肆意撒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必须有所提防……
>
> 最近，日本人到底干了多少事！日本才拿出 30 几个步兵师？真是可笑。日本比德国人口多……他们可以拿出 120 个师。而他们实际有多少兵力，人们还不知道现在我唯一不能判断的问题是日本的坦克，他们到底有没有现代化坦克？
>
> 一个副官：据说，他们的坦克和飞机都不多。
>
> 希特勒：他们也从来没有提过军舰，可是突然间到处都是他们的重型军舰。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航空母舰，可是，人们一下子看到，大部分航空母舰都是他们的……
>
> 他们一句话都没说，我也一句话都不说……
>
> 如果他们真有什么打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他们提出想在南方行动，我倒想他们不如在北方有所行动。”

这次谈话中，只字未提日本人在共同作战中的某些功绩，例如减轻了地中海战场的负担，迫使英国舰队和空军的强大兵力向近东撤退，从而使隆美尔能够依靠己方潜艇和空军力量，于 1942 年 1 月末，在短时间内，再次把英国人赶到托布鲁克以东地带。再比如，突破敌人封锁的德国船只在日本港口装载原料，特别是橡胶，以及在航运上日本所给予的帮助，对于德国继续欧洲战争起着举足轻重、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尽管通过外交途径作了很大努力，但在对苏作战中，始终未能得到日本的任何支持①俄国人终于在 1945 年战争的最后阶段，集中兵力向满洲的日本人发动进攻，使日本得到应有的报复。

国防军领事机构的组织和人事变动

当希特勒从柏林回到战地大本营时，东方战线已岌岌可危。对此，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 1941 年 12 月 15 日傍晚的日记里写进：“对目前形势与陆军总司令进行了一次极其严肃的讨论。他很沮丧，看来已无力挽救陆军脱离困境。”也许这一判断受了冯·布劳希奇元帅的健康状况的影响，10 天前他就决定辞职。结果，引起一系列人事的和组织的变动。其中，最重要的变动就是希特勒于 12 月 19 日接收了陆军的指挥权——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直到他的覆灭。

冯·布分希奇元帅，担任陆军总司令几乎长达 4 年时间。就在 12 月 19 日这一天，希特勒没有给他以最后的嘉奖，也没有给他任何荣誉。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解职方式的动机，在戈培尔 1942 年 3 月 20 日的日记里，有极为直率的描述：

> “12 月威胁性灾难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布劳希奇。元首对他只能表示蔑视。他虚荣，懦弱，根本不能掌握局势，更谈不上左右形势。元首制定的精明简洁的整体作战计划，完全被他长期的干扰和执拗所出卖和葬送了。元首制定的计划本来可以肯定指引我们取得胜利。如果要求布劳希奇在东方作的和本应作的。他都作到了，那么今天东方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元首根本没有进攻莫斯科的企图。他想切断高加索、从而击中俄国肌体的要害处。布劳希奇和他的总参谋部本应更理解这一点，但却一味地想进攻莫斯科。他想以名声上的胜利来取代实实在在的胜利。元首形容他是一个懦夫和废物。他也曾试图断送西方战局计划，多亏元首及时进行了干预。”

戈培尔很早就对布劳希奇的辞职而在“人民中产生的猜疑”和士气低沉不安。上面的这段描述正是他所追求的宣传目的。此事，加上由于冬装未及时运到前线而加在陆军总司令头上的不实之词，使陆军及其领导们在德国人民中享有的传统的崇高威望受到沉重一击。此外，他们这种歪曲事实的作法也许是为了防止一种认识的进一步扩散，即尽管取得了一些暂时胜利，但“将军”们年复一年不断对希特勒的冒险战争政策提出的警告，将最终证明是正确的。①

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决定亲自接管陆军领导权之时，曾谈论过其他继承人的问题，但只不过是作作样子而已，据后来哈尔德大将的回忆，当时希特勒对此曾讲过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话：“作战指挥这种区区小事，谁都能干。陆军总司令的任务就是用民族社会主义教育军队。我还没有看见一个能按照我的意愿去完成这一任务的陆军将领。因此，我决定自己接管陆军指挥权。”

这件事与 1938 年 2 月 4 日①希特勒独揽国防军指挥大权如出一辙，是不容忽视的。他再次以摧毁其他势力而自己来弥补空缺的办法，加强了他自己的势力，后来，他对陆军的各级指挥，直到营连指挥，他都亲自过问。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满以为任何事他都能干得很好。他的亲信也肯定象当初一样，为他喝彩。1943 年 11 月古德里安向约德尔提出让希特勒交出军队最高指挥权的动议时，遭到约德尔“斩钉截铁的拒绝”：“您能找到一个比阿道夫·希特勒更好的最高司令吗？然而首先应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比较：随着 1938 年初希特勒接收国防军最高指挥权，整个国防军变得群龙无首；对政治

当局来说，最高军事领导也自此失去了统一代表地位。现在陆军也正在重蹈覆辙，从头到脚被废弃。后来，豪辛格将军以其亲身经历和经验，描述了 1941 年 12 月底出现的状态。他写道：

> “希特勒……似乎……仅抓住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指挥，一个是人事。这样，他就把最重要的东西握在手里了。当时，各兵种内的训练、组织、预备队、军事管理、监查和教育都无人负责。凯特尔应当承担这些艰巨任务的大部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希特勒的代理人……他几乎不知道，他到底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还是陆军代理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只能管理剩余部分。这一区分最终使指挥四分五裂……国防军领率机构日渐混乱。”

希特勒不满足于数月来的分而治之的工作方法，现在又着手限制陆军总参谋部在东线的指挥权。除了在挪威和北芬兰之外，他这是又一次偏离军事常规，在没有任何明确的命令下，任起陆军总司令。这不仅意味着陆军的瓦解，以及象征性地表示，除了他没有谁还能统领强大的陆军和后备军，并能从一个战场向另一个战场调迁部队；而且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它本职的、对整个战争实施指挥的任务离得更远了。正象豪辛格后来评述的那样：“总参谋部由指导性质的指挥机关，降到了军种参谋部地位上”。这是十分正确的。

另一个比较现实的缓解当前极度紧张状态的解决方法，即将现在都直接依附于希特勒的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合并在这个时刻也尚未考虑成熟。当时，约德尔曾向作者暗示，希特勒曾打算让他——约德尔——取代哈尔德，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是他充分地估计了自己，推辞了这一任命。希特勒将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合并并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的意图遭到了反对。自从他接管陆军最高指挥权以后，他更少考虑将陆军总参谋部原来的、但并未废弃的计划作为国防军总参谋部的核心。而在一些重大指挥问题上，却偏重考虑海军和空军，豪辛格对很多人说过，当时的条件“比任何时候都有利”。但希特勒根本不想统一，只希望多头体制，尽管统一后仍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他自食其言，不再称赞陆军总参谋部在专业上极高的工作效率。在他撤换陆军总司令时，竟恶意中伤地说：“陆军的工作过于呆板。看看空军，在帝国元帅的训练下，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1942 年 1 月 1 日，一项与上述事情无关的新的改组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生效。这项改组虽然没有丝毫改变它的地位和工作方法，只是鉴于出现了一个新名称倒值得一提。“国防处”被取消了，国防处长被称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原隶属他的是三位负责作战的工作组组长，现改称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空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和“海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他们所负责的勤务单位也同时提升为“处”。

由于这一变动，一方面瓦利蒙特的工作负担减轻了，另一方面，他的同事们，即几乎全部的总参谋部的上校都随着他们的职位的提高而得到了晋升。但是，改革也带来了弊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见附图二）内最重要的部门“国防处”，从此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称呼是“小指挥参谋部”或“约德尔的工作班子”。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无法比拟的重大弊端是，战后外国人总认为。瓦利蒙特要比其他处长们承担更大的责任。

当希特勒从约德尔那里得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这一变动时，他所感兴趣的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冯·洛斯贝格上校，他

要求由另一名军官取代洛斯贝格。希特勒这一出人意料的要求事出有因——他对洛斯贝格在挪威战局期间对自己所表现出的可卑的软弱动摇提出的批评，耿耿于怀。他对这位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的其他功绩，包括在他的“军事工作班子”里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后来在德军艰难之际所作出的贡献，都视而不见。洛斯贝格的上司们也没有一个出来为他的留职说情。1942 年 1 月中旬终于由一位一直在挪威集团军司令部任职的第一总参谋部上校，特罗伊施·冯·布特拉尔——布兰登弗尔斯男爵接替了洛斯贝格的职务。在长达 3 年之久的合作中，布兰登弗尔斯也称得上一名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和同志。

希特勒的形势讨论会

自希特勒接管陆军最高指挥权以来，特别是由于严重危机压力，在大本营举行的每日形势讨论会也有了重大变动。哈尔德在 12 月 19 日的日记里写道：“新的工作方法是：每天听取运输处长、情报处长、军需总监的报告”，此外还有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报告。此时，陆军总参谋部哈尔德大将开始排除一切，特别是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尽一切可能维护和利用与希特勒的直接工作关系。

起初，希特勒及其亲信都自觉和不自觉地照例行程序办事。

象往常一样陆军总参谋部每日清晨，将其书面态势报告送到第 II 号宿营地，第 II 号宿营地也同样将此报告连同其他战场战报汇总报给约德尔，作为他向希特勒汇报态势的依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也只是依靠一张 1：100 万比例尺的地图，对东线的态势作概略的描述。此后，象每天傍晚或夜里，大本营自己还举行讨论会一样，还对东线战场的陆军指挥问题进行评论性的深入讨论。在这个中午举行的形势讨论会结束以后，紧接着，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及其随从携带 1：30 万比例尺的大型东线态势图，特别情况也携带小比例尺的地图，汇报东线态势。象过去一样，尽管哈尔德对前线态势深入了解，但在希特勒早已定下的预案面前，他所肩负的任务也极难完成①。

除此之外，陆军总参谋长每次到大本营汇报，都不得不象一个到陌生地方的来访者，哈尔德在汇报中，以其学识和判断，言辞和举止，圆满地体现出了总参谋部的传统，在希特勒眼里成了护民官。哈尔德身边的少数随员住在附近，准备随时回答军事领域里出现的问题。而希特勒身边的军事侍从却总从前呼后拥，新近还增添了党卫队的代表。由于他们常年累月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抛弃了自己的“军事观点”。譬如，凯特尔，他通常是等着希特勒谈话的间隙，急忙以毫无异议的话和手势随声附和，约德尔——两手总是插在裤袋里，遇有争论的问题，总是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尽管他有时也同意哈尔德的观点。另外还有一些“支持者”，根据不同的集会方式，利用评论和呼喊，对希特勒的讲话表示狂热的支持。

然而，使哈尔德的精神不堪忍受的——还不至他一个人——是希特勒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讲话，不管旧内容，还是新内容，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事情，总是不停地重复，象一股轰鸣的潮水，将具体现实的问题和建议统统淹没。他还经常在电话里，与前线陆军高级指挥官进行冗长的谈话。部长们、国务秘书们或其他非军事专家们——其中大部分是交通部门的——也应召从柏林赶来接受希特勒的询问、教训和恐吓。希特勒大概认为这是显示他实施绝对统一领导的一种方式。每大的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耗去了。使参加讨论会的人消磨了大量的工作时间。

协助希特勒指挥陆军，对哈尔德来说，无疑是最沉重的负担。早在南方集团军群在罗斯托夫的日子里。即自 12 月中旬起，他就为东线整个战场提出了第一个和唯一的原则，即进攻在哪里停滞的，就在哪里防守，不得后退一步，甚至还提出这样尖锐的口号：“每个人都必须就地防御”。

在当时的形势下，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普遍的或作战方针的必要性，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无可非议的——特别是布劳希奇将当时德军的态势描述得已无可救药。此外，用希特勒的名字振奋当时大多数士兵的士气，也是有道理

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过激的原则也是造成德军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的根源所在。尽管当时几乎每天都对陆军的这种呆板的指挥程序不断提出强硬的异议，但是陆军总参谋长——用哈尔德自己的话说，逐渐沦为希特勒“东线战场指挥办公室主任”。这样，他也被迫走上了约德尔曾以他的“工作班子”自愿成为陆军的合作者时所开辟的道路。希特勒在那个时期的形势讨论会上不止一次地说过：“将军们象小兵那样听话……我是领导者，所有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只有我一个人是负责者，而不是其他人！我将彻底铲除其他任何见解”。

在上述状况不断发展过程中，希特勒又采取了一项针对陆军总参谋部的人事变动。12 月 18 日，中央集团军司令冯·博克元帅·”因病”退职，由冯·克卢格元帅接替。几天后，即 12 月 22 日，当古德里安当面向希特勒说明呆板的指挥所带来的后果时，被希特勒永远撤消其司令职务。弗尔斯特将军也被希特勒毫不犹豫地解除了军长职务；第 4 装甲集团军司令赫阵纳达大将因“拒不听命和怯懦”被逐出国防军。1942 年 1 月 15 日，哈尔德有段

简短的记载：“冯·赖歇瑙患中风。”①

象勒布和占德里安一样，陆军其他将军均再不象以前那样、接受布劳希奇有规律的视察。而是要经常地飞往遥远的东普鲁士大本营，整天整天地与希特勒争论呆板僵滞的防御原则。然而，他们的设想都一一被驳回，从 1942 年 1 月底起，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始使防线得以巩固。这一发展似乎完全证实了希特勒提出的原则，希特勒也从中得出了致命的结论，使他的防御原则，在后来的战争进程里，成了防御作战中唯一有效的准则。戈培尔在后来的宣传中说：“在过去的冬季里，是元首拯救了前线。”①

自 1941 年 12 月底以后，作者也开始有规律地参加希特勒的中午形势讨论会，约德尔让瓦利蒙特出席会议的目的是，使涉及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问题和决定得到即时贯彻执行，从而减轻他自己的负担。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瓦利蒙特也效仿约德尔的作法让海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汇报海上情况，从而，将一大部分汇报任务推给了他。每当希特勒对瓦利蒙特的报告提出反问或要求时，希特勒总是询问约德尔，也只是提到约德尔的名字，这不仅使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同时也使在座的与会者们为之愕然。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来说，这一新的调整，使他上午的时间异常繁忙。早晨，首先要完成书面报告，紧接着是处理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随之在 11 点钟，他要与自己最亲近的人举行形势讨论会，并作出各种安排。之后，瓦利蒙特驱车驶往战地大本营第Ⅰ号宿营地，利用极短的时间向约德尔报告最新情况。在参加了在希特勒那里举行的通常是民达 3 个小时——有时更长——的形势讨论会之后，瓦刊蒙特便匆忙赶回自己的宿营地，以简沽的书面形式，向他的最亲密同事下达最紧急的指令，并于当天向外发电，或者形成命令草案和送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报告纪要。午餐往往很晚。只是午餐后瓦利蒙特才得以闲暇，经常由一二个参谋部的知心朋友陪同，在附近的森林里散散步。只有在这时，他才能从在希特勒身边的数小时的极度紧张中解脱出来。傍晚前后，参谋部的工作也是排得满满的。而在第Ⅰ号宿营地里，却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节奏。那里除了整日忙个不停的凯特尔元帅之外，完全是按照希特勒的习惯安排生活的——一直到快吃午饭才起床，工作却通宵达旦。

第三章新起点

战略基础

在以全力紧张地抵御苏俄反击中，德国大本营从未放弃最迟在冬未春初重新夺回东线战场主动权的信心和意志。这一思想的宣传者当然首先是希特勒自己。1942 年 1 月 3 日，他在与日本大使的谈话中就曾经说过：“ 一旦天气好转，我的目标仍是进攻高加索。这一突击方向是最重要的方向；必须搞到石油区，到达伊朗和伊拉克。一旦能在那里立足，就有希望给阿拉伯世界的自由运动以帮助。自然，我也将尽一切力量，摧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希特勒还向日本大使预言，北非和由南向中东展开钳形攻势的隆美尔军队的形势会马上好转。当东方危机接近尾声之时，希特勒于 3 月中旬，在柏林举行的“ 牺牲将士纪念日 ”上，以比前一段时间显得有力的声调宣布：“ 俄国人将在夏季彻底失败，无法挽救。因此，未来的夏季将是战争的决定阶段。布尔什维克将被逐出欧洲这块文明之地，永无立足之地。 ”

他这种狂热的思想，在形势讨论会上三番五次地进行表白。之所以说他是狂热，是因为希特勒当时对进一步作战的目标即没有慎重权衡，别人也没有向他提出，后来，豪辛格追溯当时的情况时写道：“ 哈尔德曾对是否一定要在东线转入进攻这一问题，经过长时间考虑，因为再次发动攻势是我们力不从心的。但是，他根本无法与希特勒谈论此事，那么应当怎么办呢？让俄国人缓过气来，听任美国对我们的威胁不断增加？那就会将主动权让给敌人，永远不能夺回。因此，我们必须排除一切踌躇疑虑，再一次大胆冒险。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从最后这儿句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陆军总参谋部如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样，仍以老的战略眼光，看待 1942 年的战争计划，认为，在另一个敌人尚未施展其全部力量之前，就应把当面敌人打垮。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在军事上的估计同构成希特勒战略的政治、世界观和经济思想的混成体是一致的，但在途径和目标上却与希特勒大相径庭。

在这种情况卜，如果人们静心地想恕，德国现在必须与世界上两大海上强国打交道，就必须重新估价它的意义。如果能以大量的潜艇配合以空军适当兵力，给它们海上运输线和从法国基地驶出的舰船以毁灭性打击，那么同盟国在欧洲和北非的登陆行动，至少要推迟一段相当长时间。这样，同盟国在大陆的空中优势也会受到有力的遏制。由于东线的苏俄红军对西方列强的海上供应依赖程度极大，所以德国不可能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大西洋的海、空战上来，以及扩大作战规模；它要想这样作，就至少需要争取同日本人在这一地区实施联合作战。

然而，这一切都未发生，大本营里依然如故。海军和空军总司令象过去一样。遇事总是越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径直去找希特勒。然而，雷德尔和戈林，终于迫于危机的压力。毫无异议地接受了 1942 年 1 月 10 日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组织处）和国防军统帅部经济装备局共同拟制的希特勒的命令，其中提出了国防军的装备方针。这个方针又再次使陆军受益，规定海、空军只保持现状。对于戈林的观点，戈培尔在 1942 年 3 月 31 日的日记里，以乏昧的套话写道：戈林认为，“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将这场战争胜利进行到底；至于何时胜利，还没有一个人知道 ”。“ 帝国元帅对此事的预测，也格外小心 ”关于海军的观点及其计划，在哈尔德于 1942 年 6 月 12 日与海军总司令进行了一次谈话之后，以满腔怒火在日记里写道：

“海军总部对战争形势的看法，离我们对事物的客观认识相差很远。他们对大陆充满幻想。他们根据迄今的经验同陆军打交道，他们在看陆军是否以及何时在旱路通过高加索向波斯湾突击，或者从昔兰尼加通过埃及，向苏伊士运河突击。他们谈论着通过意属非洲向非洲东海岸和南非的陆上攻势。大西洋问题将被他们以骄傲自大加以处理……而对黑海问题他们又漫不经心……空话连篇，毫无动作”。

这样看来，希特勒的意志保持无可争议，也就十分容易了。

东线的道路和目标

希特勒除了独断专行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外，自他掌管陆军指挥权之时起，又将作战行动的筹划全部垄断在自己手中。如果说在过去大型战局准备工作中，希特勒仅以提出方针和品头论足等方式加以干涉，那么现在他以比任何德国陆军都更为严格的条条框框和命令来加以约束，甚至每走一步都要由他决定。

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于 1942 年 2 月 12 日同时颁发了两个书面命令——起初只是为了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稍晚些时候，海军总司令部又发布了准备在黑海采取行动的命令。从这些命令可以看出，希特勒的这些作战计划的要点，身居高位的将领们当时是知道的。戈培尔在 3 月 20 日的日记里就这样评论道：“ 元首为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又制定了十分明确的作战计划。其目标是高加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将分阶段展开毁灭性的攻势 ”

3 月 28 日下午，在大本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商会。出于保密缘故，只有国防军、陆、空军总参谋部首脑及少数副官参加。会上，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详细介绍了夏季作战的企图。他的介绍也许表明，希特勒未受这一阶段挫折的影响，又回到了他 1940 年 12 月和 1941 年夏的基本想法上，即再次想在广阔前线的外翼进行一次决战。所不同的是，为陆军战斗力的下降和不满员所迫，打算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解决，首先在南部即高加索开始。莫斯科暂不作为进攻目标——这与戈培尔的日记有出入。

内部产生的矛盾，双方均未声张。尽管如此，陆军总参谋长的怏怏不快却始终未能消除。他过去就曾多次反对过分散进攻方向，他尤其反对的是纵深和宽度远远超过限度的作战行动。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就在会商会的第二天，国防军副官长来到哈尔德的安格堡军营，再一次激愤地抱怨他对“ 元首缺乏信任 ”’。施蒙特还说，陆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必须对希特勒的伟大坚信无疑，并坚定地追随他的思想。对此，哈尔德指出，不打算信任别人的人，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信任他。希特勒对陆军总参谋部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就是他手下的基层人员都已有所感觉。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也未能全部参加希特勒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几个星期后，他对他的“ 战史撰写官①百依百顺的施尔夫总参谋部上校说，“ 如果俄国人对斯摩棱斯史发动一次猛烈突击 ”，那么“ 兰色 ”②作战行动“ 对兵力薄弱的中央和北方集团军群来说将意味着一次巨大的冒险。然而，问题是俄国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胆量发动此次攻势。元首同意他的观点，即由于德国在南方的作战，俄国也会自动将兵力南调。 ”

约德尔不再提任何批评意见，满足于要求他的副参谋长和手下其他军官，将陆军 3 月 28 日报告中谈到的，并经希特勒批准的企图，综合在一项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之中。在目前情况下，指挥参谋部注意在起草指令时，仅提出“ 任务 ”，避免一切约束陆军总司令部的内容。然而，这一努力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希特勒没有放过验证陆军总司令作用的机会。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于 4 月 4 日提出“ 草案 ”时，希特勒声明，他要“ 亲自研究和修改指令 ”。第三天，他的“ 编史官 ”以毫不掩饰的傲慢写道：“ 元首已对第 41 号指令大删大改，增加了由他亲自撰写的重要内容……涉及主要作战行动的重要部分是由元首重新撰写的 ”这份注明 4 月 5 日的文件，重复冗长，

作战方针与众所周知的指挥原则鱼目混杂，在重大问题上含含糊糊，在次要问题上罗罗嗦嗦，语言用词晦涩蹩脚，即使是一个非军人都能从中觉察到，它与德国总参谋部数十年的传统文件风格已相距甚远。

根据这项指令，德国的欧洲盟友都要将“全部兵力……投入”。为此，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过去的几周里，受希特勒之命前往这几个盟国的首都访问。他一路顺风，马到成功。意大利和匈牙利答应各派出一支强大的集团军；罗马尼亚也允诺补充正在东线作战的部队，甚至还要另派两个集团军。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没有参与凯特尔的这次访问及其准备工作，但它与陆军商定，除行政管理问题外，其他问题均听任陆军总参谋部安排。希特勒未与各盟国国家和政府首脑通函，只是要求各盟国派出的部队由各国自己领导。此外，4 月 5 日的指令还以委婉的语言规定了各盟国军队所负责的地段。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是德国的盟友，但它们之间却是敌对的邻国，因此将意大利军队插在两国中间，将其隔开。另外，它们只担负防御任务，而且还由德国后备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给以加强。对于首次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协同，希特勒在当时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宣布了基本准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的盟友跟我们一块儿干下去。对于这一点，要在它们狂热的忠诚面前秘而不宣。”近两个月来，在东线在克里木作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战绩，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夺回了哈尔科夫地区，为“兰色—布伦瑞克作战行动”作好了最后准备。在此期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又回到了过去那种状况，除了收集每天报告之外，几乎没有接触过作战中的重大事件。只有约德尔象希特勒一样，不管是国防军的任务还是陆军的任务，都一手包揽。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他越来越疏远了他自己的参谋部，与大本营“第 I 号宿营地里的其他军官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工作班子。业务中，用餐时，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在他们中间，除施尔夫外，又增添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手下的陆军部主任”布勒将军，他老于世故，很快就越过凯特尔与希特勒建立了直接关系。

当时，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又建立了一座新的大本营，从而将大本营分成两部，即“主要参谋部”和“次要参谋部”。希特勒的副官们仅从大本营第 II 号宿营地里要走了莫姆上校。他的任务是分管大本营衣食住行，从将军到士兵他都能照顾得很好。①

“国防军统帅部战场”

在所谓的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重新调整指挥关系，以使战场的各条战线置于统一领导之下。如果说，这样一种体制已经与国防军指挥的自然组织形式相适应，那么到 1942 年，战争已扩展到全球范围，德国大本营只能通过提出作战方针加以指挥。由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人力的不足，只得尽可能派出许多全权代表到各前线司令部去，及时处理在权限和指挥系统上出现的混乱状态。在挪威，希特勒已经按照他 1940 年的方针进行了调整，认为已处于最佳状态，他已安排了领导层的人选。其中包括委任特波文为帝国全权代表。北芬兰已不是主要的陆上战场；而在北非由于隆美尔的威望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没有必要作进一步调整，接过意大利人的指挥权，反而会增加德方的负担。

但在其他战场和占领区，即从荷兰的北端到比利牛斯山，从东南欧和巴尔干国家的广阔地带到爱琴海，直至克里特岛，当时和后来都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指挥。地中海地区也是如此，尽管希特勒委任了凯塞林为“南线总司令”，但长期以来，他的权限也只不过局限在对第 2 航空队的指挥上。象这个以及其他响亮的称呼，比如“冲锋师”，根本没有在战斗中经受考验；所谓的“旅”，也不过是加强营罢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希特勒的事；而全权代表这个称呼希特勒却宁愿留给自己，——这种现象也与日俱增。此外，在西线，象过去在巴尔干任命“东南线国防军总司令”一样，也使用了“西线总司令”这样的职称——3 月初由被解职的龙德施泰持元帅担任，但却不具备过去象驻巴黎的 D 集团军群司令部和驻萨洛尼卡的 E 集团军群司令部那样能超越其所隶属部队的名符其实的指挥权，希特勒由于对雷德尔海军大将和戈林的畏惧，在他刚刚粉碎了陆军在各战场上的统一指挥后，决不想在某个战场上再出现其他军种的统一领导。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了解这一底细，因此拒绝他的参谋部提出的关于一个严格的指挥体系，在军事上的必要性的意见。从那时起，他还听任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各种任务落在他及其参谋部的肩上。为此，仅在 1942 年 5 月，他就不得不多次要求希特勒给以帮助。舍尔夫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 “元首命令，一切对国防军指挥所必要的材料和文献，都要按要求毫无保留地转交给他的军事工作班子——国防军统帅部。”

稍晚些时候，舍尔夫又写道：

> “三军总司令部受命，凡在战术上直接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指挥机构的兵力，只有经元首同意，方可作其他安排。”

这一直处于虚弱地位的指挥参谋部带来戏剧性的曙光。然而好景不长。当战争进行到后来阶段，在西线、南线和东南线，敌人向“欧洲堡垒”发动潮水般的攻势时，希特勒的翻新概念和含糊不清的隶属关系，又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落千丈。

象整个指挥体制一样，国防军统帅部于 1942 年 3 月 23 日下达的关于沿海指挥的第 40 号指令，是一个令人大失所望的调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拟制这个方针时，认为抵御敌人登陆行动时，必须确保统一指挥；然而仅数天后，海军总司令部却颁发了“附件”，突出了海军的地位，对第 40 号指令的

方针作了重大改动。海军总司令部我行我素，不顾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特别是西线和挪威战场司令的异议，由希特勒批准了它的安排。根据希特勒指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不得不在 1942 年 12 月 5 日签署一份补充命令，按照海军的要求，对沿海附近区域实行分割指挥：水上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准备工作，均听命于“沿海司令官”即海军军官，他们只接受海军有关机构的命令；陆上防御由陆军指挥官负责①对于沿海防御的其他薄弱环节，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个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不适宜的分割方针是德国混乱的指挥体制中的一个畸形代表。北非是唯一正在实施较大规模陆上作战的战场，当时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战场范围。然而自 1942 年初，德国大本营从未对这一战区的作战行动施加影响。隆美尔突然向东推进，使在东普鲁士的希特勒，以及罗马的墨索里尼感到异常震惊。后来，隆美乐看到，要实施他下一步的进攻计划，就不得不越过不与其合作的意大利指挥机构，求助于国内。当凯塞林完成对马耳他实施数月之久的轰炸任务之后，认为已“摧毁”了英国在马耳他的基地，切断了全部海上通路。到这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才于 4 月底，同他们的高参在贝希特斯加登会唔，确定 1942 年夏季继续在地中海地区作战的时间安排和目标。

同过去一样，德意双方的会晤缺少一个盟国联合参谋部的精心准备，整天只局限于磋商，他们各自隐瞒自己的意图，迟迟达不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参谋部只有约德尔可以参加的会晤，其结果如同其基础一样，不会有任何指望，特别是双方各怀鬼胎，使会谈更是雪上加霜：意大利人将夺取马耳他看得重于一切，然而又不想单方作战或在某一段时间使用；而德国方面又意见不一。隆美尔不了解马耳他所处状况，急于再次发动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他认为英国可能会抢先发动攻势；而凯塞林认为，能够，而且必须在空袭行动中奇袭马耳他；希特勒最终认为，他不相信在马耳他的登陆能取得成功，因此更倾向干攻击埃及。也许是一时间举棋不定，也许是为了迷惑别人，希特勒后来同意了一种妥协办法，即隆美尔集团军到达利比亚——埃及边界后最迟于 7 月中旬万不得已时到 8 月中旬，做好对马耳他实施登陆的准备。

然而，10 天后，即 5 月 10 日，当凯塞林报告空军已摧毁了岛上的军事设施后，仍不想进攻马耳他的希特勒。命令戈林将第 2 航空队的部分兵力调往东方，并声明说，如果西线和挪威一旦有风吹草动，还要继续从地中海抽调空军。希特勒在马耳他问题上对自己的决定这样的反复无常，致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与意大利达成协议后刚刚三周，便不得不急于向对方进行解释。而在此期间，德国已选派好配有相应武器装备的突击队在西西里岛集结。处于多次这种犹豫不决之中的希特勒，只是首先决定将担负此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即在伞兵作战中经受考验的施图登特航空兵上将召到东普鲁士大本营作口头汇报。施图登特在 5 月 21 日的汇报中，对此次行动的胜利深信不疑，而已，赢得了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的全力支持，尽管他们俩人知道戈林对此持反对态度。在罗马的德、意双方机构都急于向这一方向派遣海军，甚至罗马由双方代表参加的马耳他工作班子已着手工作。——这是战争期间双方第一次卓有成效的配合。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希特勒，当着施图登特的面，断然将违背他意愿的观点，及其全部计划和协议，一股脑儿抛在一边。对于一直保持沉默的约德尔来说，已经来不及在其参谋部内，对赞成还是反对重新进行分析研究，

更何况意大利人早在德国作出这个对他们地中海战场至关重要的决定之前，就已有耳闻。希特勒未经进一步研究，便又提出了新的论据：如果隆美尔重新到达利比亚一埃及边界，那么尔后对北非的供给，就可以越过马耳他向托布鲁克推进；因此德国根本不需要马耳他，在马耳他的登陆行动——这是对德大利人的一种欺骗，只需在“精神上进行准备”。这样，统帅部在德、意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达成协议之后，于5月4日下达的关于下一步在地中海作战命令后，仍暂时继续实施，但其目的仍是为了迷惑其盟友。

根据这一切迹象来看，到了1942年春季，在北非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奉行目标远大的进攻战略的前提条件，仍如去年夏季一样，极不可靠。这就需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国防军统帅部过去为其他战场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发展进行详细研究。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防军被牵制于东线；另一方面，西方敌人的进攻准备正在加紧进行。与此同时，西班牙的观望态度日趋明显；希特勒又未与法国达成相互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4月25日的会商会上，人们对“英、美在法国、西班牙、摩洛哥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登陆的可能性”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但对于地中海西部地区来说,除了象1942年5月29日国防军统帅部的第42号指令中所指出的那样，要从以前的观点大大后退一步以外，别无其他选择。特别是由于德国不再考虑夺取直布罗陀，因此对于同盟国在北非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只能以占领法国内陆的其他领土作为反措施。然而这也只是一种应急措施，而且还要视西线总司令当时所拥用的兵力，以及意大利人是否参加法属地中海沿岸和科西嘉岛作战而定，人们认为，为对付英、美在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登陆，西线总司令部有能力占领比利牛斯山的南缘地带，以及西班牙北部沿海港口。而实际上，对西线总司令部来说，这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它应当放弃与西牙牙进行接触的准备。

为了加强西线的防御，在经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进行实地考察以后，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认为，将荷兰沿岸纳入西线总司令的防御体系就足够了。但到6月中旬，希特勒开始对同盟国在大西洋沿岸的“登陆表示极大的忧虑”，并预料敌人将“大量使用伞兵部队”。出于这种猜测，他指示在西线必须保持有足够的陆军和空军兵力，准备一支“潜艇预备队”。6月26日，据有关情报称，敌方“小型舰只正在英国南海岸集结”，希特勒便立即调整防御力量，甚至打算在东线攻势即将开始之际，将其“近卫队”，甚至一个党卫队装甲师调来。

在挪威，希特勒也用整个冬季时间，紧急加强那里的防御，甚至从东线调来上万人，由于缺少兵力，以及土耳其日渐增长的不合作态度，巴尔干已不象去年那样，被看作通向中东的跳板。当时，在那里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剿匪行动”，以便在那里的沿岸防御提到议事日程之前，首先恢复那里的安定。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4、5月之间到叛乱的部分地区进行了视察，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获取了第一手材料，并为针对这一地区进一步颁布命令，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6月6日签署的一份关于“1942年的国防力量”的文件，对于当时处于“再次行动”时期的指挥参谋部的工作和态度，是一份极富启发性和总结性的文件①。文件除了提到若干进步外，还开诚布公地指出了不足，以及德国国防军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所遭受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在第三个战争年头快要结束之时，这份文件对于一个能认真思考

的领导的下一步行动无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人们怀疑，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看到了这份分析全面的文件？因为，约德尔对此类事历来兴趣不大，而凯特尔没有胆量将这个文件拿出来，而希特勒让铁的事实服从于他“狂热”的意志的种种行动，就更足以说明这一点。

第四章面临更大危机

开端

1942 年 6 月下旬，在东线实施的先于夏季攻势的作战行动，几乎占领了整个克里木半岛，为发动新的攻势，大量歼灭敌人兵力，获取了哈尔科夫——伊久姆附近的重要跳板。此外，隆美尔还取得了占领托布鲁克、消灭英国第 8 集团军的辉煌胜利。这些战果却成了希特勒为其下半年继续采取更大行动进行辩护的佐证。

在北非战场，德国最高司令希特勒毫不费力地将蓄谋已久的关于反对在马耳他登陆的决定，强加给了墨索里尼。他在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里，为他的决定辩解说，常胜的统帅如果在胜利的时刻不能坚持到底，那么“历史的时刻”和“战争幸运女神。“将”永远不会再现”。罗马统帅部和凯塞林共同提出的告诫，完全被希特勒的这种自鸣得意所掩盖。约德尔根据由他的参谋部起草的一份关于夺取马耳他的“各种赞成和反对理由”的备忘录，再次提起了仅两个月前与意大利共同制订的计划，但也被希特勒寥寥数语应付过去，此外，在攻取托布鲁克后晋升为元帅的隆美尔，不再坐等命令，而是自作主张，准备追击溃败之敌，向开罗和苏伊士运河推进。完全出乎隆美尔以及德国大本营的意料之外——而意大利却不甚震惊——在 7 月上旬，在阿拉曼的顶盛时期尚未到来之前，就出现了危机的端倪，最终将北非断送。

在东线，希特勒看到克里木和哈尔科夫——伊久姆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匆促得出结论认为，与去年相比，俄军的抵抗已大大削弱了。依据这种估计，他认为夏季攻势会“轻易、迅速”地达到其预期目的，不必投入预先准备的全部装甲部队；而且还计划恢复“对莫斯科的后期作战”。在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利令部里，尽管人们对尚未被征服的德国进攻力量，在经过艰难的冬季后又恢复原气表示满意，但对未卜的前途仍信心不足。人们不禁首先要问，6 月底即在东线夏季攻势开始之前，西线是否就肯定没有作好准备的希望？希特勒是否对这种战略的内在联系有足够认识？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是否日渐威胁着自身的战争目的？在形势报告会上偶尔所反映出的观点，与戈培尔1942年3月日记里所记载的大致相似，这是他在大本营里听到有人列举‘高加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进攻目标后写下的：

> “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些目标，那么，希特勒就将于 10 月初不顾一切地做出决定，及时进入冬季营地。也许他打算构筑一道规模宏大的防线，尔后东线战局便依靠它来进行……也许他要进行一场百年战争……象英国对印度那样。”

撇开这些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行不通的空想不谈，总参谋部的人们对希特勒的决定也并不乐观，因为他们最终将不得不在自己设置的两条战线上作战。同样，他们越来越难以继续与希特勒的充满风险的作战计划保持一致。但是，由于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两位将军领导下，他们的这种疑虑和内部意见纷争从未向外透露过。约德尔和希特勒的亲信们却反而摆出一付信心十足的面孔。这样，对于他们的下级来说，要么被迫承认希特勒的下一步打算是正确的，要么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和限制，虽然人们没有想到，沿着希特勒的战争道路走下去，德军很可能再度陷入比 1941 年冬季更大的危机之中，但事实上，希特勒自接任陆军总司令之时起，就以更加盛气凌人的自傲和顽固不化的固执，将 1942 年末至 1943 年初的俄国第二个冬季作战引

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1942 年夏季

1942 年 6 月 28 日再次发起的大规模夏季攻势，使希特勒第一次作为陆军总司令，在这样一场异常大胆的进攻作战中，指挥百万大军。国防军的一些人士，以及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对“作战可能性的看法”和“在战略问题上的直觉”，现在都远远不够了。对这些“专来”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将那些浮想联翩的思想，与实际情况尤其是双方的兵力，以及空间和时间上的诸因素统一起来，希特勒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区别，还是很可疑的。按常规，他的目标远大的作战计划，应在实施前，由陆军总司令部通过司令部演习和图上作业进行审查和详细准备，而希特勒却根本未加理睬。也许他认为，进行一次简单的会商，谈谈他的指导思想就足够了。这样，他没有带总参谋长，自己于 6 月 1 日来到南方集团军群视察。指挥形式。情报工作、形势报告和命令方式，都一如既往，仍沿袭那一套习惯程序和例行公事。

希特勒自以为，他在以直接的责任感，与东线陆军共亨甘苦，然而他在“山间别墅”。一呆就是数月，却一次也没有请当时就在东普鲁士的陆军总参谋长及其全班人马去到他那里汇报。只是当东线出现危机时，他才频繁地将前线指挥官召来，整日整日地进行口头会商。

如果这一切还不能说明希特勒是有意识地贻误陆军指挥任务——从他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上也可证明——那么他与一个将其终身奉献于戎马生涯的军事指挥官相比，就没有什么天然差别了。希特勒——暂且不谈他在指挥原则上的一窍不通，仅从他身兼数职，特别是他的性格素质，他根本不可能认识任务的全部内容。他只接受对手的奉承，逆耳之言一概拒之门外。空间和时间对他来说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要为他的意志让路。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自居，自以为在判断部队作战能力方面胜过他的任务一位高参。因此这成了他反复议论的话题，有时长达数小时之久。然而最后不是全盘否定，就是言而无信。在关键地点，以已方大量兵力构成重点这一原则不仅过去在战略方面，而且现在在战役战术方面，都未取得成功，处处都暴露出希特勒在这方面的致命弱点。然而，还是这个人——过去总以突然作出的冒险决定，迫使世界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现在面对出人意料之外的战争态势，也无力作出及时、紧迫的决定了。但另一方面，希特勒又越来越多地通过下达长远的指示，限制高级指挥官们在整体上的自主行动权。在他的大本营里，更缺少实施军事领导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即对人格禀性的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谅解和信任。

希特勒对陆军实施领导的这种状态和特征所造成的后果日益显露出来：

交付部队的任务，不是首先考虑军事上的需要，而是服从于希特勒的政治威信和经济需要，或起码放在与军事平等的地位。因此，将夺取和占领地盘放在首位；

然而，这一切从始至终都缺少必要的手段；

顽固地奉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打完最后一发子弹”的方针，尽管部队长时间已力不能支，预备队已使用殆尽，结果势必导致一场灾难；

几乎总是迟到的决定，总是落后于现实，结果，已方的行动总是没有准则，而面对的却是有行动准则的敌人；

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丢失；扼杀自主性的命令方式，使德国无数个师、营调来调去，无所适从，最后导致全军覆没。

在人格方面，他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他怀疑一切，到处吹毛求庇，训斥怒骂，致

使陆军中的优秀份子日渐减少，战功卓著的将领们甚至以后还被当作懦夫和叛徒，受到审判。

在这种情况下，夏季攻势开始没有几天，就已经显露出紧张和不快，即希特勒在对南方集团军群作了一次暂短的视察之后，由于在沃罗涅日这个对尔后机动具有关键意义的突破地段上，出现了混乱状态，导致了第一次严重争执。哈尔德于 7 月 6 日写道：“在元首召集的报告会上，又出现了关于集团军领导的重大口角”。后来，他又补充写道：

“整天都是与冯·博克，与他通话极不愉快”，元首、凯特尔（国防军统帅部）冯·佐登施特恩——南方集团军群总参谋长——通电话，总是一个问题。

这些事本应冷静思考，尔后下达明确命令，而现在却搅在杂乱的电话里，实在折磨人。最难让人忍受的是凯特尔毫无判断能力的絮叨废话。”

仅一周后，担任进攻部队的司令冯·博克元帅因“表示强烈不满”，成了第一个第二次被解职的司令官；而他的总参谋长却经哈尔德从中调解，保留了原职。为此，希特勒还拿出过去博克集团军群提出的“倒霉建议”为由；以后又不停地谴责博克在沃罗涅日的踌躇不前，成了整个攻势失利的罪魁祸首。

直到 7 月中旬，夏季攻势进展顺利，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才于 7 月 16 日迁移到设在乌克兰文尼察附近的新的大本营。陆军总参谋部也住在位于文尼察东北几公里处的一处森林宿营地，希特勒将其称为“狼穴”大本营和 I、II 号宿营地设在茂密的森林里，两处相距不到 100 米，一处安置在临时工棚里，另一处设在铁路段养路房里。当地的市民和村民都安份守已，因此，这里比起东普鲁士大本营宿营地似乎要安全得多。平时，大本营第 II 号宿营地的成员们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周围寂静的林间小路上散步，在附近的小河里游泳，从未发生过意外事件。然而，希特勒却似乎在故意制造事端，任意发泄，而且在以后的数周和数月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北非，此时隆美尔正被迫放弃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即将达到阿拉曼鼎盛阶段时转入防御。在窘迫态势的压力下，他甚至倾向于立刻撤到利比亚边界阵地。而希特勒却把卡塔拉洼地和地中海沿岸之间不到 60 公里宽、无法通行的狭长地带，视为北非周围的最好阵地。此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自己决定，未受领特别任务——于 7 月底到达位于前线附近的装甲集团军指挥所，想亲眼看一看北非前沿阵地的态势。而在此之前，隆美尔却听从了很少取得一致的意大利方面和德国大本营的意见，再次发起攻势。在此期间，瓦利蒙特曾途经布加勒斯特，萨洛尼卡和雅典，同结盟国家和德国高级指挥官进行了交谈，返回途中，在罗马与意大利统帅部就地中海地区，达成了一致意见。之后，他回到乌克兰，在大本营第 I 号宿营地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上，汇报了他北非之行的印象。瓦利蒙特以亲身的经历描述了北非战场的困难状况——德、意装甲集团军毫无隐蔽地暴露在物资和弹药上都占强大优势的敌方陆、海、空三军面前。希特勒安静地听着汇报，并对隆美尔给予了宽恕。而此时，戈林却不耐烦了，特别是听到希特勒向他喊道：“您听见了吗，戈林！沙漠中的地毯式轰炸”，戈林激动异常，他以嘶哑的声音，劈头盖脸地责骂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断然制止一个“门外汉”所作的

这种汇报，以及对空军的如此判断。

希特勒越是过高地估计东线攻势的初期战果，越是认为同盟国为减轻我国盟友的负担而在西线实施登陆的可能性越大。对此，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早于 7 月 6 日——遗憾地，同时又是警告性地写道：“正象元首在几天前所宣布的那样。出于这个原因，对于第 1 装甲集团军的进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军元首不想随使放手”。而三天后，希特勒却又断然要求将这个位于主要进攻方向翼侧后面的师——统帅部手中为数不多的预备队中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师，连同其他可观的加强部队，开往西线。7 月 23 日，希特勒不顾哈尔德和约德尔的强烈反对，命令陆军精锐兵团“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停止进攻，准备开往西线。在最高领导层中这种违反一切军事常规的调兵遣

将，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①类似的这种事情②，使人们对于东线的进攻态势，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成了大本营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的主要内容。希特勒认为，至 7 月 24 日止，德军已占领了从沃罗涅日的顿河中下游，直至斯大林格勒西部和罗斯托夫的广大地区，夏季攻势的胜利已成定局，下一步基本是具有追击作战性质的行动；而陆军总参谋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人们所期望的却是真正的伟大胜利。然而，敌方似乎还没有在任何一处摆开决战架势，德军也因此只抓获屈指可数的俘虏，缴获少量战利品。

由于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在一些指挥问题上的争执日渐频繁和严重。对此，哈尔德于 7 月 18 日写道：

> “我昨天提出的建议，以及昨天元首曾不客气地加以否定的、关于在顿河北岸集结部队以攻击罗斯托夫的建议，今天庄元首的报告里，又突然表示赞同，并命令部队在广阔的战线上渡过顿河，并要求开始实施斯大林格勒会战。”

在 7 月 23 日的日记中，哈尔德又对此事写了如下按语：

> “元首在报告中说：自从他自己于 7 月 17 日违背我的意愿，命令集结快速部队进攻罗斯托夫以后……被门外汉看作是一次毫无意义的集结，以外翼的空虚……对这两者，我都提出了强烈警告。凡是取得显著战果的地方，癫狂症患者便对那里的指挥进行最严历的指责。”

当夏季攻势开始还不到一个月时，哈尔德又在总体上作了如下评论：

> “对敌人现有兵力的低估，越来越离奇和危险，越来越难以使人承受。现在根本谈不上严肃的工作态度。凭借一时印象而实施的病态管理，对指挥机构和他的能力缺少丝毫判断，已成了这种所谓‘领导’的标记。”

7 月 29 日，希特勒再次谈到在罗斯托夫附近“集结”部队的事。对此，陆军总参谋长写道：

> “（元首）异常激动……对别人的错误，进行了无法忍受的辱骂。其实，这都是由于他——希特勒——所下达的命令而造成的结果。”

在第二天的形势讨论会上，又展开了激烈争吵。然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人能够认识到达场争论后来向着灾难性的方向发展，最后导致了斯大林格勒

一役的惨败。对这次争论，哈尔德对约德尔的典型态度，作了如实的记载：

> “在元首作完报告，轮到约德尔将军发言时，他自以为是地宣布：高加索的命运将决定于斯大林格勒。因此，有必要投入 A 和 B 集团军群——此间，南方集团军群已分为 A、B 两个集团军群……为此要重新进述一下我的一个想法，6 天前我就将这种思想报告给了元首，但在国防军统帅部的醉态龙钟的一伙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一思想。”

这次形势讨论会后，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意义又有了新的认识。但希特勒最初的计划里，只把斯大林格勒城看成“军备和交通中心”，只用来为高加索的主要作战方向的进攻提供翼侧保障。随着战争的推移，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意义，而且在国防军统帅部 7 月 23 日颁发的第 45 号指令“继续实施不伦瑞克作战”中作为命令提出，只有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地域，才能为下一步的机动提供充分的保证。

东线屡遭挫折的局面，应归咎于希特勒的作战计划。7 月 16 日，即在国防军统帅部第 45 号指令发布的前一周，陆军总参谋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 “与格伦（东线谍报处处长）和豪辛格交换关于即将到来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想法。正当我们在罗斯托夫北部和顿河南部苦战的时候，我们还要准备斯大林格勒会战，甚至还要参加。”

如果说人们在夺取斯大林格勒对下一步整个作战行动所具有的关键作用上，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其他为之争论的事情还有的是。因为，希特勒不顾他人反对，在发布第 45 号指令后，仍然坚持他的其他全部作战目标——占领整个黑海北部和东部沿岸，封锁穿越高加索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军用公路，占领里海西海岸及其巴库，以及阿斯特拉罕至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下游地段，而且要一气呵成。到 8 月中旬，由于兵力和机动手段的短缺，攻势势头已开始衰减。而希特勒不仅不立刻收步，维持现状，反而向各方施加压力，使本已存在的纷争更加激烈。然而，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无力满足他的要求，希特勒只得拆东墙补西墙，把几个师调来调去。

在这段时间里，在顿河中游的德国盟国的各集团军显得软弱无力，尤其是俄军对勒热夫地域的中央集团军群发起威胁性的进攻，使位于乌克兰的大本营的紧张气氛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克卢格元帅于 8 月 8 日，在“狼穴”强烈要求希特勒把从前线调走的装甲师（第 9、11）调给他，以应付当前的局势。而希特勒顽固地坚持说这两个在冬季危机中留置下来的师、是为了对付苏希尼契的苏军防线突出部，从而作为尔后进攻莫斯科的一个出发基地。克卢格没有被这些废话所迷惑，最后，他以一句使人终生难忘的话反驳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那么您要承担责任。”说完拂袖而去。这位过去曾受到作者尊敬的军长，以他的言行举止为作者树立了楷模和榜样，然而却保护不了克卢格自己：两周后，他再次被召到大本营，承当了“由于兵力使用不当”而导致行动失败的责任。

就这样，在苏希尼契又出现了一处疮疤。与此同时，勒热夫的形势朝不保夕，造成了带有历史性的重大后果。两天后，在 8 月 24 日的中午会商会上，哈尔德又重新提出，给予在勒热夫作战的第 9 集团军以机动自由，撤到一条与其被削弱的兵力相适应的防线，从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使德国陆军在仅仅 9 个月后相继失去其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这些胜利战局的最初计划者。

哈尔德可能是击中了希特勒基本指挥原则的要害，他异常激动的指责哈尔德说：“ 您总是不断地提出后退的建议。 ”接着更是一通吐沫横飞的中伤。最后他说：“ 我要求指挥官们具有同前线士兵一样的坚强。 ”从而结束了他充满激情的长篇独白。接着哈尔德也抬高嗓门回答说：“ 我很坚强，我的元首。”但是此时，他激愤不已，慷慨激昂地说：“ 现在外面，正有成千上万的勇敢的步兵和尉官在送死，只是因为指挥官们不能执行唯一可行的决定，他们被捆住了手脚。 ”希特勒倒退了一步，以充满憎恨的目光长久地盯着哈尔德的脸，发出了激动沙哑的声音：“ 哈尔德大将，您怎么可以用这种腔调对我说话。您给我讲一讲，身处前线的人是什么心情‘ 您在前线到底有过什么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您在哪儿？您想指责我不了解前线，我不许您这样说！这简直不能容忍！ ”

参加会商的人都瞠口结舌，面面相觑。而在勒热夫，已失去意义的、仅为夺取地盘的浴血奋战仍在继续。在希特勒和哈尔德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导致他们的最后破裂已在所难免。

风暴征兆

从 8 月底到 9 月初起，从远方的前线到乌克兰大本营，发生的各种不同的事情——不管是从局部还是从全局上看，都是风暴来临前的征兆。

德国上空的空战，自从 1942 年 5 月底对科隆实施首次猛烈轰炸起，敌人空袭的规模——炸弹数量剧增，飞机数量占绝对优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引起了人们对未来的严重恐惧。

在北非，隆美尔经过长期运筹和犹豫之后于 8 月 30 日傍晚展开的攻势，由于敌人强大的空中优势，被迫于 9 月 1 日中断，两天后，撤回到阿拉曼前的出发阵地。虽然转攻为守并不等于最终放弃原来的进攻目标，但德国大本营的人们要比罗马的人更清楚地看到，现在该转到英国人——在他们新任司令蒙哥马利将军指挥下——干一场了。

由于海上补给比以往受到更大威胁，夺取马耳他的设想再也不敢提及。但另一方面，意大利统帅部却在准备必要时占领突尼斯，以保护北非殖民地。与此同时，希特勒越来越想通过争取戴高乐的途经，促使整个法属北非倾向于他。在南部——尤其当隆美尔转入守势之后，希特勒对克里特岛——准备向该岛增调精锐的第 22 步兵师——倍加关心,同时对动乱不宁的东地中海北部地区也更加关注，因为希特勒一直把此地视为罗马尼亚油区的外围保护地带。

在西线，德军取得迪耶普防御战胜利后，没有就此罢手，反而重新向卢瓦尔河入海口的南岸扩展。为此，希特勒继续向法国增派部队。由于缺少预备部队，只好将新兵师投入使用。由于新兵师缺少武器装备、机动能力和作战经验，甚至对后来的 1944 年 6 月防御敌人的登陆作战都造成了有害后果。值得提及的是，在新的部署中，诺曼底又似乎再次被视为登陆目标。

挪威虽未受到威胁，却不断地消耗着其有限的兵力和物力。

在芬兰，1942 年秋季希特勒还计划，利用一次德、芬联合进攻行动，将摩尔曼斯克铁路切断，从而中断西方作战物资向俄国的输送，但现在这种希望已化为泡影。自 8 月底，敌人在列宁格勒夺得主动权，而且曼施泰因的师——由克里木向遥远的北方调运——一个接一个地在防御中被消耗掉之后，希特勒在他 1942 年的进攻计划中“ 最迟于 9 月 ”夺占列宁格勒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再也无法达到了。8 月 23 日，希特勒还在文尼察大本营里，与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 · 屈希勒尔元帅，第二天又与曼施泰因，决定下一步的作战任务——“ 第一步：……与芬兰建立联系（越过卡累利阿地峡），第二步……占领列宁格勒，将其夷为平地 ”（！）约德尔将军尽管对列宁格勒的情况一无所知，居然也千赞成这一决定。如果希特勒再次指责“ 陆军最高指挥机构 ”“ 傲慢，固执，无能 ”，约德尔也会同样给以支持。

希特勒将关键地段的唯一指挥权交给曼施泰因，并撤消了北部总司令部。尔后，便亲自介入列宁格勒战斗的指挥。他手中的王牌，是一个原来准备在芬兰投入使用的唯一的山地师和首次在前线出现的 4 辆“ 虎 ”式坦克。可是事隔不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却写道，“ 一只老虎已经完了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希特勒对数量有限的“ 新式武器 ”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所寄予的这种期望，参谋部的人们是作何感想的。更不用说，作战区域的桥梁无法承受这种坦克的重量。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 9 月 3 日拟制的关于夺取列宁格勒的第 47 号“ 指令 ”草案，希特勒推迟签署。这样，夏季攻

势的第二阶段尚未开始就放弃了。

在此期间，中央集团军群除了承受正面越来越重的压力外，还要对付后方歹徒的袭扰。为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专门拟制了一份指令——1942 年 8 月 18 日第 46 号指令，由希特勒签署，以掌握实施机动的主动权。可是此后不久，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形势讨论会上，却轻率地拒绝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用了几乎整整 14 天的时间所写的“ 剿匪作战 ”报告。

然而，大本营头上的最猛烈的风暴，还是来自于东线的南部。早在 8 月 16 日的一次中午会商会上，哈尔德拿着一份不知从什么地方激获来的俄国旧地图指出，现在的态势与当时十分相似。1920 年，红军——当时也是在斯大林指挥下，在斯大林格勒和罗斯托夫之间渡过顿河，就在这条路上，击溃了弗兰格尔的“ 白卫军 ”。哈尔德的话立刻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他立即决定，尽快派出一个德国装甲师（第 22 装甲师）到处于危险地段的意大利第 8 集团军后方，以防万一。接着，他又派出 2 个步兵师——其中 1 个步兵师甚至是从已方进攻翼侧抽调的——去执行同样的任务。希特勒企图迅速夺取斯大林格勒，抽出兵力，用以防止俄国人故技重演。

在这个热点地区，除了在斯大林格勒北部伏尔加河畔的突击之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取得很小的局部进展。希特勒对此忍无可忍。8 月 28 日，戈林衣着华绵地来到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引用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执行任务的近战航空兵指挥官冯 · 里希特霍芬将军的话说：“ 那里根本就没有敌人的重兵。空军对北部地区进行了详细侦察，在无掩护的地带上，根本就没有发现敌人。 ”这些话对连日来已失去耐心的希特勒更是火上加油，他对这一消息并不完全相信。尽管如此，他还是命令 B 集团军群各集团军指挥部，向前线靠拢。

在这段时间里，使希特勒更为恼火的是，在高加索的进展点也不象他所预期的那样。8 月 21 日哈尔德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 元首异常激动。 ”接着——他每天都对过去“ 无法改变的形势 ”作批注，他在 8 月 30 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中作了如下评论：

“ 元首对 A 集团军群的进展很不满意。 ”

次日，A 集团军群司令利斯特元帅奉命前往文尼察作口头汇报。然而，经过他对集团军群态势的一番庄重沉静的描述似乎一切指责都不翼而飞。希特勒只是当着他的面，再次逐一枚举了下一步攻势的大量目标，其中仅在前线附近就点了通过高加索西部地区、被视为通往黑海海岸必经之路的三处‘ 重点 ”隘口；在作战地域纵深，有格罗兹尼油区和阿斯特拉罕附近的伏尔加河入海口。“ 只有 ”夺取巴库一项任务，准备推到“ 下一年 ”。利斯特元帅带着这些任务，应邀参加了希特勒在小范围内举行的午宴——这种在他掩蔽室里举行的宴会通常是招待贵客的——尔后便飞回斯大林诺，然而却没有得到希特勒给他的一兵一卒。

在后来的几天中，尽管战争有些进展，其中包括夺占了久攻不下的新罗西斯克港埠，但希特勒的急躁仍有增无减。遂于 9 月 7 日，委派约德尔将军去 A 集团军群，再次敦促该集团军群加快作战进程。约德尔于当天晚上更返回文尼察，向希特勒作了汇报。然而却由此导致了动摇德国大本营内部结构的最严重的危机，甚至一直延续到战争的最后一个月。约德尔针对希特勒的指责，肯定地说，利斯特元帅严格遵守了他下达的指示，并列举了集团军群下一步准备采取的措施；说到最后，约德尔对自己仅被作为一个传令兵被派

来调去，极为不满，大发雷霆。这一切使希特勒勃然大怒，第一次对约德尔暴跳如雷。

作者没有目睹这一事情的过程，只是第二天从约德尔那里以及希特勒因此事而作出的安排中得知，而且作者自己也被卷入这一事件之中。大本营的全部活动和作用似乎瘫痪了。会议室，这个希特勒每天都要消磨数小时的口舌，渡过紧张的日日夜夜的地方，今天已无人光顾。讨论会改在希特勒的窄小的卧室里举行，参加者只是那几个必不可少的报告人，完全是一种例行的、或者说是没有任何形式的会议。会上的话没有一句是必要的，声调冷若冰霜。希特勒自法国战局以来，在战地大本营里每天与宿营地第Ⅰ号的成员们两次共餐的习惯，现在也没有了。餐厅里摆放的那把希特勒的坐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空着，后来被博尔曼利用起来。在 48 个小时内，先后有 10——12 名国会速记员，身着军服来到大本营，由希特勒亲自主持宣誓仪式，自此，他们就可参加所有的军事会商会。

9 月 9 日，希特勒让凯特尔和哈尔德转告利斯特元帅，利已被解除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A 集团军群的指挥于当晚起，由凯自己接任！凯特尔也借机向陆军总参谋长暗示，他的职务也将在很短时间内，以另一种方式被夺占。另外，据说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务将由凯塞林接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将由第 6 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接替。国防军统帅部的两位将军由于这种原因，一反常态，开始对瓦利蒙特讲起真心话了。凯特尔尽管是希特勒的一个百依百顺的“忠实待从”，也并没有完全参与事情的全过程，但也与约德尔一样，遭到了希特勒的轻蔑。他私下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他能否以他的自重，长期与希特勒协调下去，继续留在这一职位上，这是一个只能由他自己回答的问题。约德尔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向一个独裁者指出他的过失，因为这样就伤害了他作为其人格和行为最强大支柱的自信。讲完对希特勒的认识之后，他还说道：“他还要在陆军将军里为我找一个接班人！象“编史员”舍尔夫和我这样可靠的民族社会党员。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他针对他的副手说：“您最好离形势讨论会远一点；参加这种会是令人感到压抑的”。

当时，作者数周没有见到希特勒的面。当作者后来奉命去参加形势讨论会时，才使他恍然大悟。当作者步入希特勒的掩蔽室时，迎接他的不是问侯声，而是一双凶杀仇怨的眼睛，久久地盯住作者，作者突然觉得，这个人使他丢了脸。不一会儿，他才明白，原来是希特勒的致命一招棋输掉了，苏俄未能在他的第二次行动中被摧垮，两线作战使德国陷入窘境。因此，凡是现在能成为他的错误、疏忽、错觉、空想见证人的将军们，他都再也无法忍受，他要立即与他们分手，寻找其他对他深信不疑的助手。

急转直下的形势——尤其是凯塞林和保卢斯分别离开地中海和斯大林格勒——所造成的压力，似乎成了更换陆军总参谋长的主要原因。既未得到晋升，也未获任何嘉奖，哈尔德于 9 月 24 日辞去其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哈尔德在希特勒最后一次接见他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他也不能恢复。我们必须分手了。”对于希特勒企图在领导陆军中采取的另一种全新的原则，哈尔德一语道破地写道：“教育总参谋部狂热地信仰他的思想，在陆军中要毫无保留地坚决贯彻他的意志。”

关于陆军总参谋长的接班人，希特勒选拔了蔡茨勒将军，这出乎各方面人士的意料之外。在大约一年半以后即 1944 年 6 月，蔡茨勒也辞去陆军总参

谋长之职。

1939 年春季以前，蔡茨勒常年是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处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并作为约德尔的部下，是力主国防军实施统指挥的最积极的斗士之一。他作为装甲兵团高级司令部的参谋长，曾参加所有大型战局。积累了不寻常的经验，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此外，还要追溯到他与国防军的副官长施蒙特的友谊。希特勒平时几乎不留意总参谋部军官，甚至那些头头脑脑。可是由于施蒙特的这一层关系，希特勒却认识蔡茨勒，曾有好几次，邀请他单独去听报告，却没有请他的司令。1942 年 4 月中旬，蔡茨勒又经施蒙特的推荐，但主要是希特勒的选择，被任命为两线总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受领了重整西线占领军的任务，为“欧洲堡垒”沿岸的防御作好准备。谨慎而勤奋地执行着这一任务，对大本营的“原则命令”和“个别命令”都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执行。1942 年 8 月 19 日，当德国在迪耶普取得反奇袭胜利后，蔡茨勒的好说的作风达到了顶点。不仅他的报告言过其实，而且大本营的公报也任意夸大；但另一方面，他也对海岸防御作了出色的总结。

因此，在迪耶普取胜数天，以及希特勒与哈尔德发生激烈争吵后，希特勒曾表示过，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象蔡茨勒这样的人”，作他的陆军总参谋长。这话是完全可信的。他希望他身边的这个人是一个对一切都持乐观态度，不为任何闲难所吓倒，同时也没有象哈尔德那样的“永恒的疑虑”的总参谋部军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戈林意外的推荐，蔡茨勒的任命也势在必行。当戈林从他在大本营的代表那里听说，对这个问题正踌躇未定时，这位“帝国元帅”急不可待地来到会议室，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我为您经常与这个哈尔德生气，卧不安席，食不甘味。您必须撤换他。我知道一个接班人，他可以省去您的一切烦恼。他就是蔡茨勒，他对您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人了。”

新上任的陆军总参谋长在致陆军总司令部军官的欢迎词中，强调了他对他们的期望，他说：

> “我要求每位总参谋部的军官……必须相信元首和他的领导。心须利用各种机会，将这种信任传播给他的下级和周围的人。
>
> 不符合这些要求的人，就不需要留在总参谋部……”

蔡茨勒随着他的新的任命，被晋升为步兵上将。一开始，他不得不把他的全部时间用在东线持续不断的、困难重重的作战中。因为当时希特勒及其亲信认为有必要将其驻地由大本营迁回柏林，在那里逗留一周左右。尽管在总理府仍能与乌克兰第 II 号宿营地保持着通信联系，但希特勒的这种变动，与履行他篡夺走的陆军总司令和位于遥远的高加索的 A 集团军群司令的义务，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当大本营重新恢复日常工作之后，希特勒在形势讨论会上三番五次要求“区别精华和糟粕”。蔡茨勒对人总是和颜悦色，语调温和。这一点足以使戈林和希特勒的亲信们，以及其他侍从们乐

于接受。与此同时，约德尔也由“失宠”逐渐恢复了工作。面对这种关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认识到，自他身后出现了这个新任陆军总参谋长，再没有机会组成“总参谋长顾问组”这样一类的组织，从而使国防军的指挥，在这一级失去了一个坚定的支柱。他似乎也相当清楚，即使蔡茨勒同

意，希特勒和海军、空军总司令也将不能容忍有这样一个“分政府”存在。

另一方面，蔡茨勒也在试图利用对他的普遍好感，以及约德尔工作上的弱点，消除东线的双轨领导，夺回陆军总参谋部失去的地位。这是不足为奇的。转变为具体措施，这势必就意味着结束约德尔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东线和“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的本来属于陆军指挥领域的影响。这样，也许能达到国防军清理最高领导组织的目的，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放手进行真正的领导，打开方便之门。

现在已没有任何依据说明蔡茨勒曾准备就“领书机构”问题——这是他多年在约德尔领导下的国防处工作中十分熟悉的问题，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交换意见。按照蔡茨勒的作法。他似乎更有可能采取实际步骤，澄清约德尔参与东线指挥的问题似乎无需大本营成员的建议，他就利用一条捷径，达到他的目的，即在中午形势讨论会，如有可能也在晚上发表一系列的报告。此外，他另辟蹊跷，还单独与希特勒和速记员进行特殊交谈，就东线下一步计划和企图，交换看法。此事的发展虽不是日新月异，但一切迹象表明是在毫无阻挡地顺利进行，这使得约德尔每天按部就班的对东线战况的汇报似乎成了多余之物；同时，也使他——自 1938 年苏台德危机以来——干预陆军指挥的活动，从此告终。

蔡茨勒竭力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领导机构。并恢复陆军在那里的全部特许权的努力，因遭希特勒的拒绝而告终。估计，大概由于这一失败，促使蔡茨勒进一步在东线排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比如，他明确制止陆军作战处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回答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何询问。由于约德尔不顾其副手反复阐述的观点，对上述事情听之认之，满足于翻印陆军总参谋部的每日形势报告，以及蔡茨勒在形势讨论会上的口头汇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参谋部，在不长的时间内，自己便将自己排除于东线战事决断权之外。这对于其他战场，或者说对整个战争的领导都势必产生重大影响①。

新任陆军总参谋长终以他健康、明智的头脑——同时在约德尔袖手旁观的客观帮助下，将国防军在最重要领域——陆战领域的最高指挥机构分成了两个并列的参谋部——蔡茨勒也到此止步，结束了他的奋争。这样，不仅使国防军最高司令无法得到统一的咨询，而且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份内任务也无法进行。然而，立于这块军事领率机构废墟上的唯一“胜利者”是希特勒。结果，似乎他却成了整个战场上永远正确的行家里手②。

因此，人们认为仅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走向衰亡阶段这一点——这是战前约德尔和蔡茨勒所代表原则的尖锐反映——就预示着风暴的来临，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后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日日夜夜里，约德尔只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只有蔡茨勒和希特勒两人单独在一起。从那时起，所有一切事情，不管是东线战事，还是整个德国战争指挥事宜都是这样决定的。但从广义上来说，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对各战场，也包括东线战场并不是没有责任。但若把“国防军统帅部”从那时起事实上已失去的责任，不论巨细都推到它的身上，也是历史的错误和违背实际情况的。

蔡茨勒将军走马上任的最初几周里，深得各方面的宠爱，在人们的眼里，他自然成了希特勒军事高参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为了在对他最重要的问题上，“毫无顾忌”地绕过国防军统帅部战场这个障碍，不久他找到了新的方法和途径，即利用希特勒准备撤下东线疲惫不堪的部队，换上士气旺盛的西线部队、以片面满足东线需要的做法。但换到东线来的师，无论从装备状况

上，还是训练水平上，都不适宜东线作战的需要。而且希特勒的东线兵力西调的命令也未能认真执行。

当时，由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得不到陆军总参谋部的支持，因此想通过一条捷径，用国防军其他两个军种尤其是空军的多余部队，为它东线日益衰减的陆军输送新鲜血液。诚然，首先双方要达成完全一致，而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经过长期受压后，鼓起勇气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起草的命令草案根据这个计划海军抽掉 10 万或 20 万人,空军抽掉 50 万人支援陆军——这是凯特尔对原计划打了一半折扣上报给希特勒的数字。然而，正当这个命令刚要发布时，就在第二天的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空军总参谋长在瓦利蒙特耳边问道，他是不是这个安排的倡仪者。当瓦利蒙特点头称是后，耶顺内克微笑着说：“亏您想得出来”。一会儿，戈林到来，他没有赞许国防军指挥参谋长部副参谋长一个字，而是满脸怒气地看着希特勒。当戈林以清脆的声音大声说话的时候，希特勒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却立刻准备屈服，而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戈林说，他不期望他的那些纳粹小伙子们穿上灰色的——所谓反动的——陆军制服，他却很想成立自己的空军师，从师长到普通士兵都是清一色的空军人员。

这就是不幸的“空军野战师”诞生的时刻！希特勒只字不提他原来的命令，立刻表示同意，并要求戈林组建双倍的部队同时免除海军在这方面的任务。对此，凯特尔立即表示赞同；约德尔再次摆出一副事不关已的样子；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向陆军总参谋部提出的抗议因此而得不到支持。

尽管在很短时间里，空军以惊人的速度组建了 10 个野战师，不久又组建了 10 个师，但却无法立即补充到久经沙场的陆军部队中去。空军野战师尽管有旺盛的战斗意志，但却有“先天之不足”。首先，它缺少有经验的指挥官，缺少充分的训练和适当的武器装备。尽管在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每当听到空军野战兵师在艰苦的战斗中失灵的消息时，都非常神经质，甚至被当作无稽之谈，一一驳回，但仍无助于改善这种部队的形象。1943 年秋，空军野战部队终于被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编入陆军序列，但其战斗力始终未达到陆军师的平均水平，与希特勒出于对它的偏爱而授予它的“突击师”的称号更是不相匹配。

从 10 月起，尽管以从西线抽调的部队和首批空军野战师加强东线，仍无助于东线南翼的攻势。蔡茨勒为讨好希特勒，挖空心思，采用无数战术补救措施，也无济于事。这样，大本营在 10 月底，准备迁回东普鲁士。在此期间，进攻目标仍然未变，还是高加索南部和捷列克，而首要目标还是斯大林格勒。近几周来，那里已展开巷战，正在争夺几座工厂和工人住宅区。而无数地段的危险处境也依然如旧，尤其是顿河下游。在这里，已由罗马尼亚第 3 集团军代替意大利人占领阵地。在北非，自 10 月 23 日英国人向隆美尔集团军展开猛烈进攻后，新的威胁与日俱增。在德国整个阴暗的形势里，只有潜艇作战显露出光明的曙光，在护航作战中和远征行动中，建立了丰功伟绩。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如既往，既没有过问海军的胜利，也没有过问空军不断遭受的挫折。

最后突变

希特勒不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也不是 4 个月后突尼斯受挫时，才失掉战略主动权，而是早在 11 月这个在德国现代史上决定德国命运的月份里，在西线和东线敌人的打击下就已失去了。战争的这种于德国不利的转折，已为世界所见；但在德国领导中心，首先是再一次摆脱了 9 月打击的希特勒本人，对此毫无察觉。

1942 年 11 月 2 日至 21 日，德军在地中海战场和东线遭受三次重大失败，每次都使德国大本营惊慌失措。几周前来自空中的紧张局势，并没有使希特勒得到应有的警告。这样，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当时拟制的一份“ 1942 年秋总体形势概貌 ”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这份备忘录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 1942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从乌克兰到东普鲁士的两天火车旅途中，最后定稿的。备忘录指出，在东线战场上，国防军及其盟邦军队的能力已达到其极限的边缘。对于西方列强即将发动的进攻途径，备忘录在经深入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法属北非将是进攻“ 欧洲堡垒 ”的最有利的出发地。这一观点——决不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海军总司令部和希特勒自己也曾表示过赞同——在 1942 年秋季，也只能以一般的军事政治和战略的思想为基础。它缺少来自于自己的情报部门和意大利统帅部的充分资料依据，两者都没有正确估计到敌人即将实施登陆的准确时间——尽管敌人的登陆舰队已在开进途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备忘录最后建议，应尽快恢复与法国的军事对话。

就在德国大本营返回东普鲁士“ 狼穴 ”的当天，传来了北非隆美尔在阿拉曼前方进行 8 天浴血奋战后惨败的报告。面对这一打击，希特勒只能以“ 坚强 ”的话为隆美尔鼓气。正当 11 月 2 日傍晚，隆美尔为避免全军覆灭，只好违抗来自罗马和拉斯滕堡的命令，自作主张开始撤退时希特勒的一份著名电报正穿过太空，传到隆美尔指挥所。电报称：

> “ 德国人民和我对您的指挥才能深信不疑，对在您指挥下的、在埃及进行英勇防御作战的德意部队的坚贞无畏，满怀信心。在您所处的形势下，只能坚守不能后退一步，要将一兵一卒……投入会战……尽管敌人处于优势，但其兵力也将终有一日耗竭一空。坚强的意志战胜强大的兵力，这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您的部队要么胜利，要么战死，别无其他出路。 ”

希特勒的警告，不但中断了隆美尔正在进行的撤退，并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在大本营第 II 号宿营地里也掀起了一股余波。这里的人们对 11 月 2 日傍晚发出的电报，还一无所知。因此，当 11 月 3 日晨 3 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值班军官收到隆美尔关于 5 小时前部队已开始撤退的报告，并没有认识到形势的重大变化，未象其他重要情报那样，立即向其上司报告。12 小时后，这位年愈 50 而久经考验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预备役少校军官，面色苍白地离开了希特勒的简易住宅。只因希特勒想弄清楚，在第 II 号宿营地和隆美尔之间是否串通一气，玩弄阴谋，这位军官才死里逃生，免于枪决，但被降为士兵，到一个“ 缓刑营 ”去服役。按照军事惯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竭力承当了一切责任受到“ 解除职务 ”的处分。凯特尔曾阻止瓦利蒙特到希特勒那里去，但经斡旋，已无法挽回，并对他就为样离去表示遗憾。约德尔将军没有牵连此事，只是对同他进行长年合作的第一助手说道：“ 元首的意志就

是我们的最高信条”。与约德尔相反，希特勒副官长施蒙特经过努力使对那位预备役少校的处分大大减轻，只是未能使他留下。11 月 4 日，瓦利蒙特勒动身离开大本营。第三天，施蒙特便打电话告诉他，希特勒认识到，对他的处分是“不公平的”，并迫切恳请他回到原来的职位上来。同日下午，凯特尔也来了同样的电话。瓦利蒙特只是回答他们，在别人对他进行处理后，起码要允许他有个思考的时间。

数日后，隆美尔派一名传令官火速赶到大本营，评细汇报了北非的态势，希特勒因此好歹接受了隆美尔的决定。在希特勒的不断谈话中，越来越陷入完全不现实的想象之中。他把他原来讲的话——要么“胜利”要么“战死”的抉择——早已丢到脑后。首先，他想承认在美国的援助下在北非的沙漠上打的完全是一场物资仗，而“轴心国”鉴于海上运输的困境。难以满足最低需要。少数几辆重型坦克，以及希特勒的最后“指挥”手段——大量使用“立即”和“火速运输”等词汇——也无济于事。在同盟国方面，蒙哥马利将军以个人的名义向英国第 8 集团军士兵发出通告说，此役将作为决定性会战载入史册，它“将是战争的转折点”。

第二次打击是仅数天后，同盟国军队在法属北非的登陆。由于强大的美国军队在欧洲战争舞台边缘的首次出现；由于敌人占据着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富有重要意义的地域；由于德国缺少防御的各种准备和必要的兵力和手段，使德国统帅部面临着一种全新的、非同寻常的形势。

面对这一事实，人们不禁要问，已经觉察到事态这种发展，并在一周前做出判断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是否对此不该比希特勒负更大的责任？人们不禁还要问，即使参谋部的上司不同意它的观点，难道参谋部就没有必要以及没有可能自主行事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当记住，正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代表在与法国进行谈判的最初时刻，就将法属非洲的防御问题放在首位，然而，这些努力都因希特勒的阻碍破坏而付之东流。记得，约德尔将军在 1942 年 10 月 15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根据一些不大确切的情报，再次提出了一个他的参谋部过去曾提出过的建议，即允许法国人“从本国调集兵力，加强其北非的力量”这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最后一次提出北非问题。这些事实说明，指挥参谋部对此是没有责任的。还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1 月上旬，希特勒——还有约德尔——面对敌人在直布罗陀集结大量舰船，墨索里尼对法属北非形势，再次发出警告，甚至 7 月 7 日傍晚，敌军已经展开的形势，仍然认为，敌人在地中海的登陆目标不是法属北非，而是其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自己单方面即不依赖于希特勒而采取的准备措施，是为了防止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取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最高指挥机构的已经暴露多次的缺陷，譬如希特勒的僵化政治态度及其脱离实际的战略观点，——当时他只是看到来自西线和挪威的威胁；盟邦之间缺乏理解；以及对自己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漠视，等等——都使每一项合理化的军事准备工作未能得到实施，致使早已预料之中的敌人行动屡屡得逞。

代替周密的准备工作而作的一些事，可以典型地说明德国大本营的工作关系。11 月 6 日晚，戈林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进行任何接触，便以希特勒的代言人自居，对在罗马的凯塞林说：希特勒排除同盟国将法属北非作为登陆目标的可能性。他要求早已精疲力竭的德国航空部队和几乎没有机动能力的意大利舰队，向敌人 190 艘护航舰只“发起日夜不断的连续攻击，并将其

歼灭。”11 月 7 日，希特勒派冯·林特伦将军两次提请罗马“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部署防御，包括设立障碍物”。此时此刻，希特勒还再次命令加强地中海另一端的克里特岛的防御。

在最紧张的时刻，希特勒在中午形势讨论会后，在大本营第Ⅰ号宿营地成员的陪同下，登上他的专列，穿越德国国土，向慕尼黑驶去，准备在那里与“老战士”共庆主观臆造的相安无事的战争态势，当后半夜列车到达图林根一个偏僻的火车站时，传来了盟军开始在法属北非登陆的消息。此时此刻，希特勒首先想到的是去年对法国人所作的关于保卫海外领地，击退任何来犯者的允诺。而现在，他除了几艘潜艇和几个飞行中队外，并没有抗击敌人登陆——从卡萨布兰卡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边界一线——的兵力。

瓦利蒙特将军于 11 月 8 日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这条消息。紧接着他接到来自东普鲁士的电话，希特勒已选定他为国防军统帅部全权代表前往维希，与法国最高司令部共同组织抗击敌人在西北非的登陆行动。同日晚，他又接到命令，让他于次日早晨去慕尼黑，到“元首专列”停车处待命。当他赶到那里后，他找到的只是一辆空车。他碰到了约德尔，才知道情况已经变了，希特勒又不想和法国人打交道了。形势异常紧迫，瓦利蒙特立即开始工作，因为车厢里除了副官外没有其他人，而且形势也需要他的知识和经验。

在这些日子里，德国国防军大本营成了外部混乱局面的一面镜子：希特勒在慕尼黑阿尔齐斯大街“元首官邸”，与齐亚诺和赖伐尔举行会谈，未在专列上露面；凯特尔和约德尔在阿尔齐斯大街和车站之间来往奔波；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单独在一节卧车里，搜集紧急情报，拟制在突尼斯构筑“桥头堡”，以及占领“法国剩余地区”的命令。

这次参谋部的搬迁表明，希特勒已改变初衷，不想马上返回东普鲁士，而是想独自在“山间别墅”，思考新的形势。在距陆军总参谋部约 1000 公里，离事件发生地点 2000 公里的“山间别墅”，希特勒这个刚刚还在慕尼黑啤酒馆自称为斯大林格勒主人的人，在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又遭到 1 周内的第三次沉重打击：这座经长时间争夺的城市已被俄国人包围。数周来准备对顿河下游实施突破的企图，由于象北非一样缺少必要的手段，不得不再次放弃。一个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并已在斯大休格勒这个旋涡里，被搞得精疲力竭的德国装甲师，以及由蔡茨勒创建的由后方的打字员、面包师和司机组成的“紧急动员分队”，即搬出手头的一切力量，暂时抵挡一下俄国潮水般的攻击。

即使在这种情势下，德国大本营仍象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那样，采用习惯的分散办公形式：他自己同副官们居住在“山间别墅”；凯特尔、约德尔和大本营第Ⅰ号宿营地的军事成员们在“小首相府”做了拉默斯部长的座上客；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则在萨尔茨堡车站的特别列车上。主要于实事的陆军总参谋部设在马祖里森林，附近是空军总司令部，而他的总司令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其他事物。由于斯大林格勒事件，约德尔于 11 月 21 日，将指挥参谋部移到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施特鲁普步兵营房，离“小首相府”则更远了。第二天，整个大本营再次迁回“狼穴”。

迁回东普鲁士后，又重开了形势讨论会。在恢复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的第一篇中称，“元首对第 6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的形势充满信心”。11 月底，兵力薄弱的德、意部队在突尼斯城周围，未遇抵抗便成功地建立了桥头堡，“法国剩余地区”也兵不血刃予以占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又因此再度笼罩着德国大本营。在整个形势完全突变的情况

下，希特勒依然挥舞着他的指挥棒，到处兜焦着他那东拼西凑的战术。

第五部衰败时期
（1942 年 11 月——1944 年夏）

第一章时代特征

到 1942 年底，德国最高指挥层已失去运筹帷幄的能力，这成了它在当时的最重要的特征。当时，希特勒不是利用尚存的防卫潜力和广阔的占领区，制定一个明智的、要求不过高的战略。使战争落得一个较好的结局，而是完全按照他在 11 月 20 日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的豪言壮语行事。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个越遭受打击……越发坚强的男子汉”，现在他只“有一个信念——战斗”。①墨索里尼不同意他的观点，回信中他明确建议——后来他又多次提出，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已毫无意义的对俄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头号敌人英国”，及其构成重大威胁的空中优势。而他的德国伙伴却把这一思想看成是”无稽之谈”，以致于政治当局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都没有对战争的这种解决方案进行一丝一毫的认真分析。

希特勒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部内容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口，面面俱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被迫进行战略防御的观点从未有过市场：国防军统帅部仓促下达的指令中，没有一个使用过向战略防御转变的字眼。即便是在防御形势下，这种观点也很少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形势越是紧迫，他越是喋喋不体地说：“敌人的兵力不久就会耗竭一空。”因此，长时间以来从未出现过一种思想，即放弃一些没有意义或失去意义的阵地或地域——那怕不是在全线——但至少应该减少风险，以便组建预备队。取得更大的战役机动性，从地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重新赢得部分行动自由。然而，他却认为，必须坚持到底，否则，便会“失去重要物资”他认为必须固守，因为固守是防御的最强有力的形式；他认为必须牵住敌人，使敌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出现，但往往却做茧自缚，坐失良机。

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历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是“马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段相继丢失，主动权日渐丧失，越来越受制于敌人。

上文所列举的希特勒的所有重大的领导错误，都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他领导能力的突然衰退，也不能归咎于 11 月事件。大约 1 个月以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以坦率的语调在战时日志中写道：“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完整的决策；似乎元首已不再具备此种能力了。”这种观点本来就不是什么新发现，也不能作为他处在 1942 年末至 1943 年初德国战争进一步衰败时的精神状态。他缺少一批追随他的将军。作者认为。希特勒一直认为血汗耗尽的德国国防军，仍占绝对优势，强如往昔；而他身边的高参，几乎没有一人出来直谏，阴止他的这种僵化观念延续。

约德尔将军长期置身于 9 月争吵的后遗症之中，虽然也偶尔冲动，但他以其全部的意志克制自己，不再触犯这位独裁者的尊严。蔡茨勒将军，目前只能做一名有求必应的助手。而其他将军，经过多年的考验，还没有一位能代替他的职位，更不用说高他一筹了。如果希特勒不放弃对军事领导。尤其是对陆军领导，那么在他身边的任何精明强干的军事领导人，都会步蔡茨勒的后尘，很快被搞得精疲力竭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益增长的重大弊端不能不再次归咎到国防军领率机构的组织体制。一方面，蔡茨勒效仿希特勒对盟邦的态度，在东线战场上设置“障碍”，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越来越难以掌握战争的全局；而另一方面，越来越繁重的“统帅部战场”的指挥任务需要

指挥参谋部去完成。“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早就成了陆军第二个作战处，除它之外，希特勒又将补给工作交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需处负责。然而，这两个单位既无自己的部队。又无装备，完全依靠与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部，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部的协作。贻害最大的是由于希特勒对敌人的低估，企图将西线情报处由陆军总参谋部划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是由于蔡茨勒的顽强抵制、这一企图才未能实现。该处设在柏林，处长必须每月一至两次向设在东普鲁士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汇报。但从未面见过希特勒。而蔡茨勒也不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插手统帅部战场的后方军事管理工作。

空军和海军是在其总司令统一领导下，而且其总司令都与希特勒保持着密切联系；而陆军的分工不过是协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收集每日情报而已。当时，空军的状况是，作战能力急骤下降，而海军，自 1943 年春，由卓越的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海军大将接管后，这个在德国唯一还保持进攻的领域，也几乎处于停顿。因此，从战略高度对这些失利对全局造成的影响，事先作出判断，或者采取挽救措施，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可能性极小，更谈不上对事件进行高瞻远瞩的分析。这样，希特勒自己的“工作班子”，也被他自己的杂乱无章，搞得精疲力竭，过早夭折。

德国大本营在德国失去主动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从事的这种单调的工作到本书这一章为止，只是作为这一阶段的特殊事件加以描述的。一些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可能比作者的描述更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大本营里所发生的事情和情绪。

第二章从斯大林格勒到突尼斯

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的惨败，标志着这一时期开始的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首先应当归咎于立于德国最高领导层之首的希特勒。从整个战略角度看，这两次灾难的根由，约德尔将军早就在他的“指导原则”中有过阐述。他在1942年11月29日，根据南线和东线形势的重大变化，要求他的参谋部“从三个方面”对“整个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同时提出他自己的“指导原则”：

> “北非必须作为欧洲的前沿阵地无条件地坚守。一旦失去北非，英国便会越过佐泽卡厄索斯群岛、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厄撒半岛，向东南欧发动进攻。因此，必须保障巴尔干的安定和安全”。

他接着指出，“在西线和北部地区，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重大行动；而一在东线，必须建立几道坚固防线，以便在明春能至少从某处转入进攻。”

在北非这个同意大利人共同分担的“同防军统帅部战场”，约德尔的方针中如果在“无条件固守”之后，又出现“可以放弃”这样完全相反的命令，那么这与其说是总参谋部的话，倒不如说是希特勒的语言。希特勒的“直观”中会产生许多新鲜的、似乎是确定无疑的想法：突然间，巴尔干成了英国的最大战略目标，可同时意大利不会遭到入侵。这样，又将一个幅员广阔的地区，辟为一个新的消耗兵力的战场①完全背离了节省兵力的原则

在能说明许多重要问题的指令中，关于东线问题，根本没有提到过斯大林格勒的名字。约德尔所说的“坚固阵线”是指东线的全部事情，当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还被“允许“将其作为自己的事看待。但是，针对战后某些另外的解释，还值得强调的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无疑是想缩短“坚固战线”，即将战线后移。而绝没有想过沿伏尔加何设防，并将斯大林格勒也包括在内。综上所述，已很清楚地表明，并非国防军统帅部要急于坚守斯大林格勒。

约德尔提到的“三个方面”——他要求他的参谋部和他的副参谋长从这“三方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最终清楚地说明，他根本不是着眼于形势作出真实的判断，而意在建议对兵力进行另外一种分配，或是动员新的兵力，他的参谋部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竭尽全力实现其放弃西线和北线，转向东线的企图，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与希特勒相对抗。这些事实是对指责国防军统帅部在它自己的战场上贮备过剩的兵力的一种驳斥。

如同约德尔将军在“指导原则”中所作的判断那样，据他后来回忆，他本人，以及他的参谋部都没有进一步提到斯大林格勒的事。这不排除他曾在某种场合下同意过希特勒的要求。他的表白可能只是基于他自己的观点，也可能是基于他作为旁听者参加希特勒和蔡茨勒之间的谈话后所得来的印象。由于蔡茨勒的“情报封锁”，陆军总参谋长部对形势的独立判断，约德尔和他的参谋部都是无法得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对斯大林格勒战事的经过，记载得极少。但在1942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形势报告中……元首与陆军和空军总参谋长就

东线南部的形势进行了长时间谈话”。

如果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不在场——这极不可能——或者一言未发，那么上述这段记载无论如何也能清楚地说明，在希特勒决定斯大体格勒

的命运时，他和“国防军统帅部、没有发挥重大影响。至今还保存着的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也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些 1942 年 12 月 1 日和 12 日，以及在斯大林格勒失守后的 1943 年 2 月 1 日的几篇速记稿片断，将在下文全文引用。同时，这些速记稿的片断也进一步证明——是从 70 天的 3 天中得出这样的判断，在大本营，希特勒与其高参之间在东线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和对立，还没有张扬出去。可以肯定，蔡茨勒将军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比过去更多地单独同希特勒谈论他对斯大体格勒的忧虑和计划。只是没有他们之间的谈话记录。作者还清楚地记得，蔡茨勒对斯大林格勒日渐危机的形势坐卧不安，比如他连续数日要求他自己和他的亲密同僚们，也象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一样，只能得到一份最低限度的口粮①但另一方面还应指出，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11 月 25 日的战时日志记载，只有里希特霍芬航空兵上将提出过第 6 集团军应“首先向西撤退”，即放弃斯大林格勒，突破合围的建议。战时日志还记载，在曼施泰因元帅接管“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后两天，希特勒又一次谈到前景

“非常有利”。据 12 月 2 日的战时日志称，希特勒对于“霍特装甲集群”从科捷科尼科沃地区对斯大林格勒发起进攻的计划，怀有充分“信心”。希特勒终于在 12 月 12 日这一天，发起了进攻。他再次要求自己和他的手下，为他的立论承担如下义务：

“我们决不能放弃它——指斯大体格勒，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复得，”

并将“重大物质”损失作为论据。

对此，只有蔡茨勒随声附和地说：“在斯大林格勒，我们拥有强大的炮兵”。希特勒立即以铿锵有力的语调，重申了他的决心：“那里的一切，我们都无法替换。如果我们放弃了斯大林格勒，就等于放弃了战局的全部含义。”

12 月 18 日传来了意大利第 8 集团军崩溃的消息，它对斯大林格勒的形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几乎不到一个月，就在 1 月 15 日那天，匈牙利的第 2 集团军也土崩瓦解。失败接踵而来。同一天，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也被突破。这给大本营增加了新的忧虑。然而，当时就有些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似乎还有人这样发问：在迅速变化了的形势下，为什么不从新的角度考虑斯大林格勒以及几十万士兵的命运？当 1943 年 1 月 15 日，德国全线已大大后撤，当俄军逐渐缩小对这个城市的包围圈的时候，希特勒还委托航空部国务秘书米尔希元帅，“要竭尽全力地保证第 6 集团军的给养”，这不是故作姿态又是什么？

人们一再地为这场灾难寻找托词，说什么正是由于在斯大林格勒牵制了强大的俄国军队，才使东线南翼部队的撤退成为可能。如果是这样，那么希特勒在几周前和数月前所犯的严重指挥错误，也不能因此而被一笔抹掉。同样不能为他的错误解脱的是，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他还顽固地凭借手中的大权，通过高加索北部的来信部队和第 6 集团军，剥夺了他刚刚任命的统帅的权力，力图左右形势。就是这个人，在 1 月 22 日晚回绝了蔡茨勒将军受曼施泰因之托“提出的问题：现在是否可批准第 6 集团军投降？”与此相反，他却提出新的要求：“第 6 集团军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1 月 28 日他甚至象抛弃尸体一样，将第 6 集团军的幸存者和尚在战斗者一脚踢开，开始“重新组建第 6 集团军”①。还是这个人，当 1 月 31 日斯大林格勒的战事结束之时，还用污秽的语言辱骂他的高级军官。他自己早已放弃的尔西，绝不允许另外

一个人按照他的观点放弃！

下面的这份 2 月 1 日的部分记录稿，可以引起读者在某些方面的特别兴趣。这里，首先应该指出希特勒在以后的时间里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态度。他早在 2 月 1 日就再次强调，“无论如何要保住”顿涅茨盆地，并进而声称，不拥有这个地区，“他就无法继续这场战争。”

第 29 号记录稿片断

1942 年 12 月 1 日傍晚，“狼穴”

……①

蔡茨勒：曼施泰因集群在科捷利尼科沃，没有发生异常情况。今天奇尔一线遭到猛烈攻击。从曲克上校防守的奇尔火车站经亚伯拉罕集群，施密特集群，直至菲比希集群均遭攻击。在曲志上校防守的整个地段敌人的全部攻击均被击溃，俘获敌人 100 名。据昨天报告，附近一地段被敌人突破一个小缺口。今天，这个突破口遭到攻击，但敌人未能取得进展，因为敌人要远程向这里开进。我摧毁敌人数辆坦克。明天将投入第 336 师一部，将敌人击退。

另一地段也遭到攻击……他们击毁敌人 3 辆坦克，保住了阵地由施密特上将指挥的另一地段，击毁敌人 6 辆坦克，保住了阵地。

菲比希集群防守一个名叫吉尔耶夫的小地方，敌人大约 1000 名骑兵蜂拥而至。有趣的是，他们都成了第 40 近卫师和第 321 师的俘虏。这两个师至今仍驻扎在第 6 集团军的西北角。据俘虏说：他们是经过 3 个夜间的急行军赶到这里的。由此人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想削弱第 6 集团军，给奇尔的前锋以压力。然而，第 6 集团军今天只遭到轻微的攻击，同时得到约 100 吨的空投给养①。北部战线的情况：第 22 装甲师和霍利特集群，均未遭攻击。可是今天下午，敌人向霍利特集群、后方的通信联络及其司令部投掷了大量炮弹。这一贯是他们为尔后的进攻所做的准备。

意大利人基本上安然无恙。“帕苏比奥师”遭到强大突击部队——2 至 3 个连——的进攻。结果却成了意大利人的俘虏。敌人扬言，明天还要进攻帕苏比奥师，并将整个阵地摧毁，准备投入一至两个师的兵力和 200 辆坦克。我已命令集团军群注意那里的动向。在罗马尼亚防守的地段，敌人也开始发动进攻。集团军群已派第 298 师的一个反坦克连和第 298 师的一个工兵营，增援帕苏比奥师，第 298 师的第 1 旅第 3 团已开到帕苏比奥师左翼后方，处于待命状态。此外，空军的一个高炮群也开到帕苏比奥师后方。这就是我们眼下所能做的。

5 天前，我给意大利人派去一名防空专家，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仓库，存有 9000 发空心装药弹药。现在，他与德国工兵教导队一起，把弹药带给意大利人。这样，意大利人就有了用穿甲弹和炸药装备起来的德国工兵突击队。

约德尔：法国军事指挥官报告说：昨天异常平静。市民的态度没有明显变化。被遣散的法国士兵中没有闹事。在塞纳一卢瓦尔行政区长官邸，发生了一起抢劫事件，当时法国警察干得不错，逮捕了一个恐怖集团的 6 名武装肇事者。

元首：好！警察干的好！我们要抓住他们不放，而且只能和警察一块儿干。希姆莱很了解他的警察。他利用不正当的手段，慢慢地与他们拉关系。这将是一个与警察结成的联盟！约德尔：警察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元首：在这个国家，警察比任何人都可憎，他们寻求比他们国家更高的

权威做自己的后台，那就是我们。他们一再急迫地请求我们不要离开他们的国家。

约德尔：几天前，在帝国从事义务劳动的法国工人己超过 20 万。

元首：不会增加。他们主要是一无所有。可另一方面他们会说：至少对我们来说没有战争危险。当然，他们不要战争。战争究竟为了什么？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有同感，即整个战争是一场疯狂。

约德尔：请允许我谈谈非洲的领袖问题①。当然这是个组织问题。它是意大利人的敏感区。不会很久，他们就会说：当然我们在战场上也必须有指挥。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元首：第一，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丰功伟绩。第二，如果敌人真的在那里发起了攻势，那就不会有一个意大利人为胜利作出担保。

约德尔：正因为如此，意大利人完全没有说到我们在这个战场上悄悄地进行着指挥。他们对此没有说过一句话。

元首：他们也不能说什么。那里至少有我们 4 个摩托化帅。如果把伞兵算在内，那么就是 5 个师，再加上 2 个步兵师，就是 7 个帅。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单独以 7 个师的兵力进行着这场战争。他们却打不了。从物质上讲，也必须是我们自己进行这场战争。因为，他们要横渡大洋。当我们制服法国人后，我们也可以在海上运输方面支援他们。假如我们治服不了法国人，我们也就没有舰船。如果我们解决了那里的问题克兰科：我们就可以将突尼斯送给他们，然后我们取下阿尔及尔。

元首：他们可以全部接管过去。

博登沙茨：防空任务必须由我们自己担负。

凯特尔：还有运输！

我们要提一提剿匪斗争。昨天恰好有这样一份命令。元首：我认为有一个前提很重要，这就是剿匪必须有成效，这是一条原则，要时刻提醒人们。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命令的要求，但其行动确实取得了成果；或者一个人处在危险境地，他只能以残忍的手段来应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能取得成效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其目标必须是，消灭匪徒，恢复安定。否则，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在国内采取正当防卫法那样的境地；就会导致德国警察名存实亡，就会导致没有一个士兵敢携带武器，就会成为一项有伸缩性的法律条文，使一些不幸杀人的人总是嘀咕：我不幸杀死了人，也害了自己！他要杀死我，我也同样受害。因此，我只能有节制地对待他人，使他失去战斗力，但并没有伤害他而我自己仍保持战斗力。这个关于正当防卫权力的富有伸缩性的法律条文，实际上使每一个携带武器者，都成了受害者——不管是警察还是军人最恶劣的是导致了察波恩①事件的爆发，而警察方面却故技重演。一方面命令：你必须行动！另一方面又违背了正当防卫权力。

因此，我认为这里必须增加一个前提，那就是“消灭匪徒而不伤害其他一切是人们的最高义务。因此，凡是有助于消灭匪徒的事，都是正当的；反之，凡无助于消火匪徒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这样，每个人就有了行动自由。如果那些猪猡在伤害妇女和孩子，他们该怎么办？我在开姆尼茨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在那儿，红色猪猡向我们啐唾沫，同时把孩子拉到前面作挡箭牌。假如我们要碰孩子们，那我们就要倒霉了。

在剿匪斗争中也是如此。如果匪徒们把妇女和孩子当作挡箭牌，军官和士官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匪徒射击。关键的是冲过去，把匪徒消灭。对于

携带枪支者，人们必须给他一个可靠的靠山。可以给他们下达一般指示，但同时还必须给他们提供可靠的庇护，免得让穷鬼们说：事后还得由我负责，如果猪猡们在一座房子里，并设置了障碍物，在这间房子里还有妇女和孩子。您认为该怎么办？是点燃这座房子还是不点？如果点了，就会烧死无辜。这是不成问题的！必须点燃这座房子。人们不能这样说：一个一般人是不可以这样干的，只有军官可以；不！如果穷鬼纠集六，七个人站在那里，他该怎么办？认为这只是军官的事，这正是警察的悲剧。到什么时候警察身边也不能站一名军官！可怜的官员总是六亲无靠。正困为如此，法国的警官才投靠我们德国警察，因为他们第一次从我们这里找到靠山。这是法国警察从未经历过的！当巴黎动荡不宁、每日枪声不断时，法国警官每天都提着脑袋过日子。一方面，他们受命保护议会，对付示威者。可如果其他人采取行动了，警官又该怎样保护吧？如果警官们不能保护议会，他们就要受到惩罚，因为他们没有去做。那么，他们就只有开枪，这样做又要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开枪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要高度小心谨慎，以免遇到小人。人们还必须经常设想士兵的心里状态。我们在这里可以脱离实际地说，理智必然是重要的。可您为什么这样缺乏理智呢？您难倒没想过？穷鬼们不会想到，他们在为生活而斗争，为生存与否而斗争！正是小人和士官们倒通过历史把事物看透了，他们敢向匪徒居住的室内射击，同时将很多的妇

女射倒在地，因为他们认为不这样就不能通过居民区。

约德尔：但是，在这里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匪徒们在战斗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可以绞死他们，把他们倒挂起来或将他们五马分尸，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唯一控制的方法，就是战斗后，在匪徒生活过的地区采取报复、镇压手段。但这是一种（党卫队）帝国领袖自己都认为必须要小心谨慎的行动。他说：我必须确保不能由此扩大匪区，以及将全部男人都赶跑。否则，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传出去 2000 名男人就会呼啦一下子又都跑到匪区去了。不注意这一点，就谈不上什么可以和不可以的问题。这是经验。

元首：但是最基本的是，在履行义务时，必须运用最强硬的手段。要绝对有理，而且无论如何要有庇护。

约德尔：更多的是在于指挥。不管怎么说党卫队在行动上是富有经验的。

元首：党卫队是有经验的。但是您听过没有，由于他们有经验，人们是怎么谈论他们吗！人们说他们惨无人道！

约德尔：这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干得很机灵，全们做任何事都是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任何国家干这种事都是如此！

元首：人们原谅他们的利诱，但不原谅他们的威胁。

凯特尔：在游击区对这些谈论不多。现在一切都合作得很好，我们很高兴。一切都在统一领导下，一块儿干。那里，无论是警察武装，还是军队，都是在巴赫一策莱夫维斯基一人的协调领导下进行的。

元首：巴赫一策莱夫维斯基是一个十分机灵的人，早在党内，我就经常把最困难的事交给他去办。哪儿的共产主义反抗无法对付时，我就把他找来他就把他们收拾了。

……

第 8 号记录稿片断

1942 年 12 月 12 日中午，“ 狼穴 ”

……

12 时 45 份开始。

元首：发生了什么不幸？

蔡茨勒：没有，我的元首。曼施泰因到达了那个地段，占领了座桥梁。敌人只是对意大利发动了进攻。这是个在夜里动员起来的团，10 点钟投入战斗。意大利人把所有的预备营都投入了战斗，这很好。

元首：我已经有好几夜没有合眼了，不知道南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布勒：真是令人担心。

蔡茨勒：因此，必须象昨晚那样尽快做些什么。如果俄国人利用这一点，说不定今天夜里就会降临一场灾难。集团军群想明天早晨才开到这个团，这样我们在这个团就还有大约 10 个小时的时间。第 17 集团军没有发生更多的情况。由于敌人要在克里木登陆，再次出现了关于间谍的报道。他们想挑选恶劣的气候或大雪天作掩护。

元首：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的海军也能挑选这样的天气！？约德尔：这样的天气是不能登陆的。

元首：俄国人却能，他们照样通行无阻。我们在大雪纷飞的恶劣气候里是不能登陆的，这一点我承认。我相信俄国人做得到。

克兰克：事情并不太糟。如果严冬来临，整个大地冰封了，那时就坏了。如果只降到零度。还可以。

元首：这当然可以，这就好比在雾里登陆一样……我想说说这个格鲁吉亚营或这个连。说老实话，我根本不知道格鲁吉亚人不是穆斯林。因此，不能把他们当成土耳其营。格鲁吉亚人不属于土耳其民族。格鲁吉亚是高加索种族，他们与土耳其人没任何关系。我认为，只有穆斯林可靠。其他一切民族都不可靠。在哪儿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民族，要百倍警惕。我认为组建纯高加索种族的营，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但如果真的组建穆斯林营，我看倒没有危险。

蔡茨勒：为了积累经验，我到下面去时，曾提出过一系列问题。波罗的海有一位俄国将军，回答了有关格鲁吉亚人问题。他很坦率地说，我们从格鲁吉亚人那里既没得到好处，也没得到害处。他们也是如此。

元首：这我相信。他们是想撒手不管。第二，听说他们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靠的。斯大林本人就是格鲁吉亚人，因此他们很多人都跟共产主义分子眉来眼去。他们有一种独立性。只有土耳其民族才是真正的穆斯林。格鲁吉亚人不是土耳其民族，而是土耳其——高加索种族，甚至可能还有某些北方血统。我也不相信亚美尼亚人——尽管卢森堡和军方进行大量宣传。我认为亚美尼亚人同样不可靠和危险。我认为唯独纯穆斯林人即真正的土耳其民族才是可靠的。但是，他们在军事上是否都有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无法评论。（呈上国防军最高司令部的每日战报）……

元首：您只告诉我一点：当时被搞坏的那些坦克在哪儿？

蔡茨勒：就在第 22 装甲师上方。我是否命令他们在这里做好准备？

元首：关键是夺取这条大街。

蔡茨勒：这条街垒关系不大，因为从这里还有一条小街。只要我们确实封锁住了这条军用公路，敌人可能就要利用这条小街。

元首：我们必须在街对面站住脚，尔后才能夺占这条街。这是很棘手的事。

蔡茨勒：我们不可能做到。那样就会将现有的一点预备队用光。

我已计算过了。山地团 20 日才能到达这里。

元首：是否到 20 日他们就能扭转事态，还是个问题。搞不好，我们就得从这里退却。

蔡茨勒：我相信，他们在气质上还是相当强大的。

元首：我总是害怕在退却时，他们会把物资丢掉。一支部队如果没有物资，就什么也无从着手，更谈不上什么士气。

蔡茨勒：已准备好几天了，要夺回这条街，这里只有一道阵地，里边就更少了。

第 16 摩托化师进行了一次漂亮的突击，活捉了 150 名俘虏。

元首：他们没有打运动战，他们丢掉了坦克，打的是阵地战。

蔡茨勒：翼侧本来还可以更向前推。正面推进得比较少。我已弄清楚了后撤命令的来龙去脉。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他（曼施泰因）打了点折扣，他想下达撤退命令。

这里的形势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曼施泰因给我来电话，说他夺取了这一地区的一座桥。第 23 装甲师现在感到有点吃紧，他们似乎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去了。

今天一整天的战斗都异常激烈。他们占领了里切夫。这座桥特别讨厌。因为它是通向对面的纽带。进攻继续向这里

扩展着。我们窃听到了敌人第 8 骑兵军的电话，他们想转入防御。

上面还有一点不清楚，即敌人本来想干什么。

第 6 集团军在这里主要担任攻击任务。曼施泰因元帅今天来电话询问这次进攻的给养。他己写成书面报告派人送来。

元首：他距这里有 80 公里航程。

蔡茨勒：他已送来了书面报告。您可以再看一遍。他把第 16 集团军抽走，使整个罗马尼亚战线全垮了，再也未能恢复秩序。也许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一缺口，将装甲部队送进去。否则他竟提出这种建议，真使我吃惊。

元首：他在那么拥有的兵力，还是有点指望。他在那儿一直有两个强大的师，一个师有 95 辆坦克，另一个师有 138 辆坦克。

蔡茨勒：如果这 2 个师抽走，这自然是冒险的。

元首：我承认这一点。但是还有空军部队随时可以调用。下一个步兵师什么时候到？

蔡茨勒：时间很长，大约 8 天。我们希望第 11 装甲师能够投入，才能承受住敌军的攻击。如果第 11 师不行，那么那两个装甲师要停止行动。第 23 师将坚守一侧，必须这样做。

这样就只剩下第 6 师，难以抵挡敌人的反突击。如果我们把上面的第 17 师抽走，那也是一种冒险。但是，两个装甲师可以停止进攻，这样，两天后就有可能将第 17 师调来，那样，也许会失去 1 天时间。

元首：他想把第 17 师往这儿调吗？

蔡茨勒：他想调。

元首：第 17 师根本没有一点用。

蔡茨勒：那么第 11 师怎么样？

元首：它仅剩下 45 辆坦克。

蔡茨勒：它现在还有 49 辆坦克，损失很小。这个师已将 1 个营配置在北

部。还有第 306 师的 1 个团，作为临时增援。元首：第 11 师什么时候损失这么多坦克？他们在北方时，还有 70 到 80 辆坦克呢。

蔡茨勒：据我所知，他们到南边时只剩下 49 辆坦克。元首：又是一笔损失。

蔡茨勒：这是自然的，每天都会有损失，明天损失如何还要看天气怎样。

豪辛格：第 11 装甲师到南方来时曾有 57 辆坦克。

元首：他们在北方时损失了 73 辆或 75 辆。

蔡茨勒：我再核实一下，这个数字我已记不请了。依我的经验，在这种天气里，大概总会失去 10 至 20 辆坦克。元首：下面我想听听其他方面的形势。我们书归正传。

蔡茨勒：这儿总的看没有更多可谈的了。昨天，意大利人打开了一个 1200 米的缺口，昨晚经过急行军，于 10 时赶到这里，如果发生情况，他们可以投入战斗了。似乎形势还比较稳定。如果今天上午这里发动进攻，这个团总算没有在这里白等。昨天敌人在这里进行试探性的进攻，今天早上又是这样。敌人已占领这里的一个地段。此后集团军群自作主张，急速将第 385 师 1 个团投入战斗，又命令第 385 帅增援这一小段阵地，这样把（意大利）“ 科泽里阿 ” 师解脱出来。我认为这样调动是正确的。

元首：这儿的进攻是否都被敌人击退？

蔡茨勒：仅在这一处。第 385 师 1 个团在这里作战，第 385 帅已接管这里的指挥权。

元首：可这儿是陡坡，是不是？

蔡茨勒：是的。这里对坦克很保险。他没有报告坦克的情况。元首：如果我们再有 14 天时间，这支部队就会开到这里。我想把这些坦克送给意大利人。实际上我们损失了 14 天时间。

但另一方面，还有 3 个德国师在这里，您知道吗，在铁路未很好发挥作用之前，这几个师的给养仍然很困难。蔡茨勒：现在的供应已开始紧张。当时就已经很紧张了。现在我们只能靠部队运输。人们每天晚上都和总军需官开玩笑：你是不是就以这种 “ 列车 ” 给我们搞运输。

元首：这条支线是不是已经完工了？

蔡茨勒：这条铁路线已经完工。

元首：全部？

蔡茨勒：是的。

元首：完全可以通过？

蔡茨勒：是的。已经可以使用了。只是还有点儿美中不足，不是完全用碎石铺轨。这已经是尽力而为了。元首：说来说去，前线还是最危险的。我们的盟国太软弱了，而且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依靠。现在舒尔特旅已经来到，随后还有我们的随伴营。舒尔特旅将插进去，至少能抵住那里的进攻。这是一道小封锁阵地。现在 “ 科泽里阿 ” 师怎么样？

蔡茨勒：据我所知，有 6 个营。

约德尔：1 个常规师今天刚到，还没有投入战斗。

元首：“ 库恩泽 ” 师呢？

约德尔：这是 1 个山地帅。

豪辛格：有 3 个山地师。

元首：很好。那么 “ 策勒雷 ” 师呢？

约德尔：“策勒雷”，“托里诺”和“帕苏比奥”师都是老牌师了。“3月3日”师是由法西斯分子组成的。

蔡茨勒：还有1个“l月3日”师。

约德尔：这也是个法西斯师。

元首：他们是被调出来了，还是继续留在那儿？

约德尔：他们都作为预备队使用。

蔡茨勒：第27装甲师也不怎么完整了，已用处不大了。

元首：我只考虑一个问题。这里没必要再投入兵力了。如果敌人从这里下手，他们也不会再投入更多的兵力。

蔡茨勒：最多将第306师的1个团再投进去。这是唯一的解救办法。集团军群已建议，将集团军群1个团拉到这里。

元首：第17装甲师有多少辆坦克？

蔡茨勒：也很少了，只有58辆。

元首：这完全没用了。这里根本用不上。他们至多只能发射破甲弹。

蔡茨勒：第11装甲师还有30多辆重型坦克。

元首：只能对付步兵和T—34型坦克，可以发射穿甲弹。他们还有多少辆轻型坦克？

蔡茨勒：总共还有19辆IV型坦克和29辆III型坦克。元首：它们当然也可以发射装甲弹，但作为进攻用，只有第11装甲师有用。

蔡茨勒：是的。因此我很高兴，这个师可以过桥了。

元首：现在还不能。如果这一地区一丢，桥也失守了。

蔡茨勒：今天的战局如何，还不好说。

元首：舒尔特旅什么时候到达？

豪辛格：他们已经起程，第一批列车今天到达。

元首：列车要开到哪儿？

豪辛格：首先到米列罗沃，然后再到这里。

元首：我们的元首警卫营去哪儿了？

蔡茨勒：去第17装甲师，与舒尔特旅同时出发。

豪辛格：如果按计划的话，18日准时出发。

元首：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将这个旅和这个营编在一起？

约德尔：可以编到第11或第17装甲师。

元首：在这儿，也要组建机动预备队。这个问题必须考虑一下，这个营无论如何要装备现代化武器。也可以编到第17装甲师，使这个没有多大作用的师强大起来。我已想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临时将这个师拉到这里。他们有21辆坦克。不管怎么说，他们多少还有点机动能力，还可以在这儿发挥点作用。

蔡茨勒：看样子，这个地区眼下还没有危险，要有也是以后的事。

元首：敌人行动如同闪电，如果它突然来到这里，我们在这儿却没有配置兵力。敌人会声东击西。人们当然可以说，已经调来了第306师1个团。但这是起码的，仅这点兵力是不保险的。如果将第17装甲师拉到这儿，把第11装甲帅替换出去呢？第11装甲师现在怎么样？

蔡茨勒：第11装甲师不错，很能打，立了很多战功。这个师总共还有5个营，1个战斗力很强，其他4个中等，有29门中程反坦克炮，6个轻炮兵连，3个重炮兵连，百分之百具有机动力。估计损耗近三又二分之一，还有7

辆III型轻型坦克，30 辆III型重型坦克，5 辆IV型重型坦克，45 辆坦克还有 2 级战斗力。

元首：提到了战斗力，引起我的考虑。

对战斗力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个是部队本身所具有的战斗力，另一个是部队的状况。状况和战斗力是两种完全不同概念。

施蒙特：状况是次要的。

元首：否则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非常勇敢的师，遭受惨重损失，被称为 2 级师，只是因为它勇敢地战斗了。相反，另外 1 个师，他守在一个阵地上，被称为是好的，因为它还满员。因此，人们必须将部队状况和能力区分开来。

蔡茨勒：屈希勒尔大体也这样作了报告。

（呈上报告）

元首：必须抓部队的能力，它是由部队的某本价值，部队的整体状态和部队指挥构成的。这样就有了一个初步轮廓。部队的指挥和状态、是部队的内在的气质，再加上目前状况，否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图象。除此之外，我还要说一点，一支部队尽管一时状况很坏，但它的气质极好，经过艰苦的磨炼。另一支部队状况虽好，却气质不好。我吏喜欢前者，而不喜欢后者。你们看看这儿的部队：都处于一种根本没有战斗过的状态。我宁愿用一个被削弱的、但气质很好的师取代这里的部队，即使它己消耗百分之三十，我也非常高兴。这是关键的，尔后才能勇往直前。

蔡茨勒：我主要忧虑今后几天的防守。如果敌人真的进攻这一地区、二三天以后部队才能开到这儿。

元首：对方也有困难，敌人要通过每条铁路线将部队从遥远的地方运到这里。蔡茨勒：敌人正是利用铁路将部队运到这里。对敌人来得这么快，我也感到惊异。

元首：对面的两座大桥，必须命令空军炸毁。克里斯蒂安，这条铁路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毁掉，决不能让敌人利用它。蔡茨勒，我考虑总的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它①。失而不会再复得。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没有能进行突然袭击，可惜这次又晚了。如果我们在沃罗涅日不是呆那么久，进程会更快一点。那时一次就能成功。现在还要来第二次。如果我们后退，把物资丢在那里，那才可笑。所有的马匹都疲惫不堪，已经没有力气拉东西了。我不能用 1 匹马喂另 1 匹马。如果是俄国人，我可以说，l 个俄国人可以吃另 1 个俄国人。们我可不能让 1 匹老马吃另 1 匹老马。不能说 2 天之内给我一顿燕麦吃，我就有力气了，马也如此。2 天之内马不会好多少。还有很多重型迫击炮就丢在那里。

蔡茨勒：我们还有大量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在里面。

元首：我们在那里的所有东西，绝对不能替换下来。如果我们放弃了它，就等于放弃了这次战局的全部意义。可以想象，让我下次再到这里来，简直是发疯。现在是冬季，我们可以尽一切力量构筑防御工事。敌人有可能利用我们的铁路运送物资。一开冻，敌人还可以利用伏尔加河运输。他们懂得他们依靠什么。因此，我们绝不会再来这里。因此，我们也绝不离开这里。为此我们要付出血的代价。我看，当春天洪水泛滥，这一地区就要淹没，我打算那时再干。虽然还需要好几周时间，但到那时，这一地区肯定要全部被淹没。这些河谷低洼地，部分宽达 20 至 30 公里，河谷下端更宽些，还有一些

小岛。可以看到，在城市附近没有开垦耕种，这只是个岛子，其他都是灌林丛，春季一到，都肯定被水淹没。克兰克：首先得等到冰雪融化。

元首：然后就可以了结那里的事情了。那时，我们也可以将炮兵从低洼地带转移，也不会再为此担心了。

但是关键的是，必须把这件事坚持到底。当然，无论如何必须了结此事。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一地区——把它比作一条口袋——我曾与哈尔科夫做了比较。这就是一条口袋。哈尔科夫口袋几乎一直延伸到克拉斯诺达尔。

豪辛格：也延伸到这里。

元首：也许还更大些。但情况大体类似。唯一不同的是，敌人在这里有一条铁路。此外，还有另一条铁路，是意大利人修建的，正在修建中，还没通车。

蔡茨勒：还没有修好。我想明天带一名铁路员工和总军需官，进一步商谈此事。

元首：应该怎么看待整个的事情，其前提是要首先相信，全部历史并不会到此结束。

总的来说，我要在这里投入 1 个德国集群，以结束这段历史。下一次关键性的突击就靠它了。但能否实施，还要等着看，还有希望进行两面包围。但我们能否进行，还成问题。将兵团运到这里，是可能的，问题取决于我们能否修一条较长的铁路，保证供应，我们才能在这里组建两个装甲集群。

我想，首先是将这条口袋撕碎，然后再进行这场酝酿已久的突击。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攻下去，敌人必将从口袋里撤走。但是我们能不能攻到这里。更多的就没有什么可能了。敌人显然是等待两件事。首先它期望我们从这里推进。因此，我认为应从南向北进攻，开辟整个局面，然后继续向东进攻。当然，这都是不现实的。首先应当做的是，为此解脱部分兵力的手脚。当然，非常关键的是，今天意大利人会怎么样。我只是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从这儿①继续走下去，你们能不能负起这个责任？约德尔，我现在取消一切活动。

约德尔：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元首：这我承认。现在的事情总是一块儿来。我们离开专列后，什么时候取得联系？

约德尔：一般来讲每 2 小时联系一次，3 个小时没有一次联系的情况很少。一般都是 2 小时一次，有时还更多。博登沙茨：只要无线电发报机能正常工作，就能取得无线电联系。

元首：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能够利用无线电发报机得到吗？能做到吗？

约德尔：做不到。

海韦尔：只有在火车站可以用电话联系。

元首：在每个火车站都行吗？

约德尔：在临时车站没有在固定火车站上的效果好。在固定火车站上随时都可以取得联系。

元首：如果我创造奇迹，我也就不去柏林了。我们走着瞧吧。蔡茨勒：以后的几天将是非常艰难的几天。

元首：我看在这儿就有巨大危险，因为那儿什么也没有。现在好了，来了 l 个团。这就是说，现在这儿的兵力多了一点。如果把第 17 装甲师调走，这儿就没东西了。如果每条铁路都能搞运输，那么第 17 装甲师就解脱出来

了。舒尔特旅有 21 辆现代化坦克，要比第 17 装甲师的老式装备强得多。第 17 装甲师怎么样？蔡茨勒：有 5 个兵力强大的营，这是曼施泰因的主意。

元首：我知道了。

蔡茨勒：舒尔特旅还没有经受进攻战的锻炼，只能防御。他们有大量的反坦克炮，有 50 门。

元首：如果有可能或出现危机，可将第 17 装甲师调过去，但无论如何要把舒尔特旅部署在米列罗沃地带，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把他们调上来。

约德尔：这次进攻是否已决定由一支新部队担负？

蔡茨勒：时至今日还没有报上来。

元首：约德尔，您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3 天后，这儿也会发生这种事。那些畜生已经把事干完了。他们向这里运送了 2 个月的物资，最近几天又在运送部队。他们突然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旅。在这些旅的背后什么也没有，这实在可笑。如果我用三四个师进攻，我保证处于优势。

蔡茨勒：他们今天必须作出决定。不论在这儿和在那儿都有危险。风险是必须要冒的。

元首：他的部队拉过来了吗？

蔡茨勒：第 23 师今天早上从侧翼迅速向这里移动。因此，今天第 23 师可以停止前进，第 6 师继续前进。

元首：随后来的空军部队怎么样？

蔡茨勒：是的，他需要空军掩护才能继续前进。

元首：没发生什么情况吗？

蔡茨勒：没有，他首先是接过阵地。

元首：这样，他又得了 2 个兵团，在这里还有 3 个兵团，3 个兵团中第 29 师最强。我想第 3 摩托化帅已经完蛋了。第 297 师……蔡茨勒：比较好，还过得去。

元首：我认为他只能担负防御任务。

蔡茨勒：第 297 师今天应大受称赞，无可指摘。

在报告中有一段较长的文字是描述这个师的。

元首：是的。不久第 306 师也将过来，但有 1 个团将离开。这个师有 3 个团。

约德尔：这个师百分之百满员，有 9 个营。

元首：是的，l 个团已经拉走。它装备有 90—76 毫米口径火炮，当然都是自行火炮，是吗？

约德尔：不，都是牵引炮。

元首：这个师还有 6 门炮，第 22 师现在有 18 门。

蔡茨勒：是的，其余的都被炸毁了。

元首：10—75，20—75 毫米口径火炮，火力太弱。已从第 294 师抽走 1 个团，这里可没有预备队。

蔡茨勒：我相信战役照样能很好地进行。

元首：这儿会怎么样？

蔡茨勒：机动和坦克，而且要挖战壕。

元首：敌人一直在挖战壕，然后匆忙离去。

蔡茨勒：他们会再次匆忙离去，战壕可以防寒。

豪辛格：在这儿，敌人有 16 个步兵师，2 个坦克旅和 4 个骑兵师。

蔡茨勒：形势会瞬息万变。以后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约德尔：对方不会在全线发动大规模进攻，只能进攻意大利人和这里。

蔡茨勒：我说过，这是唯一的可能。他们只能是在这儿干一点，又到那儿干一点。这都是人们可以感觉到的。

元首：什么时候做出决定？

蔡茨勒：越早越好。

元首：如果我们今天做出决定，至少可以看看那儿的进攻会怎么样。如果进攻顺利进行，就根本用不着派舒尔特旅到那里，否则，无论如何也得将这个旅送去。这个旅什么时候到达？

豪辛格：首次列车今天开出，18 日到达。元首：舒尔特旅是不是都是摩托化部队？

博登沙茨：是的，2 个营都是摩托化部队。

元首：他们有可能从米列罗沃来。

布勒：这是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

博登沙茨：它有 3 个连，共 40 门反坦克炮

元首：这我承认。但是，我也可以把我们的警卫营加上去，它也经过进攻战的训练。它的 21 辆坦克并不是为了防御用的，参加过许多地方的反突击。

博登沙茨：那儿还有一支混编高炮营，编有 3 个重炮连。这是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

约德尔 :有 36 门重型反坦克炮和 3 个装备有 88 毫米口径火炮的炮兵连。

元首：如果我们在那里有了这支部队，我就放心了。

第 47 号记录稿片断

1943 年 2 月 1 日中午形势讨论会。元首：我再考虑一下。但是我要说：以攻势行动结束东线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了①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蔡茨勒：是这样！

元首：因为没有物资，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不能用人去抵挡。人我还是有的，但我没有物资。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现在仅有 5 公里宽的地段（指每个营的地段），但我能供给他们大炮和弹药。以后，我可能仅有 3 公里宽的地段，但我却没有大炮和弹药了。如果认为在 3 公里宽的地段上没有弹药也比在 5 公里宽地地段上有弹药，能更好地战斗。这种计算是正确的。蔡茨勒；是的，这是个问题。现在还关系不大，但将来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元首：不！以后和眼前都是大问题。当前，全部的坦克装备计划已经失算。我们的全部坦克计划必须立刻停止，它依靠的是电炉钢……还有火炮计划。我们每月生产不了 600 门大炮，但可以每月制造 150 门。庞大的弹药计划也必须马上停止。

目前，它的产量不断下降，不是一般的下降，而是急剧下降……。我从它那里什么也没得到。如果我要退却，我将会……失掉这些，这是一场无可求药的混乱，而别人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可有过退却的教训。

蔡茨勒：事情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不退却，情况会更糟。部队必须从这儿退却，向南，撤到这儿的装甲集团军。

元首：一开始我就说了：我很清楚，如果我不能在这儿成功，那么这里就只剩下 2 个桥头堡了。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象曼施泰因想的那样好，部

队不退却，就好了，否则，一切都完了。如果我向曼施泰因让步，部队将永不复返……，他将不会撤问装甲集团军，撤不回第 17 集团军，一切都会土崩瓦解……我一直担心他这么长时间呆在那里……

蔡茨勒：我还在考虑，在第 4 装甲师之后，立刻把第 337 师从法国调来，加上第 78 师一部，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始组建一支小的兵力集团。但必须以党卫队打先锋。如果我们把党卫队“帝国”师调到北面去，它肯定可扭转形势。但这要拖延很长时间……我们在南面被牵制住了。

元首：我们再看一青。这完全取决于第 4 装甲师行动怎么样。第 4 装师情况怎么样？

蔡茨勒：有 15 个排在途中。他们进展很慢，因为很多装备都被炸毁了。有 7 个排今天应该到达。

元首：如果第 4 装甲师到达，我们就有了 1 个兵团。随后还有第 337 师，我们就又有了 1 个兵团，后边还有第 78 师，这样加起来，我们就有了 1 个集群。也许依靠这些力量，我们就可以开始干了。就等着瞧吧，如果我们这样开始干……（下面的话是关于俄国的一份报道。报道称保卢斯元帅及其他将军们，其中包括冯·赛德利茨将军和施密特，在斯大林格勒的南部包围圈内被俘。）他们完全是把这一地区拱手让给俄国人的。否则，他们可以组织在一起，组成环形筑垒阵地，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以设想一下，一位妇女出自于自尊心，只听到两句侮辱的话，他便离开家门，毫无犹豫自杀了。而一个军人却被死吓倒了，甘心情愿去当俘虏。我看不起这种军人。

蔡茨勒：我也不能理解。我总认为，情报不属实，他也许在那里受了重伤。

元首：不，完全是真的。他们马上到了莫斯科到了国家警察局，他们还拼凑了一份命令，命令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包围圈也该投降。施密特会在一切文件上签字的。他没有勇气走上在这种时刻每个人都必然要走的路，他也没有力量违抗这一切。他的心灵在受折磨。这唤起了我们更多的理智，却很少有不屈不挠的意志……。

蔡茨勒：还根本没有弄请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元首：您不要这么说！我这里还有一封信……是贝洛收到的。我可以给您看。他（指从斯大林格勒来的一位军官）在信上说：我从其他人那里得出以下判断：“保卢斯：问号；塞德利茨：击毙；施密特：击毙。”

蔡茨勒：我也听说塞德利茨情况不妙。

元首：在德国，和平时期每年有 18000 至 20000 人选择自杀的道路，而且不是象在现在这种形势下。而今天，他看着他的士兵勇敢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有 4.5 万至 6 万人献身,他怎么能向布尔什维克投降？啊,这真是……！

蔡茨勒：这仅是一点蛛丝马迹的消息，人们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元首：我早就有所怀疑。在他被包围的时刻，他还问我，他该怎么办？将来，当一个要塞被包围了，司令官接到敌人投降的要求时，他应该问问自己，现在我该怎么办？……他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多么干脆！（此话似乎指乌德特在他任飞机总设计时，因工作失利而自杀。）还有贝克尔，他在运载武装弹药时出事了，事后便自杀身亡。他做得多么干脆！手枪确是一件份量很轻的东西，但是在它面前胆小鬼也会被吓倒！哈！还不如活埋！在这种形势下，他应当非常清楚，他应用他的死为坚守阵地树立榜样；如果他做出了这样一个投降的榜样，那就不要指望其他人再继续战斗了！蔡茨勒：他没有任

何托词可寻。他必须在精神失常以前自杀。

元首：如果说精神失常，他唯一不正常的就是他对自己说：我可永远不能自杀。人们可以这样说：过去的统帅，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事业无望时，也会拔剑自刎。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连瓦卢斯①还能命令他的奴仆：现在杀死我吧！

蔡茨勒：我总是这样想，他们也许是自杀了，俄国人却故意宣称他们被俘。

元首：不！

恩格尔：如果我可以说的话，我认为他们没有投降，保卢斯是受重伤后被俘的。他们明天也可能说，他伤重而死。元首：有没有关于受伤的详细消息？

悲剧已经发生，它应该成为一个警告。恩格尔：将军的名字可能都不十分确切。

元首：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会再成为元帅了。一切都要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再说。不要过早地称赞一个人。蔡茨勒：人们对战争的结局坚念不移，以至人们把他们的最后快乐……

元首：人们必须相信，其前提必须有英雄气概。

蔡茨勒：根本不应该有另外的想法。

元首：在众人生活的环境里，怎样能够采取其他处理办法呢？我不得不说，每个拿生命冒险的士兵都是笨蛋，他们总是拿他们的生命做赌注。当小小的俄国农民被征服以后，我还是这样理解。

蔡茨勒：这对部队指挥官来说。要容易得多。每个人都看着他。自杀对他来说并不难。但对普通人却很难。

元首：如果一个小小的可怜虫，在这种情况下这么说……我倒可以理解。但我必须说：应当勇敢地去干……这是无可争辩的。自然，无数德国人也是这样！……我们有气质旺盛的军官团，有第一流的士兵，还有占优势的武器装备。撇开斯大林格勒不说，我们仍然处于优势。使我感到痛心的是，无数士兵英雄气概，竟被这么一个意志不坚定的懦夫瓦解了。他现在正在这么做。您必须考虑到，他已到了莫斯科，您也必须考虑到，他在“鼠笼”里会供出一切。他会在一切文件上签字。他会供认，他会呼吁德国士兵投降。您会看到，他们现在已走上意志不坚的道路，并越滑越深，直至罪恶的深渊。在这里，也可以说：邪恶的行为，会继续引出新的魔鬼。

恩格尔：还有一件事：明天冯·齐茨锥茨少校将在国内外记者面前，谈到斯大林格勒的情况，是否停止这次记者招待会？

元首：不，……

恩格尔：因为他们很自然要提问题。除了其他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最好是一般他讲讲……

元首：他们是否知道一些，就是知道也不会那么详细，他们不会得出直接判断。但是，首要的是士兵的意志，如果我们不能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如果我们只是培育纯粹的理智的杂技演员、田径运动员和精神运动员，那么、我们将永远得不到能真正经受命运严重打击的后代。这是关键。

蔡茨勒：是的。在总参谋部也是一样。我第一次提升了一名没有经受过总参谋部军官训练的通信官。因为他在一个师的撤退中，以总参谋部的工作方法，进行了极为出色的工作。问题并不在于他听了 8 周的讲座。而是能立

即做出成绩我立即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已是总参谋部的军官了。

元首：是的，必须使用那些勇敢坚强的人他们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就象每个七兵献出他们的生命一样。什么叫做“生命”？…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人民而死。什么高于每一个人的生命？那就是人民。但是这好比一个人，如果义务没能阻挡他陷入痛苦的深渊，那么他就会害怕从深深的悲伤中解放出来。

据他们报道，保卢斯是被俘了。我要分清楚，是被俘了，还是失踪了。如果他们突然闯入，没发生战斗，他就被俘了。否则他们必然报道他失踪……

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么知道保卢期的情况。必须告诉北部合围圈的司令，在任何情况下也必须守住合围圈，直至最后一个人……

蔡茨勒：您是否同意，我去做这方面的事？

元首：好！我再提一下我的想法。罗马尼亚的拉斯卡尔将军与他的士兵一起阵亡了。我已给他颁发一枚橡叶形勋章，对此我挺高兴。结果怎么样呢？今天 3 点 30 分时、当我打开收音机时，俄国人正在广播：保卢斯元帅连同他的司令部全部被俘，整个司令部已经投降。

蔡茨勒：我早已预感到了！我原来想，他们将会对精疲力尽的保卢斯横加侮辱……现在看来更糟了。

元首：在很短时间内，他就会在广播里讲话，您就等着瞧吧。赛德利茨和施密特也将在电台讲话。俄国人把全们圈在“鼠笼”里，两天以后，俄国人就会把他们拖垮，然后立刻让他们讲话。一位美丽妇女，一位真正的绝代佳人，只因为一句话伤害了她，本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她却说：“我可以走了，我是多余的。”她的丈夫回答说：“走就走吧！”接着这位妇女离开了家，好写了一封绝别书后便自杀了……

耶内克在起飞前还是在起飞后受的伤？蔡茨勒：这我要查证一下。我将给耶内克去电话。

元首：我们必须搞确实！必须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司令部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们受了伤，被敌人战胜了，失去了优势，最后才被俘。

蔡茨勒：司令部的大部分成员肯定也是这样被俘的。

元首：我们必须这样说，他们根本没有投降，而是被征服的。

蔡茨勒：还可以增加这样一句：俄国人将会另作解释。在这之前，我们还要考虑一下世界舆论。

元首：就说他们数月以来已经没有给养，俄国人才得以战胜他们。

蔡茨勒：我也觉得，这样考虑比较合适……

关于俄国的报道，我们正在核实，看其中有什么纰漏没有。因为只要有一个错，比如一位将军不在其内，那我们将指出，俄国发表的东西，完全是一张在什么地方缴获的名单。

元首：他们报道说，他们俘虏了保卢斯，还有施密特和赛德利茨。

约德尔：我不知道赛德利茨是情况。您也不清楚赛德利茨是否在北部合围圈。现在要通过无线电询问一下，确定一下到底哪些将军在北部合围圈内？

元首：他肯定在保卢斯那里。我要再向您说一遍：象保卢斯这种竟然不想死的人，我真不理解。成千上万个军官和将军们的英雄气概，就是让这样一个人给磨灭了。在这种时刻，他连一个软弱的妇女都不如。

约德尔：但我还是不相信，这是不是真的。

元首：……有一对夫妻，原来生活在一起，后来男人生病死了。后来这

位妇女给我来了一封信，请求我照顾她的孩子，尽管她有孩子，但她说他不能再活下去了……然后她自杀了，这位妇女这样做，是因为她有勇气。而军人却没有勇气！您看吧：要不了 8 天，赛德利茨，施密特和保卢斯将在广播里讲话。

约德尔：我对此深信不疑。

元首：他们现在已进入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他们将被那帮家伙软化。他们怎么能如此胆小？我不明白。

约德尔：我仍然有些怀疑。

元首：我不怀疑。您知道吗，我也不相信，保卢斯是受伤了。这似乎不能肯定……我最痛心的是，我已经提拔他为元帅。我本想使他享受到最后的快乐。他是我在这次战争中提拔的最后一位元帅。看来还是不要过早地赞扬一个人。对此事我真不理解。当人们看到这么多人死去了，我不得不老实说，这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是多么容易啊……根本什么也不会想。

这样多人死去了，也许有点可笑，于是就来了这么一个人，在最后时刻里，还要玷污其他人的英勇献身精神。英雄气概可以使人从一切痛苦中解脱出来，走入永恒的、民族不朽的世界，而他却情愿走向莫斯科。怎么能作这样一种选择呢？简直是得了精神病。

约德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一直怀疑……

元首：……如果说，我今天把一座要塞交给弗尔斯特将军，我知道他会第一个把旗帜插上要塞。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可悲的是，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英雄气概被可怕地玷污了。耶顺内克：我看，俄国人有可能是故意这样报道的。他们做事诡计多端。

元首：8 天内他们将在电台讲话。

耶顺内克：俄同人可能已准备就绪，让另外一个人讲话。元首：不，他们会亲自在广播里讲话。他们都将在广播里讲话！

他们首先会要求在合围圈里的人投降，并会说，反对德国国防军是共同的事业。您肯定会看到：他们去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干“不正经的勾当”。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勇气，在这一时刻就……

我已经对蔡茨勒说了，必须给海茨鼓气，他们必须在北部合围圈里坚守。

凯特尔：他在南部合围圈里。俄国人在报道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元首：如果没有提到他，他一定是死了。

约德尔：是的。因此应当问一问现在就确定下来，眼下谁还在北部合围圈内。如果名单上的名字都在北部合围圈内。那就是俄国人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份名单，然后发表出来。另一方面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提到一个人，即哈特曼，他肯定已经阵亡了，他在南部合围圈内。

凯特尔：他是 4 天前阵亡的。

约德尔：是的！

元首：如果海茨在南部合围圈内，俄国人没有提到他……我确信，整个司令部都乖乖地投降了……。

从片断记录稿里关于北非问题的阐述中，看不出当时希特勒正在研究是否有完全撤出北非全部领上的可能性。这一点，在这一章的开头提到的约德尔给他的参谋部的指示中就已引用过。不久，约德尔又受希特勒委托，询问南线总司令部凯塞林元帅关于海上运输情况，并称“最高指挥将根据回答，采取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尽管如此，也没有采取任何能摆脱北非不利结

局的行动。

对是否长久坚守北非阵地可能性的怀疑，还必须从隆美尔那里寻根求源。11 月 29 日，隆美尔出人意料地从利比亚的西尔特沙漠来到“狼穴”，向德国最高司令部阐述他全部撤出北作的决心。希特勒一反常态，极其冷淡地接待了他，同时避开他最基本的观点——以戈林说过的向突尼斯进军只是“豹子一跃”这样一句话为依据一指出，通过地中海的供应有可靠的保证，一切要求都可得到满足①当天晚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至少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即“北非已丢失”。几天后，希特勒在任命冯·阿尼姆大将为驻突尼斯新任总司令时，又沉溺于在同盟国登陆后最初几天他所设想的那个计划里。根据这个计划，只拥有少量运输工具和重型武器的阿尼姆第 5 装甲集团军——实际上还剩下不到 2 个拼凑起来的德国帅——要一个港口一个港口地向卡萨布兰卡突击，直至将敌人赶下海去。两个星期后，德国最高司令又站到他这个伟大计划的对立面，拒绝了意大利的要求——齐亚诺和卡瓦莱罗代表墨索里尼前往东普鲁士德国大本营，紧急要求德国出动空军，以保障突尼斯运输线路的安全，希特勒竟以手段不足为由加以拒绝。希特勒对意大利人的愿望心不在焉，只是借此机会重提一遍双方“坚守北非”的决定。对此，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提出了一个基础性建议。他认为无论是突尼斯的形势，还是海上运输，前景都十分有利。1943 年 1 月 12 日，凯塞林又到“狼穴”口头报告了他的上述观点。

在最高领导层的这种态度和情绪影响下，毫不足怪，德国大本营对于及时摆脱在劫难逃的北非灾难的可能性，根本不详细讨论，更谈不上利用。在斯大体格勒失守的那些日子里，出现了一个最好的，似乎也是最后的机会。当时，隆美尔集团军在其总司令的指挥下，有意识地迅速行动，企图在不受敌干扰的情况下，与阿尼姆的部队在突尼斯会合。此时，一直在突尼斯“桥头堡”保持着优势的第 5 装甲集团军和海上形势，完全有能力将大部分部队运走①这样北非虽然放弃了，但可以拯救大量宝贵的部队。

然而，希特勒想的完全是另一套！对于他来讲，隆美尔集团军到达突尼斯国土之日，就是他的进攻计划开始之时。他在心目中的伟大的、勿庸置疑的政治和战略优势——作为最低目标的坚守突尼斯——遮住了他的眼睛。使他完全看不到在战术上创造前提的必要性，特别增加陆、海、空三军的兵力。但对于在突尼斯的指挥关系——上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及双方最高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下至凯塞林和两个并立的德国集团军——也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和处理。因为，他尽管说了许多大话，也不顾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再三敦促，最终还是把照顾墨索里尼的要求，放在军事的首位。根据最后的调整结果，南线总司令部附带取得了项成果，即他的司令部在意大利统帅部内设置了一个由德国国防军三军军官组成的指挥处。这一步骤至少说明，在德、意双方进行了三年之久的共同战争之后，出现了盟国之间比较紧密合作的局面——不管它是否能持久下去和可靠系数有多大。

在这种混乱形势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在经过多次努力后，终于 1 月底 2 月初征得约德尔的同意，亲自前往突尼斯进行一次实地调查。此外，他还借途经罗马之机，与意大利统帅部新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大将——原参谋长卡瓦莱罗因丢失的黎波里塔尼亚被撤职——进行首次接触。作者在 2 月份上半月的 10 天旅途中，先后访问了意大利统帅部，德国在罗马的南线总司令部，在突尼斯的两位德国总司令，以及德国各支部队。得到的印象使

他——如同隆美尔元帅一样——确信，目前在北非战场需要的不是进攻，而是撤退。在返回途经罗马的时候，瓦利蒙特在凯塞林一间简陋的小办分室里，单独与他坦率地谈了他的这一观点。话没说完，凯塞林便低声警告他“隔墙有耳”，不让他详谈其观点的依据。毫无疑问，凯塞林用他自己的判断来反驳瓦利蒙特仅从几天旅途中所得到的印象也完全是他的职责。同时，撇开他贯有的乐观主义不谈，他的判断也是依据于他的经验，以及无数次到前线的亲身观察。尽管如此，他也未能说服来访者。

第二天，当作者在东普鲁士大本营的中午形势讨论会上惊异地看到凯塞林元帅时，他在长时间旅途中酝酿已久的、准备向希特勒阐明——也是他曾在南线总司令部所表述的观点、顿时化为泡影。南线总司令受到希特勒的热情欢迎，并立即从他的立场出发，报告了突尼斯至地中海战场的最近发展情况。凯塞林在其内在倾向性的驱使下，再次认为，极其虚弱和极其困难的形势已经有所好转——尽管只是出现了改善的征兆；甚至谈到了战绩——尽管还只是计划和企图。不等他说完，希特勒就转过脸来，以一句对下级常用的话，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您看呢？”然而，瓦利蒙特的第一句话——仅仅是暗示不同意凯塞林观点的话——还没有说完，希特勒立刻转身对别人说：“我们是否谈些别的？”——这是他在这种场合下贯用的手法——从而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于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离开了会议室，不想忍受戈休的训斥。因为，这次他本恕驳斥凯塞林元帅对其空军的看法，使希特勒感到“忧虑”。出乎瓦利蒙特的预料之外，他刚一出来，施蒙特也随后跟了出来。并对瓦利蒙特说：“您的报告是否确实与凯塞林的想法完全不一致？元首必须要听一听。我在今天特别为您安排一个时间，您等看吧。”然而，这个指望并没有得逞，因为第二天，希特勒在约德尔和施蒙特等少数人的陪同下，前往设在乌克兰的大本营，一住便是四周。

现在，摆在瓦利蒙特面前的唯一办法，就是向约德尔写一份书面报告。在报告中，作者对直到目前还悬而未决的进攻计划，提出强烈反对意见。他首先对意大利东、西两路军队即将达成的会合提出异议。他接着指出，这股优势兵力将在 3 月中旬实施的进攻，由于缺乏保障部队，如同“空中楼阁”，是绝对不能成功的。由于目前的运输状况，连最必需的车辆的燃料都无法满足，意大利统帅部提出的每月运送 6 万吨物资的指标也只能完成一半，因此意大利自己无力通过进攻或压迫敌人的“桥头堡”来改变现状。接着，作者指出，

为了堵塞缺口，必须“撤离”。他说：“只有……有计划地采取较大规模的准备措施，才能防止造成严重后果，包括政治后果；同时才可能捍卫意大利南疆。”

瓦利蒙特的报告，在乌克兰大本营里并没有引起注意。只有同瓦利蒙特领导下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起留守“狼穴”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与瓦利蒙特共分忧虑，并与其参谋部一起竭尽全力，设法克服海上运输的困难。在突尼斯西部发起的、企图一举将盟军防线“击溃”的攻势，于 2 月 23 日被迫停止。兵力薄弱的进攻部队，又撤回出发阵地，进行改编，准备进攻东南防线的英国第 8 集团军。这时，从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又传来了人们听惯了的大话。他说。“两个集团军退回狭小的桥头堡”，是“灭亡的开始”；只有“集结强大兵力……实施短促突击”才能取得成功；要把加贝斯高地的阵地“立即建成最强大的”阵地；空军必须“加强攻击，以赢得时间”，特别是

“必须把运输量至少提高两倍，并逐渐提高三倍”。除了这些空话之外，既没有提到兵力和手段，也没有讲到时间。更有甚者，3 月 6 日至 7 日，对英国第 8 集团军发动第一轮攻击失利后，希特勒竟然解释说：“突尼斯具有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战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千方百计坚守”①。

由于希特勒对隆美尔的建议无动于衷，由于对下列一系列事态置若罔闻，终于 5 月 10 日—13 日在突尼斯酿成大祸——3 月中旬后，在盟军两面夹攻下，德意军队被迫退到突尼斯北部的一个狭窄桥头堡。接替隆美尔职务的阿尼姆，上书约德尔，“请求在战斗失利时……的指示”，结果杳无音信。凯塞林提出的关于形势对前送部队越来越有利的建议，也石沉大海。两个集团军，约 30 万人被俘。这个数字相当于在防守斯大林格勒末期所投入的部队。在此之前，直到 4 月中旬才开始撤退，但也只是撤走了一些“白吃饭”的人。空军的飞行部队和为数不多的战斗部队，才在最后时刻逃离虎口。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并没有公开咒骂前线的指挥官们。在那些日子里，作者本想代表休假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以对本职负责的精神，在形势报告中汇报一下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损失情况，但凯特尔却暗示作者保持沉默，不要打扰元首，使他能冷静地总结一下他在军事指挥上所带来的结果。也许出之同一原因，邓尼茨海军大将在第二次从罗马返回后，于 5 月 14 日向希特勒汇报告，也只字未提突尼斯的损失①。不久，即 1943 年 7 月初，希特勒在东线高级军官面前作了如下的解释：

> “对于最后导致部队和物资损失的突尼斯行动是否正确的问题，“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辩护。我之所以在突尼斯采取行动，是因为我确信以下几点：
>
> 通过占领突尼斯，可以将入侵欧洲的时间推迟半年。更重要的是，可因此使意大利留在“轴心”里。
>
> 否则，意大利肯定会脱离“轴心”。盟军就会在俄军占领斯大林格勒后，趁德国空虚闯入德国之时，兵不血刃地在意大利登陆，就会通过布伦纳山口（奥地利——译注）向德国突击。这就必然使战争更快地遭受损失。”

希特勒的这些论点，没有一条符合当时已经清晰可见的形势，也没有哪一条为此后的结果和今天已公布于众的同盟国的计划所验证。最主要的是，在他的谈话中缺少了一句话，就是如同在斯大林格勒一模一样，如果在突尼斯能及时撤退，就会避免灾难发生。

德国同意大利的关系，由于北非的这种结局，必然雪上加霜，更何况在巴尔干问题上德、意之间早已充满着紧张。由于两个“轴心国”伙伴都在诡计多端地谋求在东南欧的政治优势，因此在军事合作问题上的争执有增无减。特别是在镇压倍受意大利庇护的、以米哈伊洛维奇①为首的民族主义集团的暴动斗争中，这一争执进一步扩大。出于这些原因，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 2 月中下旬，再次受命前往罗马，以便在德国外交部长在墨索里尼面前和意大利统帅部贯彻希特勒意图时，给外长以支持，

作者坐在里宾特洛甫的特别列车上，就对这里的陌生的“地方”气氛感到不适。当他到达罗马，看到火车站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升平景象，以及许多身着黑制服的年轻外交家时，心中的不适有增无减。第二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便在威尼斯宫，向墨索里尼说明当前的形势和德国国防军三军

总司令部的愿望。在谈话中，他发觉意大利统帅部参谋长似乎对希特勒的观点和要求，不象墨索里尼那样俯首帖耳。因此，在瓦利蒙特和安布罗西奥接着举行的谈判中，瓦利蒙特就开诚布公地指出了墨索里尼的权威在意大利最高司令部里的虚弱地位。只是当双方政府首脑介入谈判，以及次日整天的讨价还价之后，双方才达成了以德国愿望为基础的一致。帝国外交部长对此感到心满意足，与他的随从们在意大利盎然地春色里度过了最后几天，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却要提前回国，心中自然闷闷不乐。谈判后的事态表明，无论是意大利一方，还是暴动一方，都各怀鬼胎，并没有遵守协议的规定。

1943 年 4 月 8 日至 10 日，希特勒在萨尔茨堡会见了墨索里尼。这只不过是在那个时期在贝希特加登举行的多次“国事访问”中的一次。据作者追忆，当时轴心国的高级代表们，常常在这里一呆就是一二天，以通报情况，讨论战争的发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常借此难得的机会，以德国总参谋部的身份，同意大利代表就两国共同军事利益方面的问题，如指挥组织、军队部署、武器供应管理和经济等问题，进行讨论。然而，希特勒对这些问题及其丰富的资料，常常漠然处之，不屑一顾。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倾向和意愿会晤——凯特尔从未参加过——不拘形式，通常根据希特勒的意愿进行的，也就是说，他把宣传看成重要的事情。然而，他却不赋予他的军事参谋部以任何权力，也不向其通报会谈结果，以避免在重大军事问题上与会谈结果相抵触。

德、意双方的会晤地点一般在萨尔茨堡具有巴罗克艺术风格的克莱斯海姆宫里。它作为“帝国政府国宾馆”，可供来访者下榻。当时，双方通常利用中午时分，举行军事讨论会，在客人面前极力宣杨战争的有利形势，对不利的形势则竭力掩饰。会后共进午餐。午餐不举行任何仪式，不讲话，不发表祝酒词，总是干巴巴地进行。有时，双方高级军官站在走廊或大厅里聆听希特勒的长篇讲话。

作者回忆起一段与此有关系的特殊经历。希特勒对保加利业国王博里斯很敬重，经常邀他来“山间别墅”作客。在国王去世前几个月的一个晚上，在克勒斯海姆出席了一次由里宾特洛甫作东道主的晚宴。希特勒未让凯特尔和约德尔参加，却命瓦利蒙特出席作陪。进餐完毕，国王离席，并向各方人士告别。然后，拉着作者的胳膊——作者以前曾与国王相识——在里宾特洛甫十分不满又充满惊讶的目光下，离开大厅，来到国王卧室。在这里，作者突然发现国王眼睛里闪着深思熟虑的目光，接着，他就形势和战争的前景，向作者提出许多紧迫的问题，希望给以坦诚回答。他们撇开法律和义务所规定的界限，进行了一个小时实事求是的严肃谈话。需要指出的是，以后作者并没有因这次谈话受到任何人的追查。然而，国王却因德国战争形势的全面衰败而未能幸免于难，主要是他自己的国家落得个山河破碎的下场。

第三章从南线到东线直至意大利的背离

新的前提与矛盾

宣传归宣传，德国最高领导人最清楚，轴心国在北非的失败意味着什么。突尼斯桥头堡一经丧失，盟军就会从北非沿海的狭窄战场转向地中海这一辽阔的新战场。强大的盟军兵力就会腾出手来，开辟长期被切断的、通过地中海的交通线，盟军就可以由此运进 200 万吨位的军队和补给品，这对于盟军来讲是何等的重要！而另一方面，地中海战区事态的发展，却愈加严重地威胁着轴心国的团结。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突尼斯失守后，立即提交了一份《意大利退出战争后的形势概貌》。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这个文件的出笼不可能不是受命于希特勒的。这个文件的出发点，是德国大本营中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认为，巴尔干地区及其防御薄弱的海岸线，正在闹事的人民，丰富的地下宝藏，以及由东南方对“欧洲要塞”实施突破战略和政治企图，都将是盟军在西线地中海地区作战中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文件继续指出，意大利的各大岛屿可能是盟军首批登陆目标，盟军将这些岛屿，以及意大利的南部甚至中部，作为越过亚得里亚海向北推进的跳板和桥梁。对此，必须予以重视，必须加强本国西部地区陆、海、空三军的防御力量，并且还希望战争尽可能在远离欧洲中心，即远离德国边境的地方进行，至少要加强业平宁和巴尔干半岛的防御。作为紧急措施，必须充分利用西线的兵源，补充正在利用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特别是来自“突尼斯桥头堡”的兵力而组建的突击集群。因为盟军主力将山西线和地中海地区转移①。

希特勒赞同这种判断并基本同意所提出的建议。但是，他与其参谋部和墨索里尼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盟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西西里岛，而希特勒则认为是撒丁，特别是当中了英国情报局设置的一个有名的圈套之后，更坚信——英国情报局设法让德国在西班牙海岸发现盟军一名被击毙的信使，从他身上搜出一份印有代号为“撒丁”行动的文件。他认为除了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也是盟军在巴尔干半岛上最有可能的攻击目标②。他认为，这可以从英国文件中找到证据。在讨论必须防守的防线时——仍不包括意大利——希特勒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克制。例如，5 月 19 日他认为。盟军对巴尔干的进攻“甚至比意大利问题还要危险，意大利问题即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控制”。突尼斯灾难事隔愈久，他愈加自信地按照其自己的方式运筹全局，并要求，德国一方也必须在欧洲周边地区坚守“欧洲要塞”。为达成这一目标他甚至准备在必要时，将其他所有战场，甚至包括东方战场的利益，置于地中海任务之后。为此，他于 5 月上旬的最后几天，口头命令陆军总参谋部随时做好由东向西南快速运送 6 个装甲师的准备，其中有 3 个党卫队装甲步兵师，他认为，这 3 个党卫队师的出现，将在意大利军队和人民心目中为法西斯分子起到一个强大的宣传作用。出于同一原因，他命令已康复的隆美尔元帅和国防军统帅部准备就绪，一旦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意大利崩溃，就代替凯塞林接管意大利的最高指挥权。他还亲自向隆美尔和巴尔干司令勒尔大将面授机宜。为防止对意大利等盟国泄密，希特勒拒绝下达任何书面指令。只有两份文件——一份代号为“阿拉利希”的行动计划——关于保障在亚平宁半岛上德国人的安全；另一份代号为“康斯坦丁”的行动计划——关于巴尔干行动——来源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计划草案。

关于这件事的细节及当时大本营的有关情况，可参考下面的速记稿片断。

第 5 号速记稿片断。

1943 年 5 月 20 日，就意大利问题与特别官员冯·诺伊拉特①的谈话。

与会者：

元首	赫维尔大使
凯特尔元帅	施蒙特少将
隆美尔元帅	舍尔夫上校
勒尔大将	朗格曼中校
布罗伊尔中将	特别官员冯·诺伊拉特
瓦利蒙特中将	京舍党卫队上尉

13：19 开始。

元首：您去过西西里？

冯·诺伊拉特（以下简称诺）：是的，我的元首。我与洛达谈过话。我过去就和他很熟。他是罗马外交使团的领导人，我在罗马遇见过他。他告诉我，他对能否守住西西里缺乏信心。他认为，他的兵力太弱，部队的装备也不足……。特别是他只有 1 个摩托化师，它的……地面部队。英国人每天都打炮击毁铁路，是的火车……使铁路运输几乎完全中断。此外，从乔上凡尼到墨西拿这一小段的交通，可以说已经完全停滞。过去曾有过六条渡船，现在只剩一条了。这条船成了“重点保护文物”，人们尽量爱护它，准备派更好的用场。

元首：“更好的用场”指什么？

诺：是这样，我的元首。这个意大利党人说：“如果战争结束了……。”还有一次，他说：“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反正这条船没有使用。也可能船有点小损伤，但那些和我交谈的军官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西西里，德国军队无疑不大受欢迎。这很容易解释，因为西西里人都认为，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战争，是我们多多少少地独吞了属于他们的东西。现在，我们把英国人引来了，从总的方面来说，这正是西西里农民愿意看到的。

他们由此推测，他们的苦难快熬到头了。对于这些纯朴的农民来说，这样想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大考虑其他的事情，只考虑是否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以为，英国人来了，战争就会尽快结束，而德国人在，就会带来不幸。

元首：意大利当局对这种看法有什么反映？

诺：我的元首，据我所知，那些行政长官和现存的机构对此反映甚微，因为他们看见了，听见了，但总是搪塞。我曾多次告诫这些老爷，并对他们说：“一个德国士兵在大街上被当做敌人或类似的什么人挨骂，这种事在西西里经常发生。对此你们将采取什么措施！长此下去，这是不能容忍的。”回答是：“我们能采取什么措施？这是人民的意愿，人民也有自尊心，他们不喜欢你们到处征收物品，捕杀禽畜。”我说：“可我们也不是到此旅游享福来的，是为了战争！”他们会说：“对此我们也无能为力，德国士兵也骂意大利士兵。”但我认为，还可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尤其是当局。有些很明显的事情，他们理应追究责任，而不是象现在这样。

元首：他们没法追究。

诺：这很困难。上面追究了，但西西里的情况与意大利北部不一样。

西西里的空中威胁，或者说空中优势都非常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闻。巴勒莫成了一片废墟，城市的其他部分还有许多古老壮观的建筑和港口也是如此。许多人告诉我港口被英国人这样搞，对他们自己也没有用了。但英国空袭后的撒丁岛、卡利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城市的仓库被首先炸毁，但港口设施、防波堤等却几乎完好无损。

元首：这就是您的报告。

瓦利蒙特：海军上将卢格也做过这样的报告。

诺：我的元首，意大利王储成了意大利军队的总指挥。但我还没有弄清楚，他指挥的意大利军队是驻扎在撒丁还是西西里，或者是在意大利的南部。很明显，他在那儿严重妨碍了督查工作的进行，洛达将军与他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洛达将军的参谋部里，有很多军官——意大利的参谋军官，他们崇拜英国，有的娶的是英国女人，有的以其他某种形式与英国人有联系。

元首：我不是早就说过吗？

诺：我是说，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任何时候都不会相信他（指洛达）。

元首：绝不能相信他！

诺：我一直认为他非常狡猾。

元首：狡猾？对于法西斯革命来说，他是一个蠢货，是不中用的间谍。事实上他就是一个间谍。

诺：他生来就是一个特务，是特务的典型货色。无论如何，我个人坚信，他在玩弄一套什么把戏。这点我在其他德国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做了很大努力，试图建立一个能满足英国人对西西里要求的活动基础。他在这方面有多大能力，我不能下定论。们我相信，他的确是一个危险的赌徒，这点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

元首：和我的见解完全一致！

诺：他在西西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也明白这点。他住在恩纳。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旨意行事，我到处都能找到证据，所有的人都这样谈论洛达将军：没有他的批准和允许，一事无成。

元首：您也和凯塞林谈过这件事吗？

诺：我对冯·林特伦将军讲过，我的元首。

元首：必须谨慎。凯塞林是一个极端乐观主义者，必须谨慎。别让他的乐观主义迷住他的眼睛，看不到那悲观的冷酷的时刻。

诺：目前西西里的德国空军的确境况很糟，空袭非常猛烈，我猜测，许多机场损失也比较大，一部分几乎无法使用。

瓦利蒙特：昨天的情况有转变……，27 架敌机空袭，有 7 架被击中，已方没有损失。

元首：地方太小。

凯特尔：部队太集中了。

诺：是太集中。罗马的气氛则不同。使人感到极不愉快的是，财阀富豪集团所考虑的当然也只是英国人的利益。从领袖目前尽力执行的措施来看，目的肯定在于合理分配战争重担。但另一方面，人们受到的腐蚀很深，现在要想采取一次大的行动来排除根深蒂固并蔓延了的黑市投机交易，已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情。现在，他肯定不愿采取这样的行动。

元首：在一个国土上，整个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还有国家成了道德败坏的发源地，人们还怎样想去排除呢？您去过意大利吗？诺：没有，我的元首。

只是经过那儿。

元首：您在罗马呆了几天？

诺：到现在为止，7 天。

元首：7 天。在罗马，人们对德国人的态度怎么样？

诺：在大街上根本看不见德国人。因为按规定穿军服的德国士兵都在前线和火车站。根据协议，指挥机构都要迁出城市，以便使城市的军事特色……

瓦利蒙特：这是时代的产物……

诺：不。这并不新鲜。我认为，这是梵蒂冈式的梦想。否则，罗马的特色还与以前一样是……

元首：太平的？

诺：是太平的。这点没问题。谁如果从非洲来，看到街景时都会惊奇。那里看上去好象两年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但人们总会这样解释：我们是穷困的人民，我们没有衣服和靴子给士兵们穿，所以，让他们在大街上散步更好些。

元首：如果把这些人作为劳动力给我们，那他们就有活儿干了。隆美尔：富豪不能要。否则他们也会把我们“腐蚀”。诺：意大利人也会认为，我们社会的先进措施自然也会彻底“腐蚀”他们。

元首：现在，在德国究竟有多少工人？您知道吗，赫维尔？赫维尔：有 23 万人，从 6 月份起大概会逐渐减少。

元首：从 6 月起？

赫维尔：我不大清楚，但可以查查。

元首：事后您把它查清楚。

凯特尔：可以打电话问问绍克尔，他很清楚。

元首：至于洛达本人，我的看法反正是不会改变的。我认为，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一直受到这个国家的一个特定阶层的破坏。正是由于这些人的破坏，阻止了意大利参战。这就是说，根本不需要参战，因为，如果当时意大利发表声明，宣布与德国联合，并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那么这场战争就不会爆发。这样，英国人就不会卷入战争，法国人也不会。

因为意大利不参战的决议做出两个小时之后，这件事就传到了英国，英国人便马上与波兰签订了互助条约。在此前，条约一直没有签订。会谈结束后两个小时便签订了条约。后来，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给领袖①写的每一个备忘录，都立即直接传到英国。所以，我总是把需要尽快传到英国的事情，写给领袖。这是立即传向英国的最好途径。诺：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与英国的交往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

前天晚上，我在火车站，那些驻扎在斯培西亚的潜艇司令官们说，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每天上午从 8 点到 10 点，一艘叫“文特罗伊”（？）的战列舰与马耳他保持联系。一个德国反间谍机关的官员前来调查此事，得知真情，事后，却被意大利当局以间谍嫌疑逮捕了。因为他们发现他知道了真相。这件事千真万确。

元首：这里没有海军的人吧？这根本不必要。我们必须注意在爱琴海的潜艇……

凯特尔：我已经作了一个摘记，把所有的事都写进去了。经常有新的观点和见解出现（指关于意大利背离情况下如何行动的命令）。

元首：船和所有武器，尤其是潜艇。

凯特尔：所有辅助战舰都算在内。

瓦利蒙特：在法国海岸……

元首：如果他们是在法国海岸，倒可以呆在那里，但不要在意大利港口，不要在斯培西亚和其他地方。京舍，您在地图上测量一下从英国到慕尼黑的陆路距离，以及从科西嘉到慕尼黑的空中距离。这个洛达确实是个间谍！

诺：关于“戈林”师没有什么新情况。如果那些先生们不帮忙的话，我们要“戈林”师离开西西里这件事会很难办。元首：正如你所说的，必须考虑一下，是否应将“戈林”师调出来。我认为，也许不调出来为好。

凯特尔：我一直认为，必须让它坚守在意大利南部。

隆美尔：它没有后撤。我不相信凯塞林元帅所说的。他说这个师在敌人的逼迫下，越过海峡撤回来。可能会有个别人回来，但全部装备和军队大部并没有回来。

凯特尔：是这样的。我建议，将“赫尔曼·戈林”师的一部分兵力悄悄地调到意大利南部，以便还能象这样的一个师，但不能让“赫尔曼·戈林”师将兵力调过来。能否再使用一下这条渡船？

诺：元帅先生，这是不可能的。

元首：啊，是这样！

诺：没有渡船照样可以干。

元首：是这样的：渡船并不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意志！诺：这很能说明问题！

元首：只要有意志，就能找到渡船。有 20 或 30 只都存放在意大利和我们这里。有 60%在我们这里修理，还有 10%整修，这些船总是出毛病。坦克也许也有同样的情况。我看见过意大利的坦克，每次投入使用后，转眼间就完蛋了。几乎二、三天就坏一辆，全部坦克都在修理中。这确实是一个意志问题。

施蒙特：英国与慕尼黑距离为 1000 公里，科西嘉到慕尼黑有 750 公里。

元首：还有一点，您记下，高射炮的弹药供应随时都有可能中断，储备已不多。非常缺！

瓦利蒙特：对，尤其是交给意大利使用的高炮。元首：所有的高炮。

隆美尔：我的元首，意大利是不可能把更多的部队调往西西里，并代我们守住它？

元首：当然，一切都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想保卫它，如果他们真想保卫它，他们一切都会做的。令我担心的不是不能，因为如果愿意认真对待的话，能守住它，这点毫无疑问，我们也可以马上派部队去。令我担心的是那些人不愿意，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不愿意。这个领袖可以拥有最坚强的意志，但它被破坏了。我看过了巴斯梯安尼尼的讲话。这个讲话当然很糟，这点毫无疑问。这个讲话，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过……

凯特尔：没有，我没有看过，今天早晨只看到他讲话的摘要。元首：这个讲话大概是这么一付腔调：意大利和德国是为正义而战，其他国家为了非正义而战；对意大利来说，任何一种无条件的投降都是不堪忍受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还说，意大利聚集在它的国王周围，将保卫它的军队和它的国王。在说到“国王”时，元老院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这样！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讲话，槽透了。它给我一个感觉，就是那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我们早已说过的那种危机。

布罗伊尔，现在您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考虑您的目标和所有问题，而且……

凯特尔：我的元首，您昨天和他详细讨论过的想法，以及我昨天给您的书面报告，都详细讨论过了，他知道这个想法。

勒尔：是的。

元首：您也知道？

布罗伊尔：是的。

元首：人们必须象网上的蜘蛛那样小心谨慎才是。谢天谢地，我对所有事情还比较敏感，凡是要发生的事，大多数我都能预感到。到现在为止，局势的任何一个恶化，对我们来说，最终都意味着改进。

凯特尔：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但必须帮助他，尤其是克里特岛、罗得岛，以及南方的补给。

元首：巴尔干行动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决定性的：要确保那里的铜、铝土矿、铬——尤其是我要说在意大利事件发生后——不致丢失得一干二净。

勒尔：到第 117 师能够开始进攻，时间是个问题。这个师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而且……准备也没有就绪。

元首：在这期间，第 1 师大概会调过去。

勒尔：只要有坦克！

元首：运输第 1 师将用……

凯特尔：飞行中队！按照在东线的作法，这一次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勒尔大将只能说：由于不能对具体安排做进一步说明，他只能向那些必须知道内情的人透露。此事不需要其他任何人知道。

元首：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要传达命令就行了。任何人都无需知道他的任务以外的事情。这就是说，如果有谁因职务关系，知道了某些情况时，这与他无关。每项措施都必须对其出发点进行审查；动机必须明确，我们一定要谨慎从事，我们必须经常估计到溃败的发生，然后我们才能采取补救措施。这是个重大的关键问题，对吗？

勒尔：对！

元首：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您有什么情况吗？

凯特尔：领袖今天上午到了国王那里，随后会见了林特伦。元首：几点会见的？

瓦利蒙特：我的元首，他一被召见，就想马上报告。我最后与他交谈是 11 点 15 分。元首：现在几点？

瓦利蒙特：2 点。

元首：蔡茨勒什么时候来？

凯特尔：蔡茨勒将军四点半到。

（赫维尔大使呈上报告）

赫维尔：这只是我的想法。

元首：这两个世界并不是近来才有的。它们早就有了……早在他们发动阿比西尼亚攻势时就有了。如果当时我与意大利作对，它就会立刻崩溃。当时，我就向他指出，他不应……。当时我对他说：“ 我不会让您忘记的。 ”我们确实没有让他忘记。

当时，我对罗马的访问，现在仍记忆犹新。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两个世界表现得截然相反。一个充满法西斯的热情；另一个则是冷冰冰的军队和宫

廷气氛，那里的人们是自顾自的小人或胆小鬼。在我眼里，一般凡是拥有 25 万以上马克财产的人，一般都是胆小鬼。因为他们要以此为生，要保住这 25 万马克。他们丧失了任何勇气。如果一个拥有二百万，他就会心安理得地生活：这些人既不参加革命，也不会干其他任何事情。因此，当他们看见他的人民在挨饿时，也会反对一切战争。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如果分配合理，如果每个人至少都能得到他所应当得到的那一份，那么人们——甚至在英国——都会对帝国扩张的可能性有所觉察。但事实不是这样。这些人生活无忧无虑，他们什么也不缺，他们拥有一切，例霉的只是那些穷鬼。我在罗马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处境。在宫廷里，法西斯主义无法贯彻。所以，宫廷给予我们的接待令人作呕，我简直不愿再提起它。但在领袖那儿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宫廷世界在起作用。这个齐亚诺也是这样。我正要带女伯爵埃达·齐亚诺去就餐，菲力普和他的玛法尔达突然闯入。还有一次，整个日程都被取消了。这个玛法尔达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对于我来说，这个玛法尔达只不过是一个德国高级官员的妻子，仅此而已。再说，他们的智慧并不那么突出。女人可以让人着迷，但我根本不想考虑人体美，只看重智慧。在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奎利纳丘陵（罗马皇宫所在地——译注）上的那帮坏家伙在兴风作浪；在那里，实际上全部法西斯分子都和宫廷卫队并存，对两者分离很看不惯，宫廷官员把这看成……

对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领袖的健康状况如何？在法西斯革命即将结束时，他怎样看待这个机会……？这对于一个必须做出重大决断的人物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因为，要么王室取代法西斯国家，这时他将如何判断人民的机会。如果王室独自接替了最高权力，他怎么判断，这很难说。当我们在一起时，他突然说到：“我的元首，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法西斯革命的继承人，我有国家首脑作为继承人，这个人会找到的，但法西斯革命的继承人却没有。”这当然是很可悲的。

他的这种苦闷早在 1941 年就开始了，当时我们正在第二大本营，在铁路上……反正早在俄国战局时就开始了。凯特尔：是的，在加里西里亚地域的那个大隧道里。元首：晚上，我们谈起俄国政治委员，说到不可能有两种权力存在，等等，他沉思着。后来，在火车上，我们坐在一起。他忽然对我说：“我的元首，您说的是正确的，在一支军队里不存在有两种权力。但是，元首，如果军官对于国家政权和国家的思想持保留态度，您怎么看？应该怎么办？”他们说，因为他们是军官，他们持保留意见。在国家观念或国家至上占上风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君主政体主义者，我们属于国王。”这就是区别。早在 1941 年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说得更明显的是 1940 年 10 月 20 日，当我返回德国时，当时是 1940 年，他突然说：“您看，我相信士兵，但我不信任我的将军们，我不能信任他们。”这就是他在向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发动攻势那天对我说的话。

问题在于，如果领袖年轻 15 岁，可能一切都没问题，60 岁的年龄就有些困难了。问题是，他觉得身体如何。但这两种世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其中一个不能排除，总是在扩展。我从那里的人们身上看出了这一点。今天晚上他很有可能——他叫什么？

凯特尔：杜里斯卡。

元首：他可能在国王那里。据说，这个强盗头子可能是王室的亲戚。如果在市民阶层娶一个女子，其父亲是混蛋、小偷，多次进过监狱，当然会很

困难；但如果在王室里娶这样一个女人，就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因此，王公贵族都在争夺公主。在那里，这位尼古拉实际上简直就象一个从奥地利逃出的无赖，不断向别人敲诈勒索，使意大利和奥地利相互敌视，他甚至利用万国邮政联盟、使他的欺骗行为得逞。从奥地利城市骗去了 175 万克朗。皇帝不得不为此解私囊。这是一件大丑闻！但对于“尊贵的人们”来说，却无所谓……

凯特尔：我的元首，关于增派隆美尔军队的行动指示和昨晚我跟您说过的勒尔的事，我们还有些不太成熟的想法。勒尔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知道怎么回事，但他似乎没得到任何书面的乐西。

元首：这次，我们对书面的东西一定要谨慎从事。凯特尔：我知道，您希望这样。每天都有事发生，例如潜艇的问题。

（圣上文件）

这只是一篇泛泛的导言，不说明什么问题。但重要的是以后，诸如传达命令、军队实力、准备工作等等。这些都必须考虑到，因为关于这些事情每天都有可能节外生枝，象今天的潜艇问题、高炮部队问题等等。我们要开动脑筋，多考虑一些问题。隆美尔已看过一遍了，大概情况他已了解。隆美尔：是的，已经交上去了。

凯特尔：他还想作一些补充、这一切都是伤脑筋的事情。另外，还有军队运输等类似问题。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具体情况，必须有人去西线总司令部和他商量，他在什么时候把军队带过来，接管由意大利占领的地中海沿岸。这些具体情况会不会出现，只有写出来才能不遗漏。所以，我们做了书面记录。

元首：但您是否认为，隆美尔，我们最好把 2 个伞兵师留住？隆美尔：是的，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

元首：您可以在您的作战行动中使用这 2 个师。

凯特尔：可以派到意大利北部去。

隆美尔：元首，我很担心，一旦意大利人突然反叛，并封锁边境，尤其是封锁布伦内罗。因为这些家伙们已为此干了多年了。

我怀疑这些家伙在他们反戈时会不会说，我们封锁了边境，不让德国人进来，也不让他们出去。以此作为给英国人的献礼。

所以，这 2 个师还是在外面为妥……

元首：我可以冷静地考虑一直这个问题。

凯特尔：是的，我认为，形式还不够适宜，还要进一步作些修饰。但我们更想让这些想法逐渐固定下来。所以，必须写下来，否则会忽略的。您是否想把这个导言重新写一下？但大部分想法……

元首：我还要好好地看一遍。

瓦利蒙特：东南线的问题在这一部分后面。

凯特尔：隆美尔的工作可以以此为基础。

瓦利蒙特：如果您需要这些地图的话……

元首：不，我不需要。瓦利蒙特：这是些很出色的地图，或许我以后再给您送来，我的元首？

元首：那也好。

（会议结束：15：30）

从保卫地中海计划——在没有意大利的情况下到 1943 年 9 月初“轴心”

伙伴的公开背叛，对于所有参战者的基本原则是，绝不能发生无益于将来共同防御的事情，也必须避免有可能给意大利一个得以背弃联盟的借口的事情。因此，这个时期德国采取的涉及到意大利领土的一切行动，都应以在意大利退出战争的情况下，能否保障自身的安全而定。

尽管如此，双方仍然满腹狐疑，使得大本营在尔后几个月内陷入与意大利愈来愈尖锐的矛盾之中。德国为了预防万一，小心谨慎地迅速把一大批军队调往意大利，尽管就这一举动在当时局势下的必要性向意大利作了充分解释，但仍然引起了意大利人的疑心。而意大利的这种疑心，又反过来增加了希特勒对意大利的不信任情绪。另一方面，在自己的阵营里，在陆军总参谋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之间，关于把强大的装甲部队从东线调往地中海地区的争执也再度激化。

5 月初，凯塞林普通知墨索里尼，应将驻守在意大利、从未到过突尼斯的德军余部，重新编成 3 个师。对此，墨索里尼极为不客气答复说，3 个师对改变局势无济于事，他需要的是坦克和飞机。数日后，即 5 月 12 日，在安布罗西奥与南线司令部之间进行的一次关于在意大利的德国军队的从属关系问题的激烈争执之后，他直截了当地拒绝再把另外两个德国师调入意大利。相反，他在当天给希特勒的一封信中，要求立刻支援 300 辆坦克。以及能装备 50 个高炮连的高炮和 50 个战斗机中队的飞机。到 1943 年 6 月 21 日，意大利统帅部参谋长又将要求支援的数目大大提高了一步：2000 架飞机，以及能装备 17 个装中营、33 个摩托化炮兵营、18 个反坦克营或自行火炮营和 37 个混编高炮营的军用物资。当时，德国可以用一些多余的装备满足意大利的要求。因此，到 6 月底，在几个意大利将军的不断劝说下，终于改变了墨索里尼的拒绝态度，使除了 3 个新编师外，还有 2 个装甲师和 2 个装甲步兵师从西线开往意大利。这些师的装备与训练都尚未就绪，这种状况直到 7 月底也未能改变。此间，德国对巴尔干的支援也大大减少，在这件事上意大利并没有进行干涉。德国对于能将一些战斗力不甚强的部队开到完全由意大利军队占据的海岸，已基本感到知足。希特勒只是把 1 个装甲师急急忙忙从西线调到伯罗奔尼撒，但却没有想到，装甲师在山区无用武之地。

只有在特别危险的情况下，才考虑从东线调兵。然而，就是在这种局限之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也不得不注意，对那些已有安排的师不挪作他用，或者根本不用。然而，由于蔡茨勒将军试图阻止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进一步了解兵力的部署及运送时间，这种努力遇到了许多困难。由于陆军总参谋部也必须参与南线地区的各种计划，蔡茨勒就抓住这个机会，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企图将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的陆军部队领导权重新掌握在陆军总参谋部手里。准备投入地中海地区的陆军部队恰恰是在东线担负“保垒”行动的核心力量。这一行动早在 3 月份就已做好计划,是 1943 年东线战场上的唯一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目的在于消除库尔斯克的突出部。正因为如此，双方的对立有增无减。正当闻名的“堡垒”行动发起时间一而再地推迟，并企图与盟军进攻地中海的发起时间保持一致之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 6 月 18 日，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形势判断报告。报告的精彩部分是在阐明局势后，建议放弃“堡垒”行动，而代之以在东方和本土，组建一支由统帅部掌握的强大的战役预备队。希特勒尽管“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提出的考虑给予重视”，但最后仍是决定实施“堡垒”行动，并将进攻日期确定在 7 月 3 日，后又改为 7 月 3 日。其结果是，这个在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前 5 天才开始的、并被希特勒

标榜为“对于世界将是个信号”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使得担负进攻的部队，同时也是统帅部最重要的预备队大部化为灰烬。

6 月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病休回来后，再次强烈反对提前动用东线的统帅部预备队，同时以口头和书面等各种方式阐述他的立场。他认为“堡垒”行动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只能取得有限的区域性的战绩、不会取得对德国整个战争局势具有战略意义的结果。此后希特勒显然又一次犹豫起来，但在其他人的影响下，最终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决定。

墨索里尼的垮台

希特勒所谓对意大利的信任，从一开始几乎就全部放在了墨索里尼本人身上。5 月 14 日，希特勒问刚刚从罗马返回的海军元帅邓尼茨，他是否相信意大利“领袖决心跟随德国走到底”，当时在场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军事联盟的基础已开始动摇。几天以后，他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又一次表示了他的这种疑虑。他的这种疑虑并非由邓尼茨的报告引起的，更多的是出自于意大利每况愈下的军事态势。早在 4 月份的会晤中，墨索里尼欠佳的健康状态就开始使他忧心忡忡。以后，随着双方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尤其是墨索里尼所采取的拒绝德国军队进驻意大利这件事，使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疑心日见加深。甚至希特勒“送”给他一个负责装甲师装备操作的武装党卫队教官，也受到墨索里尼的冷遇。墨索里尼的这种举动，如果用“意大利政府首脑认为，意大利应由意大利人来保卫”这句话来解释，那么，多次得到证实的消息已经将这种理由驳倒。许多情报证实，自 1943 年春末以来，意大利又重新开始在其阿尔卑斯边境修筑旨在针对德国的工事。而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却对这一事实及其隐含的意图视而不见。相反，当墨索里尼表示对 5 月下旬举行新的会晤有保留地赞同时，希特勒却十分不安。尽管做了各种准备工作譬如将刚刚迁回普鲁士的大本营又迅速全部迁到贝希特斯加登，但这次会晤仍未能举行。据说，是因为墨索里尼只愿意在意大利领土上举行会晤，但这一条件又以希特勒个人安全为由遭到拒绝。再者在德国方面来看，意大利对德国提出的无法满足的在武器装备上的过高需要，不是从头开始的一种决心，而是退出战争的借口。

在尔后的几个星期里，盟军几乎未经战斗便占领了意大利设防坚固的潘特莱里亚小岛，即“意大利的直布罗陀”。此间，希特勒对意大利的信任——尽管摇摆不定——又逐渐有所恢复。当时，他常常这样以为。那些普通的意大利士兵，还有那些经法西斯主义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军官们，在保卫祖国的号召下，也许还会建树使敌友皆惊的丰功伟绩。在这种理想主义面前现实的军事状况——仅就意大利与盟国在装备状况上的悬殊差距而言——早已在希特勒的头脑里推到了其应有的位置。而在当时，却没有任何人提出一种与之相反的冷静的客观的判断①。

敌人于 1943 年 7 月 10 日在西西里岛的登陆，将自欺欺人和充满梦幻的帷幕突然撕破了。在进攻的第三天，南线总司令就认为，意大利沿海防御，包括刚刚加固的奥古斯塔军港都要被迫放弃，即使“利用…德军…也无法守住”。

凯塞林的这一判断表现出了一种对希特勒不肯让当时在意大利南部集结的德军部队一部用于西西里岛防御的失望情绪，意大利人甚至对希特勒的这一态度进行了严厉指责。鉴于敌人在西西里岛登陆的成功，希特勒又突然改变了原来由于担心意大利的变挂而做出的决定。根据墨索里尼的要求，另外两个德国师以及在岛上参战的部队和强大的防空部队迅即与其他部队一起开往西西里岛。在墨索里尼的一再催促下，大量的空军奉命从西线、东南线和北线调来。在这种双方迟到的积极性的激情中，两位独裁者很快又想入非非了。希特勒声称，登陆的敌人将被赶入大海；墨索里尼在电报中说：“敌人在首次袭击欧洲中遭到的失败所造成的道义上和军事上的不利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

在这个自欺欺人的指望破灭之后，希特勒马上于 7 月 13 日下了一道命令，亲自接管了西西里岛的指挥权。他甚至反对凯塞林关于现在只能是为赢得时间而战的意见，把“阻止敌人向埃特纳推进“作为主要目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名军官还专门向受领这项任务的第 14 装甲军军长胡伯将军，口头转达了这项指令，命令他“悄悄地排挤意大利指挥机构……自己接管西西里岛桥头堡的全部指挥权”。随着这项命令的下达，加上任命一名“墨西拿海峡德军司令官”，并授权他在万不得已时由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岸防炮兵连阵地，德军最高领帅机构的指挥棒——从东普鲁士！——已深深插入包括西西里岛在内的意大利的下级指挥领域。墨索里尼和意大利统帅部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

在地中海战场连同“轴心国”的未来命运——或许还有更多的东西——似乎都集中于埃特纳这个小小桥头堡的形势一下，7 月 15 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提交了一份由他本人亲手撰写的少见的形势判断报告。这篇报告在回顾了战略态势的来龙去脉，便直截了当抬出了凯塞林的观点：“根据一切迹象表明，西西里岛是保不住了。”接着，他指出，不管敌人的下一个目标是撒丁岛还是科西嘉岛，是意大利本土还是希腊，已方领导必须首先注意将意大利南部作为保卫巴尔干半岛的前沿阵地而坚守不放，但另一方面，约德尔继续说道——并引用了他的参谋部早在 6 月 19 日，即出于纯军事考虑而做出的错误的“堡垒”决定后的那天所做出的判断——不澄清亚平宁山脉以南——指的是阿尔诺河以北的东西走向的山脉——的政治形势，就“无法”为德国军队在那里长时间坚守“做出解释”。为此，目前首要的条件只能是，“排除意大利军事指挥机构……以及针对意大利国防军内部的分裂现象，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与希特勒在那些天一再重复的观点相一致，他还谴责意大利“军官团的很多人的遮遮掩掩”的背叛，并硬说意大利统帅部让德国部队“在这种形势下”到意大利领土作战”，“是为了使他们在这里被歼”。接着，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使用希特勒一贯用的激烈言辞，要求“在意大利进行一次总清洗，将其作为法西斯革命的第二组成部分”，“必须把取缔现在的意大利统帅部和逮捕所有敌对人物”作为这次革命的终结。他指出，德军的将军们必须掌握地中海地区的全部指挥权，隆美尔元帅应担任这一地区的“唯一的领袖…无数意大利军官和士兵都乐于在其麾下从征”。他还就“统一指挥”问题建议，巴尔干半岛的领导权必须移交给德国，墨索里尼应当留下，但在意大利只是个挂名的领袖。与此相联系，还“要求意大利”在易遭攻击的地区，如意大利南部，必须始终以与德军相同的数量和速度加强其兵力。这个要求直到“轴心国”崩溃始终未被取消，但也没有得到满足。约德尔的这种思路基本上是重复了那些近来在小范围内说过多遍的东西。如果说他的这一思路是为了使人们联想起历史上许多在军事联盟崩溃前所出现的分歧事例，那么希特勒只要考虑到墨索里尼的威望，就会对约德尔所做的结论不寒而栗。为此，他首先试图获得意大利政治局势的可靠情况——除了军界头面人物外，他把他所信任的政界人士也召到大本营来，以商讨意大利的局势。邓尼茨海军元帅和隆美尔元帅在这次讨论过程中，声明他们与约德尔的观点完全一致。隆美尔甚至强调说，没有一个意大利将军会保证无条件地跟随德国。看到其“轴心”政策的基础似乎已完全崩溃，希特勒以少有的自谦说道：“意大利肯定还会有些卓越之士，事情不可能突然变糟。”另一方面，他自己似乎明白，如果单是德国留在地中海地区，也难以保住意大利

北部。因此，将盟友留在“轴心”联盟中，仍是上策，而其前提是建立盟友间的相互信任。尔后，他又与从罗马召回的德国大使和黑森的菲利普王子，以及意大利宫廷代理人进行谈话，最终做出决定，彻底澄清自从突尼斯行动以来一直被推迟了的与墨索里尼的会谈，而且很快就商定在意大利北部进行一次会晤。就在当天，即 6 月 18 日，便动身踏上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的路程。希特勒现在也把个人安全置之脑后了。他特别注意倾听戈林和在德国驻罗马大使的意见，他们俩自认为对墨索里尼的态度和意大利的公众舆论了如直掌；而且希特勒在踏上妥协之路之前，还撤消了准备宣布隆美尔为亚平宁半岛的保卫者的决定。

这次在意大利北部举行的以会晤地点费尔特雷命名的会晤，是“轴心”崩溃之前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举行的一系列会晤中的最后一次。然而，费尔特雷会晤却孕育着不幸的恶果。会晤一开始，希特勒不谈地中海地区的形势以及国防军统帅部其他战场的利害关系，就断定东线的“堡垒”行动胜利无望。会谈就是以希特勒的这种判断开始，过去的经验已经说明，墨索里尼及其顾问来参加费尔特雷会晤的目的，是想说服德国一起——或意大利自己退出战争，而希特勒的主要意图却是再次给朋友和盟国撑腰，并保证继续向其提供援助。

在贝希特斯加登渡过一夜之后，由于飞行事故，希特勒一行于凌晨在特雷威索附近的一座机场降落。墨索里尼身穿著名的暗灰色民兵制服迎接了他们，然后乘汽车和火车，尔后又转乘汽车行驶近 2 小时，路上双方没有机会进行初步接触。到达郊外别墅后，大家无拘无束地聚集在花园大厅里，然而却只是为了倾听希特勒的狂放不羁的滔滔泛论。他说到了双方的原料情况和装备对比、兵员现状，以及损失情况，又讲到过去和将来，充满宣传和说教。他只字未提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昨日傍晚根据约德尔的备忘录再次向他提醒的“统一指挥”的紧急军事建议。他只是明确地说到了西西里岛的形势，同时宣布还有大量德军开往西西里，“能最终转入进攻”。此话使希特勒的随同人员大惊失色。此外，他还对确保向西西里岛的运输和提高意大利军队的战备提出严格要求。最后他说，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意大利本土继续作战。

希特勒只顾自己演讲，甚至当一个意大利通信官进来报告说，在当天上午盟军第一次轰炸了罗马时，他对墨索里尼转告他的这个消息竟毫不在意。几秒钟的掌声之后，希特勒又继续讲下去。

人们带着这次“会晤”十分扫兴的心情去进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分别由其陪同人员陪同，各自吃了饭，随后希特勒就立即踏上了归程。在由汽车换乘火车时，笔者由于一直惦记着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最关心的指挥机构问题，便直接找统帅部参谋长，向希特勒提醒此事。然而，凯特尔带来希特勒的答复是，目前，还不具备……满足这些要求……的条件”。因此，由双方总司令部高级代表举行的会谈中，只限于进一步深入讨论希特勒在此之前曾提到的一些问题。

从费尔特雷返回后，墨索里尼根据若干证据，立刻宣布赞同他的顾问的观点，甚至于 7 月 20 日报告国王说，他希望到 1943 年 9 月中旬解除同德国的联盟关系。而此时希特勒却深信这次会晤再次使他的朋友和盟友“完全恢复了正常”。随后几天，当罗马多次向希特勒保证为了保住西西里，意大利“将使用一切手段”，“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时，希特勒对满足意大利统帅

部关于继续向意大利派遣德国军队的要求的决心大大加强了，对于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宣布同意德国国防军统帅部长期以来一直推行的新的指挥领导机构。在这种气氛下，连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都充满了重新萌发的对盟友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心。为此，他向希特勒建议，委派隆美尔元帅担负希腊的最高指挥——前不久他还把隆美尔称之为在意大利发生危机时唯一合适的德国“领袖”。此外，他还委托他的参谋部取消“阿拉利希”命令和“康斯坦丁”命令。

然而没过几天，德军联系官从罗马发来的报告又使人们产生了另外一种印象。在冯·林特伦将军的报告中说，那里的人们对德国最近宣布的、远不如其所期望的那点少得可怜的援助感到非常失望。因此，西西里岛的前途“十分渺茫”。此外，在所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机构”中，人们对德国在“抵抗入侵意大利的防御作战中”，能否发挥作用，表示极大的怀疑。与此同时，在意军高级指挥当局中，又引人注目地再次出现了一种强烈要求完全支配德国在亚平宁半岛上的所有驻军的意愿。更令人吃惊的是，有好几处报告说，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要塞中储备了弹药，边防守备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而德国经过布伦内罗的铁路运输，也原因不明地中断了。

7 月 24 日一条重要的政治新闻终于引起了希特勒特别关注。消息说：“法西斯委员会”今天在罗马召开会议。报告还说，“人们都在谈论要求领袖放弃对三军的领导权”。这条消息使德国大本营顿时哗然。第二天中午，在人们惴惴不安之中，大本营照例举行了形势讨论会，其目的或多致少是为了“炫耀德国的权势”。在讨论了埃特纳桥头堡形势——认为仍能无限期地坚守——以及在撒丁岛上有利的防御状态之后，约德尔将军于当天提交了一份关于“秋季前整个兵力部署的建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借此再次建议希特勒，要以适当的方式考虑最后在德国实施战略防御的问题，并建议纵建由“战役集群”组成的强大的预备队，而且首先应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组建，企图以一个长远的战略计划来代替希特勒变化无常的决定。希特勒也毫不犹豫地同意这种形势分析。在说到东线形势时，他甚至说：“必须放弃它。这是非常清楚的。这里，即地中海地区，是关键所在。在最坏的情况下，还要从东线抽调更多的兵力。必须得这么做。”关于他对意大利形势看法的发展，他说过这样一席话：“短期内，我们保证可以把意大利溃散军队重新组建成 10 到 12 个或 13 个师。”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这项庞大计划大概永远也不能实施。因为，在东线还一直有大量部队被牵制在那里；另一方面，如果意大利不予以合作，那么在巴尔干半岛组建一个战役集群的企图也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在这次形势讨论会上，突然打断正在进行的军事形势报告，希特勒焦虑不安地向外交部的代表询问关于罗马目前的状态。从下面希特勒的一系列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垮台前那一刻的情景。

第 13 号记录稿片断

1943 年 7 月 25 日下午形势讨论会

元首：您有什么消息，赫维尔？

赫维尔：还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马肯森只拍来了一份电报，他说，这次事件可能会使帝国元帅的这次访问①成问题，我们肯定会得到更详细的消息。现在，他只知道，弗兰纳西小组最终会使领袖召开法西斯委员会会议。原定昨天举行，由于对会议议程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推迟到 22 点举行。他

从多方面获得的消息说，这次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因为会议参加者都有义务保守秘密，所以他还未听到什么可靠的消息，只是道听途说。他听到最流行的一条小道消总是：人们想让领袖任命一位政府首脑，即任命 83 岁的，在世界大战中起过很大作用的政治家奥兰多为总理，而领袖应该成为大法西斯国家的总统。这一切不过是谣传而已，还需要等确切的消息。还有人说，今天上午 10 时领袖和一些将军们到国王那儿去了。现在还在那里。并且不断地接见知名人士，布法里尼此刻就在他那儿。

元首：这人是谁？

赫维尔：布法里尼是个法西斯分子——详细情况我还要通过……得到。这次党的危机扩大成为国家危机——另外还有人说，

领袖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会晤之后，决定继续领导这次战斗。——这就是至今知道的一切……

元首：好一个布法里尼，算他有运气。亏得他是在意大利做的这件事，而不是在我这几。要是他在我这儿干这种事情，我会立刻让希姆莱把他抓来，马上抓来——这类事情就是这么个结局。由此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赫维尔：我刚才说了，马肯森强调过这是谣传。无论如何，现在是一次巨大的危机。领袖已经一再向马肯森强调、尽量不要提他的生日，什么也不要准备，在这次危机中始终要小心谨慎。但他还想打听一下，那里的人们对此有何感想。现在，在这一刻，帝国元帅如果遭到冷遇，自然是……但我还会得到更详细的消息。

元首：这是很难处理的。帝国元帅和我一起经历了许多危机，在危机中他表现得非常冷漠。在危机时刻，没有比帝国元帅更好的顾问了。帝国元帅在危机时刻表现得残忍而冷酷。我已经注意到，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冷酷无情而且坚强不屈。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谋划策的人。他和我一同经历了全部危机，受到最严峻的考验，他总是那么冷酷。要是遇到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会表现得异常冷酷——不信我们就等着瞧吧。

对于晚上、午夜及第二天中午从罗马接踵而来的关于墨索里尼“辞职”以及巴多里奥元帅重新组阁的消息，德军大本营除了认为当时意大利准备放下武器以外，几乎没有做出别的什么评价要做出决定确实比较困难，主要是因为隆美尔刚刚被派往萨洛尼卡。另外，鉴于意大利曾保证继续站在德国一边作战，已被约德尔废止的“阿拉利希”和“康斯坦丁”计划，无法立即实施。实际上，希特勒在三次连续召开的形势讨论会上的行为举止，主要是由其强烈的复仇心理决定的。与此相反，只有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竭尽全力，针对当时形势的紧迫性，作出军事上的安排。

第 14 号记录稿片断

1943 年 7 月乃日 21 时 30 分的形势讨论会

元首：您了解意大利局势的发展情况吗？

凯特尔：我刚刚听到一些消息。

元首：领袖辞职了。听说巴多里奥接管了政府，领袖辞职了。不过这消息不太可靠。

凯特尔：是出于自愿吗？我的元首？

元首：可能是国王的意图，在宫廷的压力下。昨天我已说过国王持什么观点。

约德尔：巴多里奥接管政府。

元首：巴多里奥，就是我们的那个死敌接管了政府。我们必须马上找到某种方法，把这里的人都送回大陆①。

约德尔：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能否继续作战！

元首：他们说他们能作战，可实际这是叛变！我们必须清楚，这纯粹是叛变！我只希望了解领袖说了些什么。这家伙现在想和领袖谈谈。但愿他捉到他了。我想让领袖立即来这里，如果他被抓住了，让领袖马上到德国来。

约德尔：如果这事没有把握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元首：我已经考虑过，我的想法是，让第 3 装甲步兵师立即占领罗马，立即解散政府。

约德尔：这支部队要一直呆到他回来……

元首：有个方法不妨试一试：把物资留下来——把这些东西运来运去，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人，用德国船只来运送士兵。现在我还得到了马肯森的消息，我们马上安排其他的事情……但是船只必须马上离开这里①。

约德尔：是！……

元首：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立即保住阿尔卑斯的所有通道；要与意大利第 4 集团军进行接触；立即占领法国的各交通要道。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为此，我们必须马上命令部队出发，如有必要，第 24 装甲师也参加。

凯特尔：如果我们不占领交通要道，那将是最糟的事情。元首：隆美尔已经出发了吗？

约德尔：他走了。

元首：他现在在哪儿？是在维也纳新城吗？

凯特尔：可以查一查。

元首：立刻查明隆美尔现在在哪儿！必须看到现在我们……只有 1 个装甲师，即第 24 装甲师已经做好准备了，最重要的是立即让第 24 装甲师开到这个地区，以便他们能立刻通过这里，利用一条铁路线，迅速集中，那里的“费尔德黑恩哈勒”步兵师至少能占领那些交通要道，因为我们在罗马附近只有 1 个师。第 3 装甲步兵师全部驻在罗马附近吗？

约德尔：是的。但不是全部具有机动能力，只有一部分。元首：这个师有多少武器和自行火炮？

布勒：第 3 装甲步兵师有 42 门自行火炮……

元首：上帝保佑我们，我们的伞兵师还在此地。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拯救那里②的人。他们留在那里是无用的，必须离开那里，特别是伞兵师和“戈林”那个师的人马。他们的物资倒是无所谓，她们应该把这些物资炸掉或者破坏。但是人必须过来。一共有 7 万人。如果能空运的话，他们很快就能到达这里。他们只需带些轻型武器，其他东西部留下。他们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与意大利人作战，我们用轻武器就够了。再守在这里已没有意义。我们在这儿已无所作为了。下一步我们当然要从这里撤到某个地方，这是很自然的事……最重要的是，要尽快运部队来。

蔡茨勒：是，我马上下命令。

凯特尔：目的要根据当时的……

蔡茨勒：先做好准备，我必须先把铁路材料搞来。在我得到铁路材料之前，我能以每小时 36 公里的速度行驶，36 列火车，只需两三天时间。现在我马上就去行动。

（蔡茨勒将军报告离去）

约德尔：我们必须等待确切报道，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元首：当然，

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考虑一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曾经说，他们将继续和我们一块干到底，这点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叛变了，他们没有坚持到底。凯特尔：和这个巴多里奥谈过吗？

元首：我们现在得到这样的报告，说领袖昨天参加了法西斯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有一个葛兰第——我一直把他叫“猪猡”。

还有伯塔伊，特别是齐亚诺，这些人在委员会里攻击德国，而且还说，继续作战是毫无意义的，必须以某种方式使意大利脱离战争。有些人表示反对。比如法里纳西就表示反对。但是他们不如那些持赞成态度的人的作用大。领袖今天晚上还让人通知马肯森，说他无论如何要继续进行战争，决不投降。后来，我虽然得到消息说，巴多里奥想和马肯森谈一谈。马肯森说，跟他没什么可谈的。巴多里奥更加急切，于是派来一个人……

赫维尔：马肯森派他手下的一个人到巴多里奥那儿去了。元首：他通知说，领袖放弃了他的政府以后，国王刚委托他重新组阁——什么叫“放弃”？也许这个无赖有……我是说菲利普的声明……这点人们已经推断出来了。

凯特尔：这就是王室的全部所作所为！……领袖目前手中没有任何权力，什么也没有，没有军队。

元首：一无所有！我总跟他说，他什么也没有。他一无所有，不是吗？是他们有意阻碍他掌握某种权力。

现在部长命令马肯森首先去一下外交部。大概他在那儿会得到通知的。我估计会这样。其次，外交部长还问我是否同意他马上去领袖那儿。我说他应该立即去找领袖，如果可能的话，劝说领袖立即到德国来。我估计他是愿总和我谈谈的，如果领袖能来就好了，要是他不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他不来，或是他不能离开，或者他顾虑自己身体而放弃这次会晤——这个阴险的无赖是干得出来的，对此人们也不会感到吃惊——那我们也就无能无力了。可是这家伙马上又会说，战争还要继续下去，谁也无能为力——他们必定会这么做，因为这是一种背叛。——而我们也在继续玩弄同样的把戏，做好一切准备、闪电般地占据这伙恶棍的财产，并铲除这伙歹徒，明天我将派一个人去给第 3 装甲步兵师的司令官传达命令，命令他带领一个特别小组立即去罗马逮捕所有政府人员、国王及其那伙歹徒，首先是马上逮捕王储，并且抓住这伙恶棍，特别是巴多里奥和那群无赖。然后，您就会看到他们将彻底服输，二三天之后又将发生一次政变。

凯特尔：我们现在只有准备用于“阿拉利希”计划的第 715 师，正在原地待命。

元首：至少他们的 42 门自行火炮都在吗？

布勒：他们肯定有 42 门自行火炮的，所有的自行火炮都运到那儿了。

约德尔：这里有部署图。

（拿出草图）元首：这些部队离罗马有多远？

约德尔：大约 100 公里。

元首：100 公里？——60 公里！不必到再远的地方，如果他带领一支机械化部队，就可以立即到这儿逮捕这伙歹徒。

凯特尔：两个小时！

约行尔：两小时行驶 50～60 公里！

元首：根本不算远。

魏岑埃格：这个师有 42 门自行火炮。

元首：这 42 门炮部在那个师那儿。（魏岑埃格：是的，都在那儿。）约德尔，您马上干吧！

约德尔：6 个营。

凯特尔：一定要时刻做好准备，至少要 5 个营完全做好准备。元首：约德尔，请您马上为第 3 装甲步兵师拟定一项可以往下传达的命令，命令他们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此事，带着自行火炮向罗马出发……逮捕所有政府人员，国王和上流社会的人……特别是王储，我一定抓住他！

凯特尔：他比老国王更重要。

博登沙茨：必须组织好，把这些家伙立即都装进飞机带来。元首：立即装上飞机，马上带回来，立即！

博登沙茨：别让那个巴姆比诺再在机场上跑掉！

元首：8 天以后这里又要发生一次事变，您等着吧！……我还要和帝国元帅谈话。

博登沙茨：我马上通知他。

元首：当然喽，决定性的时刻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做好准备，让他们来解除这伙暴徒的武装。整个事件给人们的警告是，那些叛变的将军们，以齐亚诺为首——这个人十分可憎——给了法西斯主义一次打击。

元首与帝国元帅戈林通话（帝国元帅的提问和回答，速记员没有听到）

元首：您好，戈林！不知您是否已得到消息了？这消息还没有直接证实，但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领袖辞职了，巴多里奥已经上任——现在这种事情在罗马已经不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事实了！——这是事实，戈林，这点已无可怀疑了！——什么？——这我还不知道，我们要首先查一查。——这当然是件蠢事。它还在继续发展。但是如何发展呢？让他们看看我们将如何行动吧！——啊！我只想告诉您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您最好能尽快赶到这里来，什么？——这我不知道！以后我还要通知您的。不过请您对这件事的正确性做好充分准备。

（电话终止）

我们曾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卑鄙行为：那天正是那里的政府倒台之日①。

（凯特尔：早晨 10 点钟在大礼堂里）

——此后事情也发生了变化。但愿他们还没把领袖关押起来！可是如果他们把他监禁了，那恰恰说明我们到这儿来，是正确的。

约德尔：这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时，人们必须马上来这里……最重要的是把被阻塞在那里的人运过来。这些昨天都已下过命令了，即使只去意大利北部，即使我们只把部队开到意大利北部，而不继续前进，也要把所有的一切都运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布勒：为此，这些部队得再次在此地待命。

元首：让他们马上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要让他们马上行动。凯特尔：所以，我们才没有把部队撤到那儿去。

元首：我们可以马上行动，这是很清楚的。凯特尔：让离这里最近的那个步兵师出发。

元首：太好了，有好事等着他们呢！如果他们不行动，他们可能会……因为叛变当然会改变一切……我们必须清楚，巴多里奥这个可怜虫在这一时期一直在从事反对我们的工作，在北非，在各处。隆美尔已经走了吗？

达格施：我们正要查一下呢，我的元首。

元首：如果他还没走，我们当然马上把他召回来。

凯特尔：他可能明天早晨还在维也纳新城，他还要取东西呢。

元首：那么我要让他明天早晨乘一架“神鹰”①到这里来。我要给他指示。要是事情成熟，一切当然都将在隆美尔元帅的指挥下进行，只接受他一个人的命令。帝国元帅还在这儿吗？达格施：不，他正在途中，本来想明天回来。

元首：您核实一下！

（达格施：是的。）

元首：我们必须马上列出一份名单，那个齐亚诺当然要算在内，巴多里奥也不例外，还有其他人，主要是那伙人，当然有巴多里奥，杀死他，或者抓活的。

（赫维尔：是！）

首先要采取的措施是：命令这里的部队马上出发，开到边境，以便使那些还能开过来的部队马上过来。命令这些部队尽快……

约德尔：也必须马上通知这里的部队，告诉他们担负什么任务，他们无比如何要立即占领所有交通要道！

凯特尔：已经秘密通知到因斯布鲁克那个营。

元首：这个营现在还在那儿吗？

凯特尔：还在。山地学校已经撤消了……已经向第 715 和第 3 装甲步兵师下达了命令，此外还通知了司令部和“费尔德黑恩哈勒”师的一个集群，这三个地方已经得到指示，当时他们为“阿拉利希”计划得到西线总司令部一项秘密指示。只是命令他们禁止进行任何侦察或是其他类似的事情，以免引起人们对此事的注意。第 3 装甲步兵师应该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希望和……一起完成这项任务。

元首：他们不在这儿吗？

凯特尔：是，他们不在。

冯·普特卡默尔：为了渡海，必须通知海军人员，他们分散在各

港口的意大利人中间。

元首：当然，但在这里也还要尽可能乘摆渡。

居恩舍：隆美尔元帅今天早晨飞往萨洛尼卡，现在已到达那里元首：那他明天又能飞回来了，反正他有飞机。

克里斯蒂安：还是他那架老式的 111 型飞机。

元首：他从萨洛尼卡到这儿需要多长时间？

克里斯蒂安：15 点或 16 点以后他就能到这儿，中途着陆一次。元首：这么说需要六七个小时喽？

布勒：6 小时！

约德尔：我们乘“享克尔”式飞机从……到萨洛尼卡只用了两个半小时。

元首：要是善良的马肯森不久前没有它，那他是不能安身的。我听说，我们善良的赫维尔马上打电话告诉马肯森的夫人说：马肯森的飞机误点了。这么做是很有外交手腕的，简直可以提升他做大使。其他事情将照常进行。——那么，约德尔，我再重复一遍：首先命令第 3 装甲步兵师，还有在这里支援罗马的部队，向驻守在罗马周围的空军和高炮部队和其他部队，下达相同的命令，计他们立即了解详情。这是总的部署。然后马上前调其他部队。当然。这一定要和第 3 装甲步兵师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第三，是尽快让从这

里渡海的德军准备扫荡这一带。把后方的全部部队立即运过来。轻型武器和机枪都带着，其余东西可以扔掉。这里有我们 7 万人，其中有最优秀的人。必须这么做，把最后的一批人用汽车运回去，然后让他们立即在这里上船。反正我们这里有足够的德国船只，有很大的运输能力。

约德尔：几乎只有德国船只。

元首：高炮要留在那儿，不间断地进行支援。那边的高炮要最后再运走。

克里斯蒂安：但是，怎么没有意大利人和德国部队一起到这儿来呢？

元首：我们必须尽快行动，如果可能的话，在一夜之后把他们运到这里来。如果渡过来的士兵没有武器，他们将在一两天之内得到……

布勒：元首，今天或明天还得在这里向总参谋部下命令，让他们立即迅速地向这里重点提供汽车，也就是把清单上所列的和向东线提供的全部汽车都运到这里来，否则那些部队无法运过来。

元首；这件事我们可以等到明天再做。我必须谨慎地另作安排；和匈牙利人打交道必须小心谨慎。

约德尔：必须给南线总司令派一队卫兵。

元首：是的。

约德尔：必须立即从第 3 装甲步兵师中派一个强有力的卫队给指挥中心。

元首：对。

约德尔：否则，他们会拒绝指挥。

元首：是的。我们也会这样做的。我拒绝他们的指挥他们会感到吃惊的。

约德尔：我们必须冷静地考虑半小时。

博登沙茨：那意大利劳工呢？元首：他们还没有这儿。

施佩尔：我们需要劳动力。

约德尔：所有现在仍在德国的意大利人一律不准越过边界！施佩尔：他们工作起来很努力，我们可以让他们来完成托特组织的工作和其他工作。

元首：在现在这个时刻，我无需顾及比利时人了。我可以马上就让人把那个国王也押走，把他的王族一起关押起来。……

约德尔：这儿有一份关于 7 月 20 日开罗大本营一次秘密会议的报告：英国国王任命第 12 集团军司令威尔逊将军为驻希腊盟军总司令。

元首：这与那里的人，与他们的叛变行为是联系在一起的！约德尔：那么，还有一条消息也可能与这件事有关：一个有争议，但时常作出很出色的报道的瑞士人报道说：“西西里岛的盟军形势稳定后……企图动用新锐部队从北非向罗马方向的大陆进攻。他们把占领罗马看成是最重要的心理战措施。罗马将立即成立一个临时国民政府，解散法西斯党，把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美国和加拿大还将向非洲运去大批部队和武器”。

元首：这些肯定与此有联系……我们现在要不要马上让第 2 伞兵师做好战斗准备？

约德尔：是的，或许可以考虑用它去增援罗马。

元首：好，马上把他们调到罗马去。

约德尔：否则，我们目前什么都不能告诉他①。

元首：是的，否则就不行。他应该为自己准备一支强大的警卫部队，他自己哪儿也不能去，不能去和别人会谈，只能在他的大本营里接见客人。最

好是他病了。或者可以说，他受命到这儿来汇报了……约德尔：他必须留在那儿。

凯特尔：我想让他留在那儿。他能够指挥，能够下达命令。他手里有部队。他不应离开他的大本营，绝对不能。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由军事警卫人员引见，其他人他不能接待。当然他也不能离开他的大本营去参加会商会……这点已经非常明确。

元首：那么，约德尔，您现在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约德尔：是！

元首：我们现在当然要继续做出样子来，好象我们相信，他们在继续那样做。

约德尔：我们必须这么做。

（结束：22 时 13 分）

第 15 号记录稿片断

1943 年 7 月 25 日夜一 26 日晨的形势会……

约德尔：我的元首，这里有一系列问题。现在要通知东南线总司令，要他立即报告，在目前情况下，他将能以什么方式用他的兵力实施“ 康斯坦丁 ”方案；西线总司令如何实施“ 阿拉利希 ”方案。现在一切都变样了。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必须自己提出建议，在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因为一些师开走了——如何实施。要他们今天夜里电话通知我们。消息本身他们是熟悉的。别的无需说什么。开往意大利的火车怎样了？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顾不过来呢。

元首：我们所要做的任何事，都要制造假象。……

约德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否至少就中断到意大利和旅行和私人间的通信联系？

元首：我还不想这样做。

凯特尔：对，还不要这么做。

元首：所有知名人士反正都必须提出申请，我们再不批准了。约德尔：我已和凯塞林谈了。他想和国王，甚至巴多里奥取得联系。他现在只是听到了宣布，并没有取得联系，事实上是一名新任总司令和新的政府首脑。他不得不这样做。

元首：不得不？对，他必须这样做！

约德尔：他将明晨行动，探听一下整个局势。

元首：胡贝的意见是：“ 这里一切都严密了。 ”

凯特尔：胡贝一无所知，只是传……

元首：你们看，那些“ 不问政治的将军 ”当处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时，是多么危险。

约德尔：那就下达命令了：第 2 伞兵师立即待命，做好空降的各种准备。

克里斯蒂安：有关可动用的物资的报告马上就到。不过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的元首，封·里希特霍芬元帅的第 2 航空队，投入 100 架 JU 型运输机，为驻西西里的第 1 伞兵师实施补给……今天又有 10 架被击落。为此，他想把这批飞机撤回来。南线总司令想立即扣压它们，而且好象要根据局势的发展，把部队从意大利北部调到意大利中部。因此第 2 航空队询问了空军总司令。我首先对空军总司令说：禁止继续使用电话联系，从现在起由南线总司令负责。

元首：这一切必须由南线总司令统管，集权于一人。我也曾告诉帝国元帅，禁止互通电话。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这不是由空军总司令引起的，而是山下面，由第 2 航空队引起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批飞机是否应给第 2 伞兵师使用。

元首：首先给第 2 伞兵师，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十分清楚…

凯特尔：命令要这样写：除重型装备外，一旦需要，其他物资全部毁掉；禁止使用电话下达命令，即使是经过伪装的。

元首：不，要写“除全部重型装备”。凯特尔：那么就这么写：“除全部重型装备外，一旦需要，其他物资全部毁掉。”——还有“禁止使用电话下达命令，即使是经过伪装的也不行，命令只能由信使传达。”

元首：信使传达的文件，同样必须用密码书写。

赫维尔：我的元首！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切断邮局的一切电话联系。邮局刚刚来过电话。他们也许想建议，是否除了军用线路以外，不要切断全部的通信联系。

元首：可以告诉他们，只适用于军事目的，适用于国家通话。

赫维尔：首先是记者，他们现在当然很……

元首：只适用于国家通话！

赫维尔：只适用于政府各部？！

元首：只适用干部和军事通话。

凯特尔：……“书面指示需密写”——这样，他们所带的文件就不会泄密。

克里斯蒂安：密写和电报？

元首：密写和加密电报。难道不能加密吗？

凯特尔：不，海军也可以。

元首：密写和密码电报。

凯特尔：……“或密码电报”。

元首：对！

约德尔：通过今天中午的侦察，已查明在北西西里海岸，从巴勒莫向东有一次运输行动，大约有 50 艘船只，其中 8 艘较大，其余的较小，估计是登陆艇；航向没有确定，预计是向东估计可能是企图在我右翼背后实施登陆。

元首：这一切是由空军拟定的吗？

约德尔：空军已被告知。

（克里斯蒂安：是，从南线总司令那里得知的。）

元首：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派一名军官去。

约德尔：飞机已准备好，只需等明天。

元首：必须派一名军官去那里，告诉胡贝如何行动。首先把后方兵力运回，开到此地。前沿阵地还必须坚守，一夜间迅速撤回。全体士兵必须一夜间撤出，最后的人员必须继续射击，以迷惑敌人。

约德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口头传达：攻陷罗马。

元首：任何情况下都要这么干，这一点十分清楚。这里我们不必兜圈子，必须击溃他们。我们一定要控制整个政府。伞兵师也必须这样考虑，在罗马周围空投，然后占领罗马。一个人也不许离开罗马，然后第 3 装甲步兵师开进去。

约德尔：路上的那部分是第 26 装甲师的。

元首：命令中说：他们要下车。这是很不明确的。应该是：“必须在那里下车”。

凯特尔：这样，除了下车的以外，又出了“已下车的部分人员”。我读了两遍。，也认为：最好不写“第26装甲师已下车的部分人员”。

约德尔：他们有一部分已经下车，因为车辆不继续前进了，改为徒步前进……

元首：也须写上：已经下车的和要下车的部分。也就是说，除已经下车的以外，第26装甲师的其余部分必须下车，并从属于第3装甲步兵。

赫维尔：梵蒂冈的通路是否应占领？

元首：完全无所谓，我马上就进入梵蒂冈！你们认为梵蒂冈会使我不快吗？我马上拿下它！要紧的是整个外交使团都在那儿。不过我不在乎。先拿下它，再把这群无赖救出来……就说已经……然后向他们道歉，这对我们无所谓。我们在进行战争……

博登沙茨：他们坐在那儿……在想，他们很安全。

赫维尔：这样，我们可以从那儿拿到档案。

元首：从那儿？——对，必须搞到档案，查出叛徒。外交部长要多长时间草拟给马肯森的命令——遗憾他没有在这儿（指外长）。

赫维尔：马上就完。

元首：那好吧！

赫维尔：我立即决定。

元首：新闻报告需要搞12页吗？——我真害怕你们，二三行就解决问题了。

约德尔：我现在还想：如果敌人明天或后天要进攻的话——我不知道部队集中了没有——我想命令他们在东线再次发起进攻。近卫部队也协调行动，因为物资反正还没运来……凯特尔：铁道材料！

约德尔：当然可以。因为如果他们创造一个安定的局势，那更好。

元首：那当然好。这样可以把近卫部队一个师运去。他们必须首先行动，把辎重留在那儿。他们可以留下很多物资。他们不需配备坦克。他们应该把坦克留在那儿，再从这儿调一批去，他们可以从这里得到。这样，把坦克留在那儿，又从这里得到充足的装备。真可笑，当这个师到达时，他们又有了坦克。

赫维尔：我想问一问关于黑森王子的事，他一直闲着——我们不需要他作点什么吗？

元首：我想让他来，和他谈谈。

赫维尔：他当然会到别人那儿去打听他想知道的一切。元首：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绝好的伪装，一堵铁墙，妙不可言。我们过去常有一些人，当我们有些什么安排时，他们却一无所知，而其他一些人则坚信：如果这些人在这里，一切就会正常。我担心，戈林会胡来。

博登沙茨：我已事先跟他说清楚了。

元首：必须毕恭毕敬。那个菲利普并不危险。不过您要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错。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批运输？——最好定下来。

约德尔：我们会知道的。第305师已经准备好了。

元首：第44师呢？

约德尔：正在准备，这取决于有没有空车。第 44 师明天才放行。不过，我估计明天就可以开始。

元首：第 44 师是摩托化师吗？

（约德尔：不）——它是三旅制师吗？

凯特尔：是三旅制，而且战斗力很强。四个星期前我们就要派出这个师，隆美尔却一定想得到它，因为这个师已经装备就绪了。您当时拒绝了。于是我们把“勃兰登堡”帅派出来，因为这样不引人注目。

元首：“勃兰登堡”师也在那儿？

凯特尔：他们又出发了。他们在因斯布鲁克，事情就逐渐发生了变化。

元首：是不是应该给那些必须砸开敌人堡垒的部队，一些物资呢？比如“虎”式坦克或者其他什么。“虎”式坦克当然可以马上把堡垒摧毁，可以打开缺口。

（凯特尔：毫无疑问。）

——也许可以马上和布勒商定，学校里的“虎”式坦克怎么样？

约德尔：可提供的必须马上运往因斯布鲁克。

元首：我们只需要几辆就行了，就可以砸开这些家伙，然后开到克兰……这些家伙不久就会被砸开。

“虎”式坦克一到，只要一开炮，它们马上就可以被摧毁。它们的水泥反正可以被炸开。

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使用“豹”式坦克。也可以看看，学校里能不能提供一些重型坦克来完成这个任务。

凯特尔：我与布勒谈谈。

元首：古德里安也要来。

（结束：0 时 45 分）

第 16 号记录稿片断

1943 年 7 月 26 日中午

元首：约德尔，有什么新消息吗？

约德尔：没有，到现在为止只确定了 18 点与巴多里奥会谈，原来由于工作太多没有时间……一些人叫喊：“和平！和平！”其他人则在追捕法西斯分子。

元首：那好。

约德尔：不过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种“圣灰星期三”前的幼稚行为①

元首：这也是“圣灰星期三”，我们都经历过……

约德尔：总司令部绝对保证安全。刚才谈了一次话，他确保德军可以控制一个机场，不出任何危险。

元首：还有一个问题，您听到消息没有，伞兵师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好跳伞准备？

约德尔：他们已进入待命状态，不过还没有消息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后续部队。

元首：耶顺内克肯定知道。

约德尔：他们现在该来了。

元首：如果这里开始了②……至少把坦克运过来，难道不能吗？约德尔：……当然要在无法撤出人员的情况下，首先把昂贵的装备撤出来。

元首：首先是坦克！那里有 160 辆坦克……按照昨天的报告……这里怎

么办①？怎么才能从这儿撤出来，首先是人员？

约德尔：是啊，我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撤到科西嘉岛，在那里集中。

戈林：我也这么想。必须尽可能地加强科西嘉的力量。

约德尔：部队如果开往科西嘉，必须留下全部物资。

元首：我们今天还得讨论一下，怎样把他们送到科西嘉……党卫队第 10 师在哪儿？在这儿吗？希姆莱：在这里，他们首先到达这儿！

约德尔：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不过也差不多了。

元首：我听到过人们对“戈林”师有很好的评价……本来是一种特征，因为这是对我们整个青年的评价。

约德尔：听说过。

元首：这些“希特勒青年团”出身的年轻人很好斗……年轻的德国小伙子，有的才 16 岁。大部分“希特勒青年团”的青年战斗起来，比他们的老同伴们要狂热得多……所以，如果这些师投入战斗，战斗力相当于 2 个党卫队师……

希姆莱：现在这些部队都是训练有素的师，我的元首。元首：“希特勒青年团”师正应该这样战斗，全体青年都应该这样。他们都已组织起来了。他们将经受严峻的考验。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可现在他们……已训练很同时间了。希姆莱：这 2 个师将从 2 月 15 日到 8 月 15 日受训……他们现在状态良好。多尔曼、布拉斯科维茨、龙德施泰特等已视察了，他们，表示很满意。

元首：每个师平均多少人？平均年龄多大？

希姆莱：每师平均 400 名军官和大约 3000 到 4000 名年纪稍大的士官，所谓年纪稍大是指 20 至 30 岁之间。2 个师平均年龄 18 岁半，每个师都是如此，上自指挥官，下到新兵。元首：是不是多数都是 18 岁？

希姆菜：是！多数是 18 岁。

戈林：最近有人说，最好的战士年龄应在 29 到 30 岁之间。希姆莱：这是单纯就身体而言。

元首：只要他们受过训练……从前怎么训练这些年轻人只有上帝知道。这些吵吵嚷嚷的年轻人 17 岁就报了名，有的甚至更早……想要加入……不过他们打起架来很勇敢，没有人能相比……其他人的训练很糟糕，只训练了两个月……一部分在 4 月前，一部分在 4 月后，还有一部分在 4 月间，有的只有 14 天……那可真是“绝妙””的演习，在高原训练场的演习……肯定效果更好。

希姆莱：就其本身而言，训练得相当好。

元首：第一批 50 个师已经这样了。第 24 装甲师您也训练好了吗？

约德尔：第 24 装甲师也训练好了。

元首：这个师必须马上到这儿，这一点完全肯定。要看到我们必须尽快从东线撤出一个师到这儿来。

约德尔：我的元首，今天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到了意大利第 4 集团军①那里。

戈林：他是去访问吗？

约德尔：属于中途访问，到现在他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

戈林：好极了。

元首：可是他不能在那里呆得太长，必须尽可能快地继续前进。

事情必须快办。我们必须看到尽可能快地……今天他必须搞出一份详细的形势报告……

戈林：现在罗马的意大利人情况怎么样？希姆莱；我的元首，我们本来可以试试，领袖的这个师行不行。

我们已调给这个师 12 门自行火炮、12 辆IV型坦克、12 辆III型坦克，一共 36 辆……

元首：他必须懂得，我们要的是一个整师，他们是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戈林：最起码是火炮……

希姆莱：他们里面还有教官。

约德尔：我什么时候可以下这道命令？

戈林：当真要下命令吗？

元首：所有命令一律用密码。

约德尔：这是无可非议的。

元首：用密码，您想怎么样？否则我们什么命令也发不出去；否则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戈林：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应派特别密使。

元首：信使如果随身带一些东西会更危险。必须用密码。戈林：装在脑子里？

元首：尽管这样，他们的脑子也记不住这么多东西。希姆莱：我可以给我驻罗马的师通电。

元首：密码吗？

希姆莱：是，用密码！

元首：绝对安全吗？

希姆莱：绝对安全。我们已编出了一份全新密码。昨天完成了最后一个密码。用它可以发出命令，与他们……戈林：……必须保险。

约德尔：这只能给凯塞林，否则他不知道下一步的计划：等他得到报告……形势又变了。

元首：约德尔，如果向这里开进，是不是首先要通过布伦纳山口？

约德尔：我认为通过布伦纳山口没问题，火车可以通过。

元首：是的。不过要是它突然被占领了呢？

约德尔：那么还有一种看法……

希姆莱：南蒂罗尔会暴动！

元首：没有什么南蒂罗尔了，那几的人都被征走了。

希姆莱：那里还会有男人。意大利人……如果要收拾他们的话……我坚信，他们肯定要进入掩体。

元首：……因斯布鲁克的守备部队……已为此准备好了他的“虎”式坦克……关于这件事您已和托马勒谈过了吗？

（约德尔：是。———那边也谈过了吗？沙福：托马勒反正在这儿。

约德尔：和他谈过了。至少我们在东线塔尔维西奥还有一个团。

希姆菜：我正要说这个团会来……

……这是个山地团。可以把它直接撤下来。元首：这儿有没有警察团？

希姆莱：驻马赛的警察团。

……我想。可以把这个团留在莱巴赫。元首：不过，可以把它调过来。

约德尔：我估计，他们反正会行动的，因为他们得到了加强女全保障的命令。他们没有得到其他命令。

元首：可坦克一到，这群胆小鬼就会溜之大吉。

希姆莱：我们的坦克部队也开到那儿吗？……

元首：这里，不过要情情况，近卫部队把坦克留下，再在这里得到坦克。

戈林：这我放心。这批傻瓜会在布伦纳停下来，这绝对不行。

元首：我们的坦克一来……

戈林：我认为最好是空降伞兵。希姆姆莱的人比我的人更适合完成这项任务，应立即行动！……

戈林：对于伞兵师我想再问一下，我的元首。您对投入伞兵有什么想法？

约德尔：投入伞兵首先是为了阻止敌人从罗马逃出……

元首：这样必须占领所有通路。派一支小部队即可，他们会立即躲起来，尔后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戈林：不要同时进行……在机场上集结的——……

元首：城市内需要的其他东西都要在机场着陆。我现在对机场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必须迅速离开机场，估计盟军方面很快会发动进攻。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从机场撤离。

戈林：炸毁所有能炸毁的一切！

耶顺内克：最好今天下午或明大早晨派一名信使到法国南部通知施图登特将军，也就是说通知第 2 伞兵师，他们应该去哪儿。

戈林：通知他们在哪里跳伞。

耶顺内克：因为不能忽视今天下午或明天早晨的情况。元首：形势都一样。罗马还是罗马。公路干线……必须占领。任何情况下都要占领。

戈休：由谁来切断梵蒂冈与首都的联系呢？

元首：这是进驻部队的事，主要应由第 3 装甲步兵师完成。占领以后……现在这里有三个所谓现役意大利师。但我不太相信，用武力对待他们时，他们会有什么作为。

约德尔：第 12 师在罗马，其他师离罗马很远。

凯特尔：我想，他们已没有实力了。

赫维尔：好象他们已把一切准备好了。报纸……传单都准备好了。“斯蒂法尼”通讯社社长开枪自杀了。

元首：谁？

赫至尔：“斯蒂法尼”通讯社社长自杀了。目前听到的消息是这么说。

希姆莱：我的元首！还有人被捕了——……——德国人，他们根本不是使馆人员，而是怀疑他们从事谍报或其他非法活动，其中还有妇女。

元首：马上告诉外交部，要我们的使馆立即声明：所有德国人必须立即释放，否则我们将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事情必须尽快解决，这是最关键的……速度是最重要的。

隆美尔：您要做的是：首先把部队调过来，因为西西里岛我们已守不住了，这是肯定的了。至于您能否守住，还成问题，何况这无所谓。至关重要的是保持总体的相互联系，这样我们就能战斗下去。

约德尔：就指挥权问题，我认为隆美尔元帅在下面负责指挥……或者我们进行分工：隆美尔负责这次行动……凯塞林元帅把部队从南方带到这儿，

他们一会师，就全部由隆美尔元帅指挥。其他人一律不行，从慕尼黑……

元首：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还是认为，指挥权……必须交给隆美尔……凯塞林元帅没有他那样的声望。我们还必须在空投的时候公布此事……隆美尔无帅！其次，所有法西斯师和部队……我们必须马上把法四斯党员撤出来，这是我们的目的……被击溃的师，包括正规军……和志愿者。希姆莱曾有个好主意：每个人都可以回家，我们通过法里那奇宣布，每个意大利士兵都可以回家……其他回家的人就不去管他了，反正目前这些人也没有用。

希姆莱：也许以后把这批人抓到德国当劳工更好一些。元首：那当然，反正他们也没有用。——第二点是设法把人员撤出来，这就是这里的任务，与这里的安全措施无关。第三点是占领罗马，利用空降伞兵占领由第 3 装甲步兵师进驻。

戈林：这必须在现场指挥，在慕尼黑指挥可不行。

元首：命令要发，司令官们要负责地实施，尔后德国部队便齐头并进……敌人只要抵抗，就可以无所顾虑地开枪，这是唯一的选择。事情就该这么办……加上“赫尔曼·戈林”师，共 6 个师，都是精锐师。戈林：敌人肯定会立即向盟军请求援助和保护——敌人将在哪儿登陆？

元首：他们登陆还需要一定时间。

戈林：他们的伞兵当然可以和我们的伞兵一样空降。

元首：当然可以，不过有……

戈林：我的话仅供参考。

元首：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会光吃一惊。

戈林：如果罗马投降，就没人向盟不求援了！

元首：有，从那里会逃去一部分，因为意大利人……意大利分裂了，法西斯党员遭到迫害——谁自杀了，“斯蒂法尼”社长？

赫维尔：是，“斯蒂法尼”社长自杀了。

元首：可以看出，一切不是一致的，人们在等待着某一信号，然后才能重新开始。必须立即……比如“法西斯自由军”，我们必须马上成立一个临时法西斯政府，控制局势，发布命令……所有法西斯士兵和军官都立即有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把民族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是使这些法西斯士兵和军官与民族社会主义军队取得联系，这个 73 岁的老……

希姆莱：我马上可以给我的正在训练的党卫队中校……下命令让他马上来。

元首：他不可能办到。

希姆莱：这是另外一个师。其实只是些民兵。

元首：可是他们中有许多不相干的人。

戈林：至少他们拥有坦克和自行火炮，那里驻有德国士兵。

元首：那里有我们的人，否则一事无成。但这需要时间。他们将接到命令。如果要发生什么事的话。他们一定会按到命令。

但愿他们不会堵上耳朵、这样当电台公开广播时，他就不用保密了……当“斯蒂法尼”通讯社的电台公开……

戈林：伞兵司令部在哪儿？约德尔：他执行这项任务正合适。

元首：谁？

约德尔：施图登特。

元首：好极了。他办这件事最合适不过了……（赫维尔大使呈上马肯森

与巴多里奥的会谈记录）

元首：这是骗人的鬼话！您听听！

（读）：“ 精诚合作 ”！这群不知羞耻的家伙！

黑韦尔：他只是白费劲！

元首：要是我能抓到这头蠢猪就好了！

戈林：这封信简直狂妄之极！

元首：他是我们的老对手。就是这家伙 1939 年 8 月 25 日首先使意大利拒绝参战，这却引起了英；法首先宣战。并与波兰签订盟约。

戈林：这种事和他的信，实际都是在做戏，一出丑剧！

邓尼茨：太多了，要阻止……潜艇在斯培西亚和上伦集结，并防止他们派 5.6 艘进驻斯培西亚，我是无能为力。正确的作法应该是，如果宣传不管用，就尽快把这些船搞到手。

元首：它们在土伦……

邓尼茨：是，也许可以事先俘获它们。我在斯培西亚有自己的反潜部队，可他们的装备除了猎枪和手枪就什么也没有了。如果以后要俘获敌船，必须有装备相应武器的部队。不过我想，意大利人很可能被俘。

元首：您推测……

戈林：有我们的人在那儿。

邓尼茨：可他们没有机动能力，也许只有 300 人。我们还有两艘潜艇。300 人起不了什么宣传作用。他们都没经过训练，都是些海员。我的元首，我认为必须尽力防止这些人逃跑。

元首：这一点我已说过。必须让一支特别舰队，一支部队做好准备。

邓尼茨：可以先等一等，人们还不知道。

戈林：您把潜艇部署在前线了吗？

邓尼茨：如果他们逃跑，我马上就部署潜艇。不过还须等一等，要看看事态的发展。舰队内部可能会发生分裂，年轻军官会把老军官扣压起来。

约德尔：我认为最紧急的是把施图登特的参谋部转移到凯塞林那里。第二、派一名信使到他那儿，与他和施图登特面谈罗马行动，因为他们对这个计划还一无所知。这样，信使不久就可以通知我们，他有多少兵力，万一需要，什么时候可以把兵力集中起来。这样可以大概定一个期限。

元首：我们必须定一个日期，否则应付不了，还可能没完没了地拖延，这决不行。我们一直是从我们这方面考虑的。塞尔维亚行动日期也是我们这方面决定的。这不能交给下级机关办。

约德尔：可下级机关现在告诉我，除了第 3 装甲步兵师还有什么？

元首：其他的就是我们的事了。我们可以把伞兵……戈林：是 9 个营。

耶顺内克：9 个步兵营必须尽快武装起来，然后分三批空运。我建议，第二批应尽可能与凯塞林元帅协调行动。——凯塞林元帅必须决定在那儿着陆……此外，第 1 伞兵团调来……那不勒斯。

元首：第一批在没有……不能着陆，决不能。他们首要的任务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切断通路。必须派小分队。

耶顺内克：……第一批，不能让意大利人觉察到……明确意图：封锁罗马。

约德尔：无论如何必须这么做。如果整个师一次空运并空投，那我们的空降行动是盲目的。

元首：可谁能担保他们不会马上得到消息呢？每个机场部有意大利人，如果这么多伞兵一旦到达，将会发生什么？

约德尔：我认为伞兵打着去四西里的旗号是可行的。他们一着陆，意大利人自己会对伞兵采取敌对行动……元首：他们不会这样做。

约德尔：我不相信。他们跳伞的同时，一切就会立即变样。元首：他们中一部分人会逃走，整个行动就会失败，对这一点必须认识到。

戈林：在西西里岛驻有一个伞兵师。

约德尔：到处都是伞兵……

戈林：我们也可以直接和意大利人把所有的空运人员……不过只飞到罗马，并在那里降落……最重要的是运输能力……我们需要对第一批进行加强……

元首：我可不想说。伞兵……

戈林：不，第一批！

耶顺内克：第 1 伞兵帅。

戈林：向这里提供补给。我们公开宣布，我们不再在这里……我们需要用火车把这个师运到意大利。这是第一批，然后他们飞回。我们公开说，我们只能到罗马。前方的机场已被破坏。由于昨天的损失，我们不能空运。这一切人们是会相信的。在空运中，我们蒙受了损失……我的念见是，我们进行超载空运太冒险了，我们只能向罗马……然后我们就公开通知意大利统帅部，说我们需要用火车把伞兵运到雷焦，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帅的。紧接着第二批到达。耶内顺克：还有，如果想全部空投，并不是所有到达的飞机都做好空投准备了。

约德尔：也许对这儿和那儿都要加强——西西里以后的供给在任

何情况下都可以保证。

（呈上国防军战报）

我能否马上做出一项决定？我认为必须办以下几件事：今天必须派一名信使飞往罗马，口头……向凯寒林传达罗马行动计划，同时，施图登特也必须来，向他介绍情况。戈林：施图登特马上来。

耶顺内克：通知施图登特将军需要很长时间，他还在法国南部。

元首：尽管这样，明天一早也不可能进行了。他从法国南部到这里需要多长时间？

耶顺内克：他今天还能赶到这里，明天一早就又可以出发。

元首：我认为让施图登特将军到这里来是对的。他可以接受任务。

凯特尔：还要通知政府。

元首：还没到这一步毕竟只能把第一梯队从……

约德尔：这与罗马行动完全无关。伞兵到了，其他部队到了，现在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进行。不过他们一跳伞，罗马就会有戒备。

戈林：凯塞林说的很简单，由于这里的威胁，所以伞兵……元首：由于在这里的事态！

戈林：不，由于受到威胁，应在罗马空降，并从这里用火车把他们运到雷焦。但必须尽可能等到第二批到达。这样，他们可以联合行动。

元首：对。

瓦利蒙特：从东南线到地中侮以东的一些重要事情还没有报告。我们的行动也在按计划进行。

勒尔将军今天早晨按隆美尔元帅的安排会见了意大利第 11 集团军司令。结果说明，这个集团军还没有得到罗马的命令。他解释说，他觉得这个安排很好，可只有得到命令才能执行。昨天已和罗马约好，必须接受命令。也已询问罗马，并摧促他们下达命令。

我的元首，另外东南线总司令报告，在新形势下应如何‘ 重新分配力量？

（呈上报告）

罗得岛和克里特岛的局势没有变化。

元首：魏充斯怎么样？

瓦利蒙特：……第 92 加强团，因为他认为，很有必要占领门的内哥罗和北希腊边界间德军的真空地带……

元首：这儿反正有这个团，他们不用担心……

凯特尔：转移肯定会花很多时间，重新调派总要快得多……瓦利蒙特：在同一地带他还准备部署第 100 步兵师，这个帅本来应调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去，可由于铁路阻塞，行动十分缓慢。这个师也应调到这里，以便在需要时，占领阿尔巴尼亚海岸。

元首：它不可能做到。

瓦利蒙特：这主要关系到发罗拉和都拉斯两个基地，我的元首。整个“ 康斯坦丁 ” 计划必须建立在占领这两个基地的基础上。这样，至少主要港口可以掌握在德军手里，而不需要从东线调其他部队。

元首：但它们并没有安全保障。

瓦利蒙特：基地力量太弱。

元首：魏克斯什么时候到？

凯特尔：他明天到。今晚从纽伦堡出发，明早到这儿隆美尔：魏克斯？也许来了吧？

元首：您有顾虑吗？

隆美尔：不，……

元首：我不清楚魏克斯的健康情况如何，他是文质彬彬的人。凯特尔：我已和他谈过，他随时准备完成各项任务。

元首：那实际上他肯定是个出色的军官。…341 一凯特尔：魏克斯本来是个山民，

瓦利蒙特：东南线总司令的其他建议认为……现有的师应调到靠

近海岸的地方，第 1 装甲师应在科林斯地峡做好准备，以便也能在北方投入战斗。

元首：除了第 1 装甲师，反正只还有 1 个师。这个师必须留在前瓦利蒙特：还有 4 个要塞营。

元首：除了这个帅，就只有一个了。

瓦利蒙特：他要把第 117 师调到西海岸和南海岸附近。第 104 师和第 1 山地师也担负同样的任务。然后，“ 勃兰登堡 ” 团的另 1 个营开过来，并参加围剿行动。其中 1 个帅已进入贝尔格莱德城区，另 1 个师几天后到达。

元首：警察团什么时候到达？

瓦利蒙特：芬兰的吗？——他们必须于 8 月 1 日从但泽出发，到达这里需 14 天。

希姆莱：该到了。

瓦利蒙特：第 18 警察团应该到这个区域。

元首：“ 欧根王子 ”师呢？

瓦利蒙特：本来应该来。不过，它如果没有力量，就不得不留在这儿，因为这里还有占领海岸某地的任务。第 114 步兵师也执行这项任务。第 297 师还在贝尔格莱德周围……这个师还有战斗力。

元首：这儿的行动必须快些……

瓦利蒙特：如果元首您同意的话，第 100 步兵师应开往克里特岛，而不到这里来。这样，我们至少能占领这两个主要基地。

元首：隆美尔，您认为怎样？

隆美尔：这 2 个师……处境并不很妙，南部的 1 个师昨天失去了联系……正向海峡撤退……已经被封锁了，现在只能从水上得到补给，被困在了水上。这个师根本没到海岸，只能保住海峡。巴伐利亚师的情况也很糟，也被困在水上……直到现在也没有向海岸突击。根本不能指望意大利人。

元首：现在他们反正也完了。

戈林：这么说，我的元首，也许应该发个命令，立即解除那里现有师的武装，反正他们也要把他们的武器卖掉。希姆莱：昨天我已对意大利人采取了行动。

瓦利蒙特：东南线总司令已下令，只要意大利军队在目前部署中开始骚乱，就立即收缴他们的全部武器。

元首：他们竟敢卖掉武器！

戈林：为了英磅，他们最后连裤子扣都卖了。

瓦利蒙特：他还询问，是否用保加利亚的增援军队……以防备另外的帅发动进攻。当初和国王约定……现在在这种局势下也应该遵守。

元首：那必须看一看。

瓦利蒙特：最后他问，如果意大利人投降，阜姆一的里雅斯特地区是否能马上由他控制。

元首：勒尔？我想象得出来！这一地区必须交给降美尔，它属于意大利。

瓦利蒙特：属于意大利，是这样！

元首：凭他的力量，他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瓦利蒙特：第 92 闭提出的类似建议能否实施？

元首：其他的他可以先带来。我认为这里需要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

瓦利蒙特：无论如何必须在萨罗尼卡做好运输准备……元首：另外，在这里我们也是凭装甲师作战。

戈林：对。但是它证明——

凯特尔：我们已经推进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了。

戈林：与此相反，陆军师……凯特尔：那时，译普 · 迪特里希带领他的师很快就通过了。戈林：只需定下决心。在这儿，不用再躲开他……

降美尔：必须把这条巨大防线向前推进，使他们无法通过。这样，他们就无后顾之忧了。

瓦利蒙特：7 月 23 日，由能干的米哈伊洛维奇的人在巴尔干地举行了一次会谈。要点是：立即加强破坏活动……停止针对铁托的敌对行动，并根据南斯拉夫国王的命令与其进行合作……此外，罗斯福和丘吉尔已对国家的重建作出保证。斯大林宣布对此不感兴趣。准备空降 2 万名伞兵——这与然娃巴尔干方面的夸张——投入塞尔维亚的国家警卫队、边防卫队和志愿军。为将来着想，应禁止与这些军队发生战斗。此外，还作了其他一些规定。

仅从这些记录稿的主要部分可以使我们看到德国最高指挥层在克服的最初的混乱状态之后所要达到的目的：

竭尽全力在意大利实施“阿拉利希”计划，坚守阿尔卑斯山口，同时不给罗马以最后解除与德国结盟的借口。因此，也不让隆美尔元帅停止在慕尼黑的准备工作；

准备从几个大岛上撤出所有德国部队；将以后的防御限制在亚平宁山脉北段。因此今后新增援的德国部队不得越过这一地段向南推进；

开始在法国的地中海沿岸和整个巴尔干——在“康斯坦丁”计划的基础上——接收所有意军占领的地段。

肩负这些任务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因此进入了它整个存在时期中负担最重要的时期。另一方面，希特勒仍然继续推行颠覆罗马政府和包括救出墨索里尼在内的重建法西斯独裁政府的计划。那么，如何把这些冒险意图同暂时还继续的德，意共同作战的路线保持一致呢？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此捉摸不透，更何况它没有参与这些特别计划的制定。

“轴心”的崩溃

从1943年7月底到9月8日意大利最终背叛的若干周里，德国大本营明显处于分裂和丧失理智的状态中。两场战争接踵而至，一场在东线，另一场在南线。在此期间，各司令部无暇他顾，几乎无法得到关于另一方的确切消息。譬如，约德尔对于秋季兵力部署的建议，轻率地忽略了东线的形势——当时俄国正以优势兵力对奥廖尔突出部发动进攻——而另一方面，蔡茨勒却不顾南线已经出现的极其危险的形势，一直坚持要把唯一的装甲步兵师——党卫队“近卫”师投入使用。两线与指挥参谋部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只有希特勒独断一切。

在地中海地区与敌人在埃特纳狭窄的桥头堡的战斗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方面在完成这项份内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在忙于强迫自己的盟友顺从希特勒的意图，并设法对付罗马的反措施。这项既对内又对外的双重任务，使紧张关系日趋明显，甚至在德国自己阵营内部，关于对意大利人所欲达目的的看法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只有希特勒，以及与希特勒坐在一条板凳上的戈林坚信这是“背叛”’。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一直认为，还是要尽力鼓励意大利人坚持下去，因为他期待着救出墨索里尼的行动会带来局势的转折。

在希特勒的亲信当中，除了约德尔之外，邓尼茨海军元帅是最经常出入大本营的人。他们出于纯军事考虑，倾向于同一个即便是非法西斯的意大利也保持结盟关系。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观点同凯塞林和在罗马的林特伦是一致的。这两个人主张，对新政府的合法性不要产生任何怀疑。他们的观点同隆美尔元师和龙德施泰特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尽管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是，他们都在竭力澄清这种捉摸不请的关系。在是否从西西里岛撤军的问题上，他们也与希特勒意见不一，他们一贯主张从西西里撤军。以便不给意大利人以任何背叛的借口。这一点恰恰与邓尼茨的主张不约而同，当然邓尼茨是从其海军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首要任务就是使“阿拉利希”计划和“康斯坦丁”计划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这两个计划在7月的最后几天里，根据局势的变化进行补充完善之后，合而为一，统将意大利、巴尔干和西线都包括在内，取名“轴心”计划。当时，刚刚为其配备了一个完整的集团军群司令部的隆美尔元帅，得到了一些开往到因斯布鲁克周围地区的快速部队，并以这些部队重点保卫阿尔卑斯山山口，首先是布伦内罗山口。这项任务，以及德国企图向意大利北部偷偷开进更多部队的努力，使德军从7月底，同罗马以及饲意大利部分地区指挥机构的冲突接连不断。每次冲突都几乎是因希特勒对意大利人进行大肆威胁和咒骂而发端，尔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过在罗马的冯·林特伦将军做一些军事上必要的补救工作——这对冯·林特伦将军是一项艰巨而倒霉的任务。

如果最终以这种方式向亚平宁山脉以北进军，并以此作为防止“轴心”国崩溃最重要的准备工作的活，那么，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就无法贯彻一项在意大利背离时继续作战的明确方案了。由于希特勒作任何决定都缺乏长远考虑，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便以这些命令无法对意大利人保密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过错。希特勒说过一句话——邓尼茨海军元帅对这句话已记录在案：“元首承认，双方可以讲很多，因此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句

话对无数类似的情况都适用。

墨索里尼倒台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在塔尔维西奥和博洛尼亚举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在 8 月 16 日，即费尔特雷会谈之后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笔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谈。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即 8 月 15 日，仅约德尔和隆美尔参加了会议。意大利人在塔尔维西奥会谈时已经作出决定，试图——也许打算与“轴心”伙伴一起——寻求一条退出联盟和战争出路，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而在博洛尼亚会晤时，意大利致盟军的秘密停火建议已经提出 5 天了。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这两次会谈肯定不会取得任何结果。

当希特勒以德国国家元首的身份，严辞拒绝了对意大利巴多里奥提出他会晤的邀请之后，双方外交部长又在塔尔维西奥会面了，同时，意大利统帅部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和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出席了会议。为了在会谈中使德方能达到澄清德、意双边关系的既定目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为会谈中的军事部分准备了一份方案。这份方案同过去为费尔特雷会谈准备的那份方案几乎没有区别：将敌人阻滞在意大利国土和巴尔干之外——在南意大利部署同样数量的德、意部队——将较强的德国部队放在意大利中、北部，作为南部兵力的靠山；在高级司令部里实施统一指挥。然而，希特勒却不再想进行什么一般的军事、政治接触了。他认为，带着耳朵听一听就足够了。他特别要求，不能给意方任何关于可能从西西里撤军的暗示。他还对与会的安全做了详细的指示：一起出场；不进行个别会晤；在主人食用招待食品和饮料之前，不要吃喝任何东西。当德国的专车驶人塔尔维西奥车站时，意大利的列车这时也已在此等候。在列车的每个窗子之间都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党卫队队员！

在上午只有双方政治和军事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会议上，安布罗西奥避而不谈他对形势的估价以及意大利的下一步企图。相反，他对最近德军迅速向意大利调动部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象表示愤慨。他激愤地指出在罗马，人们有一种“不是自己国家主人的感觉”，德国国防军统帅部似乎已把意大利的领土视为“保卫德国的前沿地带”。凯特尔对这些指责当场进行了反驳，但他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也未能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在意大利专列的餐车上，他们共进了午餐。在餐车，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好象把希特勒的警告忘得一干二净。饭后接着进行了军事会谈。会谈中，双方的任何一方都表示完全理解对方关于兵力部署的愿望。然而，指挥机构问题依然未触及。在最后结束的会议上，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发表声明说，德国希望同意大利一起胜利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安布罗西奥则有力地保证，意大利将在其可能的范围内站在盟国一方继续作战。至于共同防御亚平宁半岛的计划，将在以后某一时期做进一步讨论。

这次谈判尽管明显地把主要问题搁到以后再谈，但德国与会者们仍然认为，在安布罗西奥的保证和对德国愿望的承认中，可以看出意方的明显进步。

谈判后，里宾特洛甫及其随行人员回到沃尔特湖畔的“宫殿饭店”。据说，这家饭店为了这次德国代表团短暂的访问，将所有的客人拒之门外。德国统帅部参谋长和统帅部的军官们在列车上过夜。第二天早上，他们从克拉根福飞回“狼穴”。回到德国大本营之后，凯特尔还没有来得及向希特勒汇报。当天又收到新的报告。据说，意大利两个山地师开到布伦内罗边界地区，并违背已经达成的关于共同保障隘口安全的协议，要求德军撤出沿途岗哨。也正在那几天，意大利一小股海军力量作战频繁，甚至抵达直布罗陀海峡。

并从法国南部，甚至从巴尔干地区传来了盟友之间融洽相处的好消息。

鉴于这些矛盾，在德国阵营内部人们迫切要求搞清真相。在这件事情上，人们并不理会约德尔所讲过的话。他曾说，谈判必须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对他来说，要取得在塔尔维西奥未取得的东西并非难事，他认为，利用自己的情况判断和德军兵力部署计划——隆美尔和凯塞林也曾为此出过力——就可以迫使意大昨摊牌。在这样一份新产生的备忘录中，约德尔特别首次强调提到了盟军可能在萨莱诺悔湾的登陆，并再次把北亚平宁山脉视为最后的和主要防线。凯塞林利用这一机会又重新提出的应向撒丁岛和意大利南部增派德军的建议，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从西西里岛撤退仍在犹豫不决，然而，撤退已在悄然进行之中。

8 月 11 日，意大利通知德方，他们决定将其第 4 集团军从法国以及将若干师从巴尔干地区撤回意大利本土。意大利想借此来表达其与德国重新会晤的愿望。德闰国防军统帅部在其答复中，建议举行关于这些问题的会谈，同时表示期望：“利用这一机会，彻底澄清关于在保卫意大利和欧洲要塞的南方支柱作战中的共同指挥和指挥机构问题”。

对此，罗马表示同意，并决定委派陆军总参谋长罗阿塔将军为代表。德国方面，希特勒认为，除约德尔之外，隆美尔元帅如能作为在意大利的德军最高司令出现，必将对意大利产生特殊的影响。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德方已经考虑到意大利几天来已经与盟军建尔了联系——实际并不知道——那么，德国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方法都显然是徒劳无益。德国方面以一个武装党卫队摩托化营护送德国将军们由机场到会谈地点。会谈就在这种气氛下开始了。一到达目的地，党卫队营便把会址层层封锁起来，连意大利保安人员也被围在里面。德国党卫队队员们以正步，在会谈大厅敞开的大门前经过，俨然比意大利人高出一头。德国的代表们荷枪就座，约德尔首先发言，他在会上不乏粗鲁之词，特别是当他谈到德方同意意军从法国南部撤军并质问意大利“撤出的这些人马是用来对付意大利南部的英国人，还是对付布伦内罗的德国人”时，言词更加不堪入耳。对此，罗阿塔将军不仅平和冷静，而且以论证得体的观点，驳斥了德国人为“轴心”崩溃时而拟制的方案，以致约德尔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将所涉及的这些问题，留给双方最高指挥机构去做最后处理。约德尔在会前曾对此行抱有很大希望，结果，事与愿违，他不得不于下午致电统帅部参谋长：“关于意大利人的意图，无法了解得比现在更清楚”，并补充说：“迄今为止的疑团，依然存在。”

在尔后的数个星期里，这种同床异梦的状态仍在继续。两个“轴心”国的盟友都在为最后的转折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意大利人——或者至少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决策人物——认为在德国人眼里，意大利人不仅越来越多地阻止德方为与西方列强达成协议而进行的兵力调动，而且，象隆美尔所推测的那样,似乎他们的目的还在于把驻扎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 10 几万德军封锁在某个地区，以便在适当时机将其作为“新婚晨礼”送给盟军，而德国最高级领导则在贯彻其保住一个没有意大利人或甚至反对意大利人的意大利的企图，并准备在边界动用武力，把“轴心”行动的准备工作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

作为这种工作的第一个措施，希特勒于 8 月 16 日，命令降美尔元帅及其总司令部越过边界，但其权力范围仅限于北意大利。这样，在业平宁半岛就

出现了两个并列的德军高级司令部。而且除此之外，意大利的指挥机构也继续存在。与此同时，约德尔和凯塞林联合起来，不顾希特勒的犹豫不决，终于 8 月 17 日将最后一批德军从西西里岛转移到大陆。对这一结局，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和意大利统帅部事先根本没有取得谅解。然而希特勒也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奇怪地保持沉默，并且一反常态地迁就了这个既成事实。

与此同时,国防军统帅部于 8 月 18 日再次向一直把目光盯着阿普利亚和那里的空军基地的南线总司令部指出，受威胁最大的是“那不勒斯——萨莱诺”海岸地区，并明确命令它，将其装甲部队主力调到那里。同时，还可以及时把有经验的高级司令官菲廷霍夫大将解脱出来,并为他新组建第 10 集团军司令部。

另一方面，一直未掌握罗马与盟军进行交往的真凭实据的德国国防军统帅部，继续同意大利统帅部和罗阿塔将军进行谈判，并且始终给意大利人保留站在德国一方的可能性。在这个在形式和内容都长时间受到损耗的联盟中，“轴心”伙伴处于一种奇怪的纷争之中：一个打算委身于尚在犹豫之中的盟军；另一个则怀着阻止伙们后退半步的坚定信念。但与此同时，在 9 月 4 日即英国在卡拉布里亚的雷焦的意大利本土实施登陆的第二天，罗马最高军事当局还再次向德国方面作出保证。后来得知，意大利早在一天前就同盟军签署降书。在这些日子里，正当在地中海地域不安和威胁接踵而至之时，东线正在进行的艰苦防御战也险象环生。不断告急，要求紧急补充兵力。直到这时。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方才认识到需要对它迄今为止的行动进行一番审查。9 月 6 日在份研究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把强大的后备兵力长期间摆在南方是不负责任的。约德尔建议：“对于我们在意大利遇到的麻烦，要快刀斩乱麻，迅速主动地加以处理。”他在第二天赢得了希特勒的赞同。然而，一份准备采取这种结局的最后通牒式的外交照会尚未完成，9 月 8 日下午，罗马——柏林“轴心”便以念大利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而破裂①。

关于这几天随着形势而产生的人事变动情况，看来也值得一提。战功卓著的冯·林特伦将军于 8 月 31 日被解职。他的继任者手持凯特尔的一封信，未经报告，便经直出现在他面前。这成了后来解除职务时所采取的贯用方式。希特勒不顾林特伦要求上前线的愿望，便在战争时间，按照希特勒的指令而被迫退役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为了作手术不得不于 9 月 5 日离开大本营。他迫切要求在他估计为期 3 个月的离职期间——按照他过去多次提出的请求——为他挑选一位继任者，这一请求看来似乎能够得到满足。然而，还是在他住院期间，他接到了那项在本书开始时所提到的希特勒的命令按照命令。约有 20 位提到姓名的总司令部军官，其中除了约德尔、蔡茨勒和豪辛格之外，还有他自己，都要在整个战争中留任原职。

当时一直被软禁在德国大本营第 1 号宿营地”里的黑森菲利普亲王，在意大利背叛的当天，从希特勒的临时宫邸出来时，便被保安部逮捕了。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元首在王室身上得出了教训”；9 月 10 日，王子“被盖世太保押往柯尼斯堡。”

第四章三条和更多务战线的出现

1943 年末—1944 年初

意大利的投降，对于德国来说，是 1943 年所遭受的第三次沉重打击，同时，也意味着希特勒欧洲政策的破产。德国大本营在经过一度紧张不安之后，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9 月 8 日夜晚，德军统帅部下令，在从里昂海湾到克眼特岛和罗得岛的整个地中海区域，实施代号为“轴心”的行动，“准备数月……直到 8 月 29 日方才适应当前局势”的命令，立即生效，由德国人接受这一地带的全部领导指挥权和防务。解除意大利武装这项庞大工作之所以进行得十分顺利，不仅由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及其德国地方指挥官的灵活妥善的处理，而且与同盟国提前宣布意大利投降，以及美国伞兵部队放弃在罗马附近着陆的计划，而代之以在巴乡里奥政府所控制的南意大利着陆不无关系。在“轴心”计划执行中的唯一严重失误，就是由于德国海、空力量不足，未能阻止意大利海军舰队归降盟军。此外，希特勒原以为绝大部分用法西斯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会自愿参加德国国防军的希望也落空了。德国虽然进行了大肆宣传，但墨索里尼的获释也未能给希特勒带来任何希望。墨索里尼在他不久对德国大本营的访问中，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垮掉的人，显然对意大利人民再不会有什么号召力了。因此，希特勒把他当做一个倒台的大人物来对待，在他周围布满岗哨，只在用得着他的时候，才让他露面。希特勒还特别将墨索里尼筹划组建的一支 50 万人的大军，削减到 4 个帅，以及保留支小型的海军和空军。

在盟军下一步行动的判断上，德国领率机构曾一度举棋不定。9 月 8 日晚，德军发现几小时前，有一支大型护航舰队向意大利西海岸驶去。德方认为，“敌人在罗马地域登陆的可能性要比在那不勒斯地区为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未受这种说法的影响，再次明确指出：“首先，一切都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将第 10 集团军和空军部队从意大利南部撤出”。这个观点有两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因为许多人责备德军统帅部对南线总司令及其部队置之不理，甚至想要牺牲他们。这种指责与事实截然相反。第二，因为，这些人还声称，德军本准备在北方的一条防线上实施亚平宁半岛的防御。因此，德军统帅部才拒绝南线总司令提出的关干将意大利北部的两个装甲师迅速南调，以对付 9 月 9 日提前在萨莱诺海湾登陆的敌人的要求。德军统帅部的这一决定也受到某些人的谴责。其理由除了大约 700 公里的遥远距离和其他排除这种调动的重要条件之外，人们还不妨回忆一下，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不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不论在欧附洲还是在远东——即使增强兵力，也无法阻止敌人登陆。此外，南线总司令 9 月 12 日所作的关于决心：“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的报告，也似乎不能理解为他需要兵力。但是，它也可能蕴含着改变今后意大利战场作战指导方针的设想——虽然这超出了南线总司令的任务范围。希特勒也立即要求：“南线总司令应击溃在萨莱诺登陆之敌”，而指挥参谋部却根据原订计划对此做出如下补充：“这一行动能否取得全胜或局部胜利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此行动之后必须将部队主力集结于罗马周围地区（为了下一步后撤）①。

仅这一道命令，就可以驳倒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谬论，即所谓凯塞林在萨莱诺及其附近地区所取得的防御作战的胜利，给他不久推翻那个在意大利继续作战的计划提供了机缘。更重要的是德军统帅部通过 9 月 9 日、13 日和 17 日的一系列指令，鲜明地表示了它所坚持的“在亚平宁建立一条尽量矩小防

线”的基本观点。——例如，它命令所有决定准备调往意大利南部的部队，在亚平宁半岛北部停止前进；命令 B 集团军群司令部（隆美尔）立即勘察和建立“亚平宁半岛上最好的防线”。按照这些命令，当南线总司令部解散以后，一旦德军部队在亚平宁半岛北部地域会合，隆美尔元帅便立即接过在意大利的全部德军的指挥权。还在 9 月 25 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便在希特勒表示同意以后，批准了隆美尔关于加强北亚平宁防线的建议，并答应调拨 21 个德国师，以后又增加 4 个意大利新编师，让隆美尔完成他的任务。

只是由于巴尔干问题，才使所有这些计划发生了变化。虽然巴尔干的德军战胜了某些恐惧心理，使预定的“轴心”行动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是东南线总司令部和统帅部还是更加认识到，可支配的部队数量太少，难以完成如此广大地域的防御任务。德军一直估计西方的主攻目标是巴尔干，为此，希特勒不仅坚持他防御海岸线的观点，而且还想守住处于海岸线前、从某西拉岛经克里特岛直到罗得岛这一系列岛屿所构成的封锁线。希特勒除了为罗马尼亚的油田坐卧不安之外，近来又有许多新的设想，其中最主要的是想切断通过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东西方联系，减轻敌人对土耳其的压力，并阻止土耳其参战。按照他的工作方法，几乎每天都要重新讨论一遍这些问题。他一直认为,必须‘把俄国人的军事行动和……英国在巴尔干挑起的骚乱……联系起来看。”然而，他却丝毫没有想到敌人会采取统一的战略方针；或者，红军可能有朝一日推进到巴尔干。相反，他当时却认为，在东南欧“英、俄将发生利益冲突”。他期望，这会对战争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最后他认为，德国“不应考虑撤退问题，更何况……可以从中渔利”，更不用说可以从巴尔干“开采石油、铝土、铜和其他金属”。

面对这些涉及广大地域，以及由政治、经济和军事各种因素混成的论据，如果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东南线司令部取得一致意见，把防御阿尔巴尼亚——门的内哥罗——达尔马提亚海岸，放在重要位置上，那么，对指挥参谋部来说，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他们指出，如果敌人占领这些沿海地段，那么就为“突入欧洲腹地”创造了“象占领运河沿岸……一样的有利条件”。还要估计到，如果这些地区的叛乱，再掺入大量意大利的溃军，其危险性就势必大大增加。使人更为忧虑的是，有许多报告表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将效仿意大利行事”。

为了争取在这种想法的基础上，对巴尔干问题不大动干戈，而采取小解决的办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这种情况下又运用以前常使用的方法，邀请有关司令宫到大本营，口头交换意见。在 9 月 24 日的交谈中，冯·魏克斯元帅①强调指出，由于缺少兵力，对巴尔干和周围岛屿的防御任务肯定会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他进一步指出：尽可能氏时间地坚守外围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预计的敌人的登陆进攻真的开始了的话，那么，希腊海、陆的大部分地区“只能作为前沿阵地”。只有在萨洛尼卡高地构筑。道拦阻阵地，才能为亚得里亚海的主战场提供必要的翼侧防护。这样，才有可能截断敌人进入欧洲腹地的道路。在争取明智战略决策的争论中，一位重要的盟友——海军总司令站到了东南线总司令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边。他直截了当地对希特勒说，在现在的形势下，处于地中海北部前沿的岛屿已失去意义。敌人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对这些岛屿进行陆海空的“攻击……切断其给养……迫其投降……”，并因此又损失“大量的部队和作战物资”，却“没有赢等量的战略价值”。

面对这些论点——尽管希特勒对这些论点在军事上的正确性例外地表示承认，但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他仍然坚持其必须保卫巴尔干及其周围岛屿的观点。在寻求达到这一目的的讨论中、邓尼茨海军元帅提出了一个新的、出人意料的方案。他说，撤离西西里岛，就给敌人让开了通向南意大利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坚守阿普利亚，特别是福贾空军基地，那么，我们也许就能阻止敌人从意大利南部渡过亚得里亚海。这一提示正中希特勒下怀！几天后，当福贾失陷后，邓尼茨和魏克斯仍通过一份题为《关于在意大利和东南地区继续作战的可能性》的书面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观点。然而，国防军最高司令不顾邓尼茨、魏克斯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异议，不仅坚持坚守整个东南地区的决定，而且要在意大利南部与敌人决一雌雄。大本营在 9 月 3 日的继续讨论中，希特勒勉勉强强把凯塞林争取到自己一边。而在此之前，凯塞林还力主“开展运动战”，以“保存实力”。隆美尔对意大利南部战事不太熟悉，没有发表意见。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人肯定已经认识到了在意大利作战方针的根本转变，对目前指挥权的变更，不会没有影响。

随着对地中海地域的最终决定，颁布了一系列的令。首先，10 月 1 日命令，在意大利的防御要在南部的加埃塔——奥托纳一线实施。10 月底，根据这一安排，凯塞林元帅——违背过去的全部计划——掌握了在意大利的最高指挥权；而隆美尔却另作安排。在关于东南线的命令中，希特勒违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关于至少要批准后方阵地的准备措施的意见，不仅坚持其坚守整个巴尔干的意愿，而且还要求重新占领一大批原来由意大利人占领的岛屿。除了南部的斯波拉泽群岛以外，“至少”要抵御敌人对爱奥尼亚海的科孚，克法利尼亚和赞特；爱琴海的斯卡潘托、米洛斯、科斯、莱罗斯、希俄斯、萨摩斯、米蒂利尼和利姆诺斯诸岛的任何进攻。“在北部即巴尔干北部，兵力一定要强大，但希腊兵力也不能太弱”，这就是希特勒在拒绝各种“兵力不足”的提示时，所使用的典型的准则。另一方面，他又以“会产生不利的心理影响”为借口，否定了关于构筑后方阵地的建议。

根据这一系列命令，双方在爱琴海展开了血战，一些岛屿必须重新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来。但与此同时，大批部队还没有与敌人接触，整个巴尔干不久便陷入还在不断扩展的内乱之中①。由于希特勒新下达的指令，在罗马以南的卡西诺地带展开了一场长达半年之久。如果说这场战争主要体现了双方无与伦比的骁勇，那么，自 11 月以来设想中的巴尔干危机已不复存在之后，这个战争阶段也就失去它的战略意义。在意大利南部发生的是一场消耗极大的争夺战，确实氏时间阻止了敌人的推进。但另一方面，这对于处在战争第 5 个年头的德国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更何况盟军随时都可能在意大利广阔的海岸线再次实施登陆，给德军再次造成灭顶之灾。

在南线和东南线的战事，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忙得手脚朝天。而这尤其助长了希特勒和约德尔事无巨细、一切都由“最高领导”决定的倾向。每个师的机动都出自于大本营；每支部队的调拨都需经希特勒点头。他还插手对巴尔干地区的兵员补充，以镇压起义者，以及爱琴海运输，工作的领导，甚至连亚平宁山脉阵地的走向，他都亲自过问。从 12 月 15 日起，他甚至要求西南线总司令部，每天都要向他汇报卡西防线扩建的进展情况。国防军指探参谋部所担负的后方占领区的任务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军需事务。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墨索里尼只负责管理波平源地区，使他的“共和国法西斯政府”的主权不得不受到极大限制。意大利北部，从伊斯特拉到蒂罗尔的边境

地区，由“最高特派员”以德国“纳粹省党部头目”的身份来接管，希特勒还效仿过去奥地利统治的模式，准备把这一地区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对原来的意大利士兵，希特勒下达了严厉的命令，将他们中的大部分当作“拘留者”，押往德国。

希特勒在地中海实施战略，远远超出其必要的军事限度，使德国战争潜力的紧张状况成倍地增长，也使德国其他战场失去平衡。由于缺乏总体设想，只把重点放在一个目的上，即在所占领的地区外围处处设防，致使国防军统帅部不得不忙于在其他战线上弥补漏洞。在斯堪的那维亚北部，丹麦需要德国治安力量来对付抵抗运动；在西部，需要调集强大力量去增援意大利。这种兵力空虚、捉襟见肘的形势，使西线总司令部在 1943 年夏末就严肃地估计到，盟军有可能占领侮峡附近的一个桥头堡，为尔后的登陆作好准备。

正当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为西线和西南线忙得不可开交时，东线的紧张局势又雪上加霜。在希特勒在地中海的扩张要求已到了尽头，以及由蔡茨勒苦心经营的“东方壁垒”由于红军日益迅速的推进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布特拉尔少将——在瓦利蒙特外出时代理副参谋民——说服约德尔和希特勒支持他在第聂伯河畔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布特拉尔甚至建议采取紧急措施——一年后曾在西线付诸实施——把军事学校的师生和后备队其他可以动员的分队，以及空、海军中的多余的新兵组织起来，组建应急军团，占领第聂伯河地段，至少给那里正在退却的、过度紧张的东线部队以休整和喘息的机会。然而，指挥参谋部参谋民却对此拒不接受。他既不想承认第聂伯河地段的重要性，也不想否认东线军队用自己的力量守卫第聂伯河一线的能力。此外，他还说，在没有深入了解东线形势之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也不应在负责部门之前作出决定。

当红军初秋发动进攻，并突破第聂伯河防线的时候，冯·布特拉尔将军和他的同僚们，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自己的观点广为散播的情况下，仍没有丧失勇气。如果说 1943 年 10 月至 12 月间还能从德军统帅部其他战场——现在也包括南线和东南线——向东线调派 4 个步兵师、7 个半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1 支空降部队的话，那么，这主要应归功于冯·布特拉尔将军及其同僚们为挽救东线的局势所做的不懈的努力。①然而，这些部队不是成建制地，而是陆续调往东线；而且往往姗姗来迟，每次所调派的数量之微，难以克服大范围的危机。当然，这一切都应归咎于希特勒的优柔寡断。就连博尔曼，出于对战争形势的担忧，这时也曾向其同僚戈培尔透露说：“元首做出一个决定可真难。”②

从 1943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的形势讨论会的记录片断中，人们能对希特勒在此紧要关头时期所表现出的优柔寡断略见一斑。

第 7 号速记稿片断

1943 年 12 月刀日与蔡茨勒大将的谈话。

蔡茨勒：元首，我看现在这里正在展开冬季攻势。

元首：完全正确。尽管如此，他还有什么新锐部队呢？只是他那些残余部队。

蔡茨勒：他的 9 个坦克军得到了补充，几个星期以来都在原地待命。

元首：是这样，不过都是些旧部队，没有新的。现在我有一点不明白。在这些坦克军里，他们仅靠坦克是不行的。许多人都与坦克同归于尽了，有的被烧死了，有的给打死了。

蔡茨勒：这跟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样。在我们这儿，装甲兵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装甲兵有的是。

元首：今天晚上我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蔡茨勒：是的。要是能够作出一个决定就好了。因为现在每一天都是很宝贵的。

元首：那么原来的决定仍然有效。

蔡茨勒：这个决定我可以公布出去吗？这样多少会有些帮助。

元首：可以。这样他就可以腾出一个师来。蔡茨勒，我们现在可以公开讲了，这件事①无论如何是输定了。但如果此事失败，曼施泰因先生将不负任何责任。

蔡茨勒：这是肯定的。

元首：艰难的时刻就要到来，这里②将会出现严重的危机，并会立即波及土耳其。2 月 15 日他们强迫土耳其参战。如果克里木出现危机的话，——他们就会大肆宣传。对此曼施泰因先生不负任何责任，这件事是由政客们干的。

蔡茨勒：是的，情况将变得十分严重，因为已经无可救药了。

元首：我们是无能为力了。具后果是可怕的。在罗马尼亚，后果是灾难性的……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阵地，只要我们停留在这里，并占据着桥头堡，那么，这里的机场设施就会受到威胁。蔡茨勒：是的，只要我们上面不采取行动，任事态发展，就会出现这类后果，而且还将影响到第 1 集团军。

元首：请您注意，我们已经经历过几次类似的事情，本来以为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可是结果却突然表明，难关终于闯过。

蔡茨勒：我们止处在生死关头。

元首：我完全看到了这一点。我没让这里的第 4 山地步兵师立刻解脱，看来还是对的。但敌人现在是否补充了一个新的集团军，还未得到证实。如果有人说，现在冬季会战开始了，这跟会战还在继续没有什么区别。

蔡茨勒：因此，我一直未把它称为冬季会战。

元首：敌人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时间，所以必须继续打下去。这就是事情的全部。但您在此已经看到，他已经有些打不下去了。在这儿，他已经打得疲惫不堪了，慢慢地就放松了。

蔡茨勒：我只是担心，敌人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好在北面继续交战。

元首：不，这我不相信。

蔡茨勒：敌人倒是使我们轻松了一点儿，在这儿他没有采取进步行动。

元首：那是因为他已经无力再打了。他总不能象一个古希腊罗马巨人一样，一落到地上，就会力量倍增。

蔡茨勒：他一连打了这么多个月了。

元首：他也总要喘口气。我读了这篇报告。在我看来，关键是他们的部队已经没有士气了。这是关键。

蔡茨勒：因此，我也总是递交报告。因为我必须考虑到这类情况。

元首：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是特别注意这一点的。在这儿我也和装甲兵指挥官们谈过。他们说，步兵压根儿就没作战。情况是多种多样的，那些打得很好的部队也出不了什么问题。有人对我说，用士气去影响步兵根本没有用——蔡茨勒，我要告诉您，我是一个亲手建立和领导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集团的人，而且领导至今。在这段时间里，党的地方小组曾经向我报告说，

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根本无法打倒；或者说，这里的共产党根本无法打倒，根本不可能把它从这里清除掉。但事实说明，一切都在于领导者。如果这能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如果说对步兵施加精神影响没有任何用处，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有一次，我听一个少校在演说，他对部队发表的演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那我只能说，您的演说本身没有任何价值。而与之相比，在有的部队里，士兵绝对听从军官的指挥。这就是您的影响在起作用。

蔡茨勒：是的，军队是军官的写照。

元首：一般来讲总是这样。

蔡茨勒：我相信，在糟糕的军队里，要么指挥官是被打死了，要么就是个糟糕的指挥官。

元首：如果指挥官死了，正说明了他是个糟糕的指挥官。这是再清楚不过了。

要是敌人在这儿喘过气来，并凭借其手段干下去，那我们可就要挠头了。事情并不会就此了结，那只有当我们把局势扭转过来才有可能，——对这儿的部队曼施泰因了如指掌。他很清楚，敌人将会在这里发动进攻。他说，敌人大概将从正面进攻，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消耗很大的力量。

我现在只有等着危机时刻的到来。这就是我的决定。人们经常所说的我们将胜利地战斗到底——在我看来，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部要结束现在的局面。

蔡茨勒：这是很显然的。如果我们有办法结束它，那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胜利。可是，打败他们是不可能的。

元首：眼下看，不可能有太多的期望。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去年冬天我们曾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但尽管如此，到了 5 月我们甚至又能够展开新的攻势。7 月，我们终于开始了进攻。

蔡茨勒：只是这里的弦绷得太紧了。一件事刚刚有些眉目，新的问题又来了，又重新受到压力。

元首：当部队挖好工事、埋伏好之后，心理因素开始起作用。对那些打败仗的部队，必须尽快撤换它们的指挥官，必须这样做。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报告，我只能说，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有些师实在是糟糕透顶了。如果一个军官说，对士兵施加影响是徒劳无益的。那我只能说，他们的影响不中用。他们没有力量对士兵施加影响。他所说的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这顶多只能说明，他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他的讲话全然无效。这我很清楚。在 4 年的战争中，我结识了一些团长，他们对部队的作用可笑之极，没有把它当回事。可是也有一些团长，他们在极危急的情况下，只用了极短的时间就恢复了部队的秩序，稳定了军心。这基本上取决于人本身。对我身边的几支部队①我很清楚他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指挥官。部队本身就是指挥官的一面镜子。

有时我想到我的党的地方小组。以往每次选举，在一些州里，等到选举当天的晚上，我就清楚地知道，我取得了成功。为什么呢？当时我不能说：这里过去属弗兰肯，或者这里曾经属科隆——因为科隆是革命的科隆——或者曾属东普鲁士。东普鲁士表示什么？他是完全反动的，而且我们背道而驰。或者说，这里曾是梅克伦堡、或是图林根。图林根是极革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有象科赫这样的人，在另外情况我又有象绍克尔或者莱依这样

的人，这些人就是这样。在其他地方我可惜都没有能干的人，那里的情况就很是糟糕。我非常清楚，那些情形好的州，是因为有看好的州领导。

今天的情况仍然是这样。最近我在卡塞尔遭到一次失败。对这点，可以心平气和地说。那里的指挥官当然应当撤换。因为他不胜任这项工作。不能说是啊，您在柏林和汉堡当然要容易得多。正相反，在汉堡情况还要困难一些。然而，那里有一个铁一样坚强的人，他是不会为任何力量所击垮的。相比之下，在卡塞尔的这位却轻而易举地败下阵来，他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从根本上看来，指挥官是军队状况的集中反映，或者说，军队状况是指挥官精神状态的体现。

如果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来到部队，阵亡了。又来一位，又阵亡了。这种情况是最可怕的。这种事当然要对部队产生影响。如果一个部队对一位指挥官特别爱戴的话……一个优秀的指挥官阵亡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要比一个不中用的指挥员阵亡所产生的影响要坏得多。这是老生常谈了。这确实是这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支部队长期境况不佳，这与它的指挥官是紧密相关的。

蔡茨勒，这类事我们是经历过一回的。我们因为一件事而退到一条狭小的战线，可惜我们没能守住这条战线。这就是说，如果部队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和无私精神，我们是能坚持下去的。那样的话，局面可以好一些。

现在我们又遇到了这个老问题。涅韦尔的全部灾难都应归咎于两个集团军司令的狭隘的自私心理。现在我们必须守住这条较长的防线。目前，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

我看到了这儿的后果，它将会波及世界。

蔡茨勒：对军队和阵地来说，尤其是如此。

元首：对军队来说，这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第二个斯大林格勒①，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能因为它与冯·曼施泰因元帅没关系，就无情地放弃它。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们应当思考一下。

第二点：人们也许会说，这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没有这儿也许我们同样可以达到更高的目标。然而，也许会出现别的情况。也许土耳其会参战。罗马尼亚则取决于它的政府首脑。如果他的军队在这里失败的话——您看看他写给我的这些信。

蔡茨勒：不，我心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情况会不会恶化。这是我唯一担心的。

元首：对，应当考虑到这一点。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否冒一下险，将第 16 师投到南边去。

蔡茨勒：昨天我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昨晚我也说过，是不是考虑把第 16 师投到南边去。

元首：蔡茨勒，有一点应当说明，这可不象在克里木那样难以作出决定。一旦离开，克里木就会丢掉。必须好好斟酌一下，是否必须使用第 16 师。我们可以动用第 44 师，这儿的 1 个师和第 16 师。这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用的三支部队，直到动员了其他部队。

蔡茨勒：目前来说，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北面的情形可就艰苦了。从长远来看，人们只有把北面这块地区夺回来，才能恢复秩序。我感觉，在彼得堡就象这儿一样糟。

元首：没有这么糟。如果在那儿我让部队后撤一些，并撤出几个师，那

么，情况就不会象这儿这么糟。这里的情况要糟糕一些，而且后果也极其严重。如果北面为节省 1 个师的兵力，而使我不得不让这儿的部队向后撤的话……

蔡茨勒：不，最好不这样做，应当想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元首：由于芬兰人的原因，情况会变得不妙，但也总不会象南面那么糟。我觉得失去克里木是最糟糕的事，对土耳其会产生极恶劣的影响。芬兰人不会放弃的，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也不会放弃抵抗。

第 10 号速记稿片断

1943 年 12 月 27 至 28 日，元首与约德尔大将及蔡茨勒上将的谈话（开始时是电话会谈，后来是座谈）。

此外，在座的还有：

凯特尔元帅

施蒙特中将

博尔格曼少校

达尔格党卫队少校

开始时间：23 时 19 分

元首：您看一下这个（报告）①，约德尔。

没有人向我报告这件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这里的两个桥头堡呢？以往的问题是，敌人要夺哪一个。在这个问题可说——当然他没有说——我们不能阻挡敌人的突击。我们已经阻挡住了敌人的一次突击。最近我们又抵挡住了 2 个师的突击，甚至彻底击退了他们。到底什么叫“无法阻挡”？它的前提是相信敌人具有某种力量，而在别的地方，人们就不会相信。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他希望能够从中腾出 5 个师的兵力，以改变这里的局面。因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必须有一部分兵力立刻南下到这里来。他认为，他可以在第聂伯河河曲处腾出兵力。他说：“敌人那么快地将兵力转移到别尔季切夫周围的地区。”他们根本不必把兵力开到那儿，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必要。“下星期将作出在南段实施冬季战局的决定。但愿”——什么叫“但愿”——“……敌人通过基洛夫格勒或克里沃罗格，沿第聂伯河下游向西突击，从而使得他的兵力枯竭。”他怎么会产立这么一种观点？敌人在集中了强大兵力的情况下，怎么会枯竭呢？在这儿，他大概也能说，敌人兵力最终会“枯竭”的。这是一个……文字游戏。

现在，第一个结论当然是……我已经同意了，从这里撤退，也就是说把第 4 师从这里北调，尔后把第 16 师撤到南面。

约德尔：他是针对卡缅卡阵地而言的。

元首：他主要指南线。

约德尔：他所说的阵地主要是卡缅卡以西的阵地。

元首：放弃这里的桥头堡就等于放弃这一阵地。因此，我又考虑了一下，能不能坚守住这里的一个小小的桥头堡。再说一遍，这里仅是一个小小的桥头堡，以此迫使敌人向这里派兵。但我现在觉得，阵地的走向不是朝向这里，而是朝向一边，以致我们连桥头堡也无法坚守住。尼科波尔和克里沃罗格就是这样丢的。他自己估计，要想“从战役上结束”这一局面，这里需要 5 到 6 个师的兵力。他现在已经得到了 3 个师。

约德尔：这一切都取决于对这里危险大小的估计。他的判断是对的，因为目前敌人对这里的压力还不是太大。他的判断显然是对的，而且很敏锐。

元首：这里是文尼察，这是很清楚的。

约德尔：一切都取决于此。

元首：但他却干不成这件事。您看一下这份电报。他身边目前有 3 个师可以调派。这几个师中第 4 师比其他的师都要好。他从北面调来的第 16 师也是很好的，并用第 17 师补上去了。他过去曾说过，他有 5 个装甲师和 3 个步兵师，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这些他都得到了。

博尔格曼：我的元首，蔡茨勒将军要和您讲话。（在电话里和蔡茨勒将军的谈话）

蔡茨勒：我的元首，我不得不再一次给您打电话。曼施泰因刚才打电话问，我们对他的电报是怎么看的。

元首：我正在和约德尔将军谈这件事。他所描绘的那些结论无疑都是些纯粹的幻想。我想先和约德尔将军谈一谈。在此之后也许我再给您打电话。或者您是否能亲自来一趟？

蔡茨勒：是，元首，我可以亲自去一趟。

元首：那您就来一趟吧。

（蔡茨勒：是。）

——谢谢。

（电话谈话结束）

——舍尔夫要是没有睡，是否也能来？（博尔格曼：他病了，但是我可以问问他。）

——那就让他躺着吧，别吵醒他。约德尔：他报告说，敌人在这儿有 47 个步兵师和 9 个装甲军，这就更突出了他们将在这儿发动大规模突击的企图。这一点我承认。再说，敌人现在不再抓住克里木不放，这证明了他们在静候一个比现在更容易下手的时机。

元首：要是我们离开这里，那对敌人就是一个容易下手的时机。那时他也就可以做他所想要做的事了。他在这里只需要几个师就行了。如果这里已没有危险了，他要部队干什么？……如果我们离开这里，敌人就占据了优势，假使敌人不象曼施泰因所猜测的那样，企图大范围封锁这里，那么情况就简单得多了，这是很清楚的，问题主要在于，他无论如何不能强求我们作出一个万无一失的决定。他不能这样做，敌人不会把什么地方都封锁起来的。他的任务只有抵挡住敌人的进攻。除此之外，目前他不能做更多的事。

约德尔：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从这里调出的兵力……

元首：他不能用这些兵力作战。约德尔：……情况已不同于去年冬天。

元首：这是很可笑的。

约德尔：他们都已经熬过了那段极其困难的时期。

元首：这里只有唯一的 1 个师——装甲师，或许还有第 3 山地步兵师。其他都是空想。

约德尔：对其他的师显然不能再做什么打算。

元首：第 4 山地步兵师比这里的 3 个师的作用都大。第一，因为它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师；第二，因为它是满员的，而其他的师人员都不满。

约德尔：他将在这儿投入一些兵力，这是肯定的。第 4 师是否已经接受了命令？

元首：第 4 师今天已乘第一批火车上来了。

约德尔：他把第 16 师也调来了吗？

元首：他想把第 17 师派上去。我想，这个师还将配备坦克。约德尔：那么炮兵师呢？

元首：炮兵师也在这儿。“但愿”——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事——“敌人会从切尔卡瑟和基洛夫格勒之间实施突破……从而使得他们兵力枯竭”——什么叫“兵力枯竭”？敌人根本不需要从这里突破。从这儿他们完全可以象在北面那样实施突破。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这下面是一座桥，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守住下面这个桥头堡。只要我们占据这一通道，敌人就不敢进攻这里。如果这最后一个桥头堡丢掉的话，那么……再和蔡茨勒将军通一次话。很显然他现在很担心文尼察。那是他的驻地。

约德尔：这是一条主要铁路干线。这已是最后一条大的铁路了。元首：这条铁路也通过施梅林卡。

约德尔：施梅林卡是铁路枢纽。

元首：“战役”……我厌恶浮夸的言辞。这根本不是什么战役，而只是夸海口罢了。约德尔：简而言之，他认为现有的兵力无法坚守住这里，他需要补充新的兵力。而他不知从何处得到这些兵力。于是他想通过减少南面的兵力来得到。

元首：他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了 3 个师，1 个从这儿，1 个从这儿，1 个从这儿之间。另 1 个师，第 17 师，他从这里抽走。这是 4 个师。在最近发来的一份电报中，他要求得到 5 个师。另 1 个师，第 16 师，他根本就别指望得到它，它比其他师作用都要大。

约德尔：不管怎么说情况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他已经得到了 4 个师。整个翼侧所面临的战役上的威胁依然如故。我们是封锁这里，还是撤出桥头堡，情况都没什么区别。敌人一旦从这里突破，联系就会被切断。如果敌人……就必须从敖德萨向北调集兵力。

元首：阻止在这里发动攻势是不可能的，他无法再这样做，因为他不能运用这些部队作战。这是可笑的。这只不过是用来寻求自我安慰的一句空话罢了。蔡茨勒应该把标有阵地的地图一同带来。

他不能有太大的指望，顶多是这个或那个装甲师，他可以从这中间自己调出一个来。他可以得到他所要求得到的兵力，只是这些部队要比他所要的差一些。

约德尔：问题在于，在此期间内是否组建一个罗马尼亚师，以便……

元首：……把它们也调到这里来？我一直期望能够加强这里的兵力。只有坚守住这里的桥头堡，克里木才能保住。蔡茨勒：这两个师已经没有了。只有他①在国内征集的部队。元首：国内的几个师他是不会放手的，他总是观望匈牙利的动静。这是一件蠢事，但是……这里的人们也和那里差不多，他们也失去了理智。他最好能把他的大本营从这里迁走。

约德尔：但他必须守住这个铁路枢纽，否则事情就要糟了。元首：这是第 4 师，可以首先调到这里。此外就是第 16 师。他将用第 16 帅、“近卫师”、以及第 1 装甲帅在这儿实施突击。这都是些糟糕的部队，但都是经过休整的。这是一份有其目的报告。他的确是从自私的目的出发，把一切都说得那么糟。本应留在这里的第 16 装甲师的调离促使了全局的崩溃，不然的话，今天这里就是前线了。主要是因为他拿这些师根本派不上用场。用这些师来发起攻势，简直是扯淡，根本无法组织一次战役行动。他希望，敌人另外冉派兵力进攻这里，那样敌人就会兵力枯竭。这简直是空想——“同样，从西线调更多的

兵力也是不可能的。”

约德尔：这里也必须再腾出些兵力来。

元首：如果可能的话，早就腾出来了。

约德尔：这里的工作同样堆积如山。他现在在以最快速度处理，希望能抽出些兵力。

元首：在这儿他是很幸运的。他甚至希望把部队升到这儿，在这儿展开“正面进攻”。他根本不会实施正面进攻，我倒担心他会以残余兵力从这里突出去。也不太清楚炮兵师究竟在哪。

博尔格曼：从地图上看，他们在卡萨廷附近地区。

约德尔：他们正好从它背后实施突击。

元首：这次突击是不是那么厉害，我们还得看看。

可惜，这里只有一座可以载重 16 吨的桥梁，以后慢慢就会被压坏。第 25 装甲师从官到兵都是一帮废物。他们的装备最好、最先进。

约德尔：开始时，这个师还是有些不错的士兵的。

元首：迪特里希对我说，这个师应该有好的车辆。他说：“要是我们有就好了！我们有的都是些破车。责任无疑是在于师长。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他的师。这样的师什么也干不了。相反，北面却需要这些师，因为那里面临着同样的危机。第 147 后备师是后备部队的教导师吗？——还有第 454 师？

约德尔：两个师是有保证的，即 143 教导师和……3 个教导团。

元首：它们大约在哪儿？

约德尔：据我所知，他们随时准备补充这里几个师的力量。元首：危急的时候，这些部队能够使用吗？

约德尔：当然可以。还有 2 个师正在波兰占领区组建。

元首：它们的状况如何？

约德尔：这我不清楚，这不是我的事，因为它们是蔡茨勒组建的。

元首：如果确信西线在 6 个或 8 个星期内不会发生什么事，依我

看，把它们派到西线去，再从那儿调 2 个师来。约德尔：那儿大部分是年轻的部队：第 9 和第 10 党卫队帅。

元首：这我不能调用，这是部署在下面的装甲部队。

约德尔：除了 2 月份刚刚组建的第 22 师外，那儿没有其他的师了。第 22 师的武器装备还不全，人员现在有 11000 人。

元首：如果从巴尔干调 2 个师呢？

约德尔：那肯定行，他们正好得派 2 个师来。

元首：他们必须把这 2 个师派到罗马。

约德尔：他们必须将它们派到意大利，以便使第 9 师、第 10 师和“赫尔曼·戈林”师脱出身来。

元首：我们可不可以停止这一计划，先把两个教导师或后备师调到这里来。

约德尔：那么，我们就得放弃 1 个师，而调走第 371 师，这是一个一般的、新组建的斯大林格勒师。

博尔格曼：第 147 后备师的部分士兵派去保护铁路，还有部分等待新的部署。其他部队情况不明，我马上就弄清楚。元首：保护铁路的那部分人不能调用。

事情看来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他不会再多得到什么部队了。曼施泰因

说，他不能如此迅速地把部队调来。但他无须在那里绕来绕去，只需从这里向北面派兵就行了。然而，那样就会给这里造成压力。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危险，而且比整个局面还要使我感到不快。

首先，我认为，他不得不将其立足点立刻从这里转移。

在这种压力下，是不可能作出什么理智的决定的。因为第 1 装甲师的进攻会奏效的。

约德尔：兵力的这种集结又会再次对这个无设防地区造成危险…元首：那么空军呢？对空军的情况，人们很难作出判断。约德尔：您说的是伞兵吗？

元首：对，就是伞兵。

约德尔：第 2 伞兵师在这里。除了第 4 山地步兵师以外，第 9 师也相当不错。

元首：第 9 师？不，第 9 师不好。这里是第 3 师吗？

约德尔：是第 97 步兵师。

元首：我认为这个师不错，一直很好。第 3 山地步兵师和第 97 步兵师也很好。第 9 师，我认为不好。从根本上来讲，他也只能从这里调走第 3 山地步兵师，这个师不如第 4 师，本质上也比第 4 师弱。最近，他要求从这里得到五六个师。他将这五六个师中的 1 个师按照事先批准的方案部署在这里。1 个师部署在这里，另 1 个师部署在那儿。这是 3 个师，另外的两个师……他还调出了第 17 师，这样，他实际上就拥有 4 个师。最近他又要求得到 8 个师。他得到了 3 个步兵师和 5 个装甲师。这样他会说，他当时必须交出其中的 1 个师。

可是后来为此他又得到 1 个师，就是那个伞兵师。这样实际上他是得到了 8 个师。现在他陷入了绝境。那个倒霉鬼霍特在基辅给他的影响太大了。他现在才逐渐领悟到，这个人的影响具有多么大的破坏性。这是一种慢慢显露的坏事。直到现在人们才有勇气报告这些。

在这种形势下，他在这里的驻地也就处于不利的状况之中。他正处在这个焦点的附近。他的驻地要在其他什么地方就好了。当然，这会离这里很远，然而那样会好些。文尼察自然不是他理想的驻地。但是，步兵的调遣速度不会很快，这也无所谓，反正总的时间一样。他在这里得到的反正会得到。可他还说什么“反击”。他不应该说什么“反击”。更准确地说是溜了。

（约德尔：多半是这样。）

——他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反击”。

约德尔：他只是想耽搁一段时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元首：这样，他只有死路一条。不管怎么样，我保证能在这里牵制敌人兵力，在其他情况下，我就不敢保证了。如果他说，他不能那么迅速地调来兵力，那就成问题了。如果这里不发生什么事的话，他会调得很快的。——这纯属谎言，这有他自己的目的，我只能做这样的评论。

约德尔：最糟糕的是要守住这块狭长的地带。这才是目前的燃眉之急。

元首：还有这个，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当时第 16 装甲帅没有被他调走，调来调去，这里还是可以坚守住的。他这样调动使得这里少了 1 个帅。不过这不要紧，第 13 装甲师可以早些解脱出来，这样，就可以掌握事态的发展。另外，顽固地坚守一条建筑在理论上的防线也是错误的。要是这里有保障，要是……这是最后一个地段了，那无论如何都要守住。如果撤退，那就会出现危机。

这里也是一样。他们开进了这片必须要坚守的地区，如果他们一直再撤下去的话，那么事态就难以掌握，一切都完了。

当时他拥有 5 个装甲师：第 1 师、第 24 师、第 25 师、“ 近卫师 ”还有——第 5 个是哪个师？这 5 个师是：第 1、第 14、第 25、第 24 师和党卫队师。第 14 师在北面。

约德尔：这里是第 16 师。这里是第 14 师。

元首：第 14 师是后来开过来的吗？

博尔格曼：这我不敢肯定，我的元首。

元首：肯定是这样。

约德尔：第 14 师是西线开过来的。

元首：对，从西线。他最近从巴尔干得到第 1 装甲师，从西线得到第 14 和第 25 师，从意大利得到了第 24 师和党卫队师，也就是 5 个装甲师。另外，还有 3 个步兵师，再加上 1 个伞兵师。他得到的比他上次要求的还要多。当时他要的是 8 个师。他夸口说用这 8 个师，他就可以控制局势。现在他得到了 39 个师，而且是整个前线最精锐的部队。现在他又要五六个师。他可以立刻从这里得到 1 个师，另 1 个从这里——

这是第 4 山地步兵师，他可以从北面得到第 16 装甲师，从这里得到第 17 师；这两个师我认为是他最起码可以得到的两个师。他只是装作一副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样子。他的兵力情况和以前一样，可以说是整个前线最好的。可他手下的士兵有一部分士气低落，这和他们上司的情绪紧密相连。这里的情况是可怕的。有人认为：防线之所以没能守住，是因为没有采用必要的拖延战术。现在我们必须坚守住这一条防线。接下去所付出的代价势必是双倍的。对敌人来说也是如此。可他还谈什么“ 正面出击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继续在这里徘徊，那他必须马上把部队交出来。那么，这里也就保不住了。

博尔格曼：第 14 师是从西线开来的，第 24 师从意大利开来，是在 7 月底。元首：他们起码有 700 辆坦克。“ 近卫师 ”有 250 辆，第 25 装甲师也有 200 辆，第 24 师……

博尔格曼：也有大约 150 辆。它原来在意大利北部，和我们在一个地区。

元首：那么第 1 装甲师呢？

约德尔：它的坦克要少一些。

元首：大约 100 多辆。第 14 师呢？

约德尔：它也不多了。

元首：它有 150 多辆。其他师的装备都很完备。

博尔格曼：总共有整整 850 辆。

元首：他从别的地方得到的要比从这儿得到的多许多倍，起码有 400 至 500 辆坦克。

博尔格曼：每月 100 辆。一共是 3 至 4 个月。

元首：还要多。自行火炮也应计算进去。他得到了相当数量的自行火炮营，还有 1 个“ 虎 ”式坦克营。在这段时间里他得到的坦克远远超过 1500 辆。

博尔格曼：这是今天 23 点 10 分到的电报。

元首：看来是晚了一天？

博尔格曼：刚刚到的。

元首：是啊，他坐在文尼察，还担心着这里。他必须和他的驻地一起赶快从这里离开。打电报也没有用，他可惜不能到这里来。切尔诺夫策也许是个好地方，在其他的某些情况下，伦贝格更好一些，因为第 1 装甲师的突击要通过这里。

（蔡茨勒将军来到）

——蔡茨勒，我想首先确定两件事。冯·曼施黍因元帅两次提出请求。一次是在几个星期之前，申请得到 5 个装甲师和 3 个步兵师，也就是 8 个师，这是他上次的请求。蔡茨勒：我想再查一下具体数字。

元首：5 个装甲帅和 3 个步兵师。他得到了 5 个装甲师，而且是我们现有的最好的 5 个，其中一部分是刚刚组建的师。还有 3 个步兵师和 1 个伞兵师，他一共得到了 9 个师。前线还没有谁得到象冯·曼施泰因元帅这样多的兵力，尽管他的兵力情况并不比其他地方差。他的部队的士气与这里的大本营紧密相关，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尤其是在霍特撤出的那部分地区。在那里，这种情绪特别明显。他从这里得到了他上次请求的兵力。我们前天同意了他的撤军请求，正如他所说的，想借此腾出 5 至 6 个师的兵力。更多的他也没有考虑到。他得到的这些部队中——除第 3 山地步兵师外——没有一支部队能比得上第 4 山地步兵师。他得到了第 4 山地步兵师。他从北面得到了第 16 装甲师。这里他没有装甲部队的物资。他自己从这里腾出 1 个师的兵力，他无论如何要选择其中最好的。这里是 3 个师，其中两个一等师。由于从这里撤退，他没能得到。3 个一等师——一个他可以从这儿调走——除此之外，他从这里抽走了第 27 装甲师，从这里抽走第 5 装甲师，另外的两个优等师他就别期望得到了。可他却装出一副他的全部请求都没被批准的样子。他所有的要求都绝对得到了满足。他认为他能够迅速北调和南调的想法，都是空想。他电报里所说的全都是空想。这儿无法再继续作战。如果能停下了，我就很满足了。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指望。别的都是空话。我根本不指望进行一场必胜或者是“全胜”的决战。

他在电报里说：“我认为，目前正不断得到补充的第 4 装甲集团军，再无力阻止敌人切断施梅林卡铁路的行动。所以我认为，应立即对我所提出的实施反击作战的建议作出决定”……这不是什么“反击作战”，准确地说应该叫撤退。我恨透了这些空话。他说什么，“撤退是必要的，更何况撤退行动是极其费时的。为此，应继续从西线向这里调遣兵力”。不管西线发生了什么，对他都无关紧要。说到底，这不是他的事情。至于如何调遣兵力，他让我们来办……您已经跟他谈过了，他都说些什么？

蔡茨勒：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收兵，这样，这里就可以腾出兵力。

元首：无法腾出兵力。您看，事情总是这样，他又唱老调子了。虽然可以腾出兵力，但部队总是在这里徘徊，他的部队现在就在这儿。双方都会腾出兵力，不仅是我们。这一点他必须承认。可他在这里却是这么说的：（宣读）

——他提出的结论在哪儿？啊！这就是他的结论！

蔡茨勒：失去施梅林卡的部队……从切尔卡瑟北部撤走……正被运往克里木半岛的途中……

元首：您也听到了有关的消息？

蔡茨勒：这可能是真的，我们听到一条新闻，消息说，向那个地区开往的火车共有 33 列。这大概是一个机械化军。但这不过是一条新闻。

元首：他写道，在这里他可以腾出五六个师。他说，“这样，集团军群的左翼就可腾出大约五六个师”。——这五六个师他无论如何是可以得到的。

这里写的全是幻想：“可以肯定，敌人在第聂伯河也可腾出兵力。但是，不会象我们一样快地把军队调到别尔季切夫地区。”这是谁告诉他的？他用不着把军队调到那儿。如果我们在这里对敌人已经造成一种威胁，他就可以撤掉他的部队，并马上带到那里，使军队退出前线。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不是第一流的。我今天看到，中途没有任何部队。别的部队都不能进入战斗。他想干什么？这儿有他的 1 个师，可能是第 3 师或第 4 师。这是唯一有真正价值的部队。您这儿有对形势的判断吗，蔡茨勒？

蔡茨勒：有。

元首：“敌人不会象我们一样快地把军队调到别尔季切夫地区。可以指望敌人……”您知道，我一听说，“我们指望”，这只符合我们的愿望。是不是，敌人怎么能按照我们的愿望去做呢？下面这段话简直象一则军事小说：“我们可以指望敌人利用他在第聂伯河突出部以及诺加伊斯克的军队，通过切尔卡瑟和基洛夫格勒，或者通过基洛夫格勒和第聂伯河下游，向西实施突破。这样，敌军就会在正面进攻中消耗殆尽。”什么叫“消耗殆尽”？——如果敌人腾出了兵力，他会再次实施突破！在这儿不是同样的道理吗？在这儿他也可说，敌人必定会消耗殆尽。在这儿，敌人起码与我们的兵力相等。在这个地区敌人一共有几个师？您有资料吗？标在地图上了吗？蔡茨勒：没有，还没有统计。

元首：是不是可以找人搞清楚有关资料……

好了，这是 1 个团，这是 1 个团，这儿，在切尔卡瑟是 1 个团，这儿还有 1 个团，敌人不会按照我们的愿望去做，而是做不利于我们的事情。敌人将进行两次战役：要么他把腾出的部队带过来，从桥头堡向这儿发动进攻，打一个翻身仗，他肯定可以通过这里——我们的部队不能阻止这一切，要么他不这么做，那他就会从这里绕过来，把这个地方拿下。曼施泰因希望，敌人可以直接把部队从切尔卡瑟调过来。他说，从克列缅楚格是不可能把兵力调过来的。按照他的理论，我们从这里赶到北面，要比敌人从克列缅楚格赶到北面快得多。这并不一定，敌人的部队已经在北边了，如果我们从这里撤走，那么，敌人要比我们更快地到达北面。铁路运输情况怎么样？他们怎么才能把军队调到北面。

蔡茨勒：铁路线在这儿，这里的一段路，他们可以沿着铁路线走。我在这儿把这个地方标出来了，下面这是个大型枢纽。从克里沃伊罗格，铁路要沿着扎波罗热走一段，然后通过这一带，就是标着第 17 装甲师的那个地方……。元首：他们应摩托化行进，为什么非步行不可呢？

蔡茨勒：他们可以在这下面调集其他部队。

元首：现在第 14 山地师无论如何也该在北面了。

蔡茨勒：已经在北面了。

元首：您说的很对，现在反正还有 1 个师要来，调到北面的已经是第二个师了。那么，第 17 装甲师呢？

蔡茨勒：他们将从这儿出发。如果他还能得到 1 个步兵师，便可以腾出摩托化部队。

元首：还不能肯定，他们现在是否可以来这里，过几天铁路会非常紧张，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派 1 个步兵师或什么别的部队。

蔡茨勒：会的，他们一来，这支部队就可以解脱出来。元首：但是，这些部队必须从这南面运上去？

蔡茨勒：这是铁路线，一直沿着这条路线通过。

元首：可是他必须把兵力从南面拉上去，眼下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情了。这是今天的标图吗？

蔡茨勒：这是我今天才标出来的，这是卡萨廷。

元首：我觉得有一点是必要的，就是他马上离开文尼察，以便他保持镇静，他现在六神无主，这可不行。

蔡茨勒：我们在通信技术上已经做了准备。中间是别尔策，可以通信联络。

元首：伦贝格！

蔡茨勒：是的，伦贝格离这几比较远，我看看，另找一个地方，捷尔诺波尔大概可以。今天他从别尔策报告说，他们正在做准备。

元首：他必须离开文尼察，别的都没有用。必须在文尼察留下一个小分队，负责把全部箱子、柜子烧毁，炸毁。施蒙特：不能留下一件家俱，否则他们会带到莫斯科去展览。元首：统统烧毁。约德尔：别尔策不行，已到了特兰斯特里亚，已经是罗马尼亚。

元首：已经到了特兰斯尼斯特里亚？

约德尔：不，别尔策是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

蔡茨勒：我说的是别尔策。

元首：文尼察在哪儿？我觉得这个地方标错了。

蔡茨勒：首先那里的联系不太方便。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得到罗马尼亚的过境铁路。罗马尼亚人没有把铁路交给我们。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

元首：我认为他应该去捷尔诺波尔。

蔡茨勒：好，我马上就去做准备。

元首：您有关于第 1 装甲师行动的消息吗？

蔡茨勒：没有，我的元首，还没有结果，尽管我以前已经跟他谈过此事。

元首：我认为，他们正在向前挺进。

蔡茨勒：很难说，从派出的 300 辆载重汽车来看，可能是 1 个机械化军。

元首：一辆车能装多少人，20 个？

蔡茨勒：俄国可能装得多一些，大概也是 20 人。

元首：大概一共 6000 人。

蔡茨勒：汽车上不仅可以装载人员，还可能是别的。载重汽车的数量大概与 1 个机械化军在机动中所需的数目相同。元首：大概有三四千人。

蔡茨勒：我的元首，我现在担心，30 日这天敌人会有什么反应，我认为三四天内会展开一场争夺文尼察的激战。元首：这不会有什么影响。

蔡茨勒：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我的元首，因为一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正在进展着，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元首：这无法阻止。现在所能做的不能超越事情的进展。这一点不能改变。

蔡茨勒：可以撤到卡缅卡阵地。

元首：如果他们撤退，就只有停在这儿。在这儿或那儿是无所谓的。

蔡茨勒：如果他们撤得再远一点，就可以赢得 6 天时间。元首：起决定作用的是，一提起作战，他总想往这里来。蔡茨勒：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局势

想得更远一些，他们可能撤到这里。这样一来，局势就对我们不利了，到那时我们只能……元首：他不会起多大作用。

蔡茨勒：如果能闯过这一关，局势就会有所好转。如果他从这里撤走，就必须突破敌人的防线。

元首：我觉得，蔡茨勒，应该把各支部队尽快地调到这里，封锁这一地区，这是最重要的。

蔡茨勒：是的，我的元首，五六天前我就说过，应该让局势顺其发展，并把 3 个坦克师调上来。这样，我们就有 3 支部队，就不会陷入困境。我认为从这里撤走些兵力也是无关紧要的。

元首：这样，至少他可以很快地调出 1 个师来。

蔡茨勒：局势会自己好起来的。然后，3 个师就可以开过来，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部队都陆陆续续地开来了，“ 近卫师 ”和第 1 装甲师也赶到了，可是我担心这些部队……

元首：他必须把所有的部队，包括第 1 装甲师和“ 近卫师 ”带过来。军队是沿着诺夫哥罗德—沃尔昌斯克一线到日托米尔吗？

蔡茨勒：他们沿着主线走。然后，沿着这条线走。

元首：重要的是，他们应该与“ 近卫师 ”和第 1 装甲师一起来。蔡茨勒：然后我们可以让他们从这里进来。

元首：蔡茨勒，为了停止这一切，除了把兵力调到这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如果在这儿作战失利，将来再打，这不会影响整个局势。军队在这儿停留只是一天的事儿，然后他们就会从这儿撤走，对最后结果不会有什么影响。

蔡茨勒：接着就要进行一次较大的冒险，用腾出的部队充实前线。

元首：我们怎么才能把兵力调上去呢？纸上谈兵！如果一支摩托化部队从这儿向那儿开进，他就完了。

蔡茨勒：我们现在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机动。

元首：利用坦克？

蔡茨勒：履带车辆可以这样行驶。

元首：那必须有道路。

蔡茨勒：我们在北面并不顺利。

元首：当然了，这很明显，他们不会再得到补充的部队了。这里他们得到了 1 个师。这里补充了一个，又撤走了一个，一个又正在……

如果在这儿作战，而他却只有 1 个师的话，我们可以从这儿把兵力调上去。眼下，在哪儿作战，就把机械化师马上派到哪儿。

蔡茨勒：也可以从这儿把兵力调进来。

元首：这点我承认，可是他已经被牵制在这儿了。您看，他这一个团停在这儿。我们一撤，这一个团也跟着从这里走了。并不是象曼施泰因说的那样，他很快就能把这些部队带上去。不管这些，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些部队的情况介绍。先看一下第 335 师。

蔡茨勒：作战顽强，装备齐全，一共有 4 个中等战斗力、3 个一般战斗力的营。

元首：第 97 装甲师呢？

蔡茨勒：第 97 装甲师，很好，作战非常顽强。

元首：第 9 师呢？

蔡茨勒：作战非常顽强，不错。第 17 师很好，非常顽强。第师几天前状况很不好。前几天我调查了一番，他们后面的部队本来还可以。第 9 师一直不错。

元首：第 24 装甲师的情况如何？

蔡茨勒：对这个师还没有评价。但他们的力量很强，一级战斗力。

元首：第 258 师呢？

蔡茨勒：不够顽强。

元首：第 3 山地师应该不错吧？

蔡茨勒：作战非常顽强。有 3 个中等战斗力的营，l 个一般战斗力的营。第 302 师，作战不够顽强，四级战斗力；有 5 个一般战斗力的营，2 个战斗力弱的营。第 294 师，不够顽强，2 个战斗力强的营，2 个中等战个力和一般战斗力，3 个战斗力弱的营。

元首：它用处不大。第 123 师怎么样？

蔡茨勒：作战也不够顽强，不过上次他们干得不错。第 25 师也不行，上次他们打了败仗。第 304 师上次也打了败仗。元首：这就是他首先从这里抽出来的兵力。第 257 师怎么样？蔡茨勒：还可以。

元首：他可以往这里输送一些兵力。这里他只能抽出 1 个师，就是 257 师。他在这儿的师竟都是战斗力不强的师。从这里只能调走 1 个师。防线在哪儿？从这儿进来吗？

蔡茨勒：这是卡缅卡战线。

元首：桥在哪儿？是这座吗？

蔡茨勒：就是这座。

元首：在尼科波尔附近。下游那座桥呢？

蔡茨勒：下游那座桥在这儿。这儿是一座桥。这里可以轮渡。元首：冬天不能轮渡。那么桥呢？

蔡茨勒：可以使用浮桥。

元首：浮桥还没有到达指定地点。那么，他只能使用一座桥。蔡茨勒：现在要使用的这座桥载重为 70 吨。可是天气还会有变化。

元首：怎么变化，您指的是什么？

蔡茨勒：我说的是，浮桥只能暂时开到那里。

元首：这可不行。河水是要结冰的，这是从下游往上游走。如果河水冻结后，他把冰面炸开，就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如果事情这样过去了，也就没有问题了。当然有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总是这样：冰面炸开之后，浮桥很大一部分浸在水里，这就没有很强的进攻能力了。

蔡茨勒：浮桥要下沉 18 厘米。

元首：18 厘米并不那么可怕。

蔡茨勒：这些桥可也会受到影响。

元首：还有一个问题，蔡茨勒，他们后退的几个师情况如何？等一下，我们先看一看这几个师的情况。第 46 师怎么样？蔡茨勒：不错，作战非常顽强。

元首：但是缺乏战斗力。第 387 师呢？

蔡茨勒：作战不够顽强。第 306 师也不行，相对来说比较弱。元首：第 16 装甲步兵师的情况怎么样？

蔡茨勒：不错，在什未林有一个战斗力强的、3 个中等战斗力的营，17

个炮兵连，25 门 S 型防坦克炮。

元首：他要抽出这个师。

蔡茨勒：不，还没有；只是估计，他把这个师抽走。

元首：只是估计？

（蔡茨勒：是的！）

——“大德意志帝国”师也很弱吗？

蔡茨勒：“大德意志帝国”师？噢，是的，斗志顽强，但战斗力很差。第 9 装甲师有 6 个意志顽强的营，3 个中等战斗力、4 个战斗力差的营和 11 个炮兵连。第 15 师，意志非常顽强，3 个一般战斗力，2 个战斗力弱的炮兵连。第 62 师，意志顽强，4 个一般战斗力的和一个战斗力差的营。

元首：如果缩小这儿的桥头堡怎么样？

蔡茨勒：现在不行。他说，桥头堡不能缩小。我个人认为，可以缩小。但这样也不会抽出太多的人员。

元首：他说，有两个小桥头堡。

蔡茨勒：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理解的，我对他说的很清楚，要进行横向压缩，可他偏要从纵向进行缩小。这根本办不到，也不能节省更多的兵力。

约德尔：他指的是那两个小桥头堡。

蔡茨勒：大概是吧，但以后还需要保留一个。

元首：我想，我们如果没必要离开这里的话，就可以尽量晚点离开这里。为了使兵力保持平衡，他不能再得到兵力了。他从克里木半岛不会再得到兵力了。除此之外，这与曼施泰因毫无关联。他说，这是 A 集团军群，与我毫无关联。您应该查看一下这里的兵力情况。这里有多少个师？我估计至少有 30 至 35 个。

蔡茨勒：大概是吧。

元首：这些部队可以先用在这里，然后，突然从后方发起进攻。由此看来，省不了多少兵力。

蔡茨勒：还能腾出 10 个师，3、4 个帅补充到南面，5 个补充到北面。

元首：5 个师，一个已经走了，现在已经到这儿了；一个从这儿撤走了，还需要调换补充一个。南面补充了 3、4 个师？而他却什么没得到……必须占领这道防线，现在还在敌人手里。

如果您能全面观察一下局势，就可以发现，我们当时无法控制局势。我们现在只有能力固守桥头堡。为了固守桥头堡，我们还需要投入一些兵力。

当时的想法就是撤退，那是一次比较典型的后退，当时

人们都失去了理智，包括克莱斯特在内，所有的部队都撤了。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守住整个这条防线。我们只需要保住这一个地方，因为这里没有在克里木半岛遇到的那些困难。我们这里不需要补充部队，如果我们需要补充一个师，或者两个师，我们可以马上得到。没有理由说，我们守不住这里。因为一些人的思想很简单，那就是一切后撤！有时这就是他们的癖好。他们至少也该取得一些成果！在这儿我看到过两次撤退。对此我要说，他们还是可以最后拼一拼的。一次是“水牛行走”行动。当时我只是说不要损失太多兵力、因此就同意他们撤退了。第二次撤退是我建议的，也就是奥廖尔那次撤退。这个蠢货。如果进攻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撤离。这是明智的，而他的撤退只能说是愚蠢。

博尔格曼：在这个地区共有 27 个步兵师，4 个装甲军。地图角上标的这

个地方一共有 17 个步兵师。从克里沃罗格东北面将调来 16 个师，1 个装甲军。这样，在基洛矢格勒这个地方将有 24 个步兵师，5 个装甲军。

元首：是这个地方吗？它也包括在内。

博尔格曼：在突破地域有 13 个步兵师，l 个装甲军，在切尔卡瑟有 4 个步兵师，l 个装甲旅，在突破地域有 42 个步兵师，9 个装甲军，l 个骑兵军在前，2 个装甲军随后，也可能是 3 个装甲军。

元首：他现在有几个装甲军？

蔡茨勒：9 个。通过铁路运输可能还能补充几个。

元首：我考虑是否能从驻守桥头堡的部队里抽出一些兵力，尽管桥头堡占用了大量兵力。对了蔡茨勒，我有一个问题问问您，我们在波兰占领区还有两个预备役师吗？

蔡茨勒：是的，不过都是新兵。1 个师在科罗斯坚附近看守铁路。博尔格曼：这是第 147 师。这个师有 7 个营，其中 3 个营在科罗斯坚，剩下 4 个营由新兵组成。其中 1 个工兵营，l 个炮兵营。

第 143 师有 10 个营，其中 7 个营由新兵组成，剩下的 3 个营参加了第 2 集团军的剿匪行动。

元首：我想，再往后方还有一些部队。

约德尔：在占领区有两支新成立的部队，第 22 梯队还是第 21 梯队？

蔡茨勒：可能是第 21 梯队。

元首：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往西线派一个或两个师，使那里再拖一段时间，然后再调其他几个师过来。可是约德尔讲，现在西线没有兵力，他不能再调派装甲部队了。约德尔：能适应东线作战的步兵师。西线没有了。只能把派往意大利的那个师调回来。

元首：可以把它调到这几来吗？这是哪个师？

约德尔：第 371 师。

元首：准确地点在哪几？

约德尔：他们现在正参加这次行动。

元首：参加这次行动？

约德尔：这次行动是这样的：阿格拉姆以东地区的庄稼正在收获，过几天他们将被派往那里。

蔡茨勒：第 371 师在东南方？

约德尔：他们现在还隶属于西南线总司令部。

元首：二级战斗力？

蔡茨勒：第 371 师，有 2 个营一直很不错，一共有 4 个营，其中第 1 营最好。

元首：如果从占领区调出 1 个师来，他们什么时候能到这里？约德尔：根本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会有多大用处，只会拖延部署的时间。因此，往西线只能派一个而不能派两个师。这样，只有第 71 师调给凯塞林，放弃“海尔曼·戈林”师，第 90 装甲步兵师此时不得不继续留在那里。

元首：什么时候他们能赶到车站？

蔡茨勒：他们现在在哪儿？

约德尔：阿格拉姆的西南部。

蔡茨勒：现在铁路状况不好，车皮不多，恐怕他们不能很快到这儿。

元首：乘火车需要多长时间？

蔡茨勒：时间不会太长，六七天我们就能到达。

元首：不派第 24 装甲师，我们可以派其他部队往这里来。可是如果撤掉这个师，又无法稳定局势。

蔡茨勒：是啊，这样又要冒险了。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不会出多大问题；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事情总是没完没了。

约德尔：那几个罗马尼亚营在干什么，第 5 和第 15 营呢？蔡茨勒：本来就不需要他们。

约德尔：是为了安全起见？！

元首：这里还应该补充一些部队。这里有没有战斗力强的部队？蔡茨勒：没有特别出色的部队。第 101 师、第 307 师和 1 个空军师所防守的地段不断增加。第 101 师很不错，但防守的地段很宽。第 370 师作战不顽强。

元首：第 101 师有多少个营？

蔡茨勒：8 个战斗力强的和 1 个战斗力弱的营。

元首：我还有一个想法：为了能更久地维持这里的现状，是不是可以派 1 个巴尔干师去。是否可以这样做，是一个问题，继第 4 师以后，还应该抽出 1 个师。

蔡茨勒：我得先解决一个铁路交通问题。

约德尔：每次调换兵力都需要很长时间。

蔡茨勒：元首并不是要调换兵力，而是提前撤出一些部队来，来

解决这几天的困难。

元首：一直等到其他部队调来。

蔡茨勒：火车行驶要通过罗马尼亚，时间就会拖得很长。元首：这无关紧要。他们应从这里撤出这些部队。

蔡茨勒：这要看第 4 山地师需要多长时间了。

元首：然后，我们必须在这儿拖一阵子。不能把所有的装甲部队都调走，否则这里该闹危机了。只有 1 个步兵师根本不够用。这里我们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装甲师。这样，紧接着第 4 师，还可以调出一个不错的步兵师来。

蔡茨勒：那就是第 101 师了。

元首：他们不可能要那么多的炮兵部队，还应该留下一些。不过，其他部队一到，他又可以得到炮兵部队。我想把这个师安排在这里。

蔡茨勒：是呀，他们应该投入战斗。

元首：我正在考虑另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使用“朗厄马克”①。蔡茨勒：我今天跟党卫队帝国领袖就此事谈了很久，跟他谈了几种可能性，要么交给“帝国师”使用，要么交给“近卫师”。交给“帝国师”使用，他们能很好地接纳。不利的是，它本应马上投入战斗。万一铁路运输中出了乱子，会惹出很多麻烦。还有一种可能，把它交给“维金师”使用。但是，由于需要绕道行驶，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技术条件不够。党卫队帝国领袖不想把它交给“维金师”使用，因为怕瓦龙人和佛兰德人一块儿起来闹事。这次他们躲进一个安全的阵地，不依靠任何部队。这样一来，党卫队帝国领袖就要为“帝国师”说情了。他说，最好把它交给“帝国师”。他说，德国人战斗经验丰富。所以他没有这些顾虑。

元首：我今天了解了一下新组建的“尼德兰”志愿军团的编制情况。他们有多少人，六七千人？达尔格斯：大概是 7000 人。

元首：他们的战斗力很强。战斗力比今天我们查看的所有的 6500 到 7000

人的师都要强。他们的炮兵力量比较弱。他们只有两个炮兵营，第 3 炮兵营也顶不了多大用。其他师最多有 9 个炮兵连。

蔡茨勒：最多有 9 个。

元首：这是一次冒险，为此我们得将就一下。您能不能跟克莱斯特谈一谈，问他是不是敢承担此事。蔡茨勒：他们由于第 4 山地师还有很多顾虑。

元首：调来的不是第 4 山地师，而是其他一些部队。

蔡茨勒：是几个营吗？

元首：他还可以得到 1 个师，它与其他师相比，在力量上势均力敌。当然，他们怎么做，别人不知道，不管怎么说，他们与别的师实力相当。可能他们的炮兵力量个强，但是，他们不用把所有的炮兵力量都用上。但是打起仗来——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蔡茨勒——靠这些部队根本不行。如果他不能控制局势，那么无论在这儿还是那儿，都将是一堆烂摊子。

但这没有太大关系。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结束这次战斗。我们目前首先要把这个地方拿下来。我们没有能力实施进攻，步兵师在每次进攻作战中都失败了。他们同样也不行。第 5 步兵师也只取得一点微不足道的战绩。现在的这个师很不错，但没有任何进攻能力。如果派第 12 师向北进攻的话，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步兵师没有进攻能力，冬天战斗力也不强，他们什么都做不到。去年，我们派装甲部队和装甲步兵部队展开了攻势。步兵师无法做这些事，也毫无办法；冬天他们被困在雪地里，无法隐蔽起来。所以不得不去解救他们。几个装甲……不得不忙活了一阵子。如果可能的话，他可以把第 10 装甲步兵师调出来，这是一个好办法，眼下也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如果他愿意这样做，他可以率领部队撤回。如果他从这个方面撤退的话——只是不知道现在军队的情况。我看了这几次撤退的情况，我真后悔当时允许他们撤退。相反，当时的情况并不比现在严重。可是，正如我说的那样，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压力。撤退比任何一次防御战的情况都糟。但是，我很惊讶，这些部队的情况都好起来了。

蔡茨勒：如果他们在阵地里的话，情况会更好一些。元首：我惊讶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都得到了恢复。如果这样就可以控制局势，就不会出现危机……不应该再抽掉兵力了。他们害怕在那儿受到压制，于是就马上退了！这真是一种心理变态，是一种病态。其结果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条防线一共 350 公里，是当时整个西线长度的一半。我指的是马恩河会战，但我们还将在继续这样做。我们在一次突破中放弃了一条长达 350 公里的防线。350 公里，这相当于 1914 年战争中整个右翼的长度。

约德尔：我的元首，这里不允许再出现任何危机了，否则，有一天我们还得抽调其他部队。这绝对不行，这样会使军队繁体瓦解。现在，我们为了挽救 1 个集团军，只好把最后一个有机动能力的师调来，否则，整个东线就会崩溃！我们就会失去这场战争。因为西线已经没有任何兵力了。这种由斯大林格勒蔓延开来的危机，必须刹住。

蔡茨勒：这也是我的看法，我也得出了这个结论，与曼施泰因的结论一样，只是理由不同。我的理由是，敌人以每天 15 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样，大概年底或 1 月初就会展开争夺文尼察的战斗。第 16 装甲师以最快的速度每天 12 公里前进，步兵师从南面以每天 3 至 6 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情况显然不妙。因此依我看，从科罗斯坚往南会有很大危险。元首：蔡茨勒，按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认为我们全线都该撤退？！

蔡茨勒：首先我认为应该开始这样做。然后才能腾出一些部队。

元首：时间紧迫，我们不能把他们调到北面去。因为眼下其他部队也需要新的部队。

蔡茨勒：我的元首！问题是我们现在无法控制局势。我们只能先忍受一下。这个突出部一直是危险的温床。我们在这儿的防线拉得这么长，使敌人的突破不断得手。这个巨大危险一直没有消除。于是，我们应设法从这里撤回。第二，情况也不妙，敌人已经到了特兰斯尼斯特里亚。现在除了往后撤，没有别的办法。困难的是，我们在……只有一座桥。

元首：如果他率领他的师向这个地域突击，情况就不会那么严重，比我们自愿……

蔡茨勒：自愿？！

元首：我们是自愿撤退的！这样把部队都带坏了。部队要作战。

蔡茨勒！我跟很多人说过。他们都说不能理解，为什么要从好不容易挖好的阵地里撤出来。您好好算一下，最近这 6 个月德国一共生产了多少枪支？我们现在一共有多少枪支？这是一笔最好的帐。

蔡茨勒：我每个月都提交了与此有关的报表。

元首：但这些都不太准确。我们每个月生产 20 多万支枪。可能有人会说，这只是新生产的。不！我们现在有多少枪？数量从 610 万降到 510 万。这可是下降了”这就是说一兵损失了 100 万支枪。都是在东线。枪都损失到哪儿去了？都是在这儿！这简直不可能。可是枪支都丢失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枪支的数量大大减少。可是有人说，我们现在已经制造新的武器了，有没有这些旧的都一样。总的来讲，武器的数量有限，许多枪支都是在东线“成功的撤退”中丢掉的，士兵们把武器全扔掉了。

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士兵们勇猛作战，击退了敌人，他们勇敢顽强，构筑了许多阵地，而现在却说：撤退！他们不能开辟一条四五百公里的防线！因为北面敌人在实施突破，因此他们现在不得不撤退 500 公里。

蔡茨勒：我的元首，我认为如果他真的在这儿的话，他没有这种可能性。

元首：现在情况不是这样，不能说斯大林格勒是例外，在另一边。这里简直可笑至极，这里与各处都可以进行通信联络。蔡茨勒：这里通信联络很困难。

元首：是很困难，但无法与斯大林格勒相比。好吧，您可以与克莱斯特谈谈，问他是否敢冒这次险！

蔡茨勒：好吧，我和约德尔再交换一下意见，看如何把这个师调过来。

元首：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把他们调过来，再派几个营迅速上去，向那里投放一些兵力。

约德尔：但必须搞清楚，他们去火车站需要多长时间？因为第 4 师还在运输中。

元首：什么时候他们可以确定下来？

蔡茨勒：那要计算一下路程。第 101 师赶到火车站还需要几天时间，因为第 4 师还在运输中。

元首：别的可顾不上了。如果他们后退中还能得到 1 个师……蔡茨勒：情况不利时，可以收兵。

元首：把他们撤下去，给前线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次撤退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蔡茨勒：他认为北边还可以坚持较长时间，这不需要多虑。让人发愁的是南边。

元首：这里他有麻烦，那里更难办。这里的撤退会使敌人马上重新向这里发动进攻。蔡茨勒：这是可能的。但如果我们不撤军，敌人自然也会进攻元首：那也不一定。敌人一直在进攻。我今天又收到一份关于盟友们补充兵员的消息。补充的兵员真是糟糕透顶，又少得可怜。不过，现在也没什么更出众的了。

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关于这次突击的消息？蔡茨勒：晚上才能知道。因为刚才只进行了电报联系。元首：您看，您可以马上核实一下。您与集团群取得联系，问问他们认为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这是一个有 7 个营的很有战斗力的帅，另外还有炮兵。

蔡茨勒：9 个炮兵连。

元首：自行火炮还是反坦克炮？重型的还是轻型的？（蔡茨勒：重型反坦克炮！）

——全是重型的！

蔡茨勒：1 个工兵营，1 个野战后备营。

元首：这个他们也要带上吗？

蔡茨勒：肯定有新兵在里面……本来是 8 个营。

元首：这里的有 9 个？

蔡茨勒：101 师有 8 个实力强的营，还有一个实力较弱的营。但有两个东线营在里面，是补充进去的。也许开始时还把这两个营留在那边。

元首：开始时，无论如何要留在这儿。

蔡茨勒：还可以留下一些炮兵。

（结束：1：09）

第 11 号速记稿片断

1943 年 12 月 28 日与蔡茨勒大将的谈话

元首：我们要料到这一点。现在，我把一切都仔细考虑过了。昨天晚上，我苦苦思索了一番。不大量增加兵力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在北方，最糟的情况下，芬兰人那里可能要增加压力，这会使我们轻松一些。因为他们反正要打仗。往南边来，最糟糕的情况是失掉克里木，然后是失掉克里沃罗格矿区和尼科波尔。如果我们不扭转这种局面，它将给我们的粮食供给和经济带来无穷的困难，这一损失比北面的损失要大得多。因此，我决定补充必要的兵力。

我不能从西线大批抽人，必要的力量只能从北面撤离的人中获得。我的想法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正在奥拉宁鲍姆地区打仗的部队。要守住纳尔瓦地区，这支部队就基本上够了。这样，这里的部队就比较清闲了。看来几乎可以随意调遣这里的部队，基本上占领这条防线。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我们能从北方集团军群腾出 12 个师。蔡茨勒：是的。那么屈希特尔明天来是很合适的了。

这样，我可以今天考虑考虑并提出设想。

铁路上一切正常。我们还有第 16 和第 1 装甲集群，还有一定的突击力量，我们必须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使用。在南面我们还可以得到第 4 山地师和第 17 装甲师。第 101 和第 16 装甲步兵师将作为第二梯队乘火车前来，而另外两个师将从 6 日到 8 日或 12 日急行军到这里。那样，我们又多了一个梯队。

我可以这样处理吗？

元首：可以。

蔡茨勒：还有一个问题：曼施泰因抱怨说，对第 4 装甲师来说，战线长了一些。他说的不错。我提议，把南面的第 6 集团军调过去，第 6 集团军只有一个军部，这个军部直属集团军群。所以，我认为这样解决较为妥当。我可以再与曼施泰因谈谈，告诉他把第 6 集团军调上来，由胡贝接替霍利特任集团军司令。胡贝与霍利特比较起来，我更相信胡贝。从上面下来的是一些机动部队，而霍利特对机动部队没有什么经验。

元首：这里是防御。蔡茨勒：是的，那么霍利特就能多做些事了。还有舍纳尔跟他一起，情况就不那么糟了。如果您同意，我就这么办了。元首：好吧。

蔡茨勒：然后是坦克问题。从 12 月 7 日起，陆续从第 1 集团军司令部运出坦克 294 辆，从第 4 集团军司令部运出 94 辆，从第 8 集团军司令部运出 154 辆，总共是 542 辆坦克，其中一部分还在铁路上，还没有进站。

元首：您只告诉我一件事，我们一共给了南方集团军群多少辆坦克？包括调到这里的 5 个师的坦克。据我估计，他们得到的自行火炮和坦克远远超过 1000 辆。

蔡茨勒：他们得到了全部的补充。上个月我给他调来 100 辆，这个月又是 80 辆。

元首：他们还装出一付可怜相，好象是后娘养的。事实上，只有他们得到些东西。

蔡茨勒：他们大口吞掉了一切。两三个星期前我们才第一次给中部进行补充。不然中央集团军群真是受虐待了。

我的元首，那么我可以马上办了。今天晚上他们就可以与第一批师一起出发了。

撇开其他事情不说，仅这段在午夜 23 点至凌晨 1 点进行的令人疲惫不堪的、冗长的谈话再次预示着四分五裂的德国领率机构的恶运。即使希特勒最近为此颁布了一个规定，也无助于这种状况的改变。按照这个规定，所有涉及东线和其他战场问题，都要由两个总参谋部的头目约德尔和蔡茨勒向希特勒报告后决定。希特勒所下达的命令都是在就事论事和片面理解的基础上，权衡两方面意见后作出的。当时，在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催逼下，北方集团军群将其出发阵地撤至佩普西湖和纳尔瓦以后一事，就是希特勒利用这种方式处理在兵力分配上反复出现的矛盾的一个实例。希特勒还是象往常一样反对任何放弃地域的建议。在东线北部，由于他考虑到芬兰人的问题，将在一次形势讨论会上刚刚提出的意见置之度外，不准备将德军撤到后方一条大大缩短的防线上。为了回避陆军在其熟悉的战术方面提出异议，他求助于约德尔，让他归纳一下依靠芬兰湾内侧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战略上的弊端。由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东线形势不甚了解，难以权衡利弊。而希特勒就恰恰是通过这种方式，利用他的军事“工作班子”与另一种意见针锋相对，把如此重大的决定建立在个人好恶和与自己心意相投的判断上。

然而，鉴于意大利投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方列强对芬兰日渐增大的影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早就为芬兰人可能退出战争，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在第 20 山地集团军司令迪特尔大将进一步建议的基础上，9 月 28 日颁发了“关于德军准备从芬兰北部撤退的第 50 号统帅部指令”。值得注意的

是，希特勒竟干脆利索地同意了这种与意大利和巴尔干基本相同的解决方法。可能连希特勒也看到了，德国军队在不经或违背芬兰人意愿的情况下呆在那个国家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指令只要求德国国防军同挪威保持联系，守住最北部佩萨莫周围的镍矿区。这些及时采取的措施，为 1944 年秋冬季德军顺利撤退铺平了道路，也可以看作为“有预见的指挥”的真正典范。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这一段时间从未放弃计划工作，不管是希特勒在约德尔将军 1943 年 10 月访问曼海姆后对曼海姆的印象极佳，也不管是他基于对政治事件的评价，而不愿把“军事上的考虑看得那么急迫”的时候，都从未间断过。

1943 年秋天，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问题上，德国最高领导人，根据来自各方面的消息，认为为防止这两个盟国背叛德国，有必要采取应急措施。

东线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以及最近罗马尼亚的许多个师被困在克里木半岛，使罗、匈退出战争的可能性日渐明显。鉴于这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可以考虑，即加强德国对战争的领导。为此，希特勒打算采取与对待意大利和芬兰两国截然不同的策略，即依靠由他任命的新政府，使这两个国家为共同事业进一步挖掘其国防潜力。1943 年 9 月底，在一篇以此为基础，并分析了对这两个国家实施军事占领的研究报告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认为，将来，除非促成罗马尼亚人参加反对其邻国和盟友的行动，否则，仅靠德国国防军，将无力对付匈牙利。研究报告最后指出，从长远考虑，同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是不可能的。基于这种认识，结论是：“政治领导者要么设法排除这种情况的发生，要么就必须在两个国家里创造一种内部的先决条件，阻止其发生统一的军事抵抗行动”。占领匈牙利的计划在 1944 年 3 月实施前，为了与战争进程相适应，做了很大改动。由于希特勒与安东内斯库无帅的多次谈话而获得的新的印象，使希特勒改变初衷，对付罗马尼亚的各种准备、最后也不了了之。

保加利亚尽管只对德国负政治上的义务，但是在其国王死后，仍看不出对德国不忠的迹象。而德国最高领导却越来越难以履行他在踏上保加利亚领土之初，就土耳其参战对保加利亚所承诺的义务。1943 年 12 月初，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土耳其与同盟国靠拢时，所制定的“格特鲁德”行动计划，现在看来也是极不完善和难以实施的。特别是企图想和其他战场配合，一举占领土耳其欧洲部分地区的打算，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保加利亚总参谋长为详细了解德国对战争局势的看法，1 月中旬，德国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应邀到索非亚访问，并受到“摄政参议会”的接待。1944 年初，保加利亚对土耳其的“名义战争”，完全停滞在防御状态。

在西班牙人的请求下，德国国防军统帅部不得不把“兰色师”还给西班牙。德、日双方的联系仍象过去那样的松散。太平洋战争局势使德国通过日本采取行动而直接有效地减轻其东线负担的打算化为泡影。

很明显，如果说上述所有这些事件和考虑都旨在否认德国的衰落，粉饰所暴露的种种弱点，那么德国统帅部于 1943 年 11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防御盟军在西线登陆的预备指令，再一次暴露了它的真正的战略思想。指令在开头便指出：

“近两年半，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艰巨而损失重大的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和艰苦的努力。而整个局势的危险程度也同样巨大。在此期间，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东线危机未除，西线危机又起——英军即将登陆。东线虽丧失大片领土，但对德国无关紧要。然而，西线则不同。如果敌

人从这里的绵亘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有迹象表明，敌人最晚在春天，可能还要早些时候，就将对欧洲西线发起进攻。”

接着，指令毋庸置疑地要求立即开始加强西线的防御力量，

防止敌人对海岸防御线的突破。“如果敌人硬要实施登陆”，指令

继续说，那么。

“关键在于迅速调集足够的人力、物力，通过积极的训练，将现有的大量部队训练成一流的、具有进攻能力和高度机功能力的后备力量，并利用反突击阻止敌人也可能成功的登陆，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①毫无疑问，第51号指令的出发点和范围，都是由抵御西方列强即将对西欧大陆包括丹麦的登陆进攻的任务而决定的。从战役上讲，也是由盟军“登陆”作战原则所决定的。与此相反，几天前发出的那道命令，其内容却没有超过12月中旬为此提交的一份报告的范围。根据这项指令，西线总司令部还要勘察“索姆河——马恩河——上马恩河——瑞士边界这一条防线的走向”，以便在法国中部构筑一道预备阵地。

以论述德国问题而知名的切断特·威尔莫特，在其《欧洲战争》一书中指出：1943年秋季，希特勒就有意让人在英国部队的数字问题上作手脚，欺骗公众，以便为他拟制象第51号这样的指令制造借口。在战争后期，希特勒倾向于把即便是显而易见的危险也至少要“辩证地”提出疑问。这样，在尔后的数周和数月中、希特勒对盟军企图的严重性产生了重大怀疑。从敌人方面传来的消息越是能说明登陆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希特勒的疑心越是增大。值得注意的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也在1944年1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1944年，敌人的目标是‘大西洋壁垒’或巴尔干”。约德尔肯定是受了希特勒前一天类似的谈话的影响，但也是由于他自己对巴尔干的吸引力的长期错误估价所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盟军可能的登陆地点上曾一时举棋不定。如认为在法国南部、葡萄牙和挪威，但这并未影响它不断加强西线的努力。12月，还为整个国防军统帅部战场提交了一份敌人在实施“大规模登陆时的兵力调动”表格，但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这个表格也没有派上用场。就连希特勒最后也一直认为，敌人很可能在从荷兰至诺曼底的大西洋海岸登陆。1943年12月20日，希特勒在形势讨论会上说：

“敌人肯定将于春天在西线发动进攻，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再一次说：

他们肯定已经决定了。2月中旬至3月初，他们将在西线发起进攻。”

然而，希特勒却背弃自己的这些认识和自己所下达的命令，到盟军实施登陆的前几天，他为了东线和意大利，竟中断了西线的防御准备工作，就在12月20日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布勒将军对希特勒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如果我们真的在1月份……使西线得到这些装甲部队，那还没什么问题；可是”——希特勒插上一句“我们希望如此”——布勒接着说：“可是，如果我们拿走了西线的一切，那将怎么办”我还什么也没安排（指在国内的仓库里），就又什么都没了。”

“您这是对谁讲话？”希特勒大发雷霆，“我不允许别人总是指责我……把部队调走。有话您对蔡茨勒说去（！）”

接着，希特勒将话题一转，避开实质问题，他说：“我也有我的困难。我每天看到东线的局势都使我感到可怕。在那儿，有时要用5个或6个师（!）才能决定胜负，或者取得一次较大的胜利。”

12 月 28 日，希特勒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催促下，又发布了一道明确的禁令：没有他的允许不能从西线抽调一兵一卒①——然而，实际上，此事情私下里还是屡屡发生。从上面所提到的形势讨论会上，也再次表明希特勒并不打算为什何一方——西线或者东线——坚持他自己提出的原则。

另外，在进一步观察之后可以看到，第 51 号指令也多半是纸上谈兵。拿这个言之无物的指令与西线总司令部于 10 月底对形势所进行的“总考察”的结果相比，第 51 号指令的缺陷更加暴露无遗。这份报告在其最精彩的部分指出：

“如果最高领导预料到敌人在西线会发动大规模进攻……那么关键在于……前送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必须以一支统一部署的、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为后盾。”但是，德国最高司令部所制订的计划，却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在尔后的日子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防御盟军登陆的任务，仍然不得不由当时在西线的原有部队承担，而这些部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战斗力上都不能胜任这样一场大规模战斗的要求。①此外，下属机构也缺乏任何统一的指挥。例如，在第 51 号指令的结尾，列了不少于 7 个相互独众的指挥机构，其中西线总司令部只排在第 5 位，而且这些指挥机构都要向希特勒本人，而不是向国防军统帅部报告其计划和措施。

还在 1943 年 12 月 20 日，希特勒曾第一次说过：“如果他们在西线发起进攻，它就将决定整个战争。”言外之意是：如果不击退这场进攻，我们就要输掉这场战争！这种观点同时也包含了另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卓有成效的防御寻求较好的出路。即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总司令——这是德国自 1938 年起就一直缺少的——在这种观点面前，也会陷入理智与责任的严重矛盾之中，也会向政治领导者指出这种防御前景是渺茫的。如果对只看到战争局部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作同样的要求，这对他和他的身份来说无疑是一种苛求。

1943 年底至 1944 年初，希特勒在政治和作战上都陷入了走头无路的境地，但还应看到，德国的远程火箭，即所谓的 V 型武器，当时大概很快就能投入使用了。希特勒把这场“远程战斗”的目标选在伦敦市区，他期待这场“远程战斗”即使不能完全阻止敌人的登陆，至少也要使其大大拖延，并给其下一步行动以极大干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 1943 年秋才知晓这些 V 型武器，并被委以负责这些武器在战场上使用的组织和战术准备工作的重任。对这种武器的作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认为：“每天能够发挥作用的……弹药，比一次大型空袭所投掷的炸弹还要小。”就连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也难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直到 1944 年 2 月，人们才强调指出，V 型武器，特别是大型的 A4 型火箭（即“V2”）竟没有战场使用价值。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自 1939 年 8 月 31 日以来，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连续发布的一系列旨在表明其进行战争和军事行动意愿的指令，到第 51 号指令便宣告终结。在以后的日子里，大本营下达的命令虽然也确实没有减少，但是随着领导层在组织上被划分为数摊，而且其命令内容也是根据印象或眼前的需要制定出来的，因此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尤其是后来的“指令”’已经不成其为统帅部特有的、实施统一行动的工具了。这一点，统帅部的人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至少没有人对此提出过批评。

当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 11 月底、12 月初返回大本营时，有一大堆新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前所未闻的任务堆在他的面前。当他还没来得及

对这些任务理出个头绪时，就接到一项特别使命，要在魏玛召开的“帝国新闻界首脑”会议上，向德国各报刊主编谈谈战争形势问题。约德尔为他提供了书面材料。这些材料是约德尔在几星期前在给“帝国和省党部头目”作报告时使用

的。①然而，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的草稿中，只用了他一处较为客观的描述，这也是瓦利蒙特乘汽车从柏林到图林根途中看到的那一片片还在冒烟的废墟，和满目疮痍的德国土地。

对德国的轰炸，特别是自 1943 年 8 月初汉堡遭空袭后，终于在大本营引起了不同寻常的重视。那天夜里，当希特勒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便一反常态地亲自来到约德尔的简易住所。一一这是自挪威战局以后从未有过的事，使约德尔大为震惊。希特勒一进门，就对约德尔大加指责。但约德尔和他的参谋部一样，一直被排除于空战指挥之外，对空军不断衰落的状况毫无所知。

看来，希特勒是找错了抱怨的地方。当空袭进入毁灭性的阶段后，希特勒便开始将他的不满发泄到他的帝国元帅身上——这并非不公平——，有时他是采取一种一声不吭地离开会议室的方式，来表示他的不满。后来，在这个领域、特别是“新式武器”和“喷气式歼击机”方面，希特勒干脆将战术、技术和组织的领导权集于一身。于是，就象他多年对待陆军时那样，严重错觉便层出不穷，重大失误也接踵而至。

1944 年的头几个月

到了 1944 年初，也就是盟军实施登陆的那一年，德国领率机构在意图和实际措施之间的持续矛盾，使西线的防御兵力——以具有作战能力的陆军兵力计算——远不如上一年秋天。虽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曾就 1943 年底至 1944 年初的形势概貌，向希特勒报告说：

“（在西线的）展开正全面铺开。部队的组建、配置工作也正加紧进行。目前西线共有 130 万军队。”

但是，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都无法掩饰这支所谓百万大军实际上的微不足道的价值。还有“展开”这个词，也是一个易于使人产生误解的概念。因为，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很少几个刚刚动员起来的后备团的开进而已。实际上，在这个引人注目的“展开”中，连一支师级部队也没有。

后来，多亏敌人给了一段喘息时间，于是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领导下，成功地把一个个战斗群、小分队和教导队组建成若干个师。而且还为那些在西线部队里占绝大多数的所谓“土生土长”的师，装备了少量的马匹、汽车和其他指挥器材，使这些部队具有部分机动能力，至少在装备上与赋予他们的“突击预备队”的称号相适应。撇开希特勒的信口雌黄不谈，就拿以东线强大兵力加强西线一事而论，也根本是毫无踪影之事，未在考虑之列。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认为，只能等 2 个摩托化师的状况稳定后，从意大利北部争取抽调 1 个步兵师。另一个远水不能解近渴的措施，就是加强海军和空军支援西线的应急措施，而这还不包括航空分队和防空分队，因为它们在国内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当盟军开始在西线登陆时，才能调用。

除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之外，对希特勒来说，头等重要的还是“大西洋壁垒”。他自己也似乎受到了德国长期进行的欺骗宣传的影响，自己不作任何实地调查，只凭投入的混凝土数量、工人人数、以及同“西线壁垒”或马奇诺防线的价值比较上，去臆想他的“大西洋壁垒”。更有甚者，他宁可相信那些非军事摄影师拍回照片，并由此得出判断，而对国防军有关机构或他的军事班子成员的客观报告却将信将疑。到 1944 年，工程仍在继续。在此过程中，陆军方面的愿望和建议仍被排在为海军炮兵和野战炮兵修建巨大的火炮阵地设施、潜艇掩体和 V 型武器发射设施之后。而这一切都要服从于希特勒的个人决定。

当隆美尔元帅对丹麦的防御情况进行了简短的视察之后，即 1943 年底和 1944 年初，又接管了西线最重要的北部沿海地段，直至南部的布列塔尼的指挥权，这使德国领率机构的信心倍增。他凭借其渊博的知识，采用了积极的措施，防御战术、技术并重，并以充满生气的个人影响，竭尽全力去弥补防御中的不足和缺陷、但他自己对胜利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1 月上旬，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做了一次极为罕见的旅行，视察了一般认为最有可能登陆的斯凯尔德河河口至塞纳河河口之间的沿岸地段。亲自了解那里的防御准备情况。他在 1944 年 1 月 6 日至 16 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视察的大量事实，其中有许多细节都是大本营未触及到的。然而，也正是这些细节妨碍了人们对形势的进一步认识。相反，防御基础方面的重大缺陷，却只有很少几处提及。比如约德尔写道：

“大批力量投入东线，驻守海峡群岛的第 319 师只剩下（原建制的）30%。（1 月 9 日）“最好的部队被调走了。剩下的虽然军官是优秀的，部队

是优秀的，可是他们束手无策——换装引起一片混乱，整个军就有 21 种不同装备的炮兵连”。（1 月 7 日）

“必须停止为东线抽调军官的工作。因为，团长已经是新的了，甚至许多营长也都是新手了。”（1 月 11 日日）

“第 711 师……只有 6 个营，其中还有 1 个‘高加索营’①……没有新式反坦克炮”……“党卫队第 10 装甲师（新组建）……，没有进行过大型的军事演习，装甲集群只有一半具有机动能力”……（1 月 12 日）

“同驻在瑟堡的三军部队一片混乱……在布雷斯特的部队更是糟透了。”（1 月 13 日）

“究竟怎样利用空军抵御登陆？同敌方航空队进行大规模空战是不可能的。可以对敌舰和海上目标进行小规模袭击。同敌人空军进行空战是不能接受的。”（1 月 9 日）

这次视察未能提出一个新的方案，甚至没有为前景暗淡的防御展示一点光明前景。然而，这次视察却使一项重要的措施得以实现：约德尔回来之后，以东线阵地为样板，把海峡沿岸和大西洋沿岸一些最重要港口均宣布为“要塞”，并在沿海岸线修建起一系列钢筋混凝土工事。此后不久，希特勒特意将各“要塞”的指挥官召到德国大本营，亲自向他们布置任务。由此可以看出，希特勒对约德尔的这一想法也给予了极大重视和肯定。可是，当登陆危险日渐临近之时，希特勒仍不准备把西线三军和后方混乱不堪的民用设施的指挥权授予西线总司令部，甚至不顾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何建议，连各要塞指挥官指挥其狭小范围的权力都不给。但是，尽管希特勒朝令夕改，但约德尔的话在以后的时间里并没有完全被推翻，因此，在盟军登陆后的数月里，那些尚未丢失的“要塞”，仍能在战役范围给敌人及其后勤补给以沉重打击。

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视察日记中，还可以隐约看到龙德施泰特与降美尔之间，在防御战术问题上的矛盾。在盟军实施登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本营还在为这个问题纠缠不休。简而言之，他们的分歧在于：隆美尔根据自己在非洲作战的经验，认为在敌人占有绝对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应把防御的重心和兵力部署的重点，——其中包括装甲部队——集中部署在沿海岸线的狭长地区。与之相反，龙德施泰特则依据传统的理论，认为，应把很少的后备力量中最强的部分，部署在战斗区域的纵深，待充分了解了敌人的登陆地段和目的之后，再集中兵力实施反突击，给登陆之敌以决定性的打击。最高统帅在这两种意见的争执中，起初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完全是因为当时对登陆地段的估计日益不清所致。但由于总的后备力量太少，采取这种方法也不能使防御前景有多少改观。

至于对登陆地段的揣测，德军大本营和位于圣日尔曼的龙德施泰特司令部，以及枫丹白露，在很长时间内都坚信，登陆地段会选在海峡的最狭窄处。希特勒在他有关这一问题的谈话中，肯定也曾考虑过其他可能性，统帅部也曾就他提到过的可能性发布过补充命令。譬如，在 1944 年 4 月 6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他竟怀疑“整个事情”——指英美为实施登陆而进行的展开——是否是“一场无耻的闹剧”？他们正在对付的是否是“一场无耻的讹诈”？尽管如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仍坚持不懈地从事其工作。希特勒虽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把防御重点放在斯凯尔特河和寒纳河之间的地段。别人得出这个判断也许是依据海岸部队和防御工事的密度，或者是海岸炮兵部队和预备队的数量，或者是防御力量的强弱等条件。而他和其他人得出这种判断的主要

根据是：在这个地区，敌人的军舰和飞机可以在最短距离上发挥最大效能；在这里有宽阔并适于登陆的海岸地段，以及许多高效率的港口；从这里到德国军事工业中心鲁尔区，路程最短；这里还有大量对敌人造成威胁的V型火箭发射装置。

1944年4月，希特勒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突然把诺曼底也划为几乎同海峡沿岸一样重要的可能登陆目标，但防御计划的基本方针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而在以前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多次指令中，诺曼底半岛同布列塔半岛，一直被排在危险地区的前列。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次调查报告中，在统帅部委托隆美尔元帅制定的“反击登陆之敌的研究报告”中，以及希特勒在1944年2月和3月的讲话中，都曾指出过这一方向。然而，这次的重新提起，同以往不同的是，希特勒要求立即以最快地速度加强诺曼底北岸的防御。但由于海峡沿岸的防御也不能削弱，所以采取的措施显得软弱无力。当时调到诺曼底的一个新编步兵师，在投入战斗前，一直未被敌人情报机构发现。

希特勒在陈述他的理由时，一直认为，英国南部兵力配置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敌人极有可能在诺曼底及其瑟堡港，以及在很容易被切断陆上联系的科康坦半岛登陆。还有，敌人的歼击机——此时，德方还不知道其续航能力已大大提高——也能抵达这一地区。尽管如此，希特勒的这种突然如此倍加重视诺曼底的思想发展过程，仍不得其解。也许是他那经常起作用的“直觉”又在那里作祟了。一种更为简单的解释是，1944年初，“谍报局”从卡纳里斯手中转到党卫队的所谓“帝国保安总局”之后，许多情报都很符合希特勒个人的意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仅仅两个月之后，当希特勒的观点得到验证后，没有将此特殊功绩归于己有。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希特勒及其他指挥官和参谋们，长时间以来所期待的主要登陆地段，仍是海峡沿岸。

不光是登陆地点越来越模糊，连登陆时间也日益含混不清。1944年初，最高统帅认为登陆会在近期发生。可是，随着日月的流逝，这种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另一方面，这种含混不清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为了在西线抵御盟军登陆，集中了或准备调集大量兵力，而在许多吃紧的战场上，兵力极为短缺。

希特勒及其高参们无力消除这一压力。尽管人们都认识到，盟军登陆的成功与否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德军大本营的将帅们仍不愿放弃其他战场，相反却在1944年1月到6月间不少于四次修改西线防御计划，使其已经搭好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破坏。如果说，从一开始抵御盟军登陆的取胜前景就很渺茫，那么以后，由于领导层的这种态度，使这一前景几乎化为泡影。

1月22日，盟军在安齐奥——内图诺登陆，迫使德军第一次撤退。①鉴于德军的整个局势，有人认为，盟军的这次突击可能会继续向罗马南部的阵地体系的侧翼纵深发展，因此除了在灾祸临头之前，迅速向亚平宁山北部撤退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坚守罗马也已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可非但如此，约德尔却以教训人的口吻强调，这显然是盟军的一次尝试；即盟军企图渡过海峡实施主要登陆行动之前，通过小规模的登陆进攻削弱和隔裂占领欧洲海岸地区的德军后备力量。对此，他自己的回答是：把敌人的冒险立即粉碎在萌芽状态，并利用以此而造成的威慑阻止敌人在西线的大规模登陆行动。这正中希特勒的下怀！但希特勒的想法比他的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如果我们干成这件事，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登陆了。”接着，希特勒便与约德尔一起仓促决定，着手进行了一些可以认为是符合敌人意图的

工作。首先，命令两个准备往西线的摩托化师，继续留在意大利；为了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从国内调来了1个军司令部和远远超过1个帅的兵力的若干部队和教导队，并装备大量坦克。与此同时，还从西线调来1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营。只是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不断提出异议和顽强坚持下，方阻止了从西线抽调第二批部队的行动。

在尔后为争夺桥头堡的战斗中，还出现了一些现象，值得一提。希特勒在自己制定的实施反突击的战术方案中，不顾责任指挥官冯·马肯森大将的反对，坚持全部使用没有战斗经验的部队。他于1月28日下达的“为罗马而战”的命令，好似一份狂热的革命号召书。在这份命令中，他一方面用他那贯有的词语不厌其烦地对当前的事件大加吹嘘，好象意大利从来就不是“次要战场”；另一方面，他首次用适宜的方式表示了他对国防军领导层的不信任，说他们从根本上破坏了德国的全部军事秩序。他要求“战斗必须要残酷、无情”，而且还以狂暴的口吻强调：“这不仅是针对敌人，而且还针对所有在此关键时刻退却的指挥官和部队。”第一次反突击失败之后，3月初，第二次反突击也被窒息在鲜血和泥泞之中。这样，全部不合时宜的计划，以及立即“摧毁”盟军主要战线的企图也随即告吹。此后，希特勒又干了一件令人难以捉摸的事。他把约15名年轻军官从安齐奥——内图诺的战斗中，召到他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大本营，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亲自向他们——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场——询问战斗情况，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考察却放手不管。譬如，在安齐奥——内图诺登陆、并已突入意大利军队侧翼纵深的盟军先头部队，是不是已对防线及其与后方的联系构成了持续性的威胁；是不是亟需在意大利战场上寻求一个危险和损耗都较小的解决办法，以解决准备用于西线的预备役部队一直受牵制的问题。①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却继续发布命令，进行检查，忙于阵地的构筑，这与人们重新热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壕沟战不无关系。

由于占领匈牙利的需要，第二次从西线抽调大量兵力。经过数月平静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国防军统帅部突然于1944年2月28日，下达了实施“抽屉计划”的命令。随后，德军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领导下，匆匆忙忙地集结兵力，在匈牙利边境展开。原来计划用于占领匈牙利的兵力，此间已大部调往东线战场。然而，希特勒在对匈牙利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的仇恨和复仇心理的驱使下，竟为完成这个次要的任务，再次从西线抽调兵力。于是，1个军司令部、1个集团军的直属部队、以及1个刚刚组建的“装甲教导师”，脱离抗击盟军登陆的准备工作，于3月19日，开往匈牙利。西线的另1个装甲师（第21装甲师）的一部也已准备开往匈牙利，只是由于希特勒看到占领行动进展顺利才作罢。此外，如在安齐奥——内图诺的后备部队中，也有若干团级战斗群被调往匈牙利。这些部队都是摩托化部队，是新近为西线动员组建的，对西线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这些部队后来都象在意大利一样，留驻在匈牙利，他们同东南线的其他部队一起，陷入了东线战场这个永无休止的漩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盟军登陆前数周，阻止了继续从西线抽调部队的行动，其中就包括装甲教导师。

占领匈牙利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尤如一场“小偷和警察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德国国防军只能算是一个配角。当霍尔蒂站在希特勒的旁边，被迫答应效忠盟友，并接受德国的武装帮助的时候，那些受命站在克勒斯海姆宫的大厅里，同他们的匈牙利同事攀谈的德国军官们，显得极为尴尬。这

个安排的阴险目的在于：尽量拖延匈牙利摄政回国时间，以便使德国占领军能在布达佩斯的“城堡”内，恭候这们摄政的凯旋。执行这一命令的东南线总司令冯·魏克斯元帅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有力支持下，没有解除匈牙利军队的武装，阻止了希特勒计划中一项重要内容的实现。这是魏克斯元帅的一个重大功绩。当红军先头部队已推进到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匈牙利人在自己国家仍被占领的情况下，为了保卫他们的边境奋起抵抗，从而证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不愧为德国的盟友。

连月来不断向东线调兵遣将，给防御盟军登陆的准备工作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1943 年底下达了禁止西线兵力东调的命令后几乎还没过一个月，后备部队，以及在国内为西线储备的部队和装备又开始源源不断开往东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他 1 月 21 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希特勒的这样一个决定：

“现将军械库中全部用于西线各师反坦克营的装备……都运往乐线。”

第二个月，后备部队的最后 3 个机动团，在即将扩建成师之前，也被调往东线。2 月底，驻挪威的 1 个师（第 214 步兵师）也奉命开赴东线。3 月，希特勒在东线南段毁灭性态势的重压下——这是他对早已无力坚守的防线死抱住不放的一贯作法所造成的结果——将维持东西两线关系的一切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后来，从波兰占领区又调走 3 个新组建的师，从丹麦调走 1 个，从东南地区调走 1 个——这些部队都至少是间接或直接用于防御盟军登陆的。这样，到 3 月 23 日夜晚，西线在兵力部署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

约德尔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第 326、346、348 自行火炮营和第 19 空军野战师调往东线。”

“西线总司令交出了第 349 步兵师。”

次日，他记下了最后一批，也是最大一批部队的调动：

“党卫队第 2 装甲军急速开往东线。”

这样，在不久前装甲教导师被调往匈牙利之后，在盟军登陆危险日渐临近的情况下，西线连一个具有完备战斗力和使用价值的装甲师都没有了。

可以看得出，希特勒的这些决定是经过救天踌躇之后才作出的。他认为，东线被包围在喀尔巴阡山脉北部边缘的第 1 装甲集团军，如果得不到这些军队的援助，就不能摆脱包围。这也许是对的。①然而，鉴于西线面临着登陆的威胁，最高统帅的这些决定丝毫无助于改变目前的这种困境。希特勒一反常态，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但是，对一个对所有战场都要负责的陆军总参谋长来说，也许是绝对不会进行这种冒险的。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是如此。然而，如果约德尔不是对东线的战斗情况长期漠不关心，如果不是失职的话，那么他就会以充足的理由，与这种对历尽艰苦建立起来的、并一直缺乏雄厚基础的西线防御体系的破坏行动相对抗。

在这种情况下，约德尔也肯定没有想到过同他的参谋部商量一下，也没有给他的同僚们提供发表不同意见的时间和机会。他只满足于在午夜刚刚过后，把希特勒的命令传达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冯·布特拉尔将军。他也很少与西线总司令部交换自己的看法。对西线的援助，他和他的参谋部完全都是通过电报进行传达的。如 3 月 24 日，他在电报中询问：“西线是否……已得到第 331 步兵师”。

4 月 25 日的电报称：

“将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师，也尽可能将第 3 山地师（从东线）

调回。将武器、汽车和坦克送往西线。”

由于以蔡茨勒为首的陆军总参谋部，一直不愿意执行从东线抽调那些支离破碎的部队的命令，使本来就含混不清的命令更加令人费解。

人们事先并没有估计到，编有两个装备齐全的装甲师的党卫队第 2 军、在完成东线任务之后未能立即返回西线。为了在东线南部战场的反突击中将这个军作主力使用，希特勒企图无限期地控制这个军。根据一切迹象表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协助工作。直到 6 月 12 日，盟军开始登陆几乎已经一周时，希特勒——大概在众人强烈抗议之下——才放弃了这一反突击计划，并命令这个军开回西线。1944 年 8 月 31 日，他不顾事实真相，对两位将军说道：

> “如果我把党卫第第 9 和第 10 两个装甲师部署在西线，这件事——指盟军登陆成功——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可是，由于有人想在这里搞罪恶的颠覆活动（指 7 月 20 日），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件事。”

他这番辩解的前一部分实在令人生疑；而后面的话如果不是出自一个长期思维混乱人之口，就是讲话者对事实有意进行粗暴的歪曲。作为唯一了解内情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竟然对此沉默不语。

当国防军最高统帅又从统帅部战场为克里木半岛抽调几个营之后——不久因损失惨重又被迫撤回——盟军于 5 月 12 日再次对意大利南部的阵地展开进攻，最高统帅置一切原则于不顾，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插手用于抵御盟军登陆的微薄的兵力。如果盟军在安齐奥——内图诺登陆后，便停止进一步对“欧洲要塞”周边地区的进攻——这也正是约德尔的战略设想——那么，盟军现在对罗马的突击，无疑是为了牵制德军从意大利向西级的撤退。然而，由于希特勒顽固坚持“不放弃一寸土地”的信念，以及罗马事件使德国威信扫地而在他心中留下的创伤，希特勒此时此刻的作为，却远远背离敌人原来的设想。当他从意大利抽调兵力的企图早已被迫放弃之后，5 月 25 日，敌人主突方向的先头部队与从安齐奥方向向罗马南部突击的先头部队汇合。在这场攻势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内，希特勒再次把 3 个师的兵力从匈牙利和丹麦调往南线，并随后又调去第四个尚未组建完毕的帅。6 月 2 日，希特勒命令把一直在西线一个最危险地区担任海岸警戒任务的第 19 空军野战师和大量的重型装甲分队，一起运往意大利，从而使他这种听任敌人摆布的战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根据这些命令——如后所述——一次也没有完全满足凯塞林提出的除了补充足够的后备力量外，还索要不少于 5 个战斗力完备的师，及加强其空军的要求。虽然约德尔也认为，要想“减少一些夺取利古里亚海岸所冒的巨大风险”，多增加些力量是很必要的，但他本人并没有参予作出这些决定。在这个方向上，他的参谋部也只能于 6 月 1 日下达一个关于“加快扩建亚平宁阵地”的命令。

新近前送的力量也丝毫无助于改变 6 月 4 日在罗马事件中所遭受的损失。这些部队未起什么作用，反而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入了这永无休止的失败漩涡，被希特勒反复下达的“尽可能少放弃地域”，“在罗马北部和南部重建防线”的命令所吞噬。

下面再介绍一些关于德国大本营的判断和措施，及其内容关系发展变

化，也许对了解盟军登陆前这段时间的情况有所帮助。

在此期间，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上的所有岛屿和海岸防御都沦为毫无价值的防线。春天，盟军竭尽全力才阻止了希特勒占领达尔马提亚沿岸和利萨岛，以及维斯岛，这些地区都是盟军同铁托进行联系的基地。作为巴尔干问题“专家”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例外地参加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议论形势讨论会。他在会上的主要论点是，德军即使是此次作战取胜，也不能阻止敌人对其他众多岛屿的占领。他的观点却得到了一个很生硬的、但又难以令人服气的回答：“那么您也可以说，要知我明天还要挨饿，今天何必吃饭”。德军大本营所关注的只是在巴尔干半岛范围内的艰苦战斗，而对一个致命威胁却视而不见，这就是铁托部队与红军在多瑙河平原的会师。它给欧洲东南部十分吃紧的千余公里的海防线以致命一击。1944 年 5 月，武装党卫队的一支伞兵分队进行的旨在逮捕铁托的“跳马”行动，以及铁托人头的高额悬赏，都是由希特勒决定的，然而两者也只不过是出“剿匪”目的。

在西地中海，从年初就开始盛传盟军正准备在此登陆，因此亟需加强从里昂湾至热那亚湾的海岸线。可是，最高统帅除了几支后备部队外，只能向这一地域增派几个新建或经补充的师，以解燃眉之急。另外，为了为下一步增派兵力打好组织基础，于 1944 年 4 月底，组建了一个隶属于法国西南部的西线总司令的集团军司令部，后改为 G 集团军群司令部，司令为布拉斯科维茨大将，下辖驻比斯开湾沿岸的第 1 集团军和法国地中海沿岸的第 19 集团军。

关于丹麦这个原来被视为同西线一样的盟军最有可能实施登陆的地区，在此期间几乎不再为人提起。相反，希特勒却一直没有失去对挪威的极大关注，并不断为其增派兵力和调拨武器。根据希特勒的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要完成一项新的艰巨任务：针对芬兰人退出战争这一情况，要求德军占领阿兰群岛，以便利用这个基地和芬兰湾的苏沙里岛来确保在波罗的海对俄国人实施的封锁。此外，希特勒用尽一切手段，包括停止对芬兰人的武器和粮食援助，试图迫其就范。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氏和迪特尔大将却认为，从德国方面来说，保持这种“战友情谊”在军事上已没有任何必要，德国无需再为此承受不必要的负担了。希特勒对这一观点的态度，直到了 6 月 25 日迪特尔大将因飞机失事遇难还一直举棋不定。①

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海军总部的关系和合作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海军元帅在他在大本营的频繁逗留中，在所有问题上，甚至在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上都代表他一个军种的利益。特别是在潜艇战领域，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沦为一个只履行例行公事的情报收集站。譬如，如果不是希特勒独断专行，那么对侦察或陆上防御都应实施统一领导。

5 月中旬，对英国的“远距离战斗”的准备工作看来已经就绪。定于 6 月中旬，从陆地和飞机上发射这种“V—1”型火箭，并辅之以炸弹和远程火炮，对伦敦实施轰击。关于发射时间安排，西线总司令不断收到由希特勒一一确定的具体指示。事实上，6 月 15 日发射开始时，也就是盟军登陆开始后 10 天左右，一切都已经结束。而 1944 年 9 月，一种速度更快、体积和威力更大的火箭——“V—2”型火箭已经可以投入使用。

每况愈下的战争形势，未给大本营的内容关系带来任何影响。然而，却出现了一些相互悖逆的现象。例如，在 1944 年 1 月 30 日，即“民族社会主

义党暴动纪念日”，约德尔和蔡茨勒两人在这段形势混乱不堪的日子里，却被提升为大将，并被授予“民族社会主义党金质奖章”。此后，约德尔对希特勒本人的内在责任心大为提高，而且还通过极不寻常的方式让他的副手感觉到这一点。①与此同时，蔡茨勒对希特勒在东线实施的丧失全部理智的指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无休止的失败日益反感，对希特勒的“信徒股的忠诚”也与日俱减。在冯·克卢格元帅遇难身亡，以及霍特大将和屈希勒元帅被免职之后，1944 年 3 月 30 日，长年战斗在东线的高级指挥官曼施泰因和克莱斯特也被希特勒革职，借口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一批新人来“指挥”“非机动的固定防御作战”。此事导致希特勒同蔡茨勒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使希特勒忍无可忍。于是，由豪辛格将军暂时替代了蔡茨勒的职务。（P1019）遭到了希特勒个别亲信的愤怒攻击。因陆军上层军官团内部分裂而形成的鸿沟，这件事暴露得尤为明显。①

大本营第 II 号宿营地的人们，成功地抵制了党的监察系统以军事为掩护、不按一般“程序”企图在营内安插人员的作法。当柏林国防军统帅部组织部门的领导机构，要求在第 II 号宿营地任命一名“纳粹领导组织”成员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副官，一位在战斗中受过重伤的上校反驳道：“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干这些蠢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认为，话应当说得缓和一些，但对上校所持的态度，他是全力支持的。

当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开始解决所有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了大量额外工作，其中主要有：

接管“勃兰登堡”师这是早期卡纳里斯谍报局所属的一支特种部队，大约相当于英国的“特遣队”。后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根据形势的需要，将这个师以团或营为单位，分别转隶前线的军级司令部；

合并从卡纳里斯谍报局分出来的前线情报处，并对其实施领导；

重建战地宪兵勤务机构，并开始工作，以维持受威胁或已崩溃的防线的军队纪律；

竭力接受那些能同时为国防军三军服务的军事设施，如野战医院、汽车制造厂等；

更多地参予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运输和管理工作。

第五章盟军登陆

积极防御的尝试——至 6 月末

1944 年 6 月 5 日即盟军实施登陆的前夜，德国大本营丝毫没有觉察到决定战争的关键时刻已迫在眉睫。德军没有侦察到，24 小时以来，5000 多艘舰船穿过海峡向诺曼底海岸驶来。无论是隆美尔、冯·龙德施泰特，还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都没有根据气候和潮汐情况判断出，敌人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实施登陆①

由于德同空军处于绝对劣势，使德国各级指挥都处于盲然无知的状况。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情报机构发出的警告，竟没有引起德国领率机构的重视。几天以来，第 II 号宿营地并没有发觉在英国南部的展开地区已经实施‘无线电静默”，即使通常制造进攻假象的无线电讯号也消失了。而早在 1944 年 1 月份，长纳里斯海军上将就已获悉英国播音员在登陆前夕对法国抵抗组织发出的无线电通讯稿的全文。在这篇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通讯稿中，有两行凡雷恩《秋之声》中通俗易懂的诗句，其中一句是——秋风瑟瑟、提琴长吟”——作为 6 月 1 日或 15 日实施登陆的预先通告；第二句是——“凄声切切，刺伤我心”——作为登陆开始前 48 小时的进一步通知。6 月 5 日下午，间谍局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报告，6 月 4 日夜第 15 集团军间谍部门收听了第二行诗句。然而，报告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一切依然如故，

事后通过调查——很显然这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进行的——才弄清楚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还得知，第 15 集团军在收听到情报之后，立即用电报向 B 集团军群（隆美尔）、西线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作了报告。然而，只有第 15 集团军司令冯·扎尔穆特大将于 6 月 5 日晚上签署命令，计部队进入一级战略状态——即使这道命令，也是临近午夜时分，监听人员在截获敌方在海上和空中实施大规模机动情报后才发出的。可能是由于要急于对付登陆，才没有对上级机关乃至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失职的原因进行调查。因此，只能这样猜测；所有的人——包括约德尔将军，都认为这份报告没有特殊的价值。这或许是由于他们不赞成因失宠而被解职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这一情报所持的意见，或许他们还想等形势来进行验证。

为抵御盟军登陆，各级指挥部门都为防御准备工作作了不懈的努力。虽然他们认识到此次作战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但他们的准备工作水平，也不能不与德国军事潜力在第 5 个战争年头里出现的严重缺陷相适应。为了保障其他战场，希特勒不顾现实，多次横加干预命令：“利用各军兵种的火力，阻止敌人从海上或空中实施登陆……把他们消灭在水上、沙滩或空降地域”。

然而，参加作战的部队都是未经战火锻炼的、大部由上年纪的老兵拼凑起来的、装备较差的“本地”部队。即使是那些准备在海岸和沙滩防御失利时首先投入反突击的摩托化师和坦克师，也大部都缺少战斗经验。在总共这 10 个师中，有 4 个直到 6 月 5 日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因为陆军总参谋部将它们从东线调来时，已经跚跚来迟。

空军的情况更是不妙。按原计划，为数不多的空军增援部队应在盟军开始登陆时飞往西线，但敌方充分利用了自己占有的绝对空中优势，夺取了制空权，使德军计划无法实施。到 6 月 5 日敌人空军彻底摧毁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下游的所有桥梁，从而切断了作战地域与外界的全部联系；此外，盟军长时间使德军无法实施侦察，使在英国列岛前方的部队集结地区、港口和船只停泊区域，未遭德军一次空袭。

另外，德军没有想到，即使能够发现驶来的敌方登陆舰队，德国空军和力量单薄的海军，也至多能进行“针刺”一般的攻击，对盟军来说无异于嬉戏。

究其原因，大概是认为德军当年的优势丝毫未减，不论是德国大本营还是西线高级指挥机构都深信，敌人的登陆无论如何也是能够粉碎的。

然而，战斗一开始就不妙。

象往常一样，大本营分几部分设在贝希特斯加登。6 月 6 日凌晨 3 时，西线总司令部的第一份关于敌人强大兵力在诺曼底空降的报告送到了大本营。设在施特鲁布兵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顿时忙碌起来。一系列重要报告，不断由“西部集群”的参谋们那里，通过电话传送到“小总理府”约德尔的副官处。大约清晨 6 时许，西线总司令部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将军，首次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报告了形势概况。他说，一切迹象表明，登陆已经开始，登陆地点显然是在诺曼底。因此，他以其总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的名义请求：让由 4 个摩托化师和担克师组成的所谓“统帅部预备队”，从待机地域向登陆前线开进。

对于最高统帅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决策，瓦利蒙特立即通过电话与约德尔取得了联系，并得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这个情报了如指掌，可是对于盟军已在此时此地开始登陆之说仍不足为信。他认为，现在还远没有到把最后的预备队放手的时候，而是命令西线总司令部必须首先尽一切努力，依靠 B 军团军群的兵力，控制局势。直到此时，他还在怀疑，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是不是声东击西的佯攻，以主力掩护其在海峡最窄处的主攻。

由于约德尔将军未请示希特勒，自作主张地作出了这一决定，才引起了有史以来对“国防军统帅部”最强烈的指责：德国在诺曼底的失败，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首先归咎于抱住“统帅部预备队”不放。

作者认为，这些指责是不正确的，也有些是张冠李戴了。试想，倘若这 4 个师真是最高统帅的名符其实的预备队，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在前线指挥部还没有完全弄清情况之前，以及在盟军登陆艇尚未将部队送上岸之前，就将手中的王牌打出去①与 B 集团军群相比，国防军统帅部“在最初阶段下达战役指令”的可能性更小。

事实上，德军的指挥错误是根深蒂固的。本来，这 4 个师是西线总司令的预备队。6 月 6 日清晨，西线总司令部手中没有任何可以迅速调遣的部队。之所以宣布这几个师为“国防军统帅部预备队”，仅仅是希特勒插手指挥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如他一贯标榜的，能作出正确决断者，非他莫属。因此直到这时，西线总司令部在权限上仍然受到这种限制，也就几乎无法指望它在盟军登陆的最初时刻所提出的请求得到批准。希特勒的犹豫不决已众所周知，但当天 14 时 30 分，希特勒就根据尚“不成熟”的决心，将两个战斗力最强的装甲师拨给龙德施泰特指挥，使他大感意外。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对于判断整个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即在这一天敌方所拥有的强大空中优势，使德军大部队不可能在昼间向作战地域纵深实施任何机动。如果能进行充分的侦察，各有关方面对谍报机关提供的情报又给予高度重视的话，德国大本营则可在 6 月 5 日晚定下决心，命庞大的预备队在夜暗的掩护下，向受威胁的海岸开进。那样，6 月 6 日清晨至下午早些时候的延误也就显然无碍大局了。然而，同样清楚不过的是，就在盟军第一天以及以后造成的一系列不尽人意的战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兵力处于劣势，这

是靠任何指挥艺术和军队的骁勇都无法弥补的。

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另一个强烈指责的是，空军兵力的加强丝毫不符合原来的许诺。对此也需要加以澄清。只要粗略地看一看空军的指挥状况，也至少会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惊讶不已：在6月16日至7日受命前往增援的空军兵团，只有原计划兵力的三分之一，也就是30架飞机中只有10架能投入战斗。再加上空军向西转移过程中，由于敌方的袭扰和恶劣气候的影响，也损失残重。尽管德国空军已拥有第一批少量的“喷气式战斗机”——象火箭一样被希特勒称之为“惊人的武器”，但从登陆的第一天起，在故方出人意料的强大阵容面前，德国空军显得势单力薄，这比任何弊端都更加妨碍指挥和行动。

设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大本营，分为若干分部散布在各处，然而，谁也离不开谁，否则就无法工作——约德尔大将和他的副官们住在小总理府里；后来希特勒又搬到了“山间别墅”——整个上午他们都通过电话保持着联系。在此期间，一份份不再认为是佯攻的补充报告按踵而至，而且大多数都直接涉及到约德尔和西线总司令部参谋长之间关于是否让预备队投入战斗的问题。直至中午，才在通常的范围内举行形势讨论会。这一天，由于要在克莱斯海姆宫举行欢迎匈牙利贵宾进行国事访问的仪式，与会者从各个工作点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乘车来到这里。经常，都要向来宾大讲一通形势，这次由于在西线发生的事件，只是在紧挨大厅入口处的一个房间里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秘密的形势报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被西线这一重大事件所震撼，紧张地站在铺开的地图前面，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以及作出下一步的决定。结果却使人大失所望。象往常一样，希特勒象一个演员，面带轻松的微笑，摆出一付等待很久、最后终于找到了与对手算帐的机会的架式，来到地图前，操着浓重的奥地利地方口音，只说了几个字：“好吧，那就开始吧”。当他听取了敌方最新动向和己方行动的报告后，接着便向曾多年任匈牙利驻柏林武官、现新任匈牙利总理斯托亚伊将军为首的匈牙利客人，介绍当前形势。这种吹嘘德方力量。对“最后胜利”深信不疑的介绍实在令人作呕。在这个令人不快的一天里，涉及到领率机构的内容，可以在约德尔的日记里找到记载。他在1944年6月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指他自己的参谋部），为什么还不命令第189预备役师投入战斗？为什么还不命令党卫队第2装甲师接近敌人？——从6月12日起，将由第34步兵师代替第277步兵师。”

仅从这几行字，便可略见一斑。

当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派一位年轻的总参谋部军官到诺曼底战区充任联络官。与此同时，摆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面前的问题是，鉴于形势的发展，是否还应该承担前一天他自愿申请的任务，即：赴意大利，亲自视察“亚平宁阵地”的构筑情况，为这一战区的指挥提供准确无误的依据。因为约德尔也认为，罗马失陷后，德军不能再按照希特勒最初的命令行事，而应立即撤到亚平宁阵地，在那里重新转入防御。经约德尔进一步向希特勒询问，希特勒允许瓦利蒙特的此次视察。随后，瓦利蒙特不顾西线的紧张局势，于6月7日清晨，踏上西去的旅程，计划于12日返回贝希特斯加登。

假如谁想在约德尔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找出大本营对西线局势作出的慎审思考和重大决策的蛛丝马迹，即是徒劳的。日记上记的都是克里特岛指挥官的报告，是些反坦克炮和岸炮兵连的数量及部署，甚至还有遥远小岛上个

别步兵连的行动，其他就是希特勒的评论。日记里还记有一份施图登特将军关于“伞兵集团军”的组建的报告，以及6月12日一些琐事的记录——其中有一处是对一位总参谋部军官表示不满的评论，希特勒发现这个军官是原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女婿——这些与西线局势根本没有什么重要联系。无论从约德尔身上，还是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战时日志中，都可以表明——从领率机构的角度看——在抵御盟军登陆作战的第一阶段的企图，即把敌人消灭在海岸和滩头上，阻止敌人发挥其优势的企图，在6月9日晚以前已宣告失败了。还有一点至少也清楚了，即从此刻起，问题是不仅要增派新的加强兵力，而且要进一步确定今后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这两项任务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受着领导层对下一步敌情判断结果的决定性影响。德军领率机构以及西线总司令部和隆美尔元帅现在一直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不再是声东击西的诡计，近期内敌人还会越过英吉利海峡发起第二次攻击。除此之外，希特勒对布列塔尼半岛也十分关注，他认为这个半岛同法国地中海岸一样会受到敌人的威胁。

只有隆美尔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不包括它的参谋长——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携手共济，顶风冒险，集中一切可能的兵力，对先期登陆之敌给予迅雷不及掩耳的迎头痛击。这就是说，将驻扎在附近的第15集团军，从海峡沿岸运往诺曼底，并与在短期内从法国其他地区集中起来的部队一起，发动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反击。

希特勒没有准备实施如此大胆果敢的指挥。相反，他却不允许削弱第15集团军的兵力。由于所有增援部队，要在数日甚至数周之后才能到达指定地点，因此，最高统帅仍坚持他原来的决定，即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依靠现有的兵力，收复漫长的诺曼底海岸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象当时在安齐奥一内图诺那样，对敌人强大的登陆场实施局部有限的攻击，企图“各个击破，”将不会有多大意义。因此，首先应当将装甲部队及其他现有兵力集中使用，组成坚强的防御。为此，希特勒企图将这个积极防御的重点放在卡昂附近即盟军登陆线的东翼。与此同时，尤德施泰特和隆美尔也正在忙于西翼和保卫瑟堡的工作。

这些企图，不管从表面看如何信心十足并将付之于行动，但是在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眼里，却是毫无说服力的。约德尔也不愿表示态度。当时约德尔的一个最亲近的同僚，在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从其他文件中得知，约德尔，甚至还有凯特尔在当时那一段时间里所讲的话，完全是违心的。这使他——特别是目睹发生的一些事情——惊讶不已。下面引用一段邓尼茨海军元帅与这两位将军在1944年6月12日进行的一次谈话：

> “凯特尔和约德尔一致认为，既使德军有可能幸运地把敌人的登陆场包围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对于我们来说，最好是能够粉碎敌人在另一地点的登陆。然而，敌人是否企图这样作，却值得怀疑。敌人最有可能在迪埃普与布洛涅之间，或者是加来与斯凯尔德河人海口乏间的沿岸登陆。但愿对伦敦的远程作战①……一方面能把敌人的空军引开，另一方面能促使敌人在法国北部进行第二次登陆……。如果敌人能从目前的登陆场迅速向外扩展，并赢得在法国实施运动战的作战主动权，那么整个法国就将丢失。我们的下一道防线将是马奇诺防线或旧西方壁垒。凯特尔元帅认为，最后就剩下保卫德国这个唯一的可能性了。在这一点上，约德尔将军不持肯定意见。他认为，这还要取决于以后形势的发展及我们手中还能留下多少兵力。”

这些话，约德尔从来没有对他的参谋部透露过。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从意大利返回的当天，就从他的上司那里听到了一个在德国大本营里也属典型的、和令人大失所望的消息。如果说，当初，瓦利蒙特踏上旅途时就坚信，在目前形势下，亚平宁阵地无疑是意大利战场的坚固的天然防线。只有凭借这一准备就绪的阵地，才有可能把意大利战场上的军队调到西线去，那么，凯塞林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对目前部队状况的紧迫建议，以及他自己在亚平宁北部地区为时 3 天的驱车巡视，更坚定了他的想法。但是，早在 6 月 10 日晚上，他在意大利北部向约德尔作初步汇报时，从约德尔的反应就已经使他预感到，希特勒又一次独断专行，在没有听取自己派出的代表汇报之前，就已经提前出了决定。约德尔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只能向您建议，如果您回来汇报时，望您一定倍加慎重。”

意大利之行的汇报被多次推迟。很明显，希特勒根本不愿意听取瓦利蒙特的报告。在一次形势讨论会上，凯特尔竟然小声劝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收起您的公文包”，不要汇报了。瓦利蒙特愤怒地拒绝了这种无理建议。他认为，他不仅对形势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他还必须代表在意大利的正在继续实施艰苦退却德军利益说话。在当天的形势讨论会上，轮到了瓦利蒙特汇报时，还没等他讲上几句，希特勒就用喋喋不休的责难和猜疑，驳斥了他所有充满数字和技术数据的论据。因为这些论据不符合希特勒事先作出的判断。瓦利蒙特还不肯退让，但希特勒已摆了摆手示意副官收起地图和资料。

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瓦利蒙特继续汇报。接着，希特勒“顺水推舟”地解释说，亚平宁阵地还需要“7 个月时间”，才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希特勒撤消了西南线总司令凯塞林下达的企图在 3 周内将西线总司令部撤到亚平宁阵地的命令，并要求“最迟……要把防线固定在……特拉西梅诺湖高地”。同时，将“戈腾阵”改称“绿色防线”。凯塞林元帅在他“失宠”后数周，即 7 月初才被允许到“山间别墅”作口头汇报，但他一无所获，约得尔有意记下了希特勒的一句关键的话：“唯独意大利这个狭长地带能够阻止敌人的优势和作战主动权”，但他又莫名其妙地补充写道：“关于夺取每一平方公里上地和争取每一周时间的必要性及形势，元首作了印象颇深的阐述。”为了为这一战略辩护，同时还否定“绿色防线”，希特勒数百次不厌其烦地上用了在构筑西方壁垒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的数字。对此，约德尔记道：“在 700 公里长的工地上，有 70 万人施工。每天有 350 列火车和同样多的船只实施运输。在 1 年半的时间里，只有德国工人和 4000 台搅拌机在那施工。”

这种取决于政治和个人威望的指挥，产生的最终结果是：

完全暴露在敌人空中优势卜的驻意大利德军，不得不在 2 个月后即 8 月底，撤到亚平宁阵地；

由于他们已精疲力尽，因此亚得里亚侧翼这段最薄弱的防线，很快被对方突破；

直到此时——为时已晚——才向西线派来第一批增援部队。

盟军登陆已经 10 天，德国大本营不在战略上，反而在细节上进行无休止的和议而不决的议论，使宝贵时光白白流逝。就在这时，希特勒突然出人意料地动身到达苏瓦松附近的马尔吉瓦尔，到附近的“指挥所“——“托特组织”于 1943 年为防御敌人登陆曾在此设立大本营——与龙德施泰特元帅和隆美尔元帅会商。希特勒此行的起因，是由于西线总司令希望大本营能派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或副参谋长前往西线，“商讨下一步的战事”。但人们

事先没有料到，1944 年 6 月中旬，希特勒与马尔吉瓦尔并未作较长时间停留。这也是希特勒最后一次到法国。

约德尔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中唯一参加这次旅行的人。在他的这段日记中，除了“空中优势的描述”外，找不出一点象战后文学作品那样的扣人心炫的描写。在那些战后的文学报导里，讲述了以隆美尔为代表的反对派在希特勒面前的义正词严的场面，还描写了希特勒仓促起飞时，一枚失控的“V—1”型火箭从飞机旁

掠过等戏剧性情节。无论是在后来的形势讨论会上①还是约德尔同他的副手的谈话中，都没有提到过一点这类的情节。

西线的两位总司令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最高统帅的意图，期待着能亲临马尔吉瓦尔，与希特勒面谈，同时也横下一条心准备向希特勒说明，只靠目前的和即将得到的兵力兵器是不足以控制局势的。当讨论到科唐坦半岛和瑟堡有被切断与诺曼底后方的联系的危险时，希特勒也意识到形势严重了，不论他高兴与否，面对这种形势，他都不得不承认，在这个特别重要地点，对敌人登陆场实施“各个击破”的种种幻想，都迅速破灭了。但是，他不是象在此作战的第 7 集团军所要求的那样，从没有战事的地域尽可能调集大量兵力，投入瑟堡“要塞”，而是将所有兵力南调。结果，10 天后美国人拿下了瑟堡城和港口，数千名德军被俘，而在其他防线，德军却异常短缺。而在此期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还受希特勒之命，不惜浪费时光，去详细调查是否每个人都认真执行了他的命令。

关于在马尔吉瓦尔所谈论的内容，约德尔个他 6 月 17 日的日记里做了如下记载：“元首准许根据形势变化，对党卫军第 1 军防守的防线作小的修正。”但是，却没有提到讨论当天下午国防军统帅部命令中第一次提到了那个更大的计划，即“在卡昂——法莱斯一线以西地域，集结 4 个党卫队装甲师，元首将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投入反突击”6 月底以前大本营发布的所有命令和基本设想，都是围绕着元首的这一以 4 个党卫队（第 1、2、9、10）装甲师为核心的企图。在阻止盟军登陆的第一个回合失败后，第二阶段的“局部有限的进攻”行动也受挫，为此进入防御的第三个阶段，即集中反突击攻击方向选在巴勒兽瓦，这是个位于登陆一线中部的一处海岸小城，同时它还可以作为下一个作战目标，给英、美军登陆场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然而，在后几天里，敌军不断增强兵力，元首举棋不定，致使这些计划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落空了。6 月 24 日夜，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向约德尔呈送了一份关于对西线总司令部企图的意见书，建议在其他沿海地段甘冒风险，也要大力加强进攻的兵力；并建议把 7 月 5 日作为发动集中反突击的日期。而当天，希特勒却命令，已经到达的部队，不必等全部兵力集中，随时做好阻止敌人实施突破的积极防御准备。这样，最后一次符合行动准则的尝试也因此夭折了，摆脱敌人的控制的希望也随之破火了。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心血来潮，命令刚刚抵达的装甲部队投入瑟堡的战斗，为此将这些部队运到科唐坦西海岸使本来就变幻无常的指挥更加飘浮不定。鉴于敌情我情，西线总司令部认为，在敌方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德军要想远距离横穿敌军主攻方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希特勒却一意孤行，越发顽固地坚持他这一新的设想，直到 6 月 26 日瑟堡失陷。

6 月底，刚刚赶到的最后一个装甲师加入了对诺曼底敌人登陆地域展开包围的单纯防御行列，使这种动摇不定的指挥和企图通过反突击铲除登陆场

的计划归于破灭。这个支离破碎的包围圈，处处吃紧，面临被突破的危险，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攻行动和歼灭敌人。盟军的登陆成功了，由此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更确切说是第三条战线。然而，在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闭口不提盟军在西线的成功，将对战争产生何等决定性影响，以及会产生什么后果，而是当着与会者的面，摆弄着园规和直尺，计算了一下敌人在诺曼底占领的那一小块上地的面积，并与控制在德国人手中的大片法国国土相比较。难道当年在进攻波兰的最初日子里，他真的也是拿这种标准来衡量德军的战绩吗？或许是他企图以这种幼稚的方式，对周围的人施加心理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当时的那种表演，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

消极防御——至 7 月末

整个 7 月份，德军在诺曼底都在进行消极防御。

在这个阶段伊始，希特勒便不顾前线吃紧，于 6 月 29 日将西线两位总司令第二次召到贝希特斯加登。就在他们动身的那天晚上，希特勒就在一个较大范围里发表了一次讲话。从邓尼茨的记录中——它比约德尔的记录更为详细——可以清楚地看出，迫于形势，德军已放弃在诺曼底实施任何较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希特勒与西线两位总司令的会商，是在由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造成的阴郁气氛中进行的。自 6 月 22 日以来，即德国的俄国战局开始 3 周年的日子之后，东线的中部防线仅在数日之内便被突破，北方集团军群面临被割裂的威胁；在意大利，凯塞林各集团军遵照希特勒的旨意不得不“日渐减小的军队，在开阔的战场上，徒劳地抵御占优势的敌军；在芬兰，在俄国军队突破卡累利阿地峡以后，企图摆脱德国联盟的迹象越趋明显，甚至在保加利亚也是如此。对慕尼黑这个“运动之都”的连续不断的空袭，近日又扩展到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就连“山间别墅”的上空，敌机也频繁出现。在距离“山间别墅”不远的地方，人们正在为遇难身亡的迪特尔大将举行国葬忙碌着。两天后，在惨淡无光的葬礼上，参加者们仿佛看到了“第三帝国”随同迪特尔的棺木一同被送进了坟墓。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每天仍然为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收集战报并向约德尔提交有关的指示和判断。对历次形势讨论会的意图，没有一次事先通知，设在施特鲁布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因此也无人出席会议，他们即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对诺曼底的形势发表意见，也不能对被占领的西线地域所产生的无法预料的危险后果发表评论，更谈不上对整个德国战局表示自己的观点了。会上，希特勒既不对整个战局进行分析，作出充分的预见，也不去了解敌情和友情，而是通过发表一通罗里罗嗦的讲话，来阐述从他那片面的思路中得出的结论。作为这种会议参加者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在他事后的日记中，没有发表任何个人的看法。事实上，他只不过发挥着一个希特勒秘书的作用。

根据海军总司令对两次形势讨论会所做的详细记载，西线的形势可以概括如下：

敌人的空中优势和海岸附近敌舰的猛烈炮火，限制了己方实施较大规模进攻行动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确定进攻时间，因为空中态势使我们无法比较准确地计算部队和物资准备的到达时间；

我们绝不能在暴露的战场上打运动战，因为敌人掌握了制空权，并具备各种运输手段；

鉴于上述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敌人的登陆场，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拖住他们，通过不停顿的战斗，消耗其力量，最后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

这项继续自欺欺人的作战方针，对海军和空军也提了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在形势讨论会上人们就对此提出了异议。第二天，又对这项方针作了一些具体补充，并写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7 月 7 日拟制的两项指令中。突击瑟堡的计划，以及利用强大的装甲部队的猛烈进攻切断英美两军联系的意图，因无法付诸实施，未写入指令。希特勒对距离巴黎很近的位于奥恩河东岸的

英军登陆场感到极为不适，曾要求加强兵力一旦到达，须切断其翼侧与主力的联系。现在，这一要求也无声无息了。拥有三个完整装甲师的第 15 和第 19 集团军，也一直没有投入诺曼底战场。对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曾多次恳切提出建议，但直到 7 月中旬仍一无所获。其原因，除了希特勒本人的犹豫不决之外，西线总司令的报告，也越来越激起最高统帅对盟军在海峡和地中海地区可能实施第二次登陆的关注。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也只是“估计”沿海一线可能受到“削弱”，但诺曼底也不能从其他战线得到可观的兵力兵器。鉴于这些问题，所以多次提出的关于将装甲师从前线抽出来，组成预备队的设想，终未成行。

在大本营的人们正忙于落实刚刚结束的形势讨论会作出的决定的时候，西线总司令似乎对会议结果并不满意，决定再次采用他自己原来提出的以机动作战抵御盟军登陆的设想。他刚一回到法国，便根据西线装甲集群司令盖尔·冯·施韦彭堡将军对形势的判断，建议实施他那个还刚刚被希特勒指责为“决不允计实施的”行动。盖尔在判断里说，只有通过“富有弹性的作战”才能“至少暂时赢得主动性”。如果继续在“固守防御的基础上，实施修修补补的战术”，只会把全部主动权拱手交给敌人。隆美尔元帅赞同这种公然反对希特勒基本原则的做法。

西线总司令的提议，在大本营里，——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引起极大的反响和不安。“按照常规”，驻在施特鲁布兵营的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首先收到了电文。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使“高层领导”的视线从战术的纠缠中，转移到战局总体上来的机会。他们在向约德尔呈送这份报告时，还补充写道：正如西线总司令在他的建议中指出的那样，“经过理智的观察”应放弃“在诺曼底实施决战”的企图，从法国撤军，迅速占领“西方壁垒”这条最短、最坚固的防线。

如果这两位西线指挥官在贝希特斯加登当面向希特勒提出这些建议，会立即遭到希特勒无条件的拒绝。现在，希特勒感到他的指挥受到了别人的无理奚落，因而他在否定这些建议时，特别引据论证，以佐证他的观点：

在西线空旷的战场上实施机动和作战，在盟军绝对空中优势的威胁下，势必使部队的防御能力丧夫殆尽；

步兵师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远距离行军机动；

由于离海岸线越来越远，从陆地向英国发射火箭的可能性将会消失。

西线总司令的建议除了遭到断然否定外，盖尔将军作为“主谋”，也被解职，就连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也难以幸免。当他来到贝希特斯加登时，凯特尔对他说，他看上去需要休息，最好是长期休假。7 月 7 日，因车祸受伤，现已康复的冯·克卢格元帅取代了龙德施泰特的职位。前一段时间大本营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他一般都去参加，已经熟悉各种意见。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位总司令上任不到 6 周，就以自杀逃脱了希特勒的魔掌。

对于指挥参谋部对西线总司令的建议所作的评注，尽管约德尔大将在几周前同邓尼茨交换意见时就已经不谋而合，但在希特勒面前，他却只字未提。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其书面报告中，还再次提出另一种抉择，即“甘冒风险，孤注一掷，投入最后的兵力”，以扭转诺曼底的形势，但这一建议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在报告中指出，与其陷入一种毫无成功希望的境地，还不如依靠短缺的兵力兵器，不顾惨重损失，作最后一拼。

7 月 9 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驻扎数月之久的大本营，提前搬回“狼穴”’。

数百名工人正为把第 1 号宿营地内轻型的防弹室加固改造成巨大的混凝土堡分几班忙碌着。以往小心翼翼维持的宁静和女全，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喧嚣喝闹声所替代。希特勒对于搬迁已急不可待。因为，他觉得，中央集团军群的崩溃，以及对其友邻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后果，都急需由他对东线指挥亲自施加持继不断的和近距离的影响。然而，就在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数月里，除了经常把远在前线的总司令们召来之外，负责东线指挥的陆军总参谋部和指挥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们，也只是偶尔出入这里。在此期间，陆军参谋部的全体人员都驻在安格堡，况且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大将因长期患病来能工作①。

德国大本营迁回东普鲁士的战地宿营地，尤如 1941 年那样，离前线近在咫尺。如果说 3 年前，大本营在这里指挥着德军势如破竹地向东方挺进，那么今天，主要的是在这个省的边界地区收容整编溃败下来的师团和散兵游勇。此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这些日子的紧迫任务是保卫帝国的边境，这在这场战争中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其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构筑“东普鲁士阵地”打好基础。主要工作是将这个省不适于防御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为此，必须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对在战事扩展到德国境内时的权力，重新进行划分。后备军以及海、空军和党卫队与之相当的机构，要确保稍有作战能力的分队、学校以及其他单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实施动员。所有这些命令的共同出发点是，由于东普鲁士受到了直接威胁。不久，这些命令的原则也应用到其他边境省份，甚至于边境以外的省份，对这些地方——例如南蒂罗尔和弗里奥尔，希特勒始终想把它们并入“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在构筑阵地的工作中，”纳粹省党部头日”四处指手划脚，成了“工头”。他们以党的理论的灌输者自居，因此也有权从人民的各个阶层中征集劳动力。国防军的地方勤务机构的人员只能以专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这一工作①。人们对希特勒发布的这些违背军事需要的命令，不断提出指摘，但都徒劳无益。相反，长期以来充当“保卫帝国特派员”的角色的“省党部头目”，在保卫帝国的过程中越来越要求占据领导地位。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7 月 17 日，大本营得到一个大感意外的消息，隆美尔元帅在诺曼底躲避敌军空袭时，身负重伤。他退出了西线的指挥，但没有任命新的指挥官来接替他的职务。冯·克卢格元帅除了担任西线总司令之外，在隆美尔负伤后，还兼任了 B 集团军群司令，搬进了隆美尔迄今的驻地拉罗什吉永宫。他在诺曼底实施指挥时的第一个助手，是 B 集团军群参谋长，当时的施派达尔中将。

德国国防军的防线和指挥，在盟军登陆后遭受了种种打击和经受恐惧之后，经历了 7 月 20 日形势讨论会上爆炸的人，起初还认为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局。人们逃命，到处满目疮痍，剩下的只有伤员的呻吟、刺鼻的黑烟和随风飘散的地图残片和纸张。有的踉踉跄跄挣扎起来，想夺窗逃生，有人赶忙跑去救护同事。首先需要急救的是勃兰特上校，他是一位众口称赞的总参谋部军官，战前是世界有名的赛马运动员，他的一条腿被炸碎了，他挣扎着，试图扶着窗子站起来，逃出这个令人胆寒的地方。大多数人都聚集在临时房屋前，个个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先挨炸的那个人，由凯特尔搀扶着，走进他那间临时小屋，他似乎没有受伤，只是他那条黑裤子从上到下撕裂了长长的一条大口子①。

作者不顾党卫队哨兵的警告，再次闯进会议室，冒着随时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尽一切可能去抢求那些宝贵的文件。他只觉得一阵目眩，嗡的一声，

失去知觉。作者的司机和传令兵即使在此时，也没有忘记德国军人的那种特有的忠诚②在他们的帮助下，作者通过路障、双重哨卡和种种充满怀疑的盘问，终于离开“宿营地”，被送往医院。

由于大本营需要重建，因此暂时迁到附一座名叫“格利茨”的乡村别墅中，此时，大本营的人们似乎才从睡梦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谈起所发生的事情。起初人们并没有问“为什么”，更多的是出于愤慨，再次到出事地点，看一看这场由希特勒的军事“指挥”带给国防军、人民和国家的灾难。那么谁是凶手？从何而来？也许费尔吉贝尔将军说的对，他在离开第Ⅰ号宿营地时，大声对作者说：“大本营离前线这么近，怎么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是特务混进了建筑工人中？爆炸之后，再也没见到施陶芬贝格伯爵的踪影，可是人们一直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队伍中寻找凶手。时至今日，人们还仍然记得那难以忘却的场面；施陶芬贝格在“形势讨论会”开始后不久便走了进来，他托着因战争而至残的身躯——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又令人肃然起敬。凯特尔把他介绍给希特勒，希特勒以惯有的考察眼光打量了他一下，无声地表示欢迎。在形势讨论会上，人们习以为常地出出进进，而施陶芬贝格肯定是在爆炸之前就离开了现场。至此，人们再也没有往下想。

当瓦利蒙特于18时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从参谋部的军官那里得知一些在此次事件背景更大范围内与此有关的传闻，使他觉得有必要到第Ⅰ号宿营地进一步了解情况。在那里他首先找到了凯特尔元帅。凯特尔情绪激动地对他讲述了所发生的事情，并委托他立即通过电话，向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的所有司令官们通报事件的真实经过。陆军总参谋部也应以同样方式向东线说明事件经过。当作者遵照命令，在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战地木板房里，正与陆军组织处长施蒂夫少将通话的时候，约德尔突然出现了，他头上缠着绷带，凶狠的问道：“您在跟谁讲话？”瓦利蒙特赶忙一闪，才没有被他的上司夺走话筒。从此以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直没有消除对自己的副手参与反希特勒阴谋的怀疑。

当天晚上约德尔专程赶到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对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作了一次讲话，要求军官们对国防军最高统帅尽到新的、崇高的义务。军官们就象士兵一样，默默地听着他演讲。与会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完全赞同这次事件，还有少数人持遣责态度，而大多数人则在内心里希望在德国陷入混乱之前，由别人接替希特勒的领导，从而最终结束这场战争。然而，这种想法无意识地与另外一些人的一种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些人认为应当将以希特勒为人民和国防军强有力的统一化身摧毁，尽量使战争不致于在一片惊恐中结束。然而，此时此地，军官们并没把自己的各种考虑和盘托出。除了在极少数知已当中倾吐真言外，每个人在上级和下级面前都不多说一句话。一段时间之后，当人们得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组织处长迈斯纳上校——一位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是谋叛者时，都为之愕然。在他被处以绞刑一事上，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助他一臂之力。

特别令人作呕的一幕发生在此后第二天或第三天的形势讨论会上，会上，戈林这个“军衔最高的军官”与凯特尔一起，在昏暗的“狼穴”里，向希特勒当面表示“国防军各军种的愿望和要求”，希望在全体军人中推行“德国礼节”①。戈林把此事标榜为“对元首的忠贞不渝，以及国防军与党亲密无间的标志”。希特勒接受了这项请求。在场的人沉默不语。

爆炸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作者也被列入被检查之列——在会议室的入

口处，手提包要经党卫队哨兵的检查。从第二天起，连提包也不准拿，地图和文件只能拿在手里，尽管如此，在希特勒到达之前，每一步都要受到监视。

在 7 月 20 日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现象过后，战争、前线及其士兵又再次需要指挥参谋部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很晚以后，人们才知道发生此次事件的超出军事范畴之外的动机，看到了这场反对暴君及其罪行起义的政治意义。

7 月 20 日以后，在西线，来自诺曼底的威胁日益明显。在此情况下，西线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形势作了如下分析："在诺曼底，敌人……向南……占领的地盘越多……实施第二次登陆……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他们的共同催促下，希特勒终于准备将盟军登陆 6 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西线其他海岸线后方无所事事的一部分预备队派往诺曼底。为此，他允许 2 个装甲师和 4 个步兵师从海峡沿岸和比斯开湾沿岸向这里调动。但是，希特勒拒绝将地中海的第 19 集团军调过来。

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忙于全面了解德国陆军全部兵力状况——其中包括东线兵力同时也把新组建的部队计算在内。对于新组建的部队，后备军司令弗罗姆大将——7 月 20 日后立即由希姆莱取代——在最近大本营的会议上已作了汇报。7 月 23 日，形势的发展迫使约德尔不得不与希特勒商讨扩建西线后方阵地的问题。然而，这也只是构筑的准备阶段，即依托于索姆河，马恩河和孚日山，在法国中部构筑一道新的"强大防线"，对这一带，西线总司令部已于 1943 年晚就作过粗略勘察。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早在 7 月初就向约德尔提出过要在广大地城及时将部队撤到西方壁垒的强大防御区域的建议。但除了其中构筑阵地的建议外，其余都没有被采纳。希特勒委任他特别信任的基钦格尔航空兵上将为阵地建筑的特派员，同时还任命他为驻法司令官，接替不幸遇难的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的职务。

在此期间，约德尔的指挥参谋部里，人们仍有一种紧迫感。他们觉得，从希特勒那里争取到的措施，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都显得"太少了"和"太晚了"。7 月 28 日，美国向诺曼底西部发起了进攻，指挥参谋部的人们以此为契机，再次提起月初时就曾提出过的建议。他们提交了一份题为"对在敌军实施突破情况下作战指挥的几点考虑"的备忘录，但要改变希特勒顽固至极的思想是极端困难的。在这件事情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由于和平时期形成的工作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他有一个习惯，即每天清早都亲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通话，详细描述当前的态势。他自然也只能得到对方对自己观点和建议的可靠的支持，并不奢望立即得到答复。因为在这个时候，除非有最紧急的事情，才能在 11 点前找到希特勒和同他在一起的约德尔。而在作出决定前，还要经过无休止的议论，所以不到下午是无法作出任何决定的。德国领率构的办事拖沓和事必躬亲，在这件事上暴露的再彻底不过了①。

直到 7 月 30 日 21 时，大本营才获悉，争夺法国阿夫朗什狭长地带的战斗已经打响，这是阻止美军向法国深远纵深实施突破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时，约德尔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向希特勒提出了他的指挥参谋部经过"考虑"拟制的、并谨慎地将从法国撤退的字眼称之为"可能从海岸线退却"的命令草稿——他们为从法国撤退选用了一个谨慎的字眼。象往常一样，希特勒接过草稿，并没有认真地看一看，然而其后果也将如同往常一样，不堪设想。

直到第二天下午即 7 月 31 日,形势讨论会之后,约德尔才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 元首对可能在法国撤退命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现在可以证明，他认为发布这个命令是有必要的。16 时 15 分，与布卢门特里特（西线总参谋部参谋长）通话，含蓄地通知等待这个命令，但要从现在起做些必要的内部准备工作，并开始考虑些问题…… ”自约德尔提交这个命令草稿后，又延宕了整整 48 小时，而与此同时，美军在阿弗朗什的突破已大功告成。仅从大本营收到的情报中还不能对此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阿弗朗什狭长地带是否已落入美军之手。因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认为第二天动身飞往诺曼底视察之前，有必要仔细熟悉一下最高统帅的下一步计划。截止目前，只有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联络官曾在前线作过短时间逗留，瓦利蒙特曾多次请求，亲自了解一下西线的情况，但每次都遭到约德尔的拒绝。起初，约德尔以希特勒已与西线两位总司令进行过两次谈话为由，尔后又以冯 · 克卢格元帅对最高统帅的指挥意图了如指掌为借口，阻止瓦利蒙特去西线。后来，当西线不断恶化的局势使约德尔种种理论不攻自破时，7 月 20 日的事件又一次阻碍了瓦利蒙特的西行计划。此次西行，医生不允许他乘坐飞机，因为爆炸后使他的大脑和耳朵留下了后遗症。最后，这一障碍也终于被克服了，限定飞机必须在 1000 公尺以下飞行。

7 月 31 日下午，瓦利蒙特在向约德尔告辞时所提出的问题，都未能得到明确答复。但是他坚持认为，作为大本营的使者，在任何场合下都有权对西线总司令部发表意见，并回答他们的问题。由于他的一再坚持，7 月 31 日深夜，希特勒亲自接见他，并向他作口头指示，这在 5 年战争中从未有的事情。象往常一样，希特勒很快接过话题，对整个前线形势作了大而化之的判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氏认为，他的这番侮阔天空的议论没有一点新意，只不过是为了使他在与四线军官会面时，措辞更加“ 规范化 ”罢了，在谈到诺曼底态势的时候，希特勒对那里危在旦夕的局面视而不见，只是一味坚持他那条数月来无法贯彻的方针：“ 必须……将敌人紧紧包围在沿海一带……使其付出巨大代价，把他们拖得精疲力尽，最后将其彻底歼灭。 ”至于在西线作战地域纵深应预先采取哪些措施，那就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事了。

这次谈话只涉及到这些问题。接着，在第二天晚上的谈话中，还谈到了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组建“ 小型作战参谋部 ”，以取代西线总司令部内的“ 小型作战参谋部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参谋部内又有参谋部的局面，而两者所担负的任务又是一样的。

如果人们能够理智地观察问题，就会确信西线总司令 8 月 1 日的报告，即敌人正突入法国的广阔地域。尽管形势极端危急，在“ 中午形势讨论会 ”上，希特勒仍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 请告诉冯 · 克卢格元帅，让他的两只眼睛向前看，盯住敌人，而不要总向后瞥“ 看来，这话肯定是对着冯 · 克卢格的报告的。他在报告中建议，只有“ 彻底从其他防线撤退 ”尚能阻止敌人突贯。希特勒的这一番话只能给德国领率机构，首先是希特勒自己打了一剂强心针，使他们坚信诺曼底的战争照此打下去，仍能坚持到某个时候。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瓦利蒙特飞离东普鲁士，陪同他前往的只有他的传令宫，预备役上尉海因里希，冯 · 佩尔庞舍尔伯爵，他不仅人品出众，而且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几小时后，约德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17 时，元首让我看了卡尔腾布龙纳写的关于霍法克尔中尉根据与克（卢格）、隆（美

尔）的报告。（大意是说他们是 7 日 20 日事件的知情者）。

元首在挑选新的西线总司令。隆（美尔）康复后受到询问，然后被解职，但没有逮捕。

元首询问我对瓦（利蒙特？）的看法……

元首对派瓦利（蒙特）去西线顾虑重重。我要求亲自前往，元首不愿意这样做。由于我提出异议，他决定不召回瓦（利蒙特），让他继续在前线巡视。晚上，我又与元首在泰根塞进行了谈话①。

由于作者不了解这些内情，因此当他在慕尼黑机场刚一降落，就被叫去接约德尔的电话，使作者大感诧异。在电话电，约德尔要求他在与西线高级军官的接触中，要注意“探听有关 7 月 20 日事件的情报。”这对作者来说，不但难以理解，而且也与他的职务和任务不相符。直到 1945 年 5 月，约德尔和瓦利蒙特在监狱里再见时，约德尔笑着，但仍带威胁的口吻说，希特勒于当天下午，就要求立即召回瓦利蒙特，并补充说：“瓦利蒙特飞往西线，是想与克卢格商量如何再次陪害我。”约德尔解释说，尽管他的副手以前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密切，而陆军总参谋部又对这次“阴谋”负有主要责任，但这不能构成怀疑他的理由。但同时他保证尽可能监视瓦利蒙特在旅途中的行踪。经他这么一说，9 个月的疑团——在瓦利蒙特在西线逗留期间，为什么约德尔一反常态，经常在电话里催他返回大本营——才终于解开了。

从突破阿弗朗什到诺曼底战斗的结束

当瓦利蒙特在最紧要的关头来到诺曼底时，恰遇个人的一个巧合：瓦利蒙特于 8 月 2 日清晨到达施特拉斯堡，当他由飞机改乘汽车时，他突然意识到，30 年前的此时此地，他作为炮兵少尉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他年仅 19，这里便是他服役的第一所军营所在地。

下午，当瓦利蒙特在巴黎的圣·日耳曼与西线总司令会面，以及晚上在拉罗什吉永与克卢格及其司令部人员会面时，当时的态势和企图都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然而，8 月 3 日早晨，当西线总司令请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 7 点钟去见他时，情况突变：按照刚刚收到的大本营的命令，西线总司令应以强大兵力，以阿弗朗什东部地域，发动一次反突击，再次将海岸线连接起来，在诺曼底顶端重建一道封锁线。

对此，瓦利蒙特只能解释说，在他出发之前，没有接到任何新的指示，没有任何人对他暗示过这个计划；也可能这是参谋部为西线纵深地区的战斗所做的准备工作。象克卢格元帅在贝希特斯加登所知道的那种攻式防御的可能性，自 7 月底已不复存在了。不用说，这肯定是希特勒在没有作任何事先调查，指挥参谋部没有作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临时作出的决定，而且根据各种迹象来看，是前一天晚上刚刚作出的。“狼穴”的人们惟也不愿意铤而走险去阻止这道命令的下达，而瓦利蒙特立刻被这一反突击带来的希望所吸引。但是，他只希望利用这次反突击，将敌人的突破口暂时封团，从而至少使撤退成为现实。克卢格认为，这与他本人的想法十分接近。为了便于给下级指挥宫下达命令，在瓦利蒙特还在场的时候，西线总司令便立即与下级指挥官通话，为拟制命令搜集详细资料。

当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在前线渡过了漫长的一天，回到拉罗什吉永的时候，B 集团军的第一道反突击命令已经发出。各方面都似乎认为成功在望，怀疑和持有异议的人数不多。

瓦利蒙特乘车在前线做了巡视，到处能看到各级指挥官都急切地期待着这次反突击的胜利。在巴黎，他参加了克卢格与海军和空军指挥官的会商会，要海、空军竭尽全力来支持这项反突击计划，他还单独与空军第 3 航空队司令部和驻法军事司令官进行了会谈，最后他还拜访了在巴黎郊区养病的降美尔。在 8 月 7 日充满希望的莫尔坦地域反突击尚未打响之前，8 月 6 日下午，瓦利蒙特被约德尔召回东普鲁士。

他返回大本营以后获悉，这次进攻初战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盟军的“地毯式轰炸”下夭折了。此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还得知，在进攻发起的前一天晚上，希特勒与西线总司令只在进攻时间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然而，这并未改变克卢格的立场和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8 月 8 日下午早些时候，瓦利蒙特来到昏暗的地下室向希特勒汇报西线一行，当时只有约德尔在场。希特勒一言不发仅作欢迎，然后默默地听取瓦利蒙特讲述诺曼底地域战斗和机动的艰难状况。他讲述了敌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以及为取得反突击的胜利，各方的全力协助。他还概括地叙述了西线军官们对 7 月 20 日事件的反应和他的观察。他反映许多高级军官对“帝国领导人”莱的讲话表示愤概，斥责他在讲话中提出的这次谋杀是“集体犯罪”，特别是对提到有贵族称号的军官更为反感。听到这些，希特勒仍然沉默不语。直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谈到这次反突击的失

败，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归于“准备不充分”时，希特勒才用他那特有的刺耳声音发表了唯一的一句评论：“这次进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冯·克卢格元帅不愿意让它成功。”作者被允许离去；约德尔将军一言不发，只是在他的日已中写道：

“16 时 30 分瓦利蒙特汇报。”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回来以后还得知，6 日下午，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手下的陆军参谋部参谋长布勒将军，作为大本营的使者又被派到冯·克卢格那里去了。布勒将军的职务与军队指挥毫不相干。派他到那里去，只是为了在最后时刻敦促冯·克卢格进攻。他还了解到，8 月 17 日下午，进攻在莫尔坦取得初战胜利之后，希特勒又命令部队到达阿弗朗什海岸后，随即开始收复盟军占领的全部阵地！

国防军最高司令恪守这个完全不现实的目标，并接连不断地发布了一系列令人迷惑不解的命令。而这些命令又远远然后于战事的迅速发展。直到 8 月 19 日，诺曼底的陆军全部被包围在法莱斯附近的盆地中，并遭致命打击以后，这种无的放矢的指挥才告终结。如果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战时日志中所记载的那样，被合围的部队“有一大半”能突围出来，是“此次战局的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之一”，那么，这无比如何也不能减轻最高统帅由于死抱住不现实的目标不放，致使大批军队被歼，被俘的责任，同时也不能拿所谓崇高的战略目标来为这种牺牲作辩解。希特勒不久前作出的决定也丝毫未能改变失败的命运。他决定一方面从海峡沿岸抽调 6 个半师的兵力，派往诺曼底——太晚了！另一方面，将第一批 4 个大队的喷气武战斗机立即增援西线——这又太早了！更有甚者，空军想在 8 天之后，用多于此 3 倍的飞机，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冯·克卢格元帅已于 8 月 17 日被解职。希特勒除了怀疑他是 7 月 20 日谋杀事件的知情人以外，希特勒还认为他与敌军接触，是怀有投降目的。在 8 月 15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出人意料地表示了对很久没有在大本营露面的冯·克卢格的精疑。

他在之后不久对两位年轻将军作指示时，也提到了克卢格和隆美尔是 7 月 20 日事件的知情人。这次谈话是在大本营的“狼穴”里任命西线司令宫时提及的，在场的只有凯特尔。

第 46 号速记稿片断

1944 年 8 月 31 日，元首与韦斯特法尔中将和克雷布斯中将在“狼穴”里的谈话。

元首：您们知道吗，克卢格元帅已经自杀了。有人说假如他不自杀，也会很快被抓起来的，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他把参谋军官们都打发走了，但事情也并没有成功。当时，英美的侦察队正向前推进，根据情况来判断，那时他与敌人还没有建立联系。他把自己的儿子也派到合围圈里。英国人报道说，他们与一位德国将军有联系，充当联络人的那位军官已被逮捕。据说，由于他装病已从英国战俘营中出来了。但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他又被抓起来了。这个人是受了一些想改变历史命运的人的支使，他们想向英国人投降，尔后和英国人一起对付俄国人。这完全是白日作梦。他们是拱手交出德国在东部的领土，这简直是造孽！他们认为，必须放弃直至维斯瓦河以东的领土，可能的话还要到奥得河……甚至到易北河……8 月 15 日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天。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使他们的这个计划未能实施。只能由这个前

提出发，才能解释集团军群所采取的所有措施，否则就完全讲不通。

我还要告诉您们，第 7 集团军（指 B 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工作是不正常的。克雷布斯将军，如果您能从那里挑选出您认为完全值得信赖的人，并对他们提出全面清洗这个司令部的要求，那么这对您正常工作是有好处的。今人遗憾的是，隆美尔在成功时是一位极为伟大的、充满生气的指挥官，但是一旦出现一点微不足道的困难，他就成为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

他（隆美尔）在这种情形下，犯了一个军人所不应该犯的错误：不在军事上，而是在其他方面寻找出路。当他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就说全面崩溃即在眼前。可是时至今天，崩溃仍然没有发生。事实全盘否定了他的预言，证明我作的决定是正确的。那时，我决意把凯塞林留在那里，我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但又是军事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没有乐观主义，就不能指挥战争。在一定意义上讲，我认为隆美尔一个非常勇敢而机智的指挥官，但他缺乏耐力。这是所有人的看法。

凯特尔、完全是这样，这一点表现得越来越清楚了。……元首：我刚才说过，作出一个政治决断还为时尚早，时机不成熟。我相信，我有能力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对这一点，能在我一生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不会放过任何这样的机会。可是，在军事失利的艰难时刻，还希望在政治上找到干一番事业的有利时机，这自然也是幼稚、天真的。这种时刻只能在人们取得成功的时候才会出现。我的行动已经证明，我已竭尽全力去对付英国人。早在 1940 年的法国战局之后，我就向英国人伸出友谊之手，随即放弃了一切。我不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东西。1939 年 9 月 1 日我曾向英国人建议，或者说是重复了里宾特洛甫 1936 年向英国转达的建议，即与英国结盟，同时德国为大英帝国作出保证……完全反对这些建议的首先是丘吉尔，以及范西塔特周围的一群对德国怀有敌意的人，他们愿意打仗。时至如今他们已无法回头了。他们是自取灭亡。盟友之间也有出现摩擦的，也会导致破裂的。在世界历史上，联合总会要走到尽头的。只是需要耐心等待这一时机的到来。我的任务，特别是自从 1941 年以来的任务，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信心，一旦什么地方出现溃乱，就要不断寻找出路和解决办法，设法进行补救。

我可以这样说：今年，我们在东方曾经历过的这个巨大危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当莫德尔元帅到来的时候，事实上中央集团军群只有一个缺口。后来缺口多于战线，但最后战线终于又多于（缺口）……人们说，西线的师完全没有机动能力；他们没有德国的物资装备，他们——只有上帝才知道——是用什么武器装备起来的。还说我们派到东线的全都是正规师，派到西线只是教导师；说我们的装甲师首先满足了东线的需要后才派到西线；说如果我把党卫队第 9 和第 10 装甲师派到西线的话，事情就不会象今天这样。但是，人们疏忽了一点——我今天不得不说——他们是出于罪恶的目的，要在这里搞一场颠覆活动。在这场活动中，有的人异想天开，有的想联合英国人去打俄国人，第二种是舒伦堡派的，他们想联合俄国人去打英国人，第三种是最愚蠢的——他们想使双方都完蛋……真是太天真了！……

……继续战斗，直到德国人可以接受，直到后代的生活有和平的保障。然后我就结束战斗。因为，这场战争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桩愉快的事，这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得出来。5 年来，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没有看过一场戏，没有听一次音乐会，也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我仅仅为了一项任务而生活，那就是指挥作战。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作后盾，我们就不能赢

得这场战争。我要指责总参谋部，他们不是发扬这种钢铁般的意志，而是削弱从前线归来的军官们的意志。当总参谋部的军官到前线，他们又到处散布悲观情绪。当那些年轻的军官在法庭上被宣判时……那将是悲剧

……格尔克领导的总参谋部隶属下的一个处，工作井井有条，迄今还找不到象他这样能办事的人。而在其他处，如军需总监、组织处、谍报处等等，都在其处长们的怂恿下，参加了这一卑鄙的勾当。

这里发生的事，都是针对我的，如果真让它得逞，那时德国将是一场灾难。正因为它没有得逞，才使我们有机会从内部除掉这些毒瘤。但是我们在外交上受到了损失，因为这个事件使我们在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芬兰人和其他中立国家面前丢了脸。损害德国人民的是——当然现在已经……发生了，事情都公开了、真是核人听闻。德国人民一直保持着沉默，但是现在他们什么都说……我们在中部（东线）经历了可怕的事情，今天才慢慢搞清楚，是德国军官在与敌军对话，德国军官和将领向俄国投降，这是耻辱！但这一切都不能与西线发生的事情相比，这是闻所未闻的。我想，韦斯特法尔，您来的这个司令部（西线总司令部）是一个没有一点毛病的司令部。首先，龙德施泰特元帅是一个十分正直和清白的人。布卢门特拉特也没什么，本身也是清白的，我只是觉得他没有领导这样一个司令部的经验。他也曾由于那件事背上了包袱，但完全没有人指控他。凯特尔：在几周前，司令部唯一卷进去的是军需主任芬克上校，他是瓦洛纳一手培养起来的。

元首：我曾两次提升他（冯·克卢格元帅），给了他最高的奖赏。为了让他生活得舒适，我赠给了他大量的礼物。我还给了他一大笔可观的元帅补贴。但他的表现使我感到非常痛苦和失望。他是怎么卷进这个事件的，答案也许是悲剧性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卷进来了，也许他觉得没有出路了。他看到了许多军官被捕，他害怕有他的口供。他的侄子犯有严重的罪行，并在法庭上供认不讳。根据他的供词，弗赖斯勒审判长便立即中断了审理进行查证，并对元帅进行审讯，但这位元帅已不在人世了。弗赖斯勒当然也会说，这里也有界限，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德国国防军指挥的信任。这简直象一部印第安人的小说。

如果人们看看这帮人，施蒂夫等所有这些人，他们的水平是惊人的。以前，我解除了赫普纳大将的职务，当时不仅是因为他没有执行一道命令，而是因为他有些小才能。克卢格自己也确信，他必须离开他的职位。现在，我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在诉讼中，每个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小人。在场的人问，这些人怎么会成为军官的？！是啊，他们怎样能成为军官呢？我是从能挑选的人中，尽可能挑选最好的人。

您，克雷布斯，将领导的司令部肯定是一团糟的。对此，您心中必须有数。我现在只能对您说：尽快地实行清洗，并对莫德尔元帅……。

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在莱茵河畔打。在哪儿打，无关紧要，反正我们一定要战斗下去。就象弗里德里希大帝所说的那样，将该死的敌人拖垮，直至我们赢得和平、能保证德意志民族今后 50 年至 100 年有和平的生活。但这种和平绝不能象 1918 年的那样，第二次损害我们的尊严。当时人们保持了沉默，这一次绝不能沉默了。

命运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只是一瞬间的事，然后人们就完全从命运中解脱出来，有了宁静的生活和永久的和平……

我不想再谈论这件事了，我不想以此来给德国国防军脸上抹黑。如果人

们知道了克卢格元帅企图有计划地率领西线军队投降，那也许会在德国人民中引起精神上的崩溃，但不管怎么说，它已引起人们对陆军的蔑视。因此，我再也不说什么了。我们只告诉诸位将军们，他已经自杀了。人们以前所说的，全是道听途说，过去有人说，他以前……头部中了弹。实际他在等待英国的巡罗队……他们错过了机会。在一次空袭中，丢掉了他的……现在，他已躺在（那里），再不能向前了……

就目前资料看，对冯·克卢格元帅企图在西线投降这个含糊不清的指控，至今还没有多少客观根据，也未得到澄清。如果他有这种意图的诺，他就会象希特勒先前的观点那样，认为盟军登陆成功就意味失去战争，就不会另想办法。如果有谁象作者一样，因工作关系与这位元帅接触过的话，都会从他自杀前交给希特勒的、要求结束这场战争的信中，看到他清楚的观点和纯洁的品质。

接替克卢格的是莫德尔元帅，他既担任西线总司令又兼 B 集团军群司令。他在大本营接受了简短的指示后，来到西线，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实际上，这次人事变动导致了西线战场在最关键的时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但对希特勒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楚克卢格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以平息他对克卢格的报复怒火。

8 月 15 日，盟军突破了地中海沿岸防线，向法国南部大举进攻。照此下去，德军在西线的阵地必将全部丧失。因此，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不在的情况下，冯·布特拉尔将军在 8 月初的日子里，一直忙于研究在不得不放弃诺曼底以及法国中南部海岸线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下一步作战的问题。然而，约德尔只同意了扩建后方阵地的计划。继过去提过的建议，并根据由克莱泽尔中校领导的特别参谋部按希特勒要求进行的初步调查结果，指挥参谋部于 8 月 7 日，提交了一份命令草案，提出部队应立即从布列塔尼撤到西阿尔卑斯山，约德尔以种种理由否定了这份命令草案，认为它只适用于特殊情况。直到 8 月 13 日傍晚，当人们准确获悉盟军在地中海登陆的地点和时间以后,约德尔才准备上报他的指挥部于 8 月 9 日起草的第二份命令草案。正如约德尔原先所料，希特勒拒绝“向西线部队包括”第 19 集团军下达超越它们目前急于完成的任务范围以外的任何命令。”被迫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走同一条道路的西线总司令部，只好承担起这一“共同任务”歼灭阿朗松（诺曼底）周围的敌人，“采取一切措施防御”法国南部的海岸线，击退盟军新的登陆。

早在 8 月 15 日，就有消息说，德军在地中海沿岸的松散防御，已处于绝对劣势，无可救药，甚至很久以来那里就没有自己的飞机了。对此，希特勒只是干巴巴地指出，形势发展不利时，第 19 集团军应如何行动。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允许“非战斗部队及其所属机构”撤退，放弃“奥尔良——克勒蒙菲朗——蒙彼利埃一线。几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当天晚上，他又不得不对他的命令作进一步补充：“除了在土伦和马赛的部队外，G 集团军群退出战斗”，并与迪戎地区的南翼建立联系。

作者清楚的记得，在希特勒 1940 年取得辉煌胜利 4 年后的今天，当他被迫从法国撤退的时候，显得是何等沮丧。由于盟军登陆的成功，在西线的抵抗也无任何希望，此时希特勒对他过去坚持的登陆成功与否将决定战争胜负观点，再也只字不提了。同时，也不再提及他 1944 年提出的战略思想：粉碎敌军登陆后，重新赢得东线的主动权，最后将敌人击败。在他身边的人。也

没有一个去提醒他。8 月 19 日，也就是法莱斯被合围的一天，希特勒又象斯大林格勒失守后那样，以不要脸面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用谎言欺骗自己，又用谎言将国家和人民置于深渊。对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 8 月 19 日，元首首先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布勒将军和施佩尔……谈论西线形势……

尔后决定，如果敌军不是急速向前推进的话，将在 11 月份发起进攻。

在 1—2 个月之内，原则上必须有约 25 个师开往西线①…… ”

这就是“ 阿登攻势 ”的诞生之时。

第六部最后阶段（1944 年夏——1945 年 5 月）

第一章到 1944 年岁末——1945 年初

7 月 20 日事件后的大本营

关于战争最后阶段的介绍，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依据于个人在大本营的亲身经历，因为作者出于健康原因，于 1944 年 9 月初便开始休假，直至战争结束也未能康复而重新工作①。”您休息段时间吧！”这是瓦利蒙特在指挥参谋部工作 5 年之后向希特勒告别时，听到希特勒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句话，后来，他还收到了寄给他的为 7 月 20 日事件受伤者颁发的特别勋章。

造成瓦利篆特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原因，估计除了爆炸时遭受震荡外，在最后那几个星期里精神上所受的沉重负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这个时候，大本营里那全部能使前线和盟邦保持不断联系，并促使德国战争机器运转的支柱，似乎都已瘫塌了。

这时的希特勒，显然已是个病人，虽然 7 月 20 日事件对他的伤害很少，但也可以看出，他所受的震惊似乎加深了他那本性所具有的全部凶暴和邪恶，且更加流露于外。他弓着身子，拖着脚步来到会议室。只有与他十分亲近的人，才能从他那呆滞的眼睛里寻到一丝问候的目光。他弯着腰，缩着脖子，坐在为他搬来的一把椅子里。一只颤抖的手撑在地图桌上。不知道因为一件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使他突然大发雷霆，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寻衅“挑刺儿”。

希特勒没有一天不在对 7 月 20 日事件的肇事者和知情人发泄着愤恨。每天都会有一份新的嫌疑者名单。这些被怀疑的人有的是士兵，有的是年轻有为的总参谋部军官，等待着他们的几乎都是绞刑架。在形势讨论会上，人们私下纷纷议论着第一批被绞死人的惨象，作者也不想过多地向读存描述了。希特勒为了不使人对自己产生误解，将那些也许是没有被发现，或者根本就没有参与此事件的人，召集到大本营来，针对前线的全面溃败向他们不断发出警告：“如果有推和我不谈我们的胜利，只谈和平，那他就要掉脑袋。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在什么地位上，都是如此。”然而，当人们还在按照他的话进行这种大搜捕时，他自己却把说过的关于战争失利的话完全抛在脑后了。尽管他在 8 月底还刚刚与德军指挥官格斯腾贝格将军又一次谈到如果失去罗马尼亚油旧的问题。当时，希特勒竟厚着脸皮声称，7 月 20 日是“天意”保护了他。当初，当敌国政治家们希望出现所谓“奇迹”的时候，希特勒曾把他们大大嘲笑了一番；如今，他自己也在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使战争发生新的转机。

在军事指挥上，尽管希特勒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并由于不断追究政治仇敌转移了注意力，然而，他独断专行的意志和决心不仅不减当年，而且胜似往昔。如果说，这种对“将军们”不断增长的不信任，对他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人们就无法摆脱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印象：他所任命的军事顾问们，不能以理智的军事目光来指挥战争，而只能任凭那种不断加码的效忠因素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便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他的命令式法则来实现他那充满灾难的指挥，使所有指挥官，包括那些高级指挥官都无条件地执行他的命令。前沿阵地上的士官和士兵不能为一个命令的正确与否和结果如何而同连长争辩；同样，对于国防军最高司令的决定，集团军群或集团军司令们，也不能与国防军最高司令共同分担责任。当他们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时，国防军最高司令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充满凶狠专横目光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希特勒面前是

唯唯诺诺，而在背后并不是都句句照办。然而，由于他的地位所迫，却显出异乎寻常的恭顺。他是从国防军中清除 7 月 20 日事件可疑份子的领导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完全没有遭到反对的危险，但他仍准备将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军事管制改为由“省党部头目”进行行政管理。因为，希特勒正想以这种方式将他厌恶的冯·法尔肯豪森将军调离布鲁塞尔——法尔肯豪森男爵因同比刊时王室关系甚密而受到怀疑。9 月初，当希特勒递给凯特尔一封装备部长施佩尔写来的信时，凯特尔只是稍有震动。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火药和爆破器材工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破坏，战争必须在短期内停止。凯特尔一言不发，他以一种介乎于恼怒而又隐而不发的表情一把这封信递给了坐在他身边的作者看。但出自难以启齿的原因，他没有使用在这种场合下他经常使用的一句话：“瓦利蒙特将军先生，您看呢？”…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以他的学识和素质，完全能够预见到这场战争的最后失败，或者起码可以用他的建议和行动促成战争的结束，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形势讨论会上，他反而以一种并不亚于希特勒的威胁口吻在希特勒面前慷慨陈词道：“现在好了，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给所有‘胆小鬼’铺平了条寻找政治出路的道路。”①然而，他并没有预料到，将来签署投降书的或许就是他。对于陆军总参谋部新任参谋长提出的对全部陆军总参谋部军官进行统一监督的建议，约德尔给予回绝，同时还答复说：“总参谋部已等于解散。”这表明约德尔对陆军总参谋部象过去对待他自己的指挥参谋部一样，采取蔑视的态度。

自 7 月 20 日后，古德里安大将接任了陆军总参谋长这一职务，他多年的雄心也以此得到了满足。不过按照官方的说法，对他只是“业务性委任”，因为希特勒本来想让布勒将军接替蔡茨勒的，只是因为布勒将军在爆炸中受伤，何时能够赴任还不得而知，因此这份官职才落到古德里安的头上。作者曾从凯特尔那里听说，对于古德里安的任命，希特勒曾举棋不定，其原因大概是希特勒想起了古德里安过去曾努力试图改组国防军的“领率机构”；甚至希特勒也许会记起他在 1943 年 11 月那次走访约德尔时听到的事——约德尔说，古德里安曾鼓动他去说服希特勒，让他放弃最高统帅权，但约德尔不动声色，并干净利索地加以拒绝。

古德里安同国防平指挥参谋部不和，并非始于此时。早在一年前，他曾同戈培尔进行过一次长谈。在戈培尔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他（古德里安）对国防军统帅部的惰性很不满，说在那里找不到一个象样的领导人物。”这位新任陆军总参谋长也以非同寻常的坦率表示，他极不赞成希特勒严禁任何一个高级参谋部的军官到前线一展本领的作法。7 月 20 日后不久，当豪辛格的接班人从拉斯滕堡战地医院出院，被盖世太保逮捕后，古德里安委任了在总参谋部和在装甲部队中久经考验的文克将军，以及冯·博宁上校为他的助手。

尽管帝国的国界随着东线西线不断溃败而缩小，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仍不过是希特勒在东线战场上的参谋。他在最困难的形势下，以其充沛的精力，开始了他的新的工作，但他并不象当初蔡茨勒那样，努力为陆军总参谋部争取其他战场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他的任务所致，他认为，其他战场同东线战场相比是次要的。在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他经常以激烈的言词来表达他的这一观点。而这种观点与私人矛盾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久，人们就清楚地看出，在严峻的战争形势压力下，虽然更换了陆军

总参谋长都改变不了处在国防军最上层的两个参谋部之间的关系。这样，在直接参与指挥的高级军官内，在反对继续进行已失去的战争的问题上，就缺少一个组成共同战线或反对派的思想基础。

海军和空军仍在各种战役问题上各行其是。虽然这两个军种已不能对战争进程起什么决定性影响——尽管也有个别辉煌战例，并在努力研制新型潜艇和歼击敌机——但是他们还在徒劳地搞什么统一指挥。比如，尽管希特勒在 7 月 29 日，即正当诺曼底作战处于最紧张的时候说过：必须“将空军、海军和经济部门每一辆现代化车辆——指载重汽车——调拨给（陆军）运输队”。但就在第二天，海军总司令仍对国防军统帅部颁发的命令施加了有限的影响。两个月后，古德里安便忙于从空军调拨车辆，以补充装甲部队，以至于希特勒不得不出面过向此事，于是便发生了 1944 年 9 月 1 日在形势讨论会上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与当时战争形势极不协调，希特勒和凯特尔的言之无物，故弄玄虚，给人们留下一个荒唐可笑的印象。

古德里安：只需要得到帝国元帅的批准。

元首：我马上批准。可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帝国防御总参谋部。

还有一个其他国家都嫉妒我们的机构——国防军统帅部。这些都只因为总参谋部不愿意面向历史，而没有为众人所知。凯特尔：（以惯用的一种提高的腔调）①：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元首：（接受了凯特尔的观点）：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我们为了建立这个机构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之后……

古德里安：第 3 航空队有很多载重汽车。

托马勒（运输部队监察官）：应该调出来。

克赖佩（空军总参谋长）：我们的车辆因为支援陆军而失去很多……（拒绝抽调）

元首：然而我深信，空军尽管有自己的运载任务，但在载重汽车方面，相对来说比起陆军要好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我们谈的决不是这些——我们无须进行这种无谓的争论，而是……（未作任何决定）。

1944 年春，适当合并和精减国防军机构的新的尝试，仍没有收到什么成效。此时，希特勒仍然不敢向海、空军下达违反其总司令们意志的命令；而对于凯特尔来说，只要照希特勒的态度行事，而不暴露自己更好的见解，只要能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他就心满意足了。

各条战线和联盟的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已名存实亡。受伤和疾病，沉默与失职，尔虞我诈，相互猜疑，更多的是希特勒的复仇私欲，使大本营几乎成为死水一潭，无生无气。

日本早已不值得一提了。8 月初，土耳其同帝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在东线，自 8 月 20 日以来，当法莱斯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的时候，在黑海和喀乐巴阡山之间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两个德国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在占明显优势的俄军猛烈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在俄国大举进攻下，罗马尼业免去了安东内斯库元帅的职务，公开表示脱离德国，并在希特勒反措施的刺激下，于 8 月 25 日对德宣战。随着布加勒斯特的丢失，德国也丧失了普洛耶什蒂油田。同时，德国国内的燃料工业也被盟军的空军一一摧毁。8 月 24 日，保加利亚开始与盟军举行停战谈判。并要求撤走德国军事代表团及其全部德国部队，保加利业的背离已近在眼前。匈牙利迫于德国的压力，还继续站在德国一方。斯洛伐克不断爆发起义。9 月初，芬兰宜布解除同德国的军事同盟，并准备单方面同苏联媾和。

在意大利，很晚才占领的亚平宁阵地，由于左翼被突破，陷人全线被突破的危险。撤离地中海沿海地域的第 18 集团军和西线其他部队，在敌军装甲部队的不断冲击下，已处于混乱状态。希特勒下达的关于坚守塞纳河前方阵地，重新占领巴黎的命令。以及在法国中部开辟战场的企图，均随着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而成为泡影，或者干脆被莫德尔抛在一边。8 月 25 日，盟军进入巴黎。安特卫普城和港口——斯凯尔德河河口除外——于 9 月 4 日完好无损地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在海战中，尽管潜艇损失惨重，但战果微乎其微。恐怖性的空袭，使越来越多的德国城市沦为瓦砾。军事工业的生产尽管到 1944 年底，还保持在很高水平上，但已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交通近瘫痪。

德国领率机构的指挥已经失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试图利用形势的压力，促成一系列决议的出笼；而希特勒却似乎还认为可以挖掘潜力，用战术措施补救败局。此时，他已失去理智，梦想着无法实现的目标，顽固地死守着他的原则不放，谁也不能说服他自动放弃战争，或者放弃眼前的计划。也许是个别战场的战果遮住了他的眼睛。

7 月 31 日夜里，希特勒在同即将启程前往诺曼底的作者谈话时，对东南欧的形势作了如下阐述：

“最使我担心的当然是巴尔干。我敢说，如果土耳其能象芬兰人那样坚信我们能够控制局势，他们就会袖手旁观。所有这些人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两个凳子都扑空而坐在地板上。这是他们所担心的。如果我们真能进行一次关键性的抗击，其至打一胜仗，使他们重新相信我们可以坚持下去，现在的撤退只不过是缩短战线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使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种观望态度……土耳其人不会由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而高兴，也不会由于英国佬的插手捣乱而幸灾乐祸。

很明显，他们自然会逐渐从保加利亚身上想到：如果德国真的完蛋了，将来怎么办“那样大的国家都办不到的事，我们小国就更无能为力了。

依我看，东线的稳定，也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最终要取决于巴尔干各个小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还有土耳其的态度。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些稳定局面的保障措施。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要保住匈牙利的稳定（……这一点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

其次——也同样重要——就是保加利亚的态度。如果没有保加利亚，巴尔干地区的稳定以及我们在希腊等国的矿产资源将化为乌有……同时，英国人每一次在巴尔干的登陆企图，更确切说在伊斯特拉半岛或达尔马提亚群岛的登陆企图，都是非常危险的。

英国人的每一次登陆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我认为，如果他们以重兵实施登陆，就难以长时间进行抵御。这是这里的唯一问题。我相信最终的问题是，盟军在这里的行动能不能真正达成一致意见。

我不认为俄国人会把巴尔干让给英国人……英国人最多会利用苏俄与盟军的矛盾，自己独占爱琴海诸岛。从理论上，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们是不会联合行动的。”

当铁托进入塞尔维亚南部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份子领袖奈迪奇和米哈附洛维奇，建议德军协同塞尔维亚共同对付内部的共产主义。为此，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建议下，于 8 月 22 日，召集东线德军司令官们来大本营议事，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时，希特勒的态度同他上面所说的完全不同了。他没有对这个建议表态。而是向司令官们发表了一大篇讲话，阐述“大塞尔维亚主义”“这个巴尔干半岛上唯一人种的危险性”。在俄军已渡过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正向多瑙河平原开进，从而完全切断了东南沿海防线与背后的联系的情况下，希特勒却大谈什么德国“必须……与一切大塞尔维亚主义计划作坚决的斗争”，“决不允许出现塞尔维亚军队，哪怕让一定程度的共产主义危险存在，也比出现一支塞尔维亚军队要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谈话中只字未提罗马尼亚是否可能改变立场的问题。德国的政治领导显然没有看到事情的实质。他们简单地以为，红军的逼近会激起强大的反俄力量，进行自卫。此外，陆军总参谋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之间，在战场负责区域上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东南欧战场的司令们也很少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同其他战场一样，按照希特勒的保密原则，同其友邻没有直接联系，只是每周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得到一份通报一般情况的所谓“简报”。

在 8 月 22 日的会议上，只谈到东南线总司令部的近邻保加利亚可能将他们驻在塞尔维亚的占领军撤回。希特勒不顾兵力异常紧张状况，打算派德军，其中包括军事学校的土官生去代替他们。4 天后，即 8 月 26 日，德国公使从索非亚回来，向德军大本营报告说，保加利亚政府象约德尔在日记中所以载的那样，“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已毫无指望”。但这仅使希特勒同意了“准备从科孚——埃奥尼纳——卡拉夫里塔奥林匹斯山一线南部……撤回全部部队”。

同时，为防备保加利亚的背叛，还必须“占领保加利亚一南斯拉夫旧边界……”，开辟一条新的防线。为此，希特勒下令火速从希腊调回两个师，从克里特岛调回 1 个营。

这些仍未超出军事范畴的漏洞百出的措施，如同希特勒当年在意大利下达的企图阻止联盟崩溃的计划和命令一样，仍然是一种冒险。在一种几乎动摇所有战场并导致在大范围内出现政治问题的危机中，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以一种仇恨和复仇的心理、纠集在巴尔干残存的飞机，企图轰炸无设防的布加勒斯特，打算炸毁视为敌人心脏的国王宫殿。至于普洛耶什蒂油田，

他想用尚在南斯拉夫实施剿匪作战的唯一一个党卫队伞兵营，阻止红军的西进。但后来一直未听到这个营的消息，也许在飞行途中就已被盟军歼灭了。按照 8 月 26 日的国防军统帅命令，罗马尼亚军队将有一部分部队编入德国国防军，另一部分同意其“政府背叛联盟”的部队，将作为战俘对待。这是对几天前出现的形势的错误判断，但当时罗马尼亚尚未公布向德国宣战的决定。在保加利亚，准备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通过一次突围行动，把德国在战争期间提供给保加利亚的全部装甲战斗车辆撤回。

保加利亚于 9 月 8 日向它迄今的盟友宣战，从而使在希腊的德军“有被切断与后方联系的危险”。6 天后，约德尔以一种显然十分轻松的语调在他日记中写道：

> “元首命令，将所有兵力从爱琴诸岛撤回……
>
> 接着，他又补充写道：
>
> “在政治上，希望在我们撤离的所有地方，煽动和挑起共产主义同民族力量之间的争斗。

这后一段话说明，希特勒直到最后还希望他的军事撤离能换得政治利益。如果说他曾一度认为，由于英国人同俄国在政治上的矛盾，将有利于德军在希腊悄悄地呆下去，那么现在他却想在德军占领的区域里，煽起所有人之间的对立厮杀，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这种混乱中可以断续利用希腊北部的铬矿和冶炼厂。为此他命令空军的 5 千名人员继续留守在那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0 月 3 日下达“从希腊、阿尔巴纪亚南部和马其顿南部撤退的命令”，以及 11 月 2 日撤退完毕为止。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在克里特岛尚有 1.6 万人，在罗德岛和莱罗斯岛有 6 千人，需滞留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希特勒迫于压力，不得不在达尔马提亚群岛和阿得里亚东岸撤兵问题上作出让步。

西方盟军之所以出乎意料地在沿海地域任意纵横，是因为德国领率机构看到它采取的一系列为时已晚的措施，受到俄国向多瑙河平原推进的极大威胁，尤其是由于匈牙利在其国家元首领导下又出现摇摆不定的迹象。当德国挫败了匈牙利避开德国压力亲近盟军的企图后，希特勒才于 9 月 12 日夜间，在德国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宣布“在最近发动一次强大攻势，重新占领岁马尼亚”。匈牙利总参谋长认为这道命令只是、为了稳住匈牙利国家元首和匈牙利人民”。10 天后，当俄军已经到达泰梅什堡和阿拉德的时候，希特勒丢掉他原来的把戏，命令“3—4 个伞兵营”随时作好准备。”逮捕匈牙利国家元首”，并准备由在萨洛希·费伦茨少校领导下的“箭士字”组织接管政府。结果，匈牙利成了东线战场最激烈的战区之一，超出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管辖范围。

在北部从芬兰撤军的行动尽管受到些挫折，但却进展顺利，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当曼纳海姆元帅，即上任不久的芬兰总统，在一封致希特勒的私人信件中，彬彬有礼地对两国军事友好关系提出异议时，根据 1943 年秋颁布的国防军统帅部第 50 号指令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受到政局动荡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互相尊重，希特勒没有想对芬兰采取异常措施。由于考虑到瑞典他还异乎寻常地准备占领阿兰群岛，后因兵力不足而作罢。海军总司令为保护波罗的海而迫使希特勒采取的夺占芬兰的苏萨里岛的行动失败后，导致与芬兰进行的“延期撤军协定”谈判于 9 月 15 日破裂，以及其他对

撤军十分不利的后果。如果德军按照希特勒最初计划，继续占领芬兰北部的镍矿区，这不但违背芬兰人的意志，而且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反对继续占领的观点，也会得到施佩尔部长强有力的支持。施佩尔认为，德国工业所需要的镍，在德国有足够的储量。在这一基础之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 1944 年 9 月底呈交了一分关于斯堪的那维亚和芬兰的形势判断报告，阐述了海上补充情况，建议对即将使用新型潜艇的挪威基地采取必要的加强措施，并权衡了与西线的相互影响。这是一份关于国防和战略计划的少有文件。经过希特勒的同意——尽管他后来想变挂——从北冰洋海岸直到挪威边界的撤军工作，在俄国人袭扰和冬季恶劣气候影响下，仍于 1945 年 1 月底出色地完成了。这要归功于伦杜利希大将和他的第一流部队。

虽然现在无需再顾及芬兰，但是希特勒置陆军总参谋长的建议而不顾，在东线北部地区仍然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他的既定战术。这种做法的直接恶果，就是北方集团军群的 26 个帅于 10 月初在库尔兰被包围。此外，通向东普鲁士北部的道路也向红军敞开了，此后数周，红军便与德军大本营分占了这快土地。

在意大利，由于希特勒的呆板指挥，亚平宁“绿色防线”既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也未能使其他战线节省多大兵力，反而出现了两支对立的意大利军队，使曾企图以罗马一柏林为“轴心”统一全欧大陆的政策趋于崩溃。

德国大本营想把这全部责任归咎于下级各级指挥，认为“绿色防线”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根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战时日志的记载，1944 年 12 月 5 日，约德尔对西南线总参谋长说：“在进入亚平宁阵地时，其左翼已经受损，这是最严重的玩忽职守。”当时任西南线总参谋长的勒蒂格尔将军在这一点上与约德尔的看法一致。在一份战后的研究报告中，他反驳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这是国防军统帅部强加给集团军群的错误……直到意大利战局结束后才被发现。”此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这种过失不想就此了结。经深入调查后，于 9 月得出了结论，认为有一系列重要理由对向波河防线或所谓的“阿尔卑斯山前防阵地”撤退都极为不利。这些理由是：地形对防御极为不利；意大利北部已丢失；盟军空军基地已向帝国逼近；维也纳盆地受到威胁。由于这场极其不利的战斗，使可以节省相当数量的兵力这么唯一一点好处也丧一空。在此情况下，希特勒仍不顾凯塞林的要求，于 10 月 5 日决定，将部队迅速撤到阿尔卑斯山，并命令“亚平宁防线……不仅要坚守到秋末，而且……要全面实施防御，保住意大利北部。”为实现这一企图，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个士兵也在所不惜。实际上，就巴尔干而言，如果想将战争继续下去，除了政治、军事经济和军事上的原因外，几乎再也不存在其他选择了。

由于敌军不断猛烈攻击，意大利战场的态势日渐严峻。对此德国大本营不可谓不了解。例如约德尔在 1944 年 11 月 6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说：盟军的空军正利用这个战场训练他们的投弹手，因为在这个战场上没有任何抵抗。西南线总司令请求增援不少干“200 架战斗机”遭希特勒一口回绝。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还补充说：“不能再向意大利投放兵力了”。几天后，凯特尔也匆忙找冯·菲廷霍夫大将——凯塞林元帅因车祸受伤后作为他的代理人——以指责的口气谈到阿德里亚地段的丢失，并向他传达了希特勒的紧急命令：“立即停止波河平原的作战”。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以这种方式参与作战指挥还是不多见的。

约德尔也竭力对作战行动施加影响。12 月中旬，约德尔向勒蒂格尔将军

传达了关于意大利战场的作战指示：要“ 顽强 ”地争夺每一寸土地。企图通过纵深梯次配置，来阻止敌人的突破是一个“ 危险的设想 ”。任何主动规辟敌人的行动只能削弱自己，而无害于敌人。要想保住几个师，就要投入两个集团军的兵力。意大利战场的指挥机构的在左翼作出让步的趋势，只有利于敌人。符合敌人“ 切断德军与后方的克恩滕和蒂罗尔的联系，并将其赶到瑞士边境 ”的企图……约德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也许是元首在几年前，对东线发生的类似情况而几乎每天都重复的思想。而按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看法，意大利的前景是一目了然的。为此，“ 他建议应主动放弃第 10 集团军防守的左翼。这是一个保证不再从意大利的埃米利亚到阿德里亚之间后退一步的救急措施。 ”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最高统帅不断直接插手每一个师的指挥，争夺亚平宁阵地的艰难的、损失惨重的物资消耗战，仍在继续。

阿登攻势

约德尔在他给西南线总司令的信中，言词之所以激烈，也许是因为受了德国大本营气氛的影响。大本营已确定第二天，即 1944 年 12 月 16 日，德军发起阿登攻势。

德国国防军这最后一次的大规模进攻行动，照例是在没有经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整个局势进行分析后采取的。一有机会，便在西线转入进攻，这是希特勒早在诺曼底会战伊始就已有的思想。这使他将东西两线的战略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到 8 月 20 日——或者再晚些——直至 9 月 3 日，西线正处于后撤之际，阿登自然尚未提到次事日程上。按照原计划，大本营想不理睬在巴顿将军指挥下由第戎地域出发向北开来的盟军，而通过一次突击，迅速突人敌人右翼纵深，以此保住己方在马恩一线的防御。然而，未能如愿，计划成为泡影。希特勒对此视而不见，仍然日复一日地幻想着扩大作战规模。在孚日山西部尚无战事的地域,由沿罗纳河而来的第 19 集团军一部——这是西线尚有作战能力的装甲部队的余部，由两个奉命从意大利开来的装甲步兵师，以及若干隶属于第 5 集团军司令部的新组建部队，终于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进攻集群。除了确保在孚日山前方构筑一条新的防御线外，这支部队“尔后的主要任务”是，在将来某一时刻，突人盟军的侧翼和后方，从根本上扭转西线的形势。为了使防线的右翼和中部能够腾出兵力，希特勒还一反常态，允许他们采用拖延战术。

希特勒这些无视时间和空间规律，特别是忽视兵力极度虚弱而设想的庞大计划、在一瞬间出笼，也在瞬间破灭。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来，特别是安特卫普的迅速丢失，在大本营引起极大震惊。在此情况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于 9 月 6 日，又向希特勒重提 8 月 19 日的观点，即“11 月 1 日前，德军在西线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决定性的进攻”。但是，第 5 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仍受命在局部地区，采取有限规模的进攻行动。约德尔在 9 月 11 日的日记中，对此做了这样的记载：

> “元首命令，第 5 装甲集团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攻击敌人的背后……元首禁止向强大敌军的正面实施反突击。”

此外，德国大本营对在适当时刻，通过一次强大攻势来根本扭转西线形势的意图、计划和目标，自始至终没有放弃。为了在实际上作好准备，同日，大本营还下达了一道这样的命令：

> “在党卫队上将迪特里希领导下，重新组建第 6 装甲集团军。”

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忙于落实这些和其他更新西线陆军的措施的同时，希特勒自己却在敦促空军尽最大努力研制出能用于实战的新型战斗机，以投入即将到来的攻势。然而事与愿违，由于他对飞机的技术和性能的非份要求，反而影响了德国飞机制造的迅速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同戈林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①。

同样，希特勒为了准备未来的攻势，于 9 月初，把富有大规</ZSBJ03200020_0476_0/ZSBJ>*模指挥作战经验的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召到东普鲁士大本营，恢复了他西线总司令的职务。龙德施泰特在大本营里参加了几天的形势讨论会。会上，希特勒对他的”这位老帅异乎寻常地尊敬，而龙德施泰特却无动于衷，一言不发。9 月 5 日龙德施泰特走马上任。这样，莫德尔的权力就仅局限于 B 集团军群总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了——即西线的北

部和中部。南线总司令布拉斯科维茨大将不久也被撤换了。在 9 月 1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还提到了他：

> “如果他……干成这件事（指迅速将第 19 集团军同主力建立联系），那么我将向他正式道歉（指他 1939 年对波兰的占领政策提出异议后被打入冷宫一事）。”

在以后的数周和数月中，面对敌人不停顿的进攻，希特勒的为未来攻势奠定基础的战略原则，仍丝毫未变。然而，由于作战地域的显著缩小，尚能投入防御的兵力日益减少，尤其是长年来所顽固奉行的为局部重要地点而牺牲更大战役目标的指挥原则。使本来就很渺茫的取胜前景，变得更加虚无漂渺。在安特卫普陷落后，希特勒便命令日益松散的防线右翼，在斯凯尔德河口和阿尔贝运河的一个桥头堡，即比利时和荷兰边界处转入顽强防御。这是一项能够实施的措施，因为空军在适当时间可以将其“第 1 伞兵集团军”的多余兵力投入战斗。再加上尚有较强的兵力驻扎在敦刻尔克、加来和布洛涅的“要塞”之中，迫使敌人的进攻第一次停止了较长时间，这对盟军的整个作战行动产生了影响。这样，上面提到的那些海港要塞，在 9 月 10 日吸引了蒙哥马利集团军群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直至 11 月 3 日，盟军才凭借其各种优势，突破了斯凯尔德河口的封锁，他们尽管拥有一支护航舰队，却未能在 11 月 28 日以前到达安特卫普港。希特勒关于要保住最后一批靠近英国的 V 型武器发射基地的决定，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那些由党卫队接管的“V—2”型武器，此时

也可以在陆上投入使用了①。与此相反，希特勒却把一个完整的步兵师留在海峡群岛上，未发挥任何作用。

早已被遗忘的亚琛争夺战，现在又成了战略重点。这座城市受到的威胁，会使德国丧失“西壁工事”的第一批工事，随之边界的第二道防线也会被突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 9 月 14 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希特勒对这一威胁的态度：

> “西壁工事的每一寸土地——即使是在防御工事之外——都必须当作一座要塞那样去对待。”

有一份落款注有 9 月 16 日和约德尔签写的命令，在思想和言词上，看来完全是模仿 1941 年斯大林所发布公告：

> “在西线，广阔区域的战斗已经蔓延到德国领土上。德国的城市和乡村已经卷入战争。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以狂热的决心投入战斗，并号召每一个身体健全的男子进行最坚决的抵抗。每一个掩体和地下室，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村庄都必须成为一座要塞，让敌人碰得头破血流，让敌人在占领德国的战斗中毁灭……

这道命令甚至连攻势计划都暂时忘记了：

> 我们不再考虑任何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么守住我们的阵地，要么牺牲。”

两周后，即 9 月 30 日，由凯特尔签发了一道命令，作为希特勒命令的补充，试图确定一种固定的组织形式，但同时，他又胆怯地努力表示，不允许“省党部头目和帝国国防委员们”擅自插手。几天前，即 9 月 25 日，还发布了希特勒“关于建立人民冲锋队的法令”。这份文件的第一签署人是博尔曼，第二签署人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最后征召”工作的组织领导由“党“负责。两个月以后，希特勒发布另一道命令的时机已经成熟。这道命

令由约德尔签署。命令称：

“如果由于指挥官或部队的失职或行动不力，使敌人突破（西壁工事的）筑垒体系就是一种无法宽恕的犯罪。元首决定，倘若出现此种情况，就要直接追究责任者的罪责。”

对英军在阿纳姆的空降，德国大本营并未大动干戈。在第一天，即 9 月 17 日晚上，在“狼穴”召开的形势讨论会上，英军空降的消息占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会上，希特勒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因为他同时得到了报告，附近的德国预备队已投入战斗。在阻止蒙哥马利的行动成功，阻止其夺取马斯河、瓦尔河和莱茵河大桥的目的达成方面，似乎也不需要最高统帅的过多参与。然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却在 9 月 21 日日记中写道：

“元首坚决反对那种让完好无损的大桥落人敌人手中的愚蠢行动。”

这表明，时这次激烈战斗，元首肯定也进行了干预。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每天都置身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危机之中，忙于处理无数各种各样的具体事情。例如在德国的北海岸加强防御设施；加强莱茵河大桥的防护；还有与东线在补充人力、物力方面，进行耗时费神的讨价还价。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战争的第 6 个年头之初，第一次接受了一项过去陆军总参谋部及其作战处所担负的任务，即制定一项大规模进攻计划，并负责准备上作。由于当时的形势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德国领串机构在组织上的混乱状况，再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相当于第二陆军总参谋长，然而，他自己的参谋部却不拥有自己的、经过挑选的、能充当其左膀右臂的总参谋部军官。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和物资，从进攻部队、敌情、直至后勤供应，这一切一切，约德尔除了从陆军总司令部有关的军官和单位那里知道外，别无任何消息来源。尽管他能听到一些消息，但他并不置身于事情之中，不属于他们的成员，不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对他们并不了解。多年来他一直是个幕僚，一直在希特勒的左右，因此养成了他依附于这位最高司令而无视现实的习性，而抵御这位最高司令的能力却要比任何人都小。尽管一直有人提出这样问题：约德尔是不是就是以这种眼光来看待事物？但军事领率机构混乱的组织状况在促使采取这种无望的军事行动上的责任，是不容推卸的。

1944 年 9 月末、10 月初，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研究结果指出：在蒙绍。埃希特纳赫地段发动进攻是最为适合的。按照希特勒的方针，“主攻方向应指向西北方向的安特卫普”。计划役入两个装甲集团军，于 11 月底发起进攻。

在这一基础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拟制了详细的计划。出于保密原因，指挥参谋部没有象陆军总参谋部通常所做的哪样，听取西线总司令及其决定参与进攻指挥的高级司令官们的意见。10 月 9 日，约德尔将这次代号为“莱茵河卫兵”的计划呈送希特勒。希特勒仍象往常一样，将这一任务视为已任，对计划作了重大改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决定”

“1、位于巴斯托涅、那慕尔的宽大左翼发起进攻。

2、立即从亚琛以北、沿马斯河向南发动第二次攻击。

3、以障碍设置部队保卫侧翼安全。这种保障需以主动突击来实施”……

作战目标似乎就是在这一天作出的，即越过艾弗尔和阿登山脉，通过乌尔特、马斯河和整个比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推进到安特卫普附近的海峡边。这样，1940 年 5 月在西线发动攻势的基本思想又再现了。3 天后，即 10 月 12 日，在“这项计划……由研究阶段进入拟制阶段”之后，国防军

统帅部发布了第一道预备性命令。然而，这道命令只起到了对敌人，也对己方部队和司令官们掩饰真实企图的目的。不应忘记的是，正是在这几天，希特勒派出他的爪牙，其中有希特勒大本营的新任副官长，胁迫隆美尔元帅自杀。

11 月 3 日，即在规定发起进攻之日的前三周，约德尔大将才到达 8 集团军群驻地，向集合在那里的西线高级司令官们安排进攻事宜。他在介绍了敌情和地形情况之后，指出，在艾弗尔地区实施突破肯定可以取得成功。紧接着实施的装甲部队的突击，将在两天之内切断美国第 1 集团军和蒙哥马利集团军群与其后方的联系，并为下一步击溃敌人 25—30 个师创造前提条件。敌人为发动莱茵河攻势而在这一地区积贮的大量军事物资，也将被缴获或摧毁，约德尔还以希特勒的名义，对进攻的步骤，做了详细的指示。他还说明了以新月期间定为发动进攻时间的好处。

这次进攻的主力为 16 个师，其中 8 个足装甲帅，分别隶属于泽普·迪特里希指挥的党卫队第 6 装甲集团军和冯·曼陀菲尔将军指挥的第三装甲集团军。南线侧翼的防护将由第 7 集团军负责。

在北部，则以小股部队不断出击，牵制敌人。

尽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与会的司令官们，对希特勒的这一企图产生任何怀疑，但司令官们仍对这一处在广泛地域、远在 200 公里之外的目标，勇敢地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即使能肢例将计划内的兵力及时集中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充分装备，他们也不可能在冬季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到达那么远的目标。作为反建议，司令官们提出了一个“小解决方案”。所谓“小解决”，就是仅仅排除盟军在亚琛附近的突破，从而夺回西壁工事毗粼的工事。不得已时，才考虑随后向马斯河的推进。只有当形势超出颅料之外时，才迅速变更部署，向目标突击。

在这些和其他异议面前，国防军情挥参谋部参谋长寸步不让。他深信自己理解希特勒思路，当场反驳说：“‘小解决方案，只会推迟算帐的日子，使西方列强不再准备谈判”，一语道破了德国领导的政治目的。鉴于同样的，但至少是军事的理由，他对于把进攻日期至少推迟到 12 月 10 日的建议，连声说道：“绝对不能，绝对不能”。尽管如此，与会的司令宫们在会后的第二天，立即向大本营呈递了他们关于“小解决方案”的书面建议。就象对约德尔陈述的那样，他们又向希特勒说明，当进展顺利时，仍可以发展为大“解决方案”——他们想以此避免与希特勒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下正面交锋。而更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想借此机会向最高领导报告一下军队的实际状况、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

当时的。“些记录毋庸置疑他说明，西线司令官们，特别是莫德尔和曼陀菲尔所提出的见解，使大本营在尔后的时间里，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然而，希特勒对此却置之不理，11 月 10 日，他签署了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起草的“关于进攻（阿登攻势）的准备和展开的命令”。之后，他又把战役目标拔高到政治和战略范畴，即“通过消灭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卢森堡一线以北的敌人兵力，扭转西线战局、甚至是整个战争的局面”。在这项命令的开头指出，“即使敌人在梅斯两翼的进攻，以及即将对鲁尔区的突击，使已方丢失大片地域和阵地，也甘冒巨大风险，将此役进行到底。”“展开结束”日期，定于 11 月 27 日。

此后，前线司令宫们仍通过各种途径，继续提出他们的异议。然而，国

防军指挥参谋部不得不于 11 月 25 日给西线总司令“——一个最终答复”：“元首…毫不动摇地……坚持原进攻计划的目标和范围……坚决拒绝“小解决方案”的设想……”两天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再次被派往西线，并在其日记中写道：

“从西线返回后向元首汇报。

1、大解决方案不变。”

但紧接着却出现了这样的话：

“2、缺编部队必须补齐。建议随后提出。”

由于发起进攻的日期已到，而部队尚未到齐，而且由于接连不断的防御作用，使“陆军的补充和整编迟延”，使进攻日期“一再”向后推移，最后将进攻日期定为 12 月 10 日。

此外，国防军最高司令还过问进攻准备工作中的无数具体细节，其中绝大部分都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作为“进攻程序的方针”，下发部队。对此，约德尔在日记中均有记载，下面列举几段：

11 月 3 日：“元首不想把猎虎式坦克交给快速部队，而想交给步兵小部队……虎王式（虎 II 型）坦克太重，有损底盘”……

11 月 10 日：“……a）3000 吨（燃料？运输能力？）……目前无法从意大利和（东线）北方集团军群那里得到保障……

为了坦克的运行，薄冰层应……

人民冲锋队应在前沿阵地夺取战利品。”……

11 月 17 日：“在最后一夜必须把一切都埋藏。

1、首先是居民区、司令部——最后再进行一次一分钟袭击。

2、然后是炮兵部队。

3、火力最强的平射火力不要对付火车站，那里无关紧要。”

11 月 18 日：“进攻开始时间要统一，否则有报警的危险。只有对部队适合时，才搞夜间进攻。

所有的阿尔萨斯人都必须从……前线部队中……调离”……

11 月 28 日：“西线进攻部队的被子是否能送去？还有鞋。可让部队报告”……

12 月 6 日：“将海军作战浮舟交给第 6 装甲集团军（横渡马斯河运河）。”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一部分摘自于 1918 年统帅部为“由阵地战转入进攻”而制订的条今；另一部分来自于希特勒当时作步兵作战经验。对空军没有下达较详细的指令。

1944 年 11 月 20 日，希特勒终于想放弃混凝土几乎尚未完全干燥的“狼穴”了。红军步步逼近，威胁着东普鲁士省的大门。过去一直被视为中转站的柏林，现在终于成了德国大本营的营址。象过去在贝希特斯加登一样，德国领率机构的工作和居住地点仍是十分分散：希特勒和几个副官住在已被严重炸毁的总理府的避弹室里；凯特尔和约德尔搬人位于达莱姆的国防军统帅部过去的备用宿营地，温特尔将军领导的参谋部先是驻在附近的一座空军办公搂内，后又迁到措森——紧挨着陆军总参谋部。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与三军将领们，只有在总理府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上，才能聚集在一起，并耗费掉宝贵时光。

12 月 18 日，希特勒从柏林迁到位于黑森的瑶海姆附近的齐根贝格营地的指挥所。这个指挥部是 1939 年为西线战局准备的，代号“鹰巢”。1940 年春，托特组织特意为希特勒的那些傲慢的、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亲信”修

建了齐根贝格庄园。而现在，大本营第 1 号宿营地却安扎在森林中的一个深深的地下室里，参谋部和第 II 号宿营地座落在远离此地的弗里德贝格。陆军总参谋部再次迁到它在战争开始时的所在地——措森。

尽管西线司令官们的历次陈述均遭到拒绝，然而莫德尔元帅和冯·曼陀菲尔将军，这时又加上泽普·迪特里希和西线总参谋长威斯特法尔将军，于 12 月 2 日在柏林总理府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说服希特勒改变其进攻计划。莫德尔元帅作为将军们的主发言人，在持续数小时的谈话中，以坦诚相见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陈自己的见解。结果，又再次付之东流。希特勒甚至拒绝以“小解决方案”——他称之为“半解决方案”——作为话题。他只答应解决现在部队装备严重短缺的状况。这次谈话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约德尔的日记中得知一二。约德尔写道：

> 12 月 8 日：“现存 7150 立方米燃料，还有 6000 立方米……包括来自东线的 2400 立方术。其余生产的燃料……必须立即运输……，64 列火车弹药，55 列已到，3 列已经发车，4 列在装车；”12 月 12 日：“第 7 集团军还缺……2 个舟桥纵列，东线工兵营，首先是气艇。”

象 1940 年西线战局一样，此次作战由 12 月 7 日推迟到 14 日，最后在 12 月 12 日定于 12 月 16 日发起进攻。

由于作战物资的大量短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司令官们多次采取的拒绝态度，使这次“阿登攻势”在现代人眼里，是一次颇为值得怀疑的行动，在它开始之前，就已注定要失败。然而，德国大本营中的人们却另有所想，这可以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写给莫德尔元帅一份通知中，看出为作战失败而预先想出的全部托词。这份通告还是在 12 月 15 日，即进攻开始之前送给莫德尔的。文中写道：“……已经作出最后几项决定；……取得胜利的切先决条件都已经……具备，进攻的规模完全决定于进攻过程中的指挥；……如果……遵守作战指挥原则，……肯定可以取得重大胜利。”

在此其间，希特勒按照以往历次重大战局之前的习惯，于 1944 年 12 月 11 日和 12 日——每天利用半天时间，将参加此次攻势的全部高级军官，直到师长，都召集到“鹰巢”大本营，对他们发表了一通漫无边际的长篇大论。这次讲话内容同 10 天前在柏林对冯·曼陀菲尔将军时所谈的大致相同。希特勒除了谈了军事观点外，还谈到了促使他作出决定的政治动讥。他说：

> “战争对于所有的参战者来说，自然是一次对负荷能力的考验。战争持续越久，这种考验就变得越加严酷。只要对成功抱着某种希望，这种考验就可以忍受。一旦在某一时刻，这种对胜利的希望破灭了，通常也就无法凭借意志的力量来忍受这种考验了。这就好比一座堡垒，只要它还有希望得到解围，它就能够继续战斗。因此，逐渐削减敌人的胜利信念，通过进攻使敌人明白，他们的计划从开始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很重要的。这只有通过成功的进攻来取得，成功的防守水远达不到这一目的。因此，人们不能不断地崇尚守势、防御是战斗的更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这条原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这一方所投入的兵力总量，总是同我们的敌人一样大的。我们不能忘记，敌人的部分兵力还在远东对付日本。这个国家——除了中国之外，拥有 1 亿多人口，在技术装备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
> 尽管如此，人们必须清楚，如果长时间地依靠防守的坚定性过日子，那么终有一天还必须要用成功的进攻来取代。因而，从战争一开始，我就一直在作出努力，只要有一线可能，就进攻，使战争不致陷入世界大战的局面。尽管如此，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这就同我们的盟国背离联系在一起了，这自然还要采取进攻方式……但只有两方中的一

方认识到，象这样的战争再也无法取胜了，这才能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因此，使敌人认识到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任务，要想使他们认识到这一问题，最快的办法是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占领他们的领土。如果一方已经被迫进行自卫，进行防守，那么，这时的任务就是通过无情的打击，还要使敌人认识到尽管情况如此，他们什么也没得到，而战争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同样重要的是、要刮用每一个瞬间来加强这种心理影响，使敌人明白，他们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使他们绝不能指望投降，绝对不能，绝对不能。这是决定性的，敌人任何一点最微小的投降征兆，都会使敌人取胜的希望死灰复燃，使广大失望的群众重新充满希望，而甘愿承担一切困苦和贫乏。因此，敌人对于公布悲观失败主义的备忘录——就象 1917 年作的那样，或者公布档案材料——就象我们今年经历过的一样，这样作的危险性，敌人知道得很清楚，它可以一直使敌人抱有希望。但是也能出现奇迹，这就是要通过奋力一击，使局势发生突然的转变。敌人必须明白，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获得成功。如果敌人通过人民的态度，国防军的态度，通过它所遭到的沉重打击而明白了这一点，那么，终有一日他们的精神力量会彻底崩溃。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他战争的第 7 个年头所取得的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将会再现。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反驳：是啊，当时的形势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的先生们，当时的形势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当时，他所有的将军，其中包括他的亲兄弟……，几乎都对他是否能取得胜利持怀疑态度。他的行政专区主席，以及来自柏林的部长们，组成代表团，向他提出请求，希望他立即结束战争，认为他也不能取得胜利了。一种男子汉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使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了，并最终出现了转折的奇迹。也许还有人争辩说，如果没有俄国沙皇的更迭，这一奇迹绝不会出现。这一争辩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如果在战争的第 5 个年头就投降了，那么，在第 7 年，也就是两年之后的皇位更迭也就完全无关紧要了。人们必须要等待时机。

还应该仔细考虑以下几点，我的先生们。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象我们敌人所组成的联盟这样聪明，它由多种不同的分子所组成，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我们今天在敌人那里所看到的，都是当今世界上最极端的东西：一方面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是一个垂死的世界帝国——英国；另一方面，是一个一心要取而代之的殖民地——美国。就是这些国家，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已经日复一日地陷于分裂。我想说，如果谁象一只蜘蛛那样，坐在网中，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他就可以发现，这些矛盾是如何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发展。如果这时再给它几次沉重打击的话，那么这个勉强维持的共同阵线。随时都会随着一声霹雳而崩溃。联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希望能愚弄别的伙伴，从而得到些什么：美国企图继承英国的衣钵；俄国企图取得巴尔干和海峡，取得波斯石油，伊拉克，波斯湾；英国企图保住它的地位，加强它在地中海的地位。换句话说、有朝一日——这一时刻随时都可能出现，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历史也是由死去的人们创造的——这个联盟会解体，但是这场战争无论如何也不会使德国受到削弱。

当然，从战争开始之日我们就有着很大的弱点，尤其是我们的盟邦，存在很多弱点。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没有……很强大的国家，而只是弱国与我们结盟。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尽了它们的义务。我们不能为此而抱怨、不能为此而诉苦，而是必须感激地承认，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在同我们一起实现我们共同的意图。几年来，我们已经成功地使战争一直在我们的国土之外进行。现在，我们被迫部分退回到国家的边界上进行。还有一部分，我们仍在离国家旧边界线很远的地方进行。无论如何。我们也要维持现在的状况，一如既往地把战争进行下去，特别是要排除西线的危险。先生们，已经在别的战线上做出了牺牲，这在这里重新发动攻势创造条件。我在这里谈论一场攻势，也许那些处在艰苦奋战中、并饱受敌

人空军优势之苦的人们，会担忧地说：怎么能这样想呢？1939 年或 1940 年的形势、也并非使所有的人都深信，西线的战斗能够由攻势所决定。恰恰相反，我们先生们！我并不是要撞破敞开着的门，我是要打破紧闭的门。……

人们普遍认为，应进行一场防御性战争。这些年来，我一直反对这种意见。在对波兰发动进攻战时，人们尚能接受。在对法国和英国发动进攻时，人们就认为这是胡闹，是犯罪，是乌托邦，是没有希望的尝试。事态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当时没有把法国干掉，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想象，我们将走向何方……现在，有人会提出异议说，1940 年和现在相比、有一点差别是很大的，当时，敌军还是一支没有经过考验的军队，而现在却成了一支熟悉我们、并正处在战争中的军队。这是对的，我的先生们。但是从兵力上看，变化并不大，如果我们不把空军考虑在内的话——当然它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这一点我将还要谈到——从兵力上看，当我们在西线发动攻势的时候，大约有 100 个师，其中大约有 86 个师参加了进攻。这些师也不完全是第一流的，其中一部分是临时组编的，在几个月年组建的，只有一部分可以说是真正第一流的……对于目前的这场攻势，我们也没有第一流的兵团。但是，敌人方面也不完全都是第一流的兵团。我们有许多打得疲惫不堪的部队，敌人也有打得疲惫不堪的部队，并且还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现在我们手中有美国人首次发布的官方战报，他们在近 3 个星期的时间里，损失了大约 24 万人。这真是个巨大的数字，它远远地超出了我们所想象当中的人数。他们也已经精疲力竭了。在技术上，我们双方大致相同。在装甲兵器方面，也许敌人拥有更多的坦克；但是，我们有最新型的坦克，质量更好。”……

……

尽管将领们并没有完全觉悟，但是，对于不抱成见的军人天性来说，希特勒的这一席话并不是完全无效的。冯·曼陀菲尔将军也写道：“司令官们从谈话中……得到了一个对敌情的总的描述，这是有利的。司令官们从能够纵观全局的人那里，得到了对形势的判断，看来……这种形势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众所周知，代号为“秋雾”作战行动①于 12 月 16 日 5 时 30 分开始了。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并越过义弗尔以北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段，取得了可观的初步战果。曼陀菲尔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甚至已抵达迪南几公里的马斯河畔——尽管按作战计划已经太晚了，而且右翼的友邻集团军被远远抛在后边。在这种部分战果的鼓舞下，在主观愿望的束缚下，德国大本营的人们，对当时的一种观点置之不理。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会有大量的预备队逐渐投入战斗，己方的原定目标和己取得的战果必将化为泡影。大本营的这一态度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日记中。他干 12 月 18 日写道：

“元首命令，现在我们必须切断他们的后方。使他们失去补给，然后他们就会投降。”……

然而不久，巴斯托涅交通枢纽的敌人不但没有投降，反而牵制了很大一部分进攻兵力。在那里，尽管有己方空军的英勇献身，但是，变得晴朗的天气使我们不得不忍受盟军绝对空中优势的轰炸，在此期间，尽管德军有一些辉煌成绩，但战场上的角色开始变换了，进攻者被迫转入防御。圣诞节的第一天，西线总司令不得不命令全线停止进攻。他认为，即使小解决方案也行不通了，而希特勒却依然坚持他的庞大作战计划，甚至还要扩大他的计划。

看到强大的盟军预备队在德军对艾弗尔实施突破的战斗中撤退。德国大本营又产生了一种在 11 月 17 日和 25 日敌人突破阿尔萨斯时曾经考虑过的想

法。当时人们曾经想过，为了“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作战”，放弃阿登攻势的计划，那么现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 11 月初根据 10 月份的研究所拟制的草案会再一次提出来，进行一次新的、第二次攻势。当时，“鹰奥”里的人门正沉醉在这样一种想象之中，即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取得部分战果，而且在敌人转移兵力过程中，能够打破僵局把阿登防线向前推进，越过马斯河，到达其目的地。这一设想不仅不符合正确的战略观点，而且也缺少必要的手段。希特勒在 1944 年 12 月 28 日对参战的司令官和指挥官们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曾用宣传的言词对这一设想做了简要的描述，下面这段讲话摘自大本营第 27 号记录片断。

“总的来说，这次作战计划是清楚的。我完全同意已经采取的措施。我希望我们能取得成功，特别是右翼①能迅速向前推进，以便打开通向萨韦尔钠的通路。尔后，立即突入莱茵河平原，把美军部队歼灭。歼灭美军是我们的目的。如果到那时汽油供应充分，我希望能以新的部署②，再给敌人一次打击。我绝对担保，我们能以更多的兵力消灭更多的美军部队。因为，我们的兵力会与日俱增。我希望，这下一步的进攻将得到数个师的补充，其中一个是来之芬兰的精锐整编师。如果从现在起，不出现什么倒霉的事情的话，胜利肯定就在我们的眼前。

这取决于什么，不需要我再向诸位进行解释了。第一次作战行动③的战果也是以此为前提条件的。因为，在我们进行这两次攻势并取得胜利的一瞬间，对我们左翼④的侧翼威胁就自动停止了。我们将在那里进行第三次会战，把美国人完全消灭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转向左翼，对此我确信不移。

在西线以攻势解决问题，一定要作为我们至高无上的目标。也许某些人私下里反对我的看法。他们会说，能取胜吗？我的先生们，1939 年也有人持反对我的意见。也有人在文件和声明中对我讲：不能这么做，这是办不到的。1940 年冬，还有人对我说，不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不呆在西壁工事内呢？我们构筑了西壁工事，让别人来攻击我们好了，尔后，我们后发制人，发动反攻，我们让别人先开始，我们也会后来居上。我们占有十分有利的位置，我们可以冒险。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发动进攻的话，那么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今天的情况与当时极为相似。今天的兵力对比并不比 1939 年或 1940 年的情况更坏。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成功地在两次攻势中消灭美国的 2 个集群①，那么兵力对比就明显地、并且完全变得有利于我们了。同时，还应考虑到，德国的士兵毕竟都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战。

这次唯一不利于我们的是空中态势。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迫使我们要充分利用恶劣的天气，利用冬天。恰恰是空中的态势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不能坐等有利的天气到来。这点也正合我的意，我们可以把这种局面一直坚持到春天。到那时，我也许会调 10 个、15 个或者 20 个师来，我们在春天再发动进攻。但是敌人也将会调来 14 至 20 个师。其次，我不知道，在春天我们是否能比现在更好地控制空中的态势。如果不能，那么春天的天气对敌人是非常有利的。而在近几周内，敌人至少不能对我们集结的部队实施地毯式轰炸。这已经很不错了。

对一件事情作出决断是多么重要。关于这方面，我想给诸位讲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敌人现在对滑翔炸弹已经很了解了，他们今天当然也完全能够设计了。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已经生产了滑翔炸弹。毫无疑问，如同我们今天用滑翔炸弹把英国的工业区搞得一直不得安宁一样，敌人也同样用大量炸弹对付鲁尔区。对此，没有任何防护办法。关于重型火箭我就不想谈了。对此，我也毫无办法。这一切都在于说明，当我们将这种大型武器投入使用之前，应该首先将局势整顿好。

德国人民在这些天里松了一口气。必须避免由松气再次变得麻木不仁。麻木不仁是

错误的，它只能给人民带来忧伤和苦恼。德国人民松了一口气。我们又发动攻势了，仅这一点就会使德国人民感到喜悦。如果这场攻势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如果第一次真正的伟大战果显示出来的话——它将会表现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形势与 1941 年到 1942 年的俄国完全一样，当时，它处于不利的形势下，然而，他们在漫长的战线上，通过几次进攻，使我们转攻为守，节节后退。如果德国人民了解这一发展过程的话，他们肯定会做出人类所能够做出的一切牺牲。我们的每一次号召都将在德国人民中取得成效。这个民族无所畏惧，无论我证集纺织原料或其他物品，还是征召我们所需要的人力时，青年们都以极大的热忱来报名。德国人民将以积极的态度做出反应，我不能不说，这个民族十分令人满意，人们所能够期待的也不过如此而已。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比我们德意志民族更好。个别坏事只是例外，它们不过是证实了这条规律而已。

因此，我想向您们发出呼吁，以您们的全部热情，全部能力，全部活力。加入这场作战。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行动。它的成功自然会带来第二次的成功。而第二次行动的成功，将会使敌人对我们左翼进攻①的威胁完全崩溃。我们将把敌人西线一半的战线完全击溃。我想，敌人将无法长久地抵御住我们大约 45 个师的进攻、那样，命运将掌握在我们手里。

如果进攻日期定于新年前夕，那么我首先要感谢所有参与作战的人员，因为第一，他们做了大量的次备工作；第二，他们将冒着一次很大的承担负责的风险。我把这一点看作一个特别好的征兆，这是可行的。在德国历史上，新年之夜一直有着吉祥的军事预化的。对敌人来说，初夕之夜将是一个难受的干扰，因为他们不庆祝圣诞节，而是庆祝新年。除了这样的进攻，我们无法以更好的方式进入新的一年了。如果在元旦之日，德国又在另一个地方发动进攻的消息传到国内，并且定会取得胜利，那么，德国人民将从中得出结论：旧的一年悲惨地结束了，但是新的一年却开了个好头。这对未来是一个好的征兆。先生们，请允许我祝愿您们每个人都走好运。

请允许我再说一点，先生们，保守这次行动的秘密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的人，就不必知道。对于必须要知道的人，也只允许知道他所必须要知道的那一部分。这是极为关键的。也不允许知道一些情况的人，提前散布出去。这是问题的关键。”……

在以“北风”为代号的阿尔萨斯作战行动对北方乍要进攻地域发生影响之前，希特勒于 1945 年 1 月认炽到，“在 B 集团军群将敌人半数兵力吸引过去之后，继续实施阿登攻势已没有任何希望”。按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战时日志记载，直到 l 月 14 日，即大本营撤回柏林的前一天，人们才最终承认：“进攻领域的主动权已转到敌人手中。”

付出重大人员牺牲和物质损耗的西线作战，正接近它的尾声。

注释

参见下面的关于 1944 年 11 月 6 日形势讨论会速记稿的片断。从中可以看出希特勒对军事行动具体细节的干预，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与希特勒进行谈话的是两位空军军官。

“元首：我把事情重新想了一下，我不知道帝国元帅报告了没有。我重新想了一遍，结果是：又击落 80 架。

比希斯：82 架。

元首：这 80 架当中，有 50 架是由歼击机击落的，30 架是被高炮击落的。这 30 架必须刨除。有 490 架飞机参加了空战。

比希斯：305 架。

元首：那好吧，就算 305 架参加了空战。可刚才你们说是 490 架。

比希斯：没有，我们说是 305 架，注兰克福的歼击机联队没有参加…

元首：好吧，就算 305 架！这无所谓。他说过，一个强击机中队可以有 42 架投入战斗。这一个强击机中队就击落 30 架。

比希斯：两个强击大队。

元首：一共多少架？

比希斯：一共 63 架飞机。其中 61 架参加了空战。

元首；好，61 架！

比希特：这 61 架击落了 30 架四引擎敌机。

元首：这样还剩下 20 架。如果您把 60 架从 305 架中抽走，就还剩下 240 架。240 架在空战中击落 20 架，强击机中队自己损失 30 架。

比希斯：损失 30 架。

元首：其他中队损失 90 架。这样说来，就是 240 架参加战斗，损失 90 架，击落 20 架。

克里斯蒂安：还有一件事：强击大队还隐瞒了一个大队。

元首：这我不任乎。这个被隐瞒的大队也是要向敌机开火的。

比希斯：这是自然。

元首：这样看来，结果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克里斯蒂安：关键的是，有 30 架敌机是被强击机大队击落的……

元首：在你们那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所有这种亨利用这种方法进行过计算？帝国元帅无论如何是不会的。他绝不会感到，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因为人们通过这种“非地面的报告“把全部情况都歪曲了。

克里斯蒂安：每天都有报告。

元首：我需要这种计算。它有力地证明，歼击机是毫无用处的。……我把事情一算，我就觉得结果是令人吃惊的。

比希斯：在这次作战中丢失的 65 架飞机，到今天已找到 38 架。还有 27 架下落不明。有 38 架完全损坏了，死了 32 人，受伤 6 人。

元首：还差多少架？28 架？

比希斯：现在还差 27 架。

元首：事情完全清楚了。

比希斯：昨天，在意大利使用了大批双引擎战斗机，袭击了特里安地域的铁路设施、主要是铁路线。意大利使用了 23 架歼击机，有 4 架双引擎飞机被击落，已方无损失。

元首：这也是一种有误差的计算。最近我进行了一次计算。要识破些化招是需要时间的。我就进行了一个月的计算。有人想必会说出动了多少多少架次。就一个月来看，这还满不错，但看看出动飞机的数量，就…

比希斯：数量我曾报告过，只是一个月的数量没有报告过。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这里有个百分比的问题。

元首：必须有一个人对整个事情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出结论。不能简单他说：现在就是这么回事！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帝国航空队进行了一次阁上作业……由施通普夫大将负责。监察长加兰得可以到部队讲讲话。帝国元帅正在……

元首：我必须说，我从来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我是按照这种表格办事的。

元首：可我从来就不用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亲自动手。

克里斯安：还是话归原题吧；强击机大队击落了 30 架四引擎轰炸机。

元首；30 架。还有 30 架是高炮击落的、这样还剩下 20 架。而这是在出动 260 架次所取得的战果，太糟了。出动 260 架歼击机。击落 20 架，要是出动 2000 架就击落 200 架。这样，我就无法算出，这些飞机到底……而他们还在拼命地制造。这只能是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根本原因是，这些小伙子们有 10 天没有飞了。

元首：我们过去总是能找一些“理由”！

克里斯蒂安：这自然是要受到影响。而西线的联队，坏天气里也飞，降落时没有任何损失，因为他们每大都在飞，这当然会受影响。

元首：我不想说飞行员的坏话，我主要是说击落敌机的结果。利用 2600 架飞机，击落 200 架，也就是说，通过大批量地使用，击落大量敌架，这种希望是不存在的。继续生产这种飞机是毫无用处的……”。

第二章瓦解和投降

在进入战争最后一个阶段之初的日子里,希特勒于 1944 年 12 月 29 日夜晚，在“ 鹰巢 ”大本营里，与装甲部队总监托马勒将军进行了一席长谈。希特勒再一次炫耀了他的才能，用以欺骗他自己的和其他人的无能。第 30 号记录稿残篇里，记载了希特勒的这次谈话。

……

“ 前不久，我读了弗里德里希大帝书信集。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战争培育了我——那是 7 年战争的第 5 年——那是欧洲的一支最精良的军队。而今天，我手下的却是一群乌合之众，我不再是统帅，我的将军们都是无能之辈。军官们已没有统帅，我的部队都十分低劣，”这是一种全盘否定的评价。尽管如此，战争还是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如果人们对俄国军队进行评价的话，那也是一支糟糕透了的军队。但是它还是一直坚持下来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士兵的质量，人是永恒的。因为，士兵的质量不是表现在某次沙盘作业上，最终是表现在克服难关中的士气高低，表现在它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这是取得任何胜利的关键如果天才没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作基础也会象鬼火一样一闪而过。这是在人的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如果忽然心血来潮，计上心来，但不具备一种坚定的气质，没有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那也将是一事无成，只不过是碰运气罢了。情况顺利，就情绪高涨，遇到挫折，就会泄气，就会立刻将一切都放弃。因此，这种碰运气的人创造不了世界历史。只有在聪明的理智、活生生的良知和永不松懈的警觉的后面，还具备一种狂热般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能够创造世界历史。信念的力量会使人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斗士。这样，在危急时刻，他就感到有一种东西在指引着他，使这种质量得以体现。有一部分人不喜欢这样，这就是坏的一部分。而好的一部分人会问“ 我们为什么做出全部牺牲？战争不能再这样延续下去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住这场战争，我们不能，其他人也不能。问题是谁能够忍受得长一些。孤注一掷的人肯定会忍受长些。我们正在孤注一掷。如果有一天换另一个人说：我们厌倦战争了，那时他没有多大关系。如果美国说：结束吧，我们再没有年轻人送到欧洲去了，那么对它没有多大关系，纽约还是纽约，芝加哥还是芝加哥，底特律还是底特律，旧金山还是旧金山。一切都不会变。但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打腻了，不打了，那么德国就永不存在了。”……

希特勒的这些话，是表达他一般的政治和战略纲领的另一种说法，这一纲领在战争的全过程都在指导着德国领率机构的行动。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没有一字提到武器。至于决定战个胜利的时刻何时到来，能够决定德国命运的人，自己也被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主观愿望所迷惑。首先，他期待着敌方联盟的上崩瓦解，而且总是把很多事情都视为这种瓦解的征兆。第二，他总是“ 信赖 ”自己的“ 神奇武器 ”。毫无异议，这些武器是德国设计师和工人所创造的值得赞叹的成就，但是绝不能与后来使用的能“ 闪电般的 ”取得决定性作用的原子弹相媲美。

如果说希特勒的这种思路，还向人们指出了几分政治上的前景，那么，建立在这种松散基础上的军事计划，就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时的良好愿望，没有丝毫的生命力。德国大本营及其领导，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仍被东、西两线牵来扯去——一方面要在广大地域内不断投入新锐兵力，一方面是军事物资和兵力的匮乏，一方面是灭顶之灾即将降临，又沉浸在强大军队源源开往前线的幻觉之中①。虽然到最后，希特勒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尤如一付骨头架子，但他那魔力般的意志却一直在统辖着一切，那台指挥机器还在沿

着原来轨道运转，而且除了国防军之外，德国人民也还不断为它作出牺牲。

除了他漫无目的指挥之外，他还下达了最后一批疯狂而荒唐的命令。为了对盟军轰炸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报复，并激励他的人民做最后的抵抗，他还宣布他要退出日内瓦公约。1945 年 3 月初，他还从阴暗发霉的总理府地下室里，对他的士兵进行了软弱无力的恫吓：凡是未受伤而被俘的军人，其国内的家属将要受到惩处。1945 年 3 月 19 日，希特勒又命令：不要顾及本国人民的生活需要，炸毁全部交通和供给设施，不留给敌人一块土地。在他自杀前的 14 天，即 1945 年 4 月 15 日，他还向打了 5 年半仗的东线士兵公布了一条纪律，并将其作为誓言：

> “不管是谁向你们下达退却命令，就立即将其逮捕，必要时就地干掉，不管认识与否，也不管他军衔有多高”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凯特尔，作为军衔最高的军官了解这场战争的全部发展过程。他在纽伦堡审讯中曾说过：

> “在这一尝试（指 1945 年 3 月这段时间）失利后，德国的失败已肯定无疑了。只是作为军人要履行自己发过誓的义务，我和我们大家才被迫继续进行战斗。”

早在 1 月中旬，敌人还没有停止在西线的进攻行动之前，德国领率机构就曾多次地——尽管是违心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东线。12 月 24 日，即在阿登会战高峰时期古德里安大将来到“鹰巢”，对希特勒第一次提出告诫。因为苏俄红军已长驱直入占领了匈牙利的西北部，并将布达佩斯包围。在此情况下，古德里安认为，坐阵在德国大本营的希特勒，对于东部战场的形势并不完全了解，他所掌握的只不过是第二手材料。但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氏约德尔对这次汇报的记录来看，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就匈牙利的问题进行了商谈，并为此从国防军统帅部的战场抽调一些兵力。实际，古德里安大将前来“鹰巢”的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汇报说明，面对俄国人咄咄逼人的优势兵力和跃跃欲试的进攻，德国必须将尚存的军事潜力立即全部转移到东线。同时，他还推测红军的进攻日期可能在 1 月 12 日。古德里安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强烈的冲动，以及他对抛弃德国东线所持的反对态度，都证明这位陆军总参谋长的意见是正确的。以后发生的事情也毫无异议的表明，德国最高领导从未考虑过，在东线俄国一旦越过匈牙利，向前推进，会构成什么样的危险。希特勒不相信会有这种东线谍报处长格伦将军一再核实的红军兵力和企图冠之以“厚颜无耻地恫吓”、“十足的白痴”而加以驳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大概也认为，尽管德国在西线屡遭挫折，但仍保持着进攻态势，而且至少能使敌方胆战心惊，从而为己方赢得喘息机会，这对东线重新部署兵力大有好处。他的这一态度始终未变。不管是古德里安在除夕之夜口头汇报当中，还是 1945 年 1 月 9 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发言人在形势座谈会上，都一再提到在巴拉诺夫的维斯瓦河桥头堡正在构成一个巨大威胁，约德尔的观点还依然如故。只是当东线主要战区不断缩小，陆军的兵力再次归由陆军总参谋部统辖时，约德尔的思想才稍有变动。约德尔更加注意聚集“他”在西线的部队，并尽可能用从芬兰和挪威解脱出来的兵力补充这些部队。而古德里安——也正象他写的那样，“带着希特勒下达的东线必须自助的指示”回到措森。

俄国的大规模的“巴拉诺夫攻势”开始 4 天后，俄军转眼间到达了上西

里西亚和奥得河中游。只是到这时，德国大本营才根本改变了以往对形势的看法。1 月 15 日傍晚，“ 鹰巢 ”大本营在起程之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象往常一样，仅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

“ 19 时 20 分、古德里安来电，紧急请求将一切都投入东线。 ”

日记接着以了草的字体，简短地记下了根本无法实现、而当即要实施的决定：

“ 元首要求采取强制手段，迅速从利包（库尔兰）运去 2 个装甲师和 2 个步兵师 ”。

当天，希特勒还决定将党卫队第 6 装甲集团军从阿登调回，“ 开往匈牙利，去守卫在战争中起决定因素的油田…… ”对于几周前，希特勒背与陆军总参谋长直接下达命令，从东线中路调出一个党卫队装甲军开往匈牙利一事，古德里安大发雷霆。在大本营迁回柏林总理府的当天早上①，古德里安就当面对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表示了自己的愤慨。然而，约德尔却无动于衷，连肩都没有耸一下。在作出从西线抽调少部分后备兵力，不首先去守卫德国东部边界，反而将大部分兵力源源调往匈牙利的决定一事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否参与、这里无须讨论。但无论怎么说，他是让古德里安在反对这种安排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凯特尔在战后受审中，对大本营中的这一事情的始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希特勒认为“ 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安危，具有决定意义 ”。按照他的观点，“ 宁可丢掉柏林，也不能让匈牙利的石油和奥地利受到损失 ”。

身为最高司令的希特勒对东线的迅速崩溃似乎自知负有罪责而大发雷霆。1 月 17 日，当他得知驻守华沙的 4 个营，未经他的允许和特别命令已澈离华沙时，咆哮如雷，不能自制。古德里安写道：“ 他对可怕的形势完全失去了兴趣，而对华沙的恶运耿耿于怀……唯独要惩罚陆军总参谋部的所谓失职。 ”希特勒对古德里安说，“ 我不想对您怎么样，我是要谴责总参谋部 ”，“ 我不能忍受智囊团的自以为是，硬要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上司。这倒是总参谋部的体系，我要铲除这个体系。 ”希特勒不顾古德里安的异议，下令逮捕了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冯 · 伯宁上校和两名中校助手。就连古德里安自己也在几天之后受到当时著名的保安局局长卡尔腾布鲁内尔和米勒的传讯。结果，伯宁却被关进集中营，直到战后也没有再出来。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没有直接参与这些事件，因此它的军官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继 1945 年 1 月 22 日华沙事件后，他们为希特勒所拟制的下列指令：

“ 我命令：

1、各位司令、军长和师长在下列事宜上要对我负责，尽早向我报告。

a）作出每一次战役机动的决定；

b）师以上单位计划实施的任何一次在最高指挥机构指令以外的进攻；

c）在平静战线上实施的、任何一次超出正常突击活动的、旨在吸引敌人注意力的进攻行动；

d）计划实施的任何一次退却和撤离行动。

e）每一个放弃居民地支撑点阵地或要塞的计划；

以便我能参与上述决定的作出，使可能作出的相反命令及时下达到先头部队。

2、各位司令、军长和师长，各军种总参谋长和每一位总参谋部军官或在各指挥参谋部工作的军官，都应对我负责，在每一分直接或通过正常程序呈送于我的报告，都要阵述真情。以后我将严惩任何掩饰真情的行为，不管它是有意还是失职，或是粗心造成的。

3、我必须指出，保持通信联络，尤其是在艰苦作战和危机情况下，是作战指挥的前提。每个部队指挥官都要对我负责，无论是对上级指挥机关，还是对下级指挥机关的联络都不应中断，要利用一切手段以及亲自出面，保持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在任何情况下的畅通。”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可能认为，依靠这样的命令就能够完全控制远在千里之外的国防军——或者更确切他说——陆军的行动。很显然，他的这可憎的条文，是一种对总参谋部军官，以及他们精神和道德上的独立性的仇恨。他所提出的部分要求根本无法付诸实施，反而为他任意进行惩处制造了口实。

就在这道命令下达的当天，为了阻止从东线溃退下来的败兵，希特勒又任命希姆莱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这是在陆军中又一个新设立的高级指挥机构，据说是根据古德里安的建议组建的，目的在于“封闭”俄军在进攻中“打开的缺口……阻止俄军向但泽方向的突贯……阻止其切断东普鲁士与本土的联系，保障新的增援兵力的开进”。总参谋长本想把这一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交给已被解职的东南线总到今冯·魏克斯元帅，而且还似乎听约德尔说，希特勒对此建议表示支持。可是当陆军总参谋长到大本营向希特勒提出这一已经取得一致的建议时，使他“大失所望”。他写道“遗憾的是约德尔对元帅的虏诚进行了贬低，使得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建议，并任命希姆莱担任这一职务。”占德里安对希特勒这种“错误决断”的任何“惊呀”都无济于事，直到希特勒不久看到希姆莱完全没有能力解决军事情挥上的问题。

在“东线”的其他事情上——现在的所谓“东线”仅折德国的乐部国土以及不久的中部——希特勒和古德里安之间在防御问题以及对俄国占绝对优势兵力实施反攻的问题上，不断发生激烈地争执。每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都袖手旁观。对于德国的两线战争——现在已经在德国境内进行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似乎没有采取过任何积极措施，也没有发挥过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匈牙利南部的进攻作战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才在作战兵员的补充上发挥过一定程度的作用。然而，作战兵力之所以有所增加，也主要归功于冯·魏克斯元帅，特别勒尔大将。正是在他们的命令下，东南线部队全部撤离了被敌人占领的巴尔干广阔地带。

在霍斯巴赫将军的问题上，约德尔曾平息过希特勒怒气。霍斯巴赫将军在战前是国防军的副官长，没有经过希特勒的允许，他便回到总参谋部操起本行，而且从团长一直晋升为集团军司令。正好在希特勒下达“监视命令”的当天，他自做主张，将部队撤离纳雷夫河突出部，将他的集团军撤至维斯瓦河。结果，只是解除了霍斯巴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同时他的上司，集团军群司令赖因哈德大将也受到牵连，被解职。

值得提及的是，在当时的数周里，也正是同盟国在雅尔塔重新瓜分欧洲大陆之时,德国大本营突然想起利用 1942 年夏季被德军俘虏弗拉索夫将军的宣传作用，来反对苏俄。当时，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新闻宣传处长韦德尔将

军的领导下，尽管做了长时间的努力，支持弗拉索夫关于成立“解放军”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想法，但结果都一无所获。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也不想为尔后的欧洲“析秩序”’承担可能束缚他手脚的义务。就连约德尔也在 1943 年 11 月对“纳粹省党部头目”的讲话中说：“人们在征召外国人民作战士的时候，必须持谨慎和怀疑态度”。只是当希姆莱掌管外藉部队时，才干 1944 年 9 月与弗拉索夫达成协议，由他在短时间内组建一二个师，但为时已晚。即使这样，希特勒和戈林对这部分力量，依然另眼相看，在 1945 年 1 月 27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就曾谈到这一问题。下面是第 24 和 25 号记录稿的片断。

占德里安：费拉索夫想发表一些见解。

元首：弗拉索夫根本没有什么见解。

戈林：他们不应当穿着德国的军服到处乱跑。到外都是年轻人，大显眼了。只要随便一抓，就是弗拉索夫的人。

元首：我就反对给他们穿上德国军服。谁同意这么干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我们可爱的陆军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

戈林：他们正在到外乱跑。

元首：我不能给他们换上军装，我们没有那么多军装。我想起了当时的外国人……但在我们这里，冯·泽克特先生竟向中国人兜传德国钢盔，他根本没有自尊心。给每一个穷光蛋套上德国制服，我反对。我一直反对给哥萨克人穿上德国军服。他们应当穿哥萨克人的军装，佩带哥萨克人的标志，以便能看出来，他们是在为我们战斗。这也富有浪漫色彩。英国人也不喜欢印度人穿英国服装。俄国人穿德国军服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耻辱，因为这样就失去了特征。

戈林：弗拉索夫的人在那边确实很仇恨他们的政权，如果他们被俄国俘虏，一定会遭到惩处。

元首：您不要这样说，他们还会投奔过去的。

戈林：跑过去的人，只是个别的，多数人不会。

古德里安：正在蒙辛根组编的师是不是应当加快完成？元首：是的，应当完成了。

费格莱恩：党卫队领袖想统帅这 2 个师。

元首：不能交给弗拉索夫。

戈林：他们多数人都不可能投降的……

德国“最高领导层”的这种意见，似乎也有他的理由。约德尔在 2 月 12 日的日记里写道：

> “关于弗拉索大部队投入战斗的宣传报道，是对俄国人的警告。”德国大本营及其军事参谋部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不是立足于一个认真制定的统一的战争计划，因此在作战指挥上，其中，也包括对国防军统帅部战场，只不过纠缠于细枝末节，横加干涉和进行无休止的批评。在北线，德国国防军成功地从芬兰撤离，并巩固了灵恩峡湾防御阵地之后，只剩下一项任务，即协同海军，尽可能地将大批德国部队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运回本土大陆。然而，由于希特勒仍然担心盟军在挪威登陆，结果在 1945 年 1 月，走了回头路，又将一个滑雪旅派往挪成。与此同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在他的参谋部里就能否和是否应该继续防守挪威的全部海岸线和边界问题进行了考察。然而，希特勒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禁止从北部撤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停战为止。
>
> 在东南线，希特勒要求，在完成大规模撤军之后，还要继续坚持前沿阵地。结果。

德军与南斯拉夫部队在最后一次作战中损失惨重。数万官兵连同其忽司令勒尔大将，在意大利北部边界地区被敌人俘虏，后来有一部分被转交给同盟国。作了游击队的俘虏，其出路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意大利，尽管东线和西线遭到震撼人心的失败，而且最高指挥又抽走了一些部队，但西南线总司令仍然坚持他原来的任务。只是当凯塞林元帅重返西南线总司令职位时，才与大本营一再强调的方针取得一致看法。这项于 1945 年 2 月 22 日下达的方针指出：“元首……从不……赞成作战久拖不决……因为在现在的时刻，它将意味着部队士气和斗志的瓦解”。这样，3 月初到任的西南线总司令——凯塞林的接班人——冯·菲廷霍夫大将，在他所提出的异议遭到否决后，也不得不勉强执行这一决定。当 1945 年 4 月 9 日盟军开始发起最后的大规模进攻时，由于德军缺少燃料，集团军群失去机动能力，大本营的这一方案也随之告吹，盟军遂于 4 月 21 日占领博洛厄亚，广大的波河平原也就在他们的眼前。国防军统帅部下达的撤到阿尔卑斯山脉南缘的命令也为时已晚。在此时期间已被分隔的“南线大本营”，于 4 月 26 日—29 日，向部队发出最后号召，要求他们“发扬战斗意志”，“进行顽强抵抗”。然而，在此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之下——而且墨索里尼在逃往瑞士的途中也被击毙一——“大本营”的号召成了空话。5 月 2 日，南线总司令自己做出决定，与盟军签订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停火协定，停止了力量悬殊的较量。

此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继续为西线奔忙。在那里，盟军在停止进攻数周之后，于 2 月份又按统一作战计划，集中兵力开始了向德国本上的突击。此时，希特勒仍墨守陈规，坚持他已经下达的僵硬的指令，命令在没有集团军司令部允许的情况下，”任何 1 个士兵，1 架飞机，1 支枪”都不得逾越莱茵河向东退却，部队必须原地坚守。而在西壁工事内，由于德军为数不多，终被敌人包围，集团军的余部，尽管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在莱茵河前沿阵地上全军覆没。3 月 7 日，美军突然向完好无损的雷马根大桥发起进攻。希特勒妄图纠集 B 集团军群全部可以集中起来的兵力，将侨头堡摧毁，并以临时军事法庭和死刑对西线总司令进行威胁。但结果，盟军于 3 月 22 日夜，在多处轻易地渡过了莱茵河。

希特勒选中凯塞林元帅作龙德施泰特的接班人，并于 3 月 10 日，在柏林总理府地下室任命凯塞林为西线总司令。在会上，他说什么“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唯一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直到文克将军指挥下的新编第 12 集团军、新型歼击机和其他新式武器大量投入战斗。”接着，他命令西线总司令“守住”并除掉雷马根桥头堡①。在后来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人们竟还指望德国在英国海峡群岛的防御再坚持 1 年之久。而在此期间，凯塞林仔细巡视了他位于齐根贝格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于 3 月 15 日返回柏林。然而，他对于前线的实际情况和困难所提出的有针对性的建议，以及前线供应紧张的问题，却很少得到希特勒的理解。约德尔大将在他这一天日记的结尾处，对凯塞林的汇报评论：

“凯塞林想获得将第 416 师撤回的权利。元首没有批准，但说，如果第 416 师受到从北部被切断联系的威胁，就必须撤回。”

在这种一切都孤注一掷的形势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这一记载，真使人感到惊异。这说明希特勒本人还在继续到处发挥他的影响。在凯塞林的笔录中，对于希特勒的这次谈话，也作了这样的记载：

“当 3 月 15 日夜里，我从元首大本营返回时，我觉得，希特勒仍毫无动摇地指望着东线防御的成功；对西线的态势他也不感到意外和不安。因为他认为，在巩固了东线的态势之后，就能以腾出来的兵力和新组建的部队，来解决西线问题。他认为，无条件地执行他的命令，就能改善补给状况。”

关于在这段时间里在大本营的气氛和活动，在盟军渡过莱茵河不久，即1945年3月23日约德尔的日记里和一次形势讨论会的记录稿中，均有所记载。在约德尔这一天的日记里，只有关于一些一般的细节的记载：

“第559（师）还有14辆坦克、第190师还有4个营和3个炮兵营，14个弹药排和18个喷火排。”

接着，日记模仿希特勒的口气，谈到了一些非军事的内容，即要感谢鲁尔区工人在军事经济中所取得的成就，赞许他们在长年的空袭恐怖之下坚持工作的精神。日记写道：

“莱茵区拥有125万工人。他们没有事干，没有吃的，没有事可做——他们只好去修路”……

在高级军官中、只有国防军副官民布格多尔夫将军参加的大本营形势讨论会。这次形势讨论会除了谈论许多细节外，还涉及到一些其他事情。

元首：事实上，我看最大的危险在于第二个桥头堡，奥彭海姆桥头堡。

布格多尔夫：因为他们也很快有了架桥的装置。

元首：是一座舟桥！

赫维尔：因为菜茵河并不是很宽。

元首：最宽只有250米！在河的急流处，只要有一个人思想开小差，就会发生可怕的不幸。上游桥头堡似乎倒可以为救出几支部队创造条件。如果这个桥头堡不存在了，同时敌人集中全部兵力向朵茵河南面突击，那一个人也救不出来。目前，从工事向外突击的机会已经过去了。这儿的指挥干得太蹩脚了。他们在部队中灌输了一种思想，认为在开阔地带战争要比这里强得多。

布格多尔夫：帝国部长戈培尔博士请求，准许他能在柏林的东西轴线上扩建飞机跑道。为此，有必要拆除道路两边的枝形路灯，只需在离动物园20米处安上路灯即可。他认为，这样对将来扩大东西线轴有利。

元首：他可以这样做，但我不认为，这有多大必要。有 50米宽就足够了。

山德尔：我这里只有与冯·汉克①最后三次通话的记录（将记录呈上）。

元首：我想要最后全部通话记录。

山德尔：它们都存在党务办公厅的备用住所里；我必须提出请求，才能得到。

元首：您必须立即提出请求！这有一份刚收到的电报。他在电报里说，敌人使用了重型武器。对此，我们根本没有对付的办法。他请求重型火炮的支援。这真是有病乱投医。重型火炮应由集团军群来掌握。因此我要立即命令他们从中央出发，而且要确定一下，重型火炮是不是已经到了？布勒干得很出色。集团军群没有重型火炮，要运输这样的重型火炮可要花很氏的时间。因为不能将整个炮身一下子运走，要拆开来运，然后再组装，否则无法运输。实际上，人们最讨厌运输。现在有言在先，如果将重型火炮运到，炮弹也无法运去。实际上，现在只有6架运输滑翔机可供使用。但是，汉克是个坦克手，他对重型火炮一无所知，如果他们真的需要武器，能确保用重炮将敌人轰出来，那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运不去这样重的大炮，而且也不能运去比重型火炮更为有效的武器。如果只能运去18发炮弹，那只是一堆废物。就算每门重型火炮用一发炮弹摧毁一座房子，以及房子下面的地下室，18发炮弹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布格多尔夫：帝国部长戈培尔可以动工吗？

元首：可以。但我不理解，为什么非要加宽飞机场？“歌利亚”①也不

降落在那里，52 米宽就足够了嘛。

冯·贝洛：如果以后 JU—52 型飞机被迫在夜暗中降落，有枝型路灯就困难了。

元首：把枝型路灯从动物园的两边的 20 米或 30 米处砍掉……

冯·贝洛：这是很必要的。

元首：但并不需要 50 多米宽。那么宽是没用的。因为动物园的两边根本就不能加固。这么干是毫无目的的。约翰迈尔：那里只有人行道，再有就是斜坡。

冯·贝洛：光加宽 20 米，我认为也不行，必须清除路旁的枝型路灯。

元首：他可以挪走路灯。

布格多尔夫：我将转告他。

元首：我想起来了，在东西轴线上，也可以起飞 Me—162 型和 Me—262 型飞机。

冯·贝洛：是的。就长度（东西轴线）来讲是可以的！赫维尔：但不能算凯旋柱。

布格多尔失：凯旋柱也必须拆除。

元首：到凯旋柱几乎有 3 公里远，够长的了。……

布格多尔夫：我还有个问题。由于冯·古德里安休假，这些天您有什么打算？

元首：我想得到医生对文克的最后诊断。他曾用脑袋担保：在一段时间里，他能够恢复健康或是不能。他们说，他可以离开医院，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定要动手术。冯·贝洛：元首，这段时间您在哪儿？不去上萨尔茨山躲避一下？

元首：是的，但是一切都会过人。这是我们最后躲避的一个地方。地下室也不能作我的房子用，但全部设备部得搬走，如果有一天措森被炸毁了，我们去哪儿？如果他们对措森进行猛烈攻击，那就完了。其实，措森的大部分已经完了①布格多尔夫：措森的房子还可以使用，所有的房屋都还在，简易营房也不足够。如果营房也被炸毁了，那就彻底完了。

元首：我看到过一幅照片。那是一垛一米高的混凝土墙。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军用混凝土。只要一立起来，一般的炸弹休想摧毁它。

布格多尔夫：我曾在那里做过客，没有注意帝国空军的设施；但我觉得在柏林近郊建造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简直是胡来。因为除了您，我的元首。搬进去两个指挥参谋部都可以。在万湖旁边，即老防空学校那里，他们修了一个 3.5 米高的钢筋混凝土掩体所，共有四层，一层在地下，三层在地上。这是我偶然看到的。

元首：他到现在还对我完全保密。

布格多尔夫：拥有 6000 名伞兵的 2 个营，今天由亚平宁山出发，准备在博岑地区上车。但这些日子，由于人们计算受到空袭的干扰，估计这批伞兵到达博岑地区要 3 天时间。空车要利用上，但大部分必须步行走到博岑地区。

元首：他们在 3 天之内到不了博岑。从出发地点到博岑有 3 个星期的路程，20 天或 14 天，至少得要 10 天。布格多尔夫：从特利安到博岑只有一天的行军路程。布鲁德米勒：目前计算时间很困难，而且很少有空车回来。

因为现在他们很少开向前方。

布格多尔夫：他们能不能分段开向车站？他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只带了

些轻武器。

元首：问题是，隶属于这 6000 人的另外 7000 人，一到指定地点，就能编人部队，这 6000 人在半路上就已经得到通知，应编人到哪一部队。就防御来讲他们无论怎么说是适合的。

两个师能够到达指定地点，另外两上师也必须有所安排。

……

元首：现在必须十分准确地定下来，由外国人编成的部队到底怎么样，例如弗拉索夫师，是起了一些作用，就必须把它当成是一个完全有用的师。要是没有用……我们用 1 万或 1.1 万人的装备，去武装一个没用的师，而我们却不能组建德国师，因为我手里再没有武器了，那我们真蠢透了。要是那样的话，我情愿组建 1 个德国师，配备足够的全套武器装备。

博尔格曼：“ 还有 1 个印度雇佣军团。

元首：印度雇佣军团，那是开玩笑。印度人连虱子都不会抓，情愿挨虱子咬。他们也不可能杀死 1 个英国人。把印度人计算在内，简直是胡闹。印度人在我们这里作战，怎么会比在博塞①领导下，在印度作战更勇敢呢？他们在泽率领导下，到缅甸去作战，是为了将印度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在那里象绵羊一样任人摆布，在我们这儿怎么会勇敢呢？如果让印度人去摇喇嘛经简或干类似的事，他们倒称得上世界上最不知疲倦的士兵。可是要说把他们投入到真正的流血斗争中去，那才是笑话呢，印度人怎么会有本事？另外，这也是胡说八道。如果武器充足，倒可以出之于宣传，开开这样的玩笑，但我们的武器并不充裕，就不能开这种宣传玩笑……

博尔格曼：托马勒将军和布勒将军报告说，当前还是没有一支部队准备就绪，可以向奥彭海姆进发。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军营里有 5 辆猎虎式坦克，今天或明天准备就绪，后天可以投入使用，大后天还要增加 2 辆，这样部队可以有 7 辆猎虎。

元首：这几辆都在威斯特法伦州军营？

博尔格曼：是的。

元首：他们将使用在上游桥头堡。

博尔格曼：是的，用于雷马根，由第 512 营使用。元首：什么时候启程？

博尔格曼：今天或明天准备就绪，似乎明天晚上他们才能够出发。

元首：我们就预定为明天吧……

敌人在西线攻克莱茵河屏障，以及在东线粉碎了德国反攻之后，便开始对德国内地发动总攻。面对这种形势，德国领率机构仍坚持守在他们那脱离现实的艺术之宫。在德国人民的末日已经到来的时刻，希特勒仍要实践战争的最后含义——在他认为，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证明是劣等的民族，就没有权力存在。在这种思想面前，年轻人的牺牲，国土的沦丧，潮涌般的难民和恐怖的轰炸，就显得轻如鸿毛了。只有占德里安进行了绝望的尝试，妄图结束这一恐怖局面。3 月 28 日，他再一次在其下属的支持下，以“ 刚直不阿 ”的气概挺身而出。但也就在同一天，他被解职，离开了刚刚熟悉几个月的环境。在这件事情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次站出来，为国防军和陆军总参谋部的分裂和双轨制，在中间进行调和。新任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在敌人轰炸措森时负伤尚未痊愈，便担负起希特勒的“ 东线 ”顾问的角色。4 月 25 日，当敌人东、西两线兵力在托尔高会师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陆军总参谋部才被摧毁，克雷布斯也在柏林的混乱中死去。当作者缅怀

与克雷布斯 10 年之久的友情时，希望克雷布斯的坚强的性格和诙谐的谈吐能减轻他在希特勒身边数周的日子里，所承受的重负。

在此期间，大本营的影响和装腔作势依然如故。此时，每天仍举行两次形势讨论会，但中午形势讨论会。一般都要推迟到下午，晚上的会则推迟到午夜时分。在 4 月初的形势讨论会上，认真地讨论了是先“在威悉河组织防御”，还是先保障与“荷兰、埃姆登和威廉港的联系”的问题。第二天，消息传来，明登和尼恩堡防线被突破”，敌人在威悉河上构筑了四座桥头堡。4 月 9 日，柯尼斯堡失陷，作为该城那些不怕死的保卫者的最后报酬，是被希特勒全部判处死刷。当 4 月 13 日维也纳被占领后，又再次出现了“柏林永属德国；维也纳仍会回到德国怀抱”那句老生常谈的宣传口号。前天的罗斯福之死，似乎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给希特勒和他的亲信们带来了巨大希望，他们希望敌人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在七年战争中，俄国女王伊丽莎白之死使其同盟土崩瓦解。①

4 月中旬，当俄国人大举进攻柏林，帝国首都受到被包围的威胁的时候，德国大本营的指挥体制发生了最后一次变动。“鉴于集中指挥的闲难”大本营采取预防措施，于 4 月 11 日“建立了外围指挥部”’分别负责北部和南部地区。第二天，邓尼茨海军元帅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必要时可将海战总部迁离海岸。紧接着在 4 月 15 日，国防军统帅部下达了关于在敌人东、西两线兵力会合后如何保持德国中部的陆上联系的具体方针。由邓尼茨领导的北方司令部、对东线和西线的北部段，对丹麦、挪威和帝国航空队，拥有最高指挥权。由凯寒林领导的南线总司令部，分管东、西线的南段，东南线、意大利和第 6 航空队。但这个新的指挥机构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权对两个地区行使最高指挥权：要么希特勒本人没有在某一地区内；要么有希特勒的亲笔指令；或者是无法进行通信联系。

这一新的规定只是部分地付诸实施。4 月 20 日是希特勒诞辰。自 1941 年因希特勒的生日己不再特别重视，只是平时的那帮人来到总理府聚一聚。他们按照戈林，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的顺序，奉命……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会议室隔壁的希特勒小间卧室里，向希特勒表示生日的祝贺。”两天后，俄国人突然逼近柏林近郊。希特勒声明，他决不离开柏林。这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回忆录中引用的希特勒的话。希特勒还效仿拿破仑的样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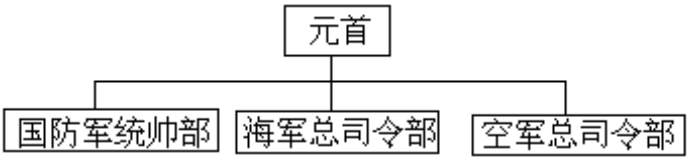
> “我将与柏林共存亡”。第二天，他又表示：“我要成为城市的最后一个保卫者。
> 要么，取得保卫帝国首都战斗的胜利，要么，与我的士兵一起埋葬在柏林”……

当 4 月 22 日傍晚，凯特尔动身组织文克的集团军为柏林解围时，仍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相信战争尚有转机的信念鼓舞着他。第二天，他与约德尔再次出席了帝国总理府的形势报告会，这对在 2000 多天的战争日子里始终不渝地站在希特勒一边的这两位人物来说，也是最后一次了。同一天晚上，当凯特尔和约德尔返回设在位于波茨但附近克拉普尼茨兵营的临时大本营时，发现他们负责北部地区的司令部，已由于俄国人的猛烈进攻而迁走了。

根据希特勒多次提出的关于决不能被围在柏林城内的明确要求，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部分人员和陆军总参谋部组成的、北部国防军统帅部”于当天夜里移至莱茵斯贝格和菲尔斯腾贝格之间的一座森林营地里。在此期间，邓尼茨与他的海军总部迁往普伦。根据希特勒一项新的指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取代邓尼茨，在这场战争小第一次担任部队司令官，与约德尔

一道，执掌北部地区的指挥大权。尽管前线违命的事例日渐增多，但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其职位上，仍倾注一切力量，进行着指挥、组织、撤换指挥宫，又任命新的指挥官。其间凯特尔负责各处巡视，约德尔则坐镇司令部。他们通过专线电话和电报与希特勒保持着通信联系。现在，他们以及希特勒都相信，照此十下去，不仅柏林，就连帝国的防御都能继续进行下去。

在这些天里,约德尔大将获得了他 10 年来梦寐以求的荣耀——尽管已经太晚了。他在 4 月 25 日的日记里写道："24 日夜里，元首签署了有关指挥和参谋部合并的命令。"日记中还有一幅草图：



从草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三军中最大的、在战争中付出最沉重牺牲的军种——陆军的总司令部，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防军统帅部希特勒最后"任命"的陆军总参谋长，与希特勒一起被围困在柏林，已无法实施指挥①

国防军统帅部"南部梯队"仍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部分人员和陆军总参谋部组成，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温特尔将军领导，于 4 月 22 日傍晚离开措森军营。根据最新的安排，在贝尔希特斯加登的这部分司令部，应驻在"紧靠帝国元帅"的位置。在此期间，戈林代替凯塞林，担任了南部地区总司令。然而，他对他这最后一次权限的扩大，并不感到高兴，因为第二天，他被解除了全部职务，幸免被希特勒逮捕和枪毙。据说，戈林在一份电报里表示了他与西方列强开始举行谈判的意图。"党务办公厅主任"博尔曼抓住这个时期，来到柏林的地下室，向希特勒指控这个早已确定下来的希特勒接班人的背叛行为，从而为他尔后的仕途清除了一个竞争者。

国防军统帅部南线梯队一直到最后依然坚信，只有"顽强抵抗"，"坚持到最后一天"，战争才会出现转机。

4 月 29 日，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的司令部——北方地区最高司令部，下午被迫离开菲尔斯腾贝格的森林营地继续向北转移，傍晚时分在梅克伦堡的多宾庄园安营扎寨，23 时，收到了由柏林发出的最后一份有关军事的无线电报：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大将

1、文克的先头部队在哪里？

2、他什么时候到达？

3、第 9 集团军在哪里？

4、霍尔斯持集群在哪里？

5、他什么时候到达？"

签字阿遗夫·希特勒

这份电报虽然寥寥数语，但仍无法掩饰身在帝国总理府地下室的人们，即使在这一天仍然翘首期望首都的解围和自己解放的紧迫心情。

18 个小时以后，希特勒死去，他的尸体被随之火化。在这最后一刻，他的懦弱的气质也作了最后一次表现。

5 月 3 日一个由邓尼茨海军元帅领导的新的大本营在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成立。邓尼茨以政府和国防军首脑的身份，于 5 月 1 日颁布了一项甚

至对今天尚具影响的命令，为战争指明了出路。

> ……“我接管德国国防军三军指挥，立志将反布尔什维克的战斗长久进行下去，直至把作战部队和德国东部地区的数以万计的家庭，从奴役和毁灭中拯救出来。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止我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我就与他们无休止的战斗下去。”

最后一件具有历史影响的事件是，德国大本营的头目签署无条件投降书——5 月 7 日 2 时 41 分约德尔大将在兰斯签署投降书；凯特尔元帅于第二天午夜时分，在帕林一卡尔斯霍斯特签署投降书。

1945 年 5 月 23 日，即凯特尔被投入战俘营 10 天之后，帝国政府全体成员，以及德国大本营的其他成员也被逮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大本营随之瓦解。